黑色文庫 第四集





班旦加措 原著

雪山下的火焰

——一个西藏犯人的证词

黑色文库 劳改基金会出版

黑色文库 第四集

雪山下的火焰

——一个西藏犯人的证词

班旦加措 原著
夏加·次仁 撰写/翻译（藏译英）
廖天琪（英译中）
达赖喇嘛 序



劳改基金会
华盛顿
2003

目　　录

序　　言

达赖喇嘛

班旦加措的证词是一部杰出的关于受难和忍耐的故事。中国早期占领西藏时， 班旦原是一名僧侣，被逮捕时才二十八岁，到 1992 年他已经六十岁了才被释放。

在他三十一年的牢狱生涯中，班旦加措忍受了酷刑、难耐的饥饿和无穷无尽的“思想改造”，但是他始终拒绝向压迫者屈服。他之有勇气这样做，甚至能宽恕他的加害者，这不仅仅是西藏人天性达观的赐予，我想这跟佛教教导人们应当具有爱心、仁慈、宽恕，以及天下万物皆相亲相属有关，它是我们内心平和充满希望的泉源。

《雪山下的火焰》生动地展现了西藏当代历史和随之而来 1949 年的被侵占。班旦加措记录了文革的恐怖年代，以及他对难友们的深切同情。他个人可能被处死的威胁并没有吓住他，倒是那些他亲眼目睹的绝灭人性的残忍行为令他极为倞怖。

这本书能帮助许多原先仅仅风闻古老佛教的文明传统和结构遭到粗暴破坏的人，进一步了解实况。寺庙和内部藏书及文物的摧毁，不仅是西藏的悲剧，也是人类文化遗产的巨大损失。一些重新被修复的宗教机构所面临的各种压制尤其严重，僧尼们不能像以前独立西藏时代那样自由地研究和侍奉。从班旦加措的身

上，我们看到人类精神核心的人性价值，如善良、忍耐、敬业等还依然幸存了下来，他的故事给我们巨大的启发。

成千上万的西藏人跟班旦加措一样逃离了故乡。当他终于平安地到达流亡之地后，班旦并没有放弃信念，安静度日，他的正义感和因西藏人的遭遇而产生的愤慨使他不能平静。面对中国共产党多年来对西藏的抹黑和歪曲，他把握机会要向世界披露西藏的真相。

我相信很少有读者不会被班旦加措的故事和他的坚毅执著而感动的。跟班旦加措一样，我也是乐观的，我期待有一天西藏重新恢复成为一个和平的地方，人们能够和睦相处。我们也许无力单独达到这个目的，但是班旦加措显示了，我们并不是这样无助的，甚至单一的个人也能有所作为。因此，我希望读者能受到他的启发，对西藏问题产生同情与支持。

一九九七年五月于达兰萨拉

愿西藏人民的自由运动得到充满正义感的世界各族人民的支持！

班旦加措

在这本自传里，我实事求是地叙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入侵我们家园的是中国的红色集团，而不是全体中国人民。在正文前面的那篇短诗中，我用“野蛮的红色汉人”一词来从逻辑上表明了我在指责谁，因为所有的汉人都不是红色汉人。汉人中有不少充满正义感的民主人士和人权斗士，他们也同样成了统治中国的红色汉人政府的迫害对象。比如，在 1989 年发动民主运动的汉人青年和学生中的许多人惨遭红色汉人政权的杀害；象吴弘达先生和魏京生先生这样的人权活动家和民主运动人士也在红色汉人政权的古拉格里受尽了迫害，但他们从来没有动摇过为中国民众争取人权而奋斗到底的信念。我说红色汉人野蛮，决不是随意骂人或说气话，“野蛮”在藏语里称做“拉落”，意思是“没有人道主义信念和精神信仰”。

我在大狱里关押了33个春秋，书后附有检察院和法院对我的起诉书和刑事裁定书的复印件；书中有关我在监狱里遭受了什么样的酷刑，把我曾关押过的数所监狱的情况、遭受监禁的时间和年限、相关人物的名称等记载的准确性方面，我愿承担法律责任。

如书中所述，虽然我在大牢里受了33年的苦，但是靠贡确松（即佛界三宝）和嘉瓦仁波切（即达赖喇嘛）的庇护，我不但没有死在监狱里，而且有幸来到了自由世界。如果我们所受的苦，真给中国政府带来了什么利益，那样还算是做了一点善事。我真的不仇视那些迫害过我的人，他们也没有权利不听中共当局的指令，这一点我很清楚。再说，愤怒和仇恨不但不能减轻你所受的苦，而且会把你引入造孽之路。达赖喇嘛总是教导我们说，缺乏宽容之心和仇恨他人是滋生邪恶的源泉。尽管我自己的精神修养还离无恨的境界很遥远，达赖喇嘛的教诲总是帮我熄灭心中的仇恨之火。

红色中国最终要走上顺应世界潮流的民主之路，因为这是唯一可行的路，按理说中共当局应该认清这一点。旅居欧美的许多汉人朋友听过我们西藏政治犯的苦难经历及西藏的情况后，感触很大；他们中的不少人对我说，你在监狱关了那么多年，受了那么多的苦，我们深感惭愧，求你原谅我们。尤其是在高等院校里学习的汉人大学生表示，中国政府的做法真使他们感到惭愧。西藏自由学生组织的成员中也有汉人学生，这真叫我感动万分。在西藏和中国境内，越来越多的汉人关注西藏，这些都是事态向积极方向转变的迹象。乘民主与开放之风，促进中共红色政权的体制发生实质性转变是非常重要的。

如何解决西藏问题？如果按照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原则，把全西藏建立成一个高度自治的行政区域，让全体藏人享受名符其实的自治权，我确信，西藏问题将会引刃而解。如果西藏

问题继续搁在那里得不到解决，西藏人民也将继续会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最终这一问题必定会得到解决。再说，获取自由和人权是历史赋予西藏民族的权利，不管如何地遭到扼杀，终究会获得成功。

历史上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历史事实。比如，中共当局强迫藏人，说日升西山日落东山，因为受不了酷刑和毒打，藏人也许会这么说的，但日出东山日落西山这一客观事实，绝不会随强加的主观意识而改变。同样，整天大喊“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样的自欺欺人的宣传口号，既不会改变历史，也无益于解决存在的问题。自从中共统治西藏到现在，很多西藏人因如实谈论西藏的历史，被定罪为“分裂主义分子”并遭到囚禁。如果中国当局继续用强制手段维持现行的西藏政策，有关历史地位的争论不但将来还会出现，而且有人甘愿用自己的生命替历史说实话的现象不是不可能出现，这样下去，藏汉人民都会卷入更深的灾难中。因此，通过和谈，在合理的基础上解决西藏问题是上策。

*原文为藏文，由仁青塔西译为中文。

民不畏死，何以死惧之

——“雪山下的火焰”中文版序

吴弘达

1995 年 4 月 3 日美国众议院举行劳改听证会。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有一个政治实体，认真地、严肃地想听一听这些幸存者的故事，第一次关切这样一个类似纳粹集中营及苏联劳动营，今天尚存在于中国的劳改营。我安排了下列六个人作证：

一、唐伯桥：天安门运动中湖南地区的学生领袖，1989 年 7 月被拘押至 1991 年 1 月释放。

二、何凯玲（女），因信仰天主教，自 56 年起劳改 21 年。

三、蔡忠贤，天主教神父，自 1953 年起共劳改 33 年。

四、西藏喇嘛班旦加措，自 1959 年起共劳改 33 年。

五、刘欣虎，因其父为反革命，所以自十三岁起随父生活在劳改营。1964 年才满十八岁即被劳教二年。1974 年又以反革命罪判刑，前后 25 年之久。

六、吴弘达，反革命右派分子自 1960 年起劳改 19 年。

这六个受害者代表了不同种族、不同年龄、不同社会背景的人，在不同时期、不同政治运动中，被中共劳改的真实情况。中共使用了超出常人想像的野蛮及残暴手段，对他们的肉体及精神

加以摧残，但他们始终屹立在那里，成了人类对中共专制政权的历史见证。

1997 年我到波兰访问，曾问到 1945 年波兰被苏联红军“解放”后，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了维持共产党政权，在波兰有没有类似苏联古拉格、中国劳改队一类的镇压反革命的机制。波兰人回答说，它们国家不需要，因为波兰的反革命都送往苏联的古拉格。我又问，那么德国纳粹占领时期呢？回答：纳粹奥斯威茨集中营就在波兰。

中国共产党为了统治西藏必需建立劳改营。1959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占拉萨前，在青海（安多）地区已设立了许多劳改营，关押汉藏两个民族的人。在柴达木盆地，以西宁为基地向西一直到格尔木地区，一路开辟了十多个世界规模的劳改营。青海好似苏联的西伯利亚，大批汉族犯人由广东、上海、江浙、京津地区遣送来这里，造成了青海地区所谓 “人口机械性地增长”（据中共人口普查资料）。康藏（又称西康，康巴）地区的藏族犯人都送往成都、康定等地劳改营。西藏地区的劳改营是 1959 年开始建造起来的，西藏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监狱（劳改营），这是中国共产党创下的历史纪录。相应地,中共还有另一个历史纪录是毁坏了无数的西藏宗教寺庙。

班旦喇嘛劳改了 33 年，释放时已 62 岁。他按西藏的传统自幼入寺做喇嘛。1959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镇压西藏暴动时，28 岁的班旦喇嘛被控支持暴动，判刑七年；1962 年企图逃跑，加判为十五年。班旦喇嘛曾被每天二十四小时上手铐、脚镣长达六个

月，后来为了强迫他编织地毯，解了手铐，脚镣保持长达两年之久。解了镣之后，他都不知怎么行走了。1975 年刑满被强迫留在劳改营就业。1983 年再次判刑九年。1992 年 8 月被释放。十三天后，班旦喇嘛翻越喜马拉雅山，逃脱成功。

班旦加措的三十三年劳改的故事实在一点也不复杂。他自小在农村成长，很原始的农村生活都不怎么使用钱币，火车、飞机从没见过。十岁当了僧侣，所有的文化教育来自经书及高僧。他在村里从来没有见过汉人，更不用说共产党。当时共产党声称要“解放”西藏，要穷人翻身，说是必须推翻阻碍社会进步的农奴主及僧侣集团。于是有一些人就成为“革命对象”，班旦加措就算一个。班旦喇嘛不愿意改变自己的信仰，这是中共政权最不能接受的。共产党说，目的是要把他“改造好，成为一个有用的社会主义新人”。但是，班旦喇嘛就是怎么也“改造”不过来，拖了三十三年之久。甚至把他押到杀人刑场，声称也要杀掉他，都无效。共产党还是仁慈的，没有如纳粹集中营那样设立毒气室，把人都杀掉。因为班旦加措是一个劳动力，可以织地毯、刷油漆、开石子、烧砖、最起码可以代替牲口来拉犁种庄稼，为国家创造财富。

少年读书时，背熟一句话：“民不畏死，何以死惧之。”当时经过师长的讲解，我似乎懂得它的意义。今天读过班旦加措的故事，我才深深了解了这句话的真谛。

感　谢

我深深感谢许多仁慈地帮助了我的人，更感谢那些还在西藏继续抗争的同胞们，以及冒着自己生命危险帮助我逃亡的人，在这儿我当然不能公开他们的姓名。

开始流亡以来，许多朋友鼓励我写书，我感谢他们的建议和提示。哲蚌寺洛色林学院的旺曲先生、帕拉甘曾和瑞士的加塘・坚赞先生[1]给予我支持和建议。对伦敦西藏办公室的达拉・格桑和次丹桑珠我深表感谢。

谢谢西藏信息网路的凯蒂・桑德斯、夏加・拉姆、达瓦才仁（鲍比）、提姆・能、劳比・巴尔赖特以及范・何尔顿、玛格利特・韩波瑞、德庆白玛几位人士的协助和威廉・菲勒斯为本书的英文版定稿。最后感谢哈维尔出版社的奎斯多夫・麦克勒侯斯、卡特林纳・比伦贝格、瑞裘・克尔及出版社的工作人员。

班旦加措 1997 年

[1] 西藏人的姓在名之前，中间加“・”以示区分，如加塘・坚赞。如果一个名字中间没有此记号，就是不带姓的名字， 如班旦加措。藏人的名字有两字也有四字的（注解为本书译者所加）。

诗　祭

班旦加措

献给体现佛祖慈悲的人
献给雪山守护神
你庇佑抚慰了雪域受难人
对你的仁慈和祝福
我内心的感谢沉重难负

邪恶化身的野蛮红色政权
吞噬雪山国
无法无天践踏国际法
雪域人们身心受凌辱
遭罪受难更哀泣
十八层地狱难比拟

相信真理、正义和善良的人
请群起奋进
让真理、正义和善良的呼声荡漾
让我们重享独立自由好时光

次仁东珠（藏译英）
廖天琪（英译中）

前　　言

在本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在更早的时候，西藏还给人们一种香格里拉化外世界的印象。它隐藏在喜玛拉亚云霄之中，激荡了多少冒险家、殖民地探测家、作家和登山者的心。标题带有诗意的有关西藏的书在全世界销售着，学者们也大书特书雪山国的神秘。在这众声喧哗的溢美声中，西藏人民的真正声音至今还只是一个苍白的回响。

班旦的故事既不是历史，也不是关于一个高僧独坐冰窖的神秘启示录。这是一个政权，假借了进步和意识形态的名义，非人性地残害一个人的故事。西藏不是唯一承受过这种恐怖经验的地方，这里发生的事只不过标志了人类史上又一个残暴的例子。在即将近入新的千年纪元时，这种苦难似乎还没有要从地球上消逝的迹象。

1950 年十月，四万名久经战火历练的中共士兵渡过金沙江，就如某位目击者所说，一举击溃了孱弱的，如“散兵游勇”的西藏军队。中国人宣布西藏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农奴制度下获得解放，完成跟祖国的统一。“解放”“统一”这些词语是用来掩盖军事进犯的政治化妆术。中国统治西藏是以两种基本思想为基石的：中国的民族主义，坚称西藏是构成中国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强调物质进化的思想。西藏人民的意愿是不在考虑范围之内的，或者根本就不在话下，这两种思想如此这般就将中国的武

力进占合法化了。按照所有殖民统治的原则，占领者搬出神的意旨，以解放的高尚名义，或将文明带给当地的人民为借口，来把入侵行为合法化。

学者和律师都能提出有说服力的论述来说明西藏始终是个独立的国家或者总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对于班旦和普通的西藏人而言，国际外交及国际法的漂亮说词于他们一点儿也不相干。按照他的普通常识，班旦知道西藏向来是单独存在的一个独立国家，它跟中国有着不同的传统、文化、语言和历史，对他来说，这个事实就如同牛奶和水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一样清楚。

小时候班旦听他伯伯讲故事，早古的时候，混屯初开，大风狂扫，把黑暗搅动变成海洋，中间冒出了一座山，这就是世界的开端。当海洋、陆地和高山形成的时候，第一个人类出现在泽塘，即今天拉萨南边的地方。这个关于雪山国的神话一直存在于西藏人的集体意识之中，加深了他们的独立观念，对那些年轻的抗议者来说，西藏就如同我们的宇宙一样古老。

在西藏的土地上有烤香的麦子，人们口中喃喃诵着大悲经，牦牛油，人们的笑声和母亲讲给孩子们的故事，这一切把西藏跟中国隔开了。对于班旦，这些比国际法和那些能决定西藏命运的强权更具有真实性。普通的平民男女有着天生的直觉，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真实的。

西藏跟中国的历史关系是复杂的。在中国那方面，近代统治者一直宣称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而西藏那方面总是反对这种说法。像班旦这样的人，他们认为西藏的独特面貌足以证明它是独

立于中国之外的。在西藏人们已经习惯于把外交这类事务交给统治精英去处理，只要这不干预到他们的日常生活。

对大部分西藏人来说，他们对中国的第一次经验是人民解放军的到来。或许看不到枪支，但人们知道敲锣打鼓和铙钹的嘈杂掩盖了枪声。那时候中国的宣传画上可以看到解放军跟西藏的农民快乐地在一起，中国士兵帮助“农奴”收割之后，抹着额头上的汗水。现实却是另一种景象，解放军把贫穷的藏民从躲藏的山中引诱出来，驱赶他们到地里工作。那不是一场军民相见欢的场面。

从 1950 年的入侵以来，中国把西藏人的整个生活倒置过来了。共产党说要改天换地，对藏人来说，这句话再真实不过。突然之间，新的思维和生活方式被强加到他们的头上，世界变色，安全感消失。有一段时间，人们以为某些新想法和价值的确有优越性，基督教、西方价值观和物质文明被强加给那些顽固地拒绝向进步投降的“落后”人民，这种人民自然不可避免地成为现代化的牺牲品。

中国人浸淫在这种现代化的信念中，追求一个社会主义的天堂，认为他们的行为是朝进步迈进。相反地，在这样做的时候，无数的生命被牺牲，家庭被摧毁，数以千计的寺庙被夷为平地，僧尼们被赶到劳改营中去充当可资利用的“生产力”。文革前后西藏在人命和文化遗产上所受到的损失是无法计算的。中国对西藏两千年深厚而有生命力的文化遗产的所作所为，其残忍性无异于活埋一个活生生的人。

今天，中国的领导要我们相信文革是“擦抢走火”，四人帮犯了错误，现在劳改犯人都被释放了，被毁坏的墙已经修复了，班旦却证明邓小平统治下的中国不比毛泽东好多少。站在守望台上的士兵被录像机所取代，棍子也换成电棒了。压制依然存在，只是手段变了。扎奇监狱的守卫有较好的设备，也接受了更高级的训练，但监狱高墙之后的监视还是一成不变。

老一代的异议分子挣扎着穿过了西藏的火焰，把责任交给年轻的下一代，他们又眼睁睁在党的监视下无畏地走进监狱。中共感到很迷惑，西藏人怎么还是继续地争取独立，他们认为桀骜的藏人不知感激。殖民统治者不能理解，一座发电站、新的运动场、迪斯科的灿烂灯火和五星旅店并不能重建人们的自尊，他们失去的文化遗产也不能失而复得。年轻的抗议者不会忘记他们父母辈的苦难和被剥夺的一切。

西藏人民为他们喜玛拉亚高地的文明感到骄傲，为它被摧毁而哀痛。他们自豪，并非因为在世上找到了一个乐园，也不是像许多支持他们的人士所相信的那样，以为西藏的社会是完美的。西藏不是香格里拉，它有着自身的缺点和瑕疵。我们的历史中有过短期的灿烂和深度的创造性，同时也伴随着许多不智的领袖，腐朽的统治阶级和贫穷的百姓，就像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一样。

对于一个国家没有比“奴役”它更具摧毁性了。西藏两千年的历史显示，它的人民完全有能力管理自己的国家，他们要按自己的理想来创建自己的世界。班旦的故事向我们展现了藏人的这种情怀。

我第一次遇见班旦是 1995 年，他造访伦敦时，我担任过他的翻译。他希望能在国际社会为他的国家寻求帮助。当时他已经在一个旧的记事本上完成了书的初稿。像大部分藏文书籍一样，他的书也记录了每个死去的人的名字和生死日期。班旦记下这些，为了要替那些不能活着讲述自己故事的人作证。他的英国之旅结束之后，我来到印北西藏流亡社区所在的达兰萨拉，我们正式开始撰写这本书。

我租了一个房间，班旦在往后的三个月里，每天来找我。他一进屋子，我就把录音机打开，录下我们的每一段谈话。最后我们攒集了 120 卷录音带，大约三百个小时的往事回忆。我把每卷带子用藏语誊写出来，这就成了本书的底稿。

首先我请班旦引领我进入他过去的生活，以便按照时序勾画出一个轮廓。然后我详细地追问每件事情的细节，以及他当时的想法和感觉。他坦然陈述，我能清楚地看出他的悲痛以及不习惯于在他人面前揭示自己而感到尴尬。他天性的羞涩令他不太愿意谈他自己，但我的工作正是要鼓励他说出自己的意见和感情。

为了保护那些有关的人，以及曾经帮助班旦逃向自由的人，我们把一些名字改了，并将一些事件的详情简化了。

夏加·次仁

1997 于伦敦

雪山下的火焰

序　　幕

好似我的一生都在为这一刻的会见作准备。

一个荷着李恩式来福枪，身上的咔叽制服在季风中抖擞的印度士兵在门外守卫。我等候了一会儿，就由一个着蓝衣的藏人青年查了身，一分钟之后，我就站在达赖喇嘛的面前。我有一种悲喜交集的奇异心情，知道如果不是我的国家遭受了重大的悲剧，我连做梦都不可能见到我们藏人称为救世主的达赖喇嘛。单薄的守卫，简单的一座平房，包裹在一层暗淡的雾里，达赖喇嘛的流亡居所跟我心目中故国的辉煌成了一个令人伤感的对比。

从离开拉萨以来，我就一直思索着将要告诉他哪些事。跟他说我的几次被捕经过？告诉他那些饿死的人和宁愿选择死亡的狱中同伴？也许该提那批为取得舒适生活和好处而乖乖听中国人话的西藏人？不不，告诉他青年的藏人在监狱中勇敢地抗议，但他也该知道有些藏人也充当帮凶，用拳头和电棍来虐待自己的同胞。这些作恶者也是藏人，同是雪山哺育的子民。

面对着达赖喇嘛，我发觉脑袋空空。看着他的袈裟和他慈祥的笑脸，我只低垂着头，他问话时，我才抬起头来。“你怎么逃出来的？”“什么时候第一次被捕？”“关在哪个监狱？”他先开始。我知道自己并不是站在他面前的第一个犯人，过去三十五年来，一批批藏人竭尽所能，越过喜马拉雅山逃亡出来，随后都来到了达赖喇嘛面前。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能见到他，向他倾倒脑

子里演练了无数次的心里话。每个西藏人翻山越岭到达逃亡终点，总是能够走过塔尔马克小径，来到达兰萨拉的接见室，将心中萦绕的话语吐露出来。

当我说了大约二十分钟之后，达赖喇嘛打断我："你应当把你的故事写出来"，他说。当时我还没有体会到这个建议的意义，我只是决定要把所受的苦，包括所有我知道在监狱里死去的人的名字写下来，然后把它当作文件呈给达赖喇嘛，让死者至少有一个记录。至于写书，却是我不曾想过的。

西藏有一个为伟大喇嘛或精神领袖人物作传的悠久传统。这类传记不仅仅给读者讲述有趣的故事，也蕴含精神上的启示，被当作人生指南，这种书的力量是人们所公认的。西藏有个说法："读了伟大的战士格萨尔王[1]的传记，乞丐都会被感动而拿起剑来，读了高尚的隐士米拉日巴[2]的传记，王子也会看破红尘。"

当我听到要我将自己的遭遇写成书的建议时，觉得很难为情，也怀疑人们会感兴趣。并不是我不愿意讲自己的故事，相反地，我逃离西藏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向世界发出声音。我在监狱中渡过三十年，经历见证了无法想象的恐怖，每个狱中人都希望，一旦外面的世界知道他们的苦难，就会赶快来把他们从地狱中解救出去。

---

[1] 传说格萨尔王（King Gesar）于十三世纪统治西藏东部的陵国，是莲花生大师的转世。他除暴安民，将有十二个头的魔王杀死。他的传奇被写成据说是全世界最长的史诗，诗长二百多卷。

[2] 米拉日巴（Milarepa）是西藏十一世纪一位传奇人物，他原先是个巫师，后来自己修炼成为一位高僧，被推崇为噶举派的第二代祖师。

在我的那个监狱里，大家常唱着："有一天太阳会穿过黑云。"想到太阳会驱赶乌云，我们就会精神振作活下去。也不只是狱中犯人这样想，在中共阴影下度日如年的寻常男女也如此。今天年轻一代的人并不知道封建时代的西藏，他们是党所谓的儿女，可是他们也呐喊自由。

我们有抵抗非正义的集体意志，它如同火焰一般不能被扑灭。我回顾以往，就能看见人对自由的珍爱，就如雪下暗藏的火苗。

会见了达赖喇嘛数天之后，我站在达赖喇嘛居所对面一座新的寺庙的庭院中。这里的藏人管这所庙叫大昭寺，跟拉萨最神圣的大昭寺同名。它依山而建，一些信徒们将所抢救出来的文物，穿过喜马拉雅山偷运出来，现在它们就挂在这里。

拉萨的大昭寺里有一座铜制的佛像，是七世纪时嫁给藏王宗喀巴的文成公主带过来的嫁妆，中国人十分看重这个历史事件。我记得在监狱里他们反复地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并强调文成公主把汉文化带到西藏，并将西藏跟母国统一。开始我们总是问："宗喀巴也娶过尼泊尔公主，那么西藏是否也属于尼泊尔？"不久这种问题被当局视为反革命行为，很可能又被加刑。

达兰萨拉的寺庙有很多活动，数十个老人手中拿着祈祷的转轮，围着神坛诵念着我孩提时代所熟悉的音乐，那是年老的信徒们喃喃念着六个音节的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

吽。”[3]围绕着庙四周的云雾逐渐散开，印度平原透过云层渐渐浮现。藏人流离在外国这种不协调的景致最终使我领悟，我必须写下我的故事，这并非是要宣扬我个人的苦痛，而是为我国家的苦难作见证。这样我可以显示，虽然我得到个人的自由，但是我的国家还是被占领着。

放眼望着印度平原的尘雾，心中被巨大的悲哀所笼罩。我清晰地回忆到监狱中的一幕幕，定期的学习班，坦白交待会和奖惩大会等等，它们盘据了我过去三十年的生命。监狱生活的疮疤在我的心灵上留下痛苦的迹印。

达兰萨拉的苍翠山林和雨水跟西藏是如此不同，它变成了我们流亡者的恬息之所。我每天几乎都能见到几个狱中难友，他们也经过艰辛的跋涉，来到喜马拉雅山脚下。他们获得了自由的喜悦中交织着对其他人曾经受到的苦难的同情，我们彼此祝贺，庆幸能成为幸运的幸存者。

我在外国获得了自由，但是以往的恐怖依然在我脑际中挥之不去。我现在住在一个用小块铝片和木头拼凑起来的小屋中，房间不比单独监禁的牢房大。雨季的豪雨打在铝片屋顶上，使我澈夜难眠。潮湿的霉味粘在墙和天花板上，大家都说雨季一过就好了。我旁边的小屋里面，住着一些翻越山岭逃过来的青年们，他们听着拉萨电台，快乐地跟着唱流行摇滚乐。人是很奇怪的，他

3 藏语 Om mani pad me bum 汉字音译为唵（an）嘛（ma）呢（ni）叭（ba）咪（mi）吽（hong）。是藏传佛教中最尊崇的一句咒语，西藏人认为勤于念经是修行悟道最重要的条件。密宗认为这是秘密莲花部的根本真言，即莲花部观世音的真实言教，故称六字真言。

们依恋自己逃离的故乡，渴望着听到家乡的声音，似乎以此来证明自己还活着。

达兰萨拉之所以是个特别的地方，并不是因为它成了我们的新故乡，主要是它已成为达赖喇嘛这位仁慈佛主的精神避风港。在监狱时，我们都心怀敬畏，肃穆悄声地念着达兰萨拉这个名字。初抵达这里之后，我被分派了一个任务，去跟一批批新来到的难民访谈，并记录他们的证词。我简直不能相信大家的故事竟如此相似，没有一个人没受过恐怖和野蛮的待遇。所有的人都具有身体被打伤、家庭破碎和生活肢解了的共同经验。

穿越雪山逃出来的大部分是青少年，有些七八岁的孩子被父母亲送出来，大人希望他们在外国有前途。这些孩子不是出身富有的地主或商人之家，他们是共产党声称解放了的农奴家庭的孩子。

达兰萨拉具有国际城市的特点，来自日本、美国、以色列和欧洲的人都挤在那两条狭窄泥泞的麦克雷德甘吉街道上。我认识了很多从来连名字都没听过的国家的人，比如像一个叫爱密丽的年轻英国人和叫法兰西丝加的荷兰妇女，她们常来我的小屋谈天。通过这类谈话，我以前的生活开始清晰地展现，我意识到，自己幸运地存活下来，因此也有责任为其他受难者作见证。

也许通过我的故事，我也可以讲述我的国家和每一个受尽痛苦的西藏人的故事。

第　一　章

彩 虹 下

我诞生在彩虹之下。

我的祖母给我讲过不知多少回我诞生时的故事。她伸出朐偻的手，在空中比划着天上那道彩虹，说那拱形的虹从河边伸展到田野，罩住了整个村庄。接着她告诉我，我的诞生有许多吉兆伴随。“俄珠，你可能是类吾其活佛呢。”这是她最喜欢也最爱讲给任何愿意听的人的故事。

好像是这样的：我出生后不久，离我村有两天步行路程的扎类吾其寺的高僧所组成的探访团就来到我家。探访团宣布我是一年前逝世的一位高僧喇嘛的转世童子的候选人之一。许多迹象显示我的诞生有些异常，当僧人来到之时，平时聚集在大庙屋檐下的乌鸦全都飞往我们家。逝去喇嘛的当家侍从回忆起，喇嘛死前不久，还曾来过我们家主持过一场宗教仪式，他当时说在我家觉得很自在。离开时，他走到我母亲跟前，把手放在她头上说：“我将回到这所屋子来。”

祖母说，我降生的头几天，妈妈梦见她左手中拿着一个象征雷霆的神器，坐在那里进入沉思的境界。神器象征佛祖教义的不可摧毁性。所有这些迹象都被认为是吉兆，通常只有在喇嘛转世时才会出现。

祖母提到前世喇嘛的财务主管，他拿着两只玫瑰佛圈在我眼前晃呀晃，我伸出小手抓住其中一只。她老人家很兴奋地摇着头拍着掌接下去说，那位师傅微笑着说，我选中的玫瑰圈恰是逝去喇嘛的。

我祖母身段矮小，有着瘦削的脸。她习惯把小块的牦牛油涂在头上，使得梳得紧紧的头发油腻发光，她的脸蛋也总是油亮的。我爱听她说故事。她告诉我，当所有候选人的名单送到拉萨后，我还是没有被选中。她认为这是因为我家跟有权势的人没有“后门”关系。虽然我还很年幼，但已经能从她讲到故事高潮时，声调变得异样而感觉到她的失望了。

无论如何我是在各种异象和很高的期望的伴随下诞生的。我乡的星占人在测我的八字时，告诉爸爸我将会光宗耀祖，不过他没说是以怎么样的方式，也许乡下的算命先生总是对有钱的地主说同一套话吧。但爸爸还是挺高兴，他以后还常常提到这次命相。

我的名字是俄珠。藏族父母一般不给孩子起名字，而是让一位高僧赐名。不知道是哪位喇嘛给我起的名字，很可能是临近寺庙里的一位住持。我生于 1933 年，那年是公水猴年。我们的村子叫帕南，离首都拉萨以西一百二十五里，第二大城日喀则以东四十五里。

帕南是西藏平原上一个普通的小村子，娘曲河流经我们的村庄，河的两岸耸立着高山，平原上星罗棋布是麦田、豌豆和芥菜园。河流变化多端，有时候水位低，它的波光粼粼，静静地流向

日喀则，跟西藏最大的雅鲁藏布江会合。水浅时，村里的人就赶着他们的牲口渡河，到对岸去放牧。如果牧人错过了时辰，没有及早把牲口赶回来的话，河水一高涨就回不来了。这时他往往得绕道，花上两三天的时间，直到找到一处浅滩渡河。

春天雪溶化了，微波变成滔天大浪，河川变得危险万状，人们十分惧怕，大人警告我别在河边玩，据说连牦牛那样大的动物都会被巨浪卷走。我还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在岸边奔跑，看一帮人如何把一条漂过来的死牦牛拖上岸。我跟其他孩子们站在一边，看大人把浮肿的尸身切开，把肉在一块摊开的布上切成一块块，那以后我就对河敬而远之。但是人们得靠河吃饭，田地靠它灌溉，离它远，得不到河水灌溉的地段，就干枯而荒芜。那些贫瘠的不毛之地，时时提醒我们对河水的依赖性。我不记得帕南有过下雨的日子，河水能及的地区都是郁郁葱葱，供给我们足够的食物。我们从河里汲水饮用，并且挖凿许多水渠，引水入田。你整天都可以看到一个人在一洼洼田里走来走去，一会儿放水， 一会儿截流。

河谷两端的喜玛拉亚群山笔直地耸入碧蓝的天空，山脉也衔接到一片倾斜展向天际的高原，崖壁从两边掩蔽着帕南。春天冰雪溶化的时候，青绿的嫩芽在冰层下面挣扎冒出尖来，村民们都把牲口赶到高原上，这些山羊、绵羊、牛和牦牛在冬季已经在屋子里闷了三个月了。我家的房子是座泥砖砌的两层楼，石头的地基将近三尺厚，为泥砖提供了很结实的平台，堆砌起来成为厚厚的墙。这种简单的泥砖墙冬暖夏凉。

上面一层住人，下层黑乎乎的，是牲口过冬的地方。我记得小时候，总是由我将牲畜们从冬日的围栏中驱赶出来。动物们害怕地犹疑着，步履蹒跚，不停地眨眼，外边的亮光刺得它们头晕目眩。大家都笑着说，牲口大约是吃了蒸发成酒精的酵母，所以醉得歪歪倒倒。因为冬天过藏历新年的时候，每家每户都会酿制大量的青稞酒，然后把剩余的糊状麦渣倒给牲畜吃。当然啦，动物们很快地就习惯了亮光，年长的孩子就吆喝着把它们从小路赶到高地的草原上，放牧人和牲口整个夏天都待在那儿。偶尔放牧人回到村子里，他赶着的毛驴背上的袋子里就装满了奶酪、牛油和可当燃料烧的牛粪。

帕南依赖农业为生，牲畜又供给我们珍贵的肉、牛油和奶酪等食品。我家有六百头绵羊和山羊，这按藏族的标准算是富裕的。我父亲从政府那儿租赁了大片的土地，然后再转租给农民。我父亲被称为税务官，因为他直接付税给拉萨的政府，而向我父亲租地的农民们，则付税给他们的地主或寺庙。父亲的纳税事务很复杂，我始终没有弄明白，他到底应该付多少税，应尽怎样的责任。有件事我还记得很清楚，我家得向藏军提供五名壮丁，这五个人不必是家庭成员。爸爸从我们的佃户中挑选了五名，跟他们议定了条件。只要五名壮丁送去服役，政府就满意了，并不过问其他细节。

我父亲是村里的头面人物，常被请去为村民排解纠纷。由于他很公正，佃户和村民都管他叫巴利大哥，这是一种亲切而尊敬的称呼。有些住在日喀则和拉萨的地主们向村民征收重税，父亲

总是设法为他们鸣不平。我家姓巴利洛巴，是南巴利的意思。在河谷顶端有另一家也姓巴利羌，即北巴利，我们可能是一族的，但没有人记得巴利家族是怎么分成南北两家的。

十八世纪时，帕南由于西藏的第二号宗教领袖，第七世班禅喇嘛在此诞生而著名。据说六世班禅逝世时，卜算家预言，转世的将是一位“快乐地坐在阳光怀抱里”的孩子。藏族地区的喇嘛们都动员起来，去寻找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其中一个探访团经由神谕的指点，到达帕南。

探访团到达村里的第一家屋前，发现一位妇人怀抱着一个新生儿坐在那里。一问她的名字，是“尼玛”，即太阳的意思，他们不必继续寻找了，尼玛怀里抱着的就是第七世班禅喇嘛。

班禅喇嘛诞生在我们家隔壁，那是全村最富的大户。从此那家人被提升为西藏的贵族，更为富裕了。村民都管这所房子叫“出生地”，当地的人都非常尊敬这所屋子。当我出生时，全村人都很兴奋，他们说帕南是风水宝地，又有一个喇嘛诞生了。当然，他们的兴奋没有维持太久。

跟其他的藏人一样，我们家的人也是虔诚的信徒，并且很恭敬地从事宗教侍奉。我们的大房子被挪用作为大藏经神龛，即藏经阁。这儿藏有一百零一册大藏经。村里没有其他人家拥有这么多藏经的。我不知道家里怎样会拥这些价值连城、有几百年历史的经书。神龛在屋子的顶层，里面还有许多佛像、观音、唐卡画和宗教锦旗，其中有些也都有几百年的历史。屋顶上有一个铜制的胜利伞，任何一户家庭，如果拥有完整一套的大藏经，就可以

获得这样一个荣誉的标志。村里人家如要在家作佛事，就会来向我们借一部经书。

村子里每年都有一次重要的宗教盛典。七月里，当农作物开始成熟，不需要照料时，大伙儿可以放松地庆祝，祈祷有个丰收之季。这也是向地方神灵敬拜、请它们保佑五谷丰收，消灾消难。村里的庆典叫做“绕佛转”。

地方寺庙的僧人会到我家来把每一卷经都用黄色的布包起来，高举过头。围在外面的家人和村民都争着来背经书，当这一百零一部大藏经安稳地一人一部被扛在人们背上时，僧侣们就开始列队步行，身后跟着这一溜背书人和村民。长长的队伍会走遍全村的每个旮旯的角落。

最后列队将停在“神地”，恶神住在这里，我们的平安靠它，据说如果不定期安抚它，它会降祸我村，所以得向它祭祀。虽然农作物都长得很好，但是还是要得到神明的保佑才行，不然一场意外的冰雹会降临并摧毁一切收成。藏民畏惧冰雹跟别处人畏惧干旱一样，有些人家供着一个“伏冰雹神”，据说它有神奇的力量，家里有人生病，我们就拜神。

神地是由许多大石头堆垒在一起，周围凌乱地拉起来几道绳子，上面扎满了祁愿者的各色小旗子，乱石中间还藏有一些动物的角。彩色旗的颜色有五种象征：黄色代表土地，红色代表火焰，蓝色代表天空，白色代表云彩，绿色代表流水。

每个家庭每年都要在这里绑一面新的祁愿旗，我从来不敢一个人到这个地方来。此处的霉味儿和成堆腐烂的旗子营造了一种

阴森的氛围，令我颤抖，每个人都怕神地。“绕佛转”仪式象征乡人对神的忠诚，也是为村子划定边界的意思。作完了这个仪式，村民就心安，觉得将受到保佑。

当队伍在全村绕了一遭后，就来到近河的一片草地上憩息。家家都在河边搭起帐篷，接连几天的歌舞活动就开始了。年纪大的人都爱赌博，而年轻人很喜欢射箭比赛，这是休息和享受夏天的时节。

再过两三个月就是收获的季节了，每家佃户都送来一名男丁，来帮父亲收割我们地里的粮食，这是村人最忙碌的季节，各种杂事让人不能偷懒。

作物收割完毕，打榖的工作接踵而来，榖子堆成一座座尖塔，妇女们就开始筛榖脱粒。当村人都在农忙之时，爸爸就请来十位僧侣，他们在我们院里高声地把阁楼上的大藏经一卷卷地吟诵，通常需要五至十天左右，才能念完全部的经。记得爸爸说，我家几百年来都维持了这种年年念经的仪式，因此我们家也托祖上的荫庇，总是幸运兴旺。

我并不觉得幸运之神关照了我，我出生不久，母亲就去世了，把三个女儿和两个儿子都撂给了父亲。我不知母亲是怎样去世的，祖母有次说，妈妈一直很健康，我诞生之后，她也恢复很快。突然一天夜里生病了，从此就一病不起。西藏人都相信，福星光临一个家庭，灾祸也会随之而来。这也许有道理，我幸运地被认为是个高僧的转世，我的母亲因此被祸星盯上。

我不知道母亲的名字，但大家都叫她阿玛拉[4]（大娘的意思），她死时才四十岁。我对她没有记忆，也不曾拥有过她的照片。旧时西藏没有照相术，也不兴为活人作画。我唯一见过的照片是十三世喇嘛的，它挂在我家的神坛上方。有一次姨妈把它取下来，放在我的头上，我很想仔细瞧瞧，摸一下它的质地，但是它太珍贵了，姨妈很迅速地把它放回了原位。这张照片是一个尼泊尔商人捎带过来的，全村只有两户人家能买得起。我想我母亲从来没照过像，有次我问一个亲戚妈妈的样子，他仅仅说“她是个好女人”。父亲从不跟我们提到母亲，我想他很伤痛，所以也从不问他。爸爸十四岁就跟比他小一岁的妈妈结婚，就像当时西藏的习俗，他们的婚姻自然是双方家庭的安排。

我的姐姐们都还年幼，不可能照顾我，所以我被送到姑母家去。她的名字是桑姆，住在离帕南有六小时路程的加措夏尔，她是许多年前嫁到那儿去的。姑妈家姓南姆岭，一家大小有二十多口人。

当时姑妈也近四十了，她有两个儿子，我叫他们哥哥。他们都很大了，一个已经十六岁，快该结婚了。姑妈非常能干，是一家之主，她身上那件藏服的衣襟口袋里，放了一大把钥匙，可以开启每个储藏室，仆人们需要什么用品时，先得向她开口。姑妈的脸盘又大又园，耳朵上戴着红珊瑚耳环，她的头发很长，编成

[4] 藏文名字后加一个 la，表示尊敬。本书凡男性名后出现 la，皆为译为先生、师傅 或大师。

辫子盘在头上。把我送给姑妈带的另一个原因是，她早几个月也生了一个女娃，名叫旺姆，因此她可以同时奶两个婴儿。

加措夏尔跟帕南没有太大区别，房屋都一样。就像娘曲河谷其它的居民一样，这里的村民也都是农民，人人都在地里工作，生活都围着农事打转。几世纪以来人们的技术不断改善，不过还是没有机器，一切都靠手工。今天我回顾过去，觉得奇怪，那时候我们竟然不用轮子，雪山国对这种大发明竟然没有应用过。

姑母家也是向政府交税的纳税户，据说他们拥有的土地上长出的粮食如此之多，堆积起来可以把雅鲁藏布江断流。我从小把姑妈当作亲妈，我叫她阿玛拉 — 娘，她的房子就是我的家。后来在监狱里，每次审问到名字、年龄和父母名字时，我都得先想想，才能给出正确的答复。姑妈待我如子，有时候她用双臂搂着我，悄声说："没娘的孩子"。

姑妈一家上下对我都慷慨而疼爱，我从来没有一次感觉到是在别人家中，或这里不是我自己的家。有次我听到别人说，"这孩子他爸"，我以为他们是说被我喊作爸爸的姑父。当我听到"这孩子的爸爸要来了"及"这孩子的家"时，感到很迷糊，我明明住在自己家里呀。我意识到有些不寻常的事情将要来临。

我在加措夏尔很快乐，童年生活简单，我的天地就是家庭和村子。男孩子自己去玩，女孩子则跟在母亲身边帮忙，观察并学习母亲的各种手艺。父母到田间工作时，我们也跟了去，有模有样地学着作，这就是我们受的教育。我帮着搬运递送东西、除草、在田间走动、打开关闭灌溉的水渠的闸。

小时候我最喜欢听故事，有一个伯伯在当地最大的塔什伦布寺出家，他常来姑母家过冬，他很会跟孩子们玩，常把我们召到一起听他说故事。他用洪亮的声音讲述混沌初开，大地全被水所覆盖，后来水慢慢蒸发，形成陆地和高山。佛祖变成一只猴子，他的配偶渡母现形为女妖，猴子跟女妖的结合，生下了第一个人类。他们的六个孩子代表世界上的六种典型：神、半神、人类、鬼怪、动物和魔，他们继续繁殖，我们西藏人就是这样产生的。

有些故事很吓人，他给我们描述另外的世界和地狱的情况，在那儿人被活活地下油锅或受到饥饿的煎熬。伯伯还说，人死了以后，他的善行和劣迹，变成黑白二色小石子，白的是善，黑的是恶，都被放在一个天平上来衡量。如果称砣向黑的那方倾斜，就得下地狱，朝白的方向，那就可以上天堂。他把脸凑到小孩们的跟前说，“你要不想下地狱，那就别攒积黑石子。”

伯伯在村里很受人尊敬，大家都来向他请求指点迷津。有一回，他带我到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去，要说这是一种了不得的宗教经验，不如说这让我对于寺里的生活有了亲切的体会更妥当，我察觉到村子以外和大山背后的天地如此广阔。伯伯和一个从拉达克来的和尚共居一室，那人给了我一块他从印度带来的鱼儿形状的太妃糖。那天晚上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了火把，听说也是从印度来的，我当时想，印度真是个美妙的地方，有这么多神奇的东西。西藏人对印度的崇敬，就如同基督教对于耶路撒冷的虔诚一样。但是我对于佛祖曾在“帕格帕国”— 极乐园生活，觉得奇怪。帕格帕在藏文里的同音词是猪猡的意思，我不明白，为什么

印度被称为猪猡国，因为那儿有成群的猪在丛林里乱窜吗？当我问伯伯印度为什么叫作猪猡国时，他和其他的僧侣们都捧腹大笑。伯伯说，是我该学习读和写的时候了。

我对于外面世界的知识都来自于伯伯的故事，印度是世界上最神圣的地方，任何其他地方都是很可怕的，按他的说法其他地方都住着没有文化没有善心的人们。他的说法满足了我的好奇心，据他说，一个人能够出生在雪山之国是修来的福，我丝毫也不怀疑这一点。

我想伯伯讲的关于西藏和藏人来源的故事，奠定了我对西藏人和中国人是截然不同的民族的信念。当中国人涌进西藏并声称西藏始终是中国的一部分时，藏人不能理解，因为我们有不同的历史观。共产党将这类口传故事视为荒诞不经，但对我们藏人而言，这些强有力的故事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的表姐旺姆是我在村里最亲密的玩伴，姑妈说我俩“难分难解”。虽然没有玩具，但凡手所能接触到的东西，我们都能变着法儿玩，树枝成了矛，泥地是战场，我们进行想象中的战争。通常男孩子总是玩他们自己的，但我老把旺姆拖到我们一块儿，她挺厉害，村里任何一个男孩都别想欺负她。

我们五六岁时，旺姆病了。姑妈尽其所能，把喇嘛请到家里来作法，驱赶致病的妖魔。一天清晨，我看到姑妈在厨房里哭泣，立刻明白可怕的事发生了。后来几天姑妈一直守在旺姆的床边，我一点也安慰不了她。

大人都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我猜他们认为提到旺姆会使我难过，避免这个话题，伤痛会很快过去。有时我想，西藏人往往以为避开不愉快的题目，痛苦就会自动消逝。直到今天，我一想到姑妈和旺姆，还会流泪。跟旺姆在一起无忧无虑，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日子，我们常在泥浆里混，捏泥人儿玩，回家时俩儿都成了泥人，姑母对我们尖叫，并让仆人来打理我们。

旺姆死后不久，我就见到本家人了，祖母和哥哥姐姐们都来吊唁，慰问姑妈，他们一到，大家都哭成一团。父亲送来一批新衣和一双印度制的皮鞋。那天姑妈把我叫到里面的屋子，先拍除我身上的尘土，然后把我带进家里的诵经房。一个男人坐在一个高的位子上，正啜着茶，他的一双大眼灼灼逼人，耳朵上挂着的绿宝石耳环直坠到肩。

姑妈推搡我向前，说“见见你爹”。跟每个见到生人的孩子一样，我害羞又紧张，心里却也有点兴奋，想总会得到一样礼物吧。我向父亲走去，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白水晶，我把双手伸出，他将白水晶放入我的手中。爸爸开始说话了，我却只管盯着手中的这件礼物，这是我们称为“甜玻璃”的冰糖。我每天揣在口袋里，有时拿出来出来舔一舔。

虽然我跟父亲长久分开，但是父子之间仍有一种天然的亲情。有一天一个屋里比我大的男孩嘲笑我爸爸，说他身上穿着件土色的藏袍，看上去像大便，我绕着屋子追他，狠狠地捶他的背。

每次爸爸来探姑妈时，我都被召唤到他跟前，我们的谈话很简单。他问：“你乖不乖？”我点头。“好好听姑妈的话。”他就把太妃糖和肉干塞到我的口袋中。我经常向其他孩子炫耀得到的礼物，也知道他们嫉妒得要死。他们羡慕我，因为我爸爸有那么点儿神秘，又似乎是重要的人物，每次他来，家里总是大方地招待他，让他睡在全家最好的房间里。

姑妈始终没有忘怀旺姆的死，她拼命地工作，夏天她下田，冬天她没日没夜地纺织羊毛，另外她还料理家里内外的杂事。她更加地疼爱我了。

有一天爸爸来了，我知道他计划着要带我回家，我看见姑妈在哭泣。那年我九岁，父亲认为是我返回帕南的时候了。

那是个夏天的清晨，姑妈把我叫醒，端给我一杯茶和一碗甜的红薯饭。这只中式的瓷碗是从家里神坛上取下来的，上面有两只蟠龙。吃红薯饭是要讨个吉利。姑妈交给我一条哈达，她让我把它放在我床上的毛毯上，她说，这表示我有一天还会回到这座房子来。我杯子里的茶满满的，这也表示我很快会重返这儿。她指着一叠新衣裳嘱我穿上，这是她特地准备的，我穿上衣服后，她替我四面拉平。

终于要离开这里了，我心中很悲伤，看得出姑妈也很伤心。我是吃她的奶，在她跟前长大的，她待我如子，而自己的女儿又死了。她看着我穿上新衣，又帮我整理上衣，系紧两头。

全家都聚在院子里，一切都准备妥当了。六七匹小马都上了鞍，两边挂着木头盒子，我看着爸爸指挥若定。家里人一个个走

来，每人给我挂上一条哈达，不久我整个人都被哈达遮住了。姑妈是最后一个，她走向我，手里拿着一条不知有多么细的丝织哈达挂上我的颈项。她拥抱我时，脸上的泪水沾湿了我的脸庞，虽然我在数不清的哈达之下，几乎不能动弹，我还是挣扎着去抱姑妈，并且放声大哭起来。邻居们都闻声赶到，过来围观，有些人仍然往我头上挂哈达。

有人说道："俄珠好像新娘子出嫁哩。"我擦干眼泪，平静下来，接着被抱上小马。村里的孩子们开始唱："新娘子，新娘子，"我恨不得马儿立即把我拉得远远的。祖母和爸爸打头，马队启动后，渐行渐远，喊叫声消逝了。我脖子上的哈达像旗子一般随风起舞，姑妈骑着驴伴随我们走出村子，走了一段距离后，她赶上来把我脖上的哈达都取了下来。

父亲有时候转过头来看我，我尽量避免跟他的眼光相遇。到了家，这里的家人和邻居都在等候着。我被抱下马，有个人又上来给我挂上一条哈达。姑妈在这里住了几个星期，才返回加措夏尔，她是哭着走的。

在帕南我开始了成年人的生活。那时后，一个藏族孩子成长很快。我父亲和哥哥都在十四岁时就负担起家庭的责任了。在新家我没什么事可作，哥哥和姐姐们掌管了家中一应琐事。我感到生活很单调，也尽量躲开父亲，他似乎年纪越大越庄重威严了。我记得他以低沉的调子喃喃诵经，这更让人难以跟他亲近了。

我现在回想当时父亲对我的爱，是混杂着对一个失去了母亲的孩子的悲哀。他躲开我，因为我让他回忆起母亲，也可能他感

到无力照顾我。他从不谈论母亲，连她的名字都不曾提过，他没有忘记她，而是不能面对她已经不在的事实。

母亲去世之后的一年，父亲再婚了。我回到帕南的时候，继母已经有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已到当地的嘎东寺当和尚了。继母很善良亲切，不像父亲那样难以亲近，也不是那种典型的后娘，她总是慈爱地拥抱我。父亲死后，哥哥变成一家之主，他搬来跟继母一块儿住了。她还很年轻，我们家的人认为如果迎进来一个新娘子，会引起争吵不和。在西藏人们为了保护家产不分散，几个兄弟共有一个妻子是很平常的。我们家则是哥哥娶了继母，她还年轻，可以为他生养孩子。

搬回帕南给我最大的补偿是邻近有个嘎东寺，离我家只有不到一小时的路程，父亲的两个哥哥都在寺里出家，有时候大人带我去，有时候我感到无聊时，也会自己前往。祖母注意到我经常在那儿流连忘返，她就跟我讲我诞生时的事，并且建议我也出家，我听了很欢喜。在村子里我十分孤独，但在寺庙里我有很多伴儿，连大人都肯花时间在我身上。

第　二　章

出　家

没过多久，祖母就开始为我的前途担忧了。父亲还是把我当作孩子，没有考虑我以后的出路。但祖母老缠着他，说要“为俄珠的未来铺路”。

在西藏即使出生在富裕家庭的乡下男孩子，也都没有多少选择的机会。他可以经营家中的产业，或者到庙里出家。长子往往继承农庄和负担起家里一切的责任，我哥哥十四岁时，就已经挑起了庄园里大部分的责任了。他长得漂亮又有自信，到处巡视，分派工作，雇佣劳工，排解佃户的抱怨，把一切事情处理得十分妥帖。我有时候陪着他出去，发觉村人对这个模范长子尊敬而佩服。

祖母非常虔诚，她希望我成为一个僧人。藏历每月的初八、十五和三十，她都要到寺里去朝拜一整天。她总是早早起床，穿上整洁的衣服，并带上一大块牦牛油和一罐印度产的向日葵油，这可是最上等而珍贵的东西。我开始跟着她跑寺庙了，虽然她已经七十多岁，身体却很强壮，能一口气爬上陡峭的山上，然后她就慢慢地从一个房间的神龛渡到另一个房间的神龛，并为油灯添上一些牦牛油或葵花油。她也会伫立在每个神像的前面，双手合什，喃喃地念一些祷词，然后往前用额头抵触神像的座子。

中午时分她去看望她的两个儿子，我的伯伯们会准备好糌粑午饭，或烤香的大麦及肉干。祖母午睡的时候，我就跟小和尚们玩耍，我很羡慕他们能学习阅读和写字。午睡过后，祖母到正中的大殿去作最后的朝拜，她走到主神坛前，然后把她皱巴巴、像小鸟爪子一般的手伸到面孔前，缓慢地、一板一眼地口中念念有词。我问她祈求什么？她说她祁愿菩萨保佑众生，人人都没病痛。她常说，身体健康是钱也买不到的宝贝，穷人富人都一样难逃疾病的灾难。

现在回想祖母的祁愿很能反映西藏的实际情况，虽然有些地方有藏医，但是帕南是缺医的，要走一两天的路程到日喀则或江孜，才看得上大夫。家里有人病了，大家都束手无策，我们都靠神灵来治病，有时候人们也奇迹般地不药而愈。

村子和寺庙之间有一大片田野，田野的尽头衔接着陡峭的山，庙就盘踞在山上，威严地俯览着整个山谷，望过去可以看到娘曲河蜿蜒地流向日喀则。晴朗的时候，从我家的屋子可以看到寺庙灰白的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这座寺庙已经有九百年的历史，它是十一世纪时印度高僧卡切释迦希利到西藏传佛音时所建造的。

这座庙的名字一直有争议。一般人都相信嘎东是我们村子座落在它脚下的那座山的名字。这座山叫“嘎”，是“马鞍”的意思，“东”是前面的意思，嘎东寺也就是“马鞍山前”。也有学者说这座寺名叫“无忧树”，有那么个说法：寺庙建造好了不久，佛教在西藏开始衰落，本土的“苯教”复兴。很长时间内，

许多寺院都无法承传佛教的教义，只有帕南这座寺庙内的和尚们继续严守佛教的规章，后来他们甚至周游西藏，传授复兴了佛教的教义，因此这所寺庙被称作“无忧树”。

这座庙里曾经一度拥有两百名僧人，就记忆能及，我们家族里总有人到嘎东寺当和尚。附近村庄的每户人家中都有一个男人在寺里。嘎东寺把各个村庄都凝聚到一块儿，它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寺庙。

爸爸把我叫到他顶楼上的小房间去，他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里面阅读经文。泥炉上烧着一壶茶，和尚伯伯也在，祖母随即也进来了。爸爸举杯，吹开浮在表面的茶叶，啜了一口，转身向我说：“孩子，你伯伯和我认为你应该进庙去。”他看着祖母，好像希望她能代他接下话头，其实我一听他的话，就已经点头答应了。

我老早就想出家，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我不愿主动向爸爸提出这个要求，怕他会觉得我在家中不快乐。祖母又开始重复我诞生时的故事，好像大家都还没听过似的，可是这次她提出了重要的一点：我应当到扎类吾其寺去，因为那儿的住持说，如果我有一天真要出家，他要我去那儿，祖母仍然相信我是扎类吾其喇嘛的转世。我若去拉萨会感到失落，因为我们在那儿没什么关系。不过爸爸否决了祖母的建议，坚持我应该去嘎东寺。他看着伯伯说，我们家几百年来都跟嘎东寺有联系，现在不应中断这个传统，伯伯点头，爸爸不再对此事继续讨论。

如果让我选择，我宁愿去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它是西藏最大的寺庙之一，这里是仅次于达赖喇嘛的班禅喇嘛之庙，我们这一带的人对班禅特别崇敬。我曾经跟随姑妈到过扎什伦布寺，我们有很多亲戚在那里，它对我有特别的吸引力。并不是我不喜欢嘎东寺，这是个宏伟的寺庙，对我好像自己家一样亲切，但我认为这不是学习的最佳地方。嘎东古老而负盛名，但在 1943 年它仅是一个能满足乡下人们精神需求的简单寺庙。不过，对这一切，我反正没有自主权。

就这么决定了，我将到“我们的寺庙”去，家族跟寺院几百年的联系可不能中断。伯伯很急于我到嘎东，因为他已经很老了，只有很少的徒弟，他承袭了一间很大的僧舍，这是我家几代人所传下来的。这个伯伯比日喀则的那个伯伯要严肃得多，他把我当大人一样，跟我讲述家里一些重要的事情，我们现在是师生关系了。

我祖母为我准备了几套和尚的衣物，一套夏衣，一套冬衣，第三套是仪式上穿的礼服。裁缝每过几天就送一些东西到家里来，这些新衣裳都整齐地放在神龛那间屋里。祖母有时候把我叫过去，拿着衣服在我身上比。在我将离家正式入寺前的两天，姑妈来看我了。她骑着马来，到了我家，一看到我就迳直伸开双臂拥抱我。我把眼泪压下去，暗暗希望她是来接我走的。看到她我就想起旺姆和我在加措夏尔的日子，我相信她也是这样。她久久地拥抱我，然后掺着我的手走进屋去。

姑妈为我拉拉身上的衣服并且开始检查我的一应用品，祖母很高兴她能接手此事。所有的东西都被装进两个木制的大盒子里，上面覆盖着牦牛皮。两匹壮实的马载负着木盒子，把他们运到伯伯的僧舍去。姑妈的出现，使我感到离家搬入寺庙有些不自在，她在我们家的屋子里走来走去，唤起了无数的回忆。她的举动有些异常，她也不再拿我当长不大的孩子看待了。

其实我并不明白出家是怎么回事，我很熟悉寺庙并且认识里面每一个僧侣。我们家很有声望，许多僧人把我父亲当成施主，因为他对那个寺庙非常慷慨。我这次进庙当和尚，父亲就送了大批的粮食和牛油，算是很厚的礼物。

我还记得很清楚，那天一大早姑妈把我叫醒，给我端来一杯奶茶，祖母随着递给我一碗红薯饭。她们帮我穿上那件讲究的羊毛藏袍，继母忙着给每个人冲茶。伯伯也来了，父亲已经跟他打了招呼，要他关照我。

按照规矩，我将住进寺庙里伯伯的僧舍小院，他将成为我的监护人，带领我跨进出家人的生活。他的名字是洛桑旺波，不过每个人都叫他旺波先生。他那时五十多岁，却自以为很老了，他跟爸爸长得很像，举止也一模一样，但伯伯的光头和袈裟让人很容易分别他兄弟俩。他对孩子严厉是出了名的，不过对我他总是宽厚仁慈，从不责骂我。

1943 那年是公水马年，我开始住进庙里。邻居们都来送哈达，父亲和继母把它们都挂在我的脖子上。继母哭了，她把一些烤过了的麦子塞到我的口袋里，她说口袋空空离开家是坏兆头。

我被放上马背，向寺院走去。渐渐地屋子周围的嘈杂都远离了，我没有回头，耳朵里只有马蹄踏在柔软的土地上的声音，伯伯一马当先，不时回头望望跟随的人马。

在旺波先生的僧舍有很多亲戚在等候。我同父异母的弟弟比我小两岁，去年也在此出家，他跟随另一个伯伯。旺波先生给我介绍寺院里的情况，走了一遭。到了他的僧舍，我们像检查员一样，每个旮旯角落都察看了。有四间房间和一个厨房，橱柜里放满了瓷器、木碗和佛事用品。从两个房间望出去，可以俯览帕南河谷和娘曲的蜿蜒曲线，我甚至能看到父亲在帕南村的屋子，人们走进走出，继母在院子里忙来忙去的小小身影都能依稀看见。从他们走路的样子，我就能分辨出那是家人还是邻居。

我伯伯成了我的师傅，我叫他先生，他现在负责我的生活起居。那天下午，一个和尚来给我剃了光头，只在头顶上留了一小束发卷。次日，我正式地变成了一个小比丘。

伯伯每天很早把我叫醒，他教我怎样穿着羊毛袈裟，这家伙这么重，我简直走都走不动。伯伯教我穿袈裟的规矩，衣裳的下半部不可以有折叠，因为那是虚荣浮夸的表现，上半部的围披不该盖住头脸，否则就是傲慢的态度。穿着袈裟是很有学问的，我注意到今天许多和尚都不遵守这些规矩。

我们进入诵经堂的主殿，我尾随在伯伯身后穿过侧道，所有僧侣们的眼光都焦距在我身上。住持坐在一个高的位子上，他叫

更桑多顶，不过大家都叫他堪仁波切[5]或上师。大约四十岁的上师总是笑嘻嘻地，他曾在拉萨最大的色拉寺进修，在那儿他受到很高的尊重。

在仪式的过程中，上师缓慢地伸出他的手，以不同的姿势从面前的坛台上拿起一个铃铛或象征雷霆的法器。他的声音深沉悠扬，超越了其他僧侣的和声，他的身躯随着吟唱轻轻地摇晃，好似一片麦田在微风中摇曳。

诵经的声音停止后，我已站在堪仁波切的面前，他伸手摸摸我的面颊。一个小比丘递给他一把放在盘中的剪刀，他用一只手抓住我头顶残留的那束头发，举起剪刀，咔嚓一下把最后那缕青丝也剪了下来。

“你喜欢学佛法吗？” 他问。

“我喜欢”，我回答。

我得到一个法名 — 班旦加措，这个名字我一直使用到今天。这次受戒的仪式标志着我跟世俗世界的一切都了断了，虽然还没有进行任何的宗教宣誓，但从此以后我的言行举止都得像个出家人，心中万般皆空只有佛。

一年之后我才正式皈依佛门。四条基本的教规是：不杀生，不偷窃，不说谎，守独身。教规分列在十条规则之中，这样便于理解。我们周遭的万物众生多元而复杂，要做到绝不杀生，比如，不踏死脚下的虫蚁，是不可能的。由于踩死蚂蚁也算杀生，

---

[5]Ken Rinpoche，堪是博的意思，也是一种佛教的学位。仁波切是活佛，上师之意。

因而佛家对杀生有不同程度的区分。一个出家人或皈依佛门的僧人在杀死一个人或故意杀害一个动物的生命时，才算破戒。出家人应该回避金银宝物，不可以饮酒跳舞，不可以观看惊险刺激的表演，这些事务都属于世俗社会，会让青年人心生杂念不好好学习。

有段时间，他们允许我在寺院里到处游荡，观察各种不同的活动。很多小和尚比我小，按习俗，一个过了七岁的男孩就可以当比丘，据说一个孩子只要大到能追赶一只乌鸦时，他就可以当和尚了。

在寺院的第一年就像是上学一样，学习阅读和写字，老师写在一块硬木板上的文字我得辨认，这叫作“干写”，用一支竹笔模拟着老师的笔画和花体，但是不能把笔沾上墨水。依样画葫芦一周之后，我升级到“湿写”，虽然我还是模仿老师的字体，但是已经可以把他们画在一块撒上薄薄碳灰的木板上了。这个阶段持续了好几个月，一年之后我终于被允许在纸上写字了，这种经验哪怕是对年长的僧人也是很难得的，因为制造纸张是很繁复又昂贵的程序，纸张是不能随便浪费的。

学习阅读也是一场艰苦的奋斗，每一座寺庙都有本寺的一套仪礼佛经，所有的僧侣必须于每天清晨念诵一遍。另外一个伯伯曲顶先生教我经文，每天得背诵头一天学习过的段落，如果背错了，就得把左手高高举起，让老师的藤条抽下来。曲顶先生有好几条皮鞭，都挂在柱子上。他常说：“只要用功学习，鞭子就无

用武之地了。”不过他更常使用藤条打人，他警告我：“在背诵的时候，时时要想到藤条。”

出家人的日子是艰苦的，好在年轻僧侣之间的友爱和伯伯兼老师的旺波先生对我尽心照料，使我的日子稍微好过些。不久我就全神灌注地学习，有时候也作一些简单的杂务，如擦灯或挑水之类。

清晨四点钟，大家都起床了，到太阳升起的时分，自习的早课都必须结束。我每天早上花两到三小时来背诵经文，伯伯告诉我早上是最好的学习时光，因为脑子最清明。太阳升起时，海螺号吹响了，把院内的僧侣都集中起来作早课。有几位年纪大资深的和尚，包括我伯伯，不必参加早课，这是他们享有的特权。

所有的僧侣们排着队站在大殿门口，低音长号吹响了，大家鱼贯进入殿内，长老们先就坐。年轻的僧人开始背诵一段赞诵噶鲁巴教派开山祖宗喀巴的经文，嘎东寺是属于这个教派的。之后可以坐下来，我们祝愿达赖喇嘛长寿，祈祷世界免于饥饿和瘟疫、人类能和平地生活。在早课期间，供应两杯茶，每个僧侣的一项义务是服侍众人茶水，他必须从百米以外的厨房中，将茶水盛在一只巨大的黄铜壶中提过来，这只壶有时比他人还大。

我从来不必为众人侍茶，出身于富有家庭，家中又作了丰厚的奉献的僧侣可以免除一些重活儿。不过我还是得从事扫地、擦窗、点燃那成百的油灯这类活儿。在节庆时，我们要点几千个灯，之后还得打点擦亮它们。而我伯伯总给我派任务，使我团团转。

我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学习上。一个僧侣在寺院里有三种学习的选择，有天赋的人可以专攻佛教研究。第二类的注重学习宗教仪礼，在不同的节日祭典中，他们专司礼仪侍奉，并且学习在沙上建构佛的极乐世界图案，图案上显示出不同的神祇。第三类人不喜欢走研究的方向，又觉得仪礼事务繁琐，就可以选择料理寺院的财经工作。他们变成寺院的经纪人，主管向佃户收租或追讨债务，其中有些人打理寺院的一些商务活动。

我十二三岁时，有一天回到伯伯僧舍吃午饭，他把我叫进屋去，我立刻觉得是自己做错了事。进去后，伯伯叫我坐下，拿茶给我喝。他指着一堆茶叶、奶油、糌粑和衣服说，是姑妈家送来的。然后他压低了嗓子告诉我，姑妈逝世了，我一听，全身颤抖，一切往事都到眼前。她总是替我拉平衣裳，她是我世上最爱的一个人，跟她在一起时，我多么惬意自在。现在我大了，什么事都要自己挑起来，甚至当其他僧侣做事打杂时，我还得监督照管他们。

我全心投入学习，把寺院以外的世界都忘记了。我发觉到那些不识字和懒惰的僧侣都只能担当低下的职务，内心就激发出力量，驱动我努力向上，不断地背诵更多经文。虽然对有些人背经是很轻松的，于我而言却很艰难。每当一名学生背下一篇经文时，他的师傅就向上师报告，准许那名学生在全体僧侣前背诵一遍。这是蛮可怕的经验，当日课完毕之后，这名年轻的僧人就站在大殿中央，面对众僧，开始背诵经文。我也有过好几次的经验，还记得当时大殿的肃穆寂静，仅有人们轻啜茶水的声音。要

想通过考试，就得背诵下全部的跟礼仪有关的经文。如果一个学生在众人面前一时忘了而停顿，不仅丢失他个人的面子，也羞辱了他的师傅。我非常幸运地过了一道道关口。

由于日日的背诵，僧侣们终其一生都不回忘记。但是我的经验不同，长期被关在监狱中，使我把许多在嘎东寺学过的经文都忘掉了。

一名和尚学会了全部基本的祈祷经文之后，可以进一步深造，继续跟着自己的经文师傅单独学或跟三四名学生一道都行，不然也可以拜另外一位有学识的学者，专门授业。嘎东是个小的乡村寺庙，在经文研究方面没有什么声誉。上师开办了一个因明学研究班，从拉萨请来一位喇嘛，到嘎东来花几个星期的时间指导班里的学生。

格西仁曾[6]是拉萨附近哲蚌寺内有名的高僧，曾经教过我们的上师，我开始上他的课。他的外表和举止刻划出朴素和苦修的痕迹，他的声音很轻柔，有时几乎听不见，他说的是拉萨方言，不过还是能让人觉察到有一丝外国口音。格西出生于印度喜玛伽邦的克那吾尔，十六岁上到哲蚌寺来修炼，我们称呼他为先生。整整四个月，他每天给我们讲解复杂的佛教因明学哲理，他说，如果真要好好学习，应该到拉萨最大的三个寺庙之一去进修。他将嘎东比喻为一口井，里面有水，但是谁想游泳，就应该到大海里去。

---

[6]Geshe Rigzin 格西仁曾，geshe 是佛学的学位，等于教授。

直到十八岁我还不知道村庄以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我们对中国曾发生的内战印象模糊，我不记得曾经跟别人谈过任何外界的事。对我们乡间的人而言，外边的世界彩色缤纷，充满了新鲜神奇的机器，连拉萨都似乎极为遥远，我们对西藏的政治情况毫不知情。后来在监狱里，中国人给我们看中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片。在帕南只有四季的变化让人们知道时间的流逝，对其他的事全都闻所未闻。

宁静的生活到 1950 年的 10 月就被打破了，我们听到消息，中国将进攻西藏，而达赖嘛已经从拉萨逃亡到印度了。有一天早晨，有几个僧侣说他们有一个感觉，不久将要发生地震。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果然听说在康区和山南地区确实发生了地震，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很坏的兆头，达赖喇嘛逃离了不久就发生地震，我们的担忧证实了。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急急忙忙举行了一系列的宗教仪式，向保护神祈祷，请求祂们保护达赖喇嘛和我们雪山之国的安全。过了几个月，听说中国人已经渡过了金沙江，这是西藏和中国边界的一条河，中文也叫长江。冬天来的时候我们村里有几个人从昌都返回来，从他们那里听到势力薄弱的藏军在康区跟中国作战的第一手资料。

有两个人来看我伯伯，其中一个人把头伸进僧舍的门，并把舌头伸出来向我们打招呼，问这是不是旺波先生的住所。我请他们进来，同时马上认出来这两个人是我爸爸的佃户，一个叫玉杰，另一个人叫多布杰。

“我们刚刚从昌都来”，他们说。

我把伯伯找来，不久僧舍就被院内其他的僧侣们挤满了，大家都想听玉杰和多布杰捎来的消息。他们告诉我们关于香戈多拉的消息，他是我爸爸的一个佃户，是个大胆、力强的人，身上总是带着一个护身符，据说是可以防弹的。香戈带领大家抵抗中国军队的入侵。可是势力单薄的藏军跟中国军队的实力悬殊，香戈唯一的武器是一把长剑，他很快就投入近距离的肉搏战。玉杰和多布杰两个人轮流说着，有时候停下来喝一口茶，玉杰一停，多布杰就紧接着讲下去，他的双手在空中比划，把香戈怎么样使剑示范给我们看，大家都静静屏息听着。香戈杀了很多的中国士兵，最后他精疲力尽坐在一座桥下休息，从桥上滴下来的血沾染了他的护身符，使得护身符失去魔力，一颗炸弹落到桥边爆开，把香戈炸死了。

这个故事听来好似是一首史诗，不像真实的事，大家并不感到恐慌也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国家已经被侵占，而且很快将被中国人征服，我不记得自己那时有怎样的焦虑感。几天以后，香戈的家人到寺庙里来见上师，作了一场法事。除此之外，我们的生活还是照旧，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过了几个月，听说达赖喇嘛平安返回拉萨了。1951 年 7 月他将到江孜举行一场佛法，江孜离帕南只有几天的路程，是一个对印度的贸易中心。爸爸到寺庙里来，说这是一辈子也难得的机会，大家都应该去见达赖喇嘛，这将是我们第一次有机会去看由佛主转世的人。

我们早早地启程了，达赖喇嘛将要抵达的消息转播得非常快，我们在路上遇到几十个由村民和僧侣组成的一个个小团体，大家都朝江孜的方向奔去。我简直不能相信有这么多人聚集到这儿，每一块空间都搭满了帐篷，一堆堆的人临时升起了炉火，用三块石头架成三角形，上面放一个锅。夜里面大家挤在一起取暖，睡在露天里。他们为僧侣们打扫了一块地，这块比较高的平台就成为我们的聚点。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放眼望去到处可以看到人们围着帐篷和炉火，青烟袅袅升入天空。妇女们穿戴着她们最贵重的珠宝和髮饰，上面嵌镶了玛瑙和绿松石。小商贩们到处摆上摊子，贩卖各式各样从印度运过来的饮料。我四处走动，看着那些翘着腿的商贩们向客人推销商品：中国的茶砖、镜子、烹饪器具、香料、纺织品和靴子及玩具。

突然人群中起了一阵骚动，商贩们急忙把的货物捆扎打包，我听到军乐的声音，并看到藏军列队走过来。军乐队的指挥身上穿着虎皮，士兵们身后跟着一批身上穿着黄色丝绸衣服的西藏贵族，他们双手向左右摇摆。贵族后面又有一群僧侣，手里拿着香炉和香烛。僧侣后面有几个皮肤黝黑的人撑着一把装点华丽的黄色大伞，伞下面就是年轻的达赖喇嘛，他向群众点头挥手示意。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达赖喇嘛，从大伞下面可以看到他容光焕发的脸，我永远不会忘记。所有的西藏人都把他当成菩萨救世主，我们相信达赖喇嘛是慈悲的佛主转世的，在雪山之国他是所

有西藏人的精神和政治寄托，他不但守护佛教真谛，也保佑人民的福祉。

没到江孜之前，我从来没有体验过一个商业性的边界城市会如此生机勃勃，在这里你可以遇到来自西藏最偏远角落的人，以前我以为我们的村庄是世界的中心，现在我意识到西藏是一个国家。在当时熙熙攘攘、前来朝圣的商旅和僧侣中，大约没有一个人能够预测到，我们当时正大难当头，下一次大家又聚在一起的时候，会是在监狱里、在劳改营、和在中国警卫的眼底之下。

有一些谣言说，拉萨最富裕的贵族们将把他们的资产转移到印度的噶伦堡去，这些人很世故，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但那时候，江孜有着节庆的气氛，人们接肩摩踵地在做买卖或是在祈祷，大部分的人都在祈祷。我还记得人们脸上的表情，他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自己曾经见到过达赖喇嘛。

我们在江孜停留了几天，我在临时搭起来的集市之间悠荡。拥挤的人群正在观看一个队伍，并且低声说：“中国人，中国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国人，他们骑着壮实的藏马，马身上点缀着装饰物，士兵身着蓝色的、看起来很不协调的服装，后来的才知道那叫毛装。群众分开站在两边，让队伍从中走过去：五个中国骑兵，后面跟着一些西藏官员，他们穿着非常讲究的丝绸衣裳，戴着头饰。后来我才知道这几个人里面的一位叫作张经武，是中国驻西藏的代表，这整个行列看起来不太象一个壮观的征服者的队伍，张身后没有大军跟随，也没有人背着枪。

很久之后，当我在监狱的时候，中国方面公布了一张照片，这是张经武到达江孜的时候夹在拥挤的人群中。图片的说明是："西藏群众欢迎中央政府的代表。"这是谎话！人们聚在一起是要看我们的领袖达赖喇嘛，没有一个人西藏人会跑到江孜来欢迎张经武。以后我们就慢慢地明白，中国当局在制造各种"事实"时，是多么具有创造性。

我们回到帕南，就好像小孩子出去冒险以后回家一样。父亲说，这是他一生最珍贵的经验，即使明天就死去，他也感到很满足了。西藏人相信只要能听到达赖喇嘛的教诲，就会为下辈子带来运气。回到帕南之后，我们举行了一个庆祝仪式，一方面是大家高兴能幸运地见到达赖喇嘛，另一方面也庆幸达赖喇嘛现在成为西藏的精神和政治领袖。达赖喇嘛还未成年时，西藏由一位摄政统治，但是现在中国人来了，未来的前途似乎困难重重，西藏的贵族们决定让年轻的达赖喇嘛接管权力，他还没有满十八岁。

一年以后，我们听说西藏的第二号人物——班禅活佛，返回到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这中间有二十三年的空档。他的前任——第九世班禅活佛，在跟拉萨政府发生冲突时，逃离了日喀则，最后死在中国，他的转世灵童在安多被发现了。听说班禅喇嘛在通往日喀则的路途中间，会在嘎东停留一夜，我们拼命地打扫寺庙，把一切尽可能收拾得漂漂亮亮。一组和尚把墙壁粉刷一新，另外一些人去清理走道，帐篷搭起来了，我被指定将走在班禅喇嘛身后面替他撑法伞。可惜到了那一天，班禅喇嘛和他的随从只在寺庙附近稍做停留，根本就没有到嘎东寺来。大家都感到很失

望，可是僧侣们还是非常地兴奋，因为他们都看到了班禅活佛。父亲说这几年大家真幸福，能够亲眼看到两个最伟大的喇嘛。

西藏人认为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是太阳和月亮。现在太阳和月亮都照耀在雪山之国，似乎好运将跟随我们。

第　三　章

暴　　动

江孜之旅使我更下定了决心，要继续我的学业并且将我的一生奉献给宗教。我是一个年轻的僧人，现在面临抉择，或是当一个寻常的僧侣或是深造成为一个正式的喇嘛。我已经快满二十岁，可是还只是一个很单纯的乡村和尚，在嘎东寺接受教育是自发的行为，学习是否勤奋都是个人的决定，有些僧侣仍然是文盲，在寺院里只担任一些体力活动。老师鼓励我背诵所有的基本经文，我学会了如何主持复杂的仪式，以及怎样使用仪式上所需要的器物。我相当努力并且通过了所有的考试，在嘎东寺已经没有什么我可以学习的了，我需要做出选择：去拉萨继续进修或者在嘎东寺留下来担任一些行政方面的职务。

伯伯问我愿不愿意参加比丘戒的宣誓，寺院里所有的僧侣都进行过这个宣誓。老师们鼓励我这么做，他们说如果不宣誓，我就必须中断学业，并且只能在寺院里担任低等工作。我很担忧是不是能够遵守比丘戒的二百五十三条教规。1952 年我和其他二十个僧侣都在上师面前进行宣誓，变成正式的喇嘛。今天我是那二十个喇嘛中唯一的幸存者，他们中间有的人在监狱里死去，有的人在文革期间被打死。

进入西藏的中国人越来越多，这类谣言慢慢流传到我们的寺庙来。听说在拉萨有抵抗中国军队的行动，村里富裕的人家开始藏匿他们的珍贵物品，我们家也开始把一些珠宝藏起来。寺庙里也指定了一些年长的僧侣专门负责藏匿寺庙的一些价值连城的物品。我们每天都听到解放军进入其它村落的消息，中国人很急切要展现它们的实力，在各个地方搭起舞台，放映电影。我无法想象这些乡下人怎么能够抗拒这些神奇的现代技术。

1952 年藏历的八月，第一批中国军队抵达嘎东。我当时正在房间里读经，一个和尚匆匆冲进来告诉我中国人来了。院子里三名穿毛装的中国军官正在拴他们的座骑，僧侣都从窗户里面往外张望。

中国代表团来拜访我们的上师，其中一名军官捧着一个盒子，里面装了几卷丝绸。他后面的几个军官捧着另一个盒子，里面放满了上好的中国茶叶。一个藏人翻译陪伴他们而来，从口音听得出他是康区人，他已经把传统的西藏服装换下来，改着深蓝色的毛装了。我没有亲自参加那次会见，可是后来我看到他们离开，上师和其它庙里的长老跟在后面。上师和长老们在他们袈裟左上胸都别着一个毛泽东的像章。中国人看上去很高兴，因为上师同意别上这个像章。

的司库对中国人特别毕恭毕敬，用一种很谦卑的声调说：“我们很珍惜长官们（Pon-po la）的礼物”我听到他用这个字眼吓了一跳，这个词的意思是领导或长官。大部分西藏人都不能够区分高级军官和普通士兵，所以把中国人都称作为“领导”。

这个词就象病毒一样扩散到我们的藏文里来成为一个新的词汇。西藏人已经开始恐惧了，只要见到中国人，他们的态度都是卑躬屈膝的，即使到今天，我们还继续称呼中国军官为“领导”。

中国人一离开，上师和其他的长老们就把像章取下来。纪律长老把像章取下来，一脸不屑地望了一下，然后轻轻地把它一弹弹到寺庙墙外去。后来我在监狱里，很担心有人会把这件事情报告上去，中国人把这一类的举动都称为“不给面子”，这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标记。

中国人开始向我们寺院提出一些上师难以拒绝的要求。同一个代表团在翻译的陪伴之下又转回来，他们要求借粮。中国人向上师保证，如果路修好了之后，他们会连本带利地加倍偿还，上师同意借他们一些粮食。

中国人在帕南设立了一个办事处，开始组织会议。一个晴朗的夏日，一队中国人开始敲锣打鼓，后面跟了一大群村里的小孩。有些人跳着舞，手里巨大的红旗在空中飘舞着。他们从一家走到一家，宣布当天晚上有一场表演，他们也来到寺院门口，并邀请僧侣们去观赏。我们无法辨认这些人是男是女，因为他们穿同样的制服，而且头发都藏在帽子底下。

那天晚上全村的人倾巢而出去观赏表演，我也非常好奇，虽然僧侣一般说来不允许观看这类表演。到了那里，我发觉寺院里所有的僧侣都已经等在那儿准备看戏，中国人在戏台旁边专门为僧侣设定了席位。

舞蹈人员在临时搭起来的帐篷里上彩化妆，单单这一招就已经是精彩的戏了。一个翻译叫大家走开，说如果人们这样盯着，女性演员就不能够换衣服了。这个时候锣鼓声和铙拔声越来越响，穿着解放军制服的演员在舞台上举着木制的枪跳来跳去。他们在空中跳得很高，开始时这种生龙活虎的动作非常震慑观众，但是看久了就嫌重复。故事的大意很简单，主题总是千篇一律：解放军帮助贫农进行秋收，解放军把一个年轻姑娘从恶霸地主的欺压之下解救出来。这种戏以后反反复复看过很多次，每次他们都强迫大家要看完才可以离开。

解放军的文宣队跑到最边远的乡村去放映电影。就象歌舞团一样，这些电影吸引了大批的群众，大家在露天戏台前挤作一堆，兴奋地等待神奇的演出开始。有些藏人被电影的光和影弄迷糊了，他们会跑到两根柱子之间张开的白色银幕后面去查看，看看是不是能够在布的后面找到演员。大部分的电影都是类似的内容，解放军跟国民党和日本人作战。最后的结果也老是一样，胜利属于共产党。我记得有人问过我，为什么日本人从来没有赢过。

中国人是有目的而来的，歌舞表演和电影都显示了共产党的至高权力，此外他们也要传达社会主义的信息。中国官员常常去拜访贫苦的农民家庭，表示对他们的生活非常关切。他们向贫苦农民发放无息贷款，同时也并不疏忽富裕的群体。1952 年中国人开始在帕南地区设置办事处，邀请当地有影响力的藏人参加各种不同的委员会。

他们也非常慷慨。藏人如果替他们工作，可以得到纯银的大圆为报酬。连我们的寺院也得到很多数量的大圆。这些银圆后来都被熔掉作成灯和碗，专门供祭祀神灵时盛水用。

演戏的节目逐渐变成了政治集会，中国军官站上一个木箱子，面对观众，开始作冗长的演讲，说军队是毛主席派来解救西藏人民的，完成任务之后，就会返回中国。他们从来不提共产主义，这些演讲的主题都只是关于如何发展西藏，如何改进我们生活的品质。

不久之后，中国人在西藏就无所不在了，帕南位于西藏主要的三个城市之间，我们亲见了每天不断地有中国士兵来到这里。他们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随身带着非常少的粮食，从举止上可以看出，这些士兵都是十八、十九岁的男孩子，但是他们看起来已经象老人了，脸孔被风刮得非常粗糙，嘴唇都十分干裂。

有一些藏人妇女把一块块的牛油送给中国士兵，但他们不知道怎么用这些东西。有一个妇女就把牛油涂在自己的双手上，然后作擦脸的样子。这些年轻的士兵就点点头也学着这位老妇人的作法，把牛油涂在脸上和手上，旁边围观的藏族妇女都大声笑了。

寺院里的生活逐渐地趋于平静，恢复了日常的作息。中国人似乎非常谨慎，对我们的宗教生活不加干预。现在我已经在学习在一盘沙地上建构极乐世界的图案，上面展现宇宙和众神。图案是由非常细的沙和彩色的榖粒堆砌而成，需要很大的耐心和很巧的手工。那年冬天，拉萨哲蚌寺的一位高僧仁曾登巴大师来到嘎

东，他建议上师把本寺的几位年长僧侣送到拉萨去进修“格舍”学位（藏文 Geshe，等同教授），这是一个僧侣所能得到的最高学术资历。

上师接受大师的建议。能够在那“三大”：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的大学学习，被认为是极大的殊荣。这是西藏最大的佛教大学，都在拉萨城外几里以外的地方。嘎东寺内只有很少几名僧侣曾经在那几个中心学习过。从拉萨返回来的僧人享有每天早课时坐在每排首位的特权。

我相信每一个出家人都梦想有一天能够到这三大寺院里去学习，我也不例外。当上师宣布派赴拉萨学习的名单时，我不在内。记得当时我极为失望，出家人也有自尊心，后来才知道，当时伯伯请求他们把我留在本地，他认为我的前途在嘎东寺，我应该取得一个较高的位置，变成司库或者是主管礼仪的喇嘛。不错，这些地位确实代表一定的特权，但是我还年轻，多么渴望能够到拉萨邻近的著名寺庙中去学习，逃跑似乎成了我唯一可以选择的路。

几天之后，三个中选的僧侣准备动身赴拉萨。我向他们道别，把哈达挂在他们的脖颈上并祝福他们，但是我秘密地已经做好准备要跟他们一同出发。我把所有随身的东西都打成一个简单的背包，三位僧人动身之后几个小时，我就挑上背包尾随在后。我从后门溜出来，没有人看见。我顺着山路往前走，到达高原上，我拼命跑，要赶上那三个僧人。当我最后停下来的时候，很放心地发觉并没有人跟随在我后面。

当那三位僧侣看到我的时候，立刻就明白了我的意图，知道我逃跑了。在接下来的几小时之内，他们试图说服我回心转意返回庙里，但是我告诉他们我已经下定了决心，我非常坚定而固执。

我心里充满了对哲蚌寺的憧憬，在行路的时候，一个同伴一再提醒我，我是没有得到上师的许可，擅自离开寺庙的，他说：“喂，班旦，你不觉得你应该返回嘎东吗？”我摇摇头埋头走路。我知道如果现在返回嘎东会引起多大的麻烦，如果我坚持到哲蚌寺去，也许我的老师和新的上师会看出我的心意很诚，当然，这之前我是一个名符其实的逃跑者。

走了十三天才到哲蚌寺。早已经听说过哲蚌寺的华丽，当我们接近它时，步伐更加快速了。我们走到山脊的尽头，远远就眺望到那座壮丽的寺庙。我们静静站在那儿，惊异地望着在闪闪阳光下变了形的寺庙，距离还太远，只能看到很多像米粒一般的白色斑点。哲蚌的意思是“米堆”，在我们眼前那一座座组成寺庙的屋顶就象一颗颗的米粒。阳光射在如此耀眼的金色屋顶上，我不得不用手护住眼睛。在背后灰色山脉的陪衬下，白色的建筑矗立在那儿，底部是一片片深色的树林，这个地方将是我们未来十年的家。我们穿过一座公园，看到有一些僧侣坐在阴凉的柳树下读经或打坐。

寺庙象一座城市一样铺洒开来，有一半延伸到山上，它的背后有三座高耸的山峰插向天空。从远距离还真看不出来，寺庙白色的墙内竟有这么些多象谜宫一般的狭窄街道和数不清的回廊。

我们放下背包，面对寺庙排成一线站立，双手合十高举过头，之后把手缓慢地放在脸孔前面，接着举在胸前，然后匍匐在地三次，为佛主、佛教义理和所有的僧侣祈祷。

“我们终于到达了！”一个同伴这样说。

我们背起包袱朝寺庙走去。

找到其它从嘎东来的僧侣并不困难，因为到哲蚌寺来学习的僧侣是按照地区，分配到不同学院里去的。一共有四大学院，每个下面又分成很多不同的系。嘎东来的僧侣一般都进入洛色林学院，这个学院拥有三十二个系。我们将会被分派到藏巴系，这里面的僧侣都来自藏区。1995 年我到牛津大学访问的时候，不由得就回想到当年哲蚌寺的学院和学生以及它的结构。

哲蚌寺创建于 1416 年，它可能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一座宗教机构。五十年代有来自佛教世界的一万多位僧侣在这儿生活和学习，有的人是从苏联伏尔加河畔的卡尔木加来的；也有僧侣来自于印度拉达克和缅甸边境的加尔唐市；还有是从日本和中国来的。头几天我们住在一个嘎东来的老僧人的居所，那里很阴暗而且简陋。我很担心找不到一名导师和合适的科系接受我作为学生，其他的人都有原寺庙的介绍信，入学没有问题，可是我这个逃跑者，手上什么文件也没有。

我们中间有几个人到离哲蚌寺以东一里的拉萨去，那个城市是西藏人精神世界的中心，每个人都希望一生当中能有一次机会到拉萨去朝圣。

当我们走上那条沙砾小道时，我看到布达拉宫闪亮的屋顶从拉萨的河谷拔地而起。多么亮丽的颜色啊！金色的屋顶，红色的瓦墙标志着达赖喇嘛的居所，宫殿的下半部全是白色的城墙，这里是西藏的守护神的家。

快靠近城市的时候，我看见一只大象，这是我头一次看见这种动物，远远望过去，看起来就象一块巨大的石头，慢慢向我们移动，它的脚下卷起一层层云雾一样的沙层。我旁边的人都把帽子摘下来，并且伸出舌头对大象表示敬意。大象停在我们的面前，赶象人喝令道："敬礼"，大象把它的鼻子卷起来伸到天空中去，围观的人纷纷丢给它面包和钱，大象用鼻子把钱捡起来交给赶象人。

我花了几天的时间去购买必需品和礼拜几处圣坛。我站在西藏最神圣的寺庙 —— 大昭寺前面排着的长长队伍的后面。释迦牟尼的脸上镀了华丽的金色，全身镶嵌了几百颗宝石，有玛瑙、绿松石和玉。两个掌门人站在佛像前面，接受信徒们的奉献并且引导大家往前移动。油灯里跳跃的火焰把佛像上的珠宝照得闪闪发亮。

神龛都在很小的房间，里面有几百个油灯在燃烧着，发出的熏烟使得空气闷热异常，我立刻就晕过去了，被其他人抬到院子里，拉萨冰冷的空气拂过我的脸，同伴们拍打我的肩膀。然后我们就走向八角街，这条街是围绕着大昭寺的。

拉萨城里挤满了人群。八角街两边全是店铺和小摊贩。顾客们跟商贩讨价还价，尼泊尔的商贩和克什米尔的买卖人在这里接

肩摩踵，我发觉那里有一个清真寺，能在西藏看到回教徒颇为有趣，我们称这些藏回“克什”，其实这是克什米尔的读音，因为他们的祖先大部分是从那儿过来的。也有很多中国人在这里，中国的士兵在八角街游逛，身后跟了一大群嘈杂的藏族小孩，他们叽叽喳喳地跟汉人学舌。有一些吉普车和大卡车从藏东地区开过崎岖的小路到达这里。在拉萨城外，中国人忙碌地在修建道路。

我在哲蚌寺还有一些手续要办理，从嘎东来的僧侣们一般都进入藏巴系，可是他们不允许我进入同一系，好在只要自己能找到一个“指导老师”，入学规矩并不十分严格。一个名叫西拉侗密的年长僧人把我带去见他的老师永曾先生，他是一个年轻的名叫赤拉布活佛的转世喇嘛的私人老师。我向永曾先生五体投地朝拜，并且向他敬奉哈达。永曾先生仔细地观察我，好像是在检查一件货物。他说只能把我介绍到他的系里，也就是山南系，我正式被接受了，名字正式注册，成为这个寺庙的一名正规成员。

我得找一个住的地方，西拉要我住进他的屋子。他房子里已经住了好几个其他的僧侣。我的房间非常狭小，徒然四壁，角落有一个小泥炉和一堆牛粪和木柴。凹凸不平的地面上铺着一条粗制的地毯，小小的窗户面对白色的庙墙，屋内有两张狭窄的床垫和两张木制桌子。

现在我是学院的学员了，也有地方可住，我可以参加哲蚌寺的不同的课程了。我去听寺院里最有名的一位喇嘛的课，他被称为白玛坚赞大师。我们到他僧舍去，被让进一间很大的房间，他坐在结实的椅子上，指给我们一排排的座位，上面放着很细致的

藏式地毯，叫我们坐下来。他告诉我们应该努力学习，他说：“你们来自远方，只有厚土和浮云是你们的指路者。”

这里的生活跟嘎东没有太大区别，每天五点钟起床。天朦朦亮的时候，就会听见一名年轻的僧侣吟诵着早经，接着是一长串的海螺号声，召集所有的僧侣来喝早茶。每个僧人带着他自己的糌粑，一共上四次茶。第四杯茶是奶色的，有点酸味道。据说过去哲蚌寺的茶都加了雪狮的奶，雪狮传说是一种在西藏山间游荡的神奇动物。

早上是个人学习的时间，我先祝祷达赖喇嘛和其他上师们长寿健康，祈祷以祈求运用我所学到的德性和行为来造福一切生命收尾。然后我开始复习头一天老师教授给我的哲理经文。

中午的时候，大家都聚集在法场，这是寺庙隔出来的一块露天空旷地方，有柳树遮荫。每个系都有它自己的法场，僧侣们聚集在这里，听上师或其他高僧讲道。听完课后大家就分成小组来讨论选择的议题，这是他们刚刚听讲的题目或是其它的哲学性经文。我们新生被分配在一起学习辩论术。

生活很快进入常轨，但是拉萨越来越严峻的政治情势使我们无法不分心。我们听到很多抗议活动的消息，也听说许多反抗中国的标语出现在街头。中国军官到寺院里来跟上师和高僧举行会谈。随后，有很多年长的喇嘛被指定要参加拉萨的政治会议。

1953 年的冬天，有大批的僧侣从康区和安多过来，从他们口中听到很多关于西藏其它地方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知晓了中国人把喇嘛和寺庙的土地都没收了。

我尝试专心集中在学习上，但是寺庙墙外的事越来越冲击我们的生活。1954 年年初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都到中国去了，大家感到非常焦虑，谁知道中国人会不会把他们扣留在北京呢？从康区和安多来的僧侣说，中国人邀请一些喇嘛和村里的长老去开会，然后把他们逮捕。

一个朋友借给我一本已翻阅得很破烂的小书，这是 1933 年去世的十三世喇嘛的遗嘱。我被他的一项预言震慑住了：他警告“红色意识形态”将要崛起，它将摧毁西藏的政教系统，他还说这在蒙古已经发生了。（几星期以后，一个年长的僧侣从蒙古来，告诉我中国人在蒙古摧毁了很多的寺庙，并且把僧侣们都投入监狱。）达赖喇嘛预言中国将染上“红色意识形态”，有一天它会摧毁西藏的宗教。

达赖喇嘛和其他的高级喇嘛都到中国去了。每天都有关于战事的消息传来，藏东地区不断有僧侣逃难到哲蚌寺来。在拉萨反华示威的领袖们都被逮捕了，年长的上师和喇嘛都被指令去参加会议，也就是中国人所谓的“学习班”。

帕南有信来，通知我父亲病重，我于是踏上了漫长的返乡路程。我走进家门，在继母身旁坐下来，她看起来毫不忧虑。我问她爸爸怎么样时，她只默默地替我倒茶。我打起精神，准备接受最坏的消息。突然父亲走进房间来，他看起来非常健康，令我十分困惑。原来父亲和伯伯用假的消息把我召唤回来，因为伯伯已经年纪大了，需要有人照顾他。伯伯和父亲极力说服我留在嘎

东。从宗教和家庭的角度来看，我有责任，无法拒绝，我别无选择地在嘎东留下来了。

不能返回哲蚌寺令我非常失望，因为我的学业进展得那么顺利，而且享有特权，能够坐在当代最伟大的几位喇嘛身边，聆听他们的教诲。我可以继续在嘎东学习，但是没有人能够指导我。我每天在寺庙里处理杂务，也到外面去访问农户并且主持仪式。

1954 年发大水了，那是一个很美丽的夏日，所有的僧侣都聚集在大殿里。突然一个比丘匆匆跑进来对坐在门口的纪律住持耳语，住持站起来打断了仪式，说河已经决堤，整个村子都被水淹没了。我们跑到外面一看，整个帕南都淹没在水里，水已经上升到我住所的腰部了。

离这里以西 50 里的江孜的河决堤了。当水冲到帕南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是醒着的，能够及时逃往高地，但是河谷上游的几百个村落都被水淹没了。后来我们看到很多的尸体被冲到河滩上来。水淹了整个河谷，泥砖砌的房子一吸了水以后，都跨了。下午，水慢慢退了，我们就进到屋子里面去抢救一些还能够抢救的东西。

那一年没有收成，所有的农作物都被摧毁了，我们需要仰赖储备的粮食。水灾驱使很多贫穷的农民替中国人去修路。在重新修建自己的房屋的时候，很多村民跟他们的亲戚搬到寺庙里来暂时居住。我的僧舍变成人们的新家，但是妇女不许在寺庙里过夜，黄昏的时候，她们都三三两两地结伴走到其它建筑物里去过夜。

我后来在监狱里时，中国人说他们在水灾时进行了抢救，但是他们没到帕南来。在西藏到处都有中国人，但是他们更急于设立自己的办事处和按规矩建立稳固的机构。就象蜘蛛，中国人围绕着西藏织着自己的网，我们完全束手无策。

1955 年中国人宣布要组成一个筹备委员会来建立西藏自治区。中国干部到我们村子里来，宣布了这项消息。我哥哥被指定为地方委员会的书记，他是一个很好的行政人才，帕南人都尊敬他。中国人还给他发薪水，每个月八十元。爸爸说中国人就象捕鱼人：他们现在先对西藏人放下鱼饵，有一天我们全都会上钩。他要跟中国人对抗，把他们赶走。他说有一天路修好了后，我们就没有办法把中国人赶走了。

有几个中国军官到寺庙里来，发给每个僧侣一个搪瓷杯子，上面用藏文和中文写着“庆祝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这种杯子变成中国人统治的象征。我们常说没有人愿意用藏人的木碗去换取一个中国的铝杯子。这些搪瓷杯子完全没有用，因为一倒入茶之后，它们传热这么快，喝茶的时候会烫伤嘴唇。

中国人在宣传方面越来越大胆，为了要煽动农民起来反抗地主，各种表演和电影都刻意描绘恶霸地主。他们放映了《白毛女》的电影，这是关于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受到残酷地主的欺凌，然后逃到山里去，最后她当然被共产党解救了。中国人非常聪明，他们从来不直接说西藏需要进行土地改革，他们也不轻慢那些被称作恶地主的人，在设立新的办事处时，这些业主也都被他们拉进委员会里去。

在寺院的大墙之内，我们还是设法维持跟以前一样的生活。仁曾丹巴大师常常来我们的寺庙，他给大家上佛教哲理的课，整个冬季他都辅导我们进行经辩，嘎东的僧侣们再度能够接受很好的教育了。大师是很有名望的师父，他也常常被别的寺庙请去，但是他已经把嘎东当成了他的家。

1955 年的秋天，我的伯伯兼老师旺波先生病了。一天早上他对我说，他的脚趾已经不能动了，麻痹慢慢地往上爬到腿部，一直蔓延到全身，最后他完全不能动弹，瘫痪在床。我觉得照顾他是我的责任，他说“诞生在这个世界的万物有一天也要面对死亡。”几天之后，他叫我用他的黄色礼袍盖住他，又叫我把佛经里面重要的一套经文 — 涅盘经放在他的身边。他开始背诵经文，我坐在地上听他背诵，慢慢地声音低沉下去，最后变成一种呻吟。我举头望着他，看见他的双手合十，好像在祷告，我知道他已经断气了。

听说次年达赖喇嘛和班禅活佛将要到印度去参加佛主二千五百年诞辰的庆典，似乎达赖喇嘛会在他前往印度或者是返回来的途中经过嘎东，所以我暂时不能返回哲蚌寺。

这次的访问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快。1957 年 2 月，藏历新年过后几天，达赖喇嘛和他的随从就到达了。我们小小的寺院挤满了外来者，年轻人背负着父母或祖父母从周围的村庄赶过来，要参见达赖喇嘛。我们必须把僧舍清理出来，以接待远到的贵宾。庭院里挤满了大约有一千人。我站在达赖喇嘛的佛座旁边，记得当他问我，去过拉萨没有时，我吓得发抖，说不出话来，旁边一

个官员推推我，我才轻轻地吐出一个“去过”。达赖喇嘛问我导师的名字，我说是白玛坚赞大师，他说我应该回去继续学业。

一个星期之后，我就动身前往拉萨。家人接受了这个现实，因为他们不能不同意达赖喇嘛的指示。1957 年，中国人已经在日喀则和拉萨之间修建了一条公路，我在这条路上生平第一次搭上了一辆中国的军用卡车。这趟旅行只用了两天，如果走路的话就得十四天。这辆卡车装满了物资，旅客们挤得象沙丁鱼一样堆在货物的上面。黄昏时分，我整个身体酸痛不堪，跳下车的时候，天眩地转。第二天风尘仆仆地到达了拉萨。

我还是在山南系注册，但是要重新入学就必须先当侍茶勤务，应该给系里每个学员奉茶。因为年纪比较大，我还必须在学院里承担其它的一些义务，我担心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学习，因此决定转到其它学院作为新生入学，在那儿我不需要担负额外的义务。我进入扎学院，这是一个很大的学校，这里的学员多半是从康区来的。从西藏中部来的僧侣不允许在这里开设办事处，对我这正中下怀。

要定下心来学习并不是那么容易。在扎学院我们听到理塘和德格两个寺庙已遭到摧毁。从东区来的难民带来了消息，中国人把越来越多的寺庙关闭了，我们也听说很多僧侣被驱赶下田去劳动。

风声日紧，到了 1958 年，这些矛盾已经从康区扩展到西藏中部，成千的康巴人都涌往拉萨。上午的辩经课常常被来自首都

地区的消息打断，每天都可以听到关于康巴人和中国人作战的消息。

在西藏中部，一般都认为康巴人非常率直而且冲动，现在人们非常佩服他们的勇气和力量。越来越多的康巴难民涌向寺庙，他们都长得十分高大，一付充满自信的样子。男人随身携带着武器，妇女们有着红红的面颊，头上身上戴满了珠宝。在藏东地区，康巴人已经准备好要打游击战了。他们背上挂着武器骑着马来到哲蚌寺，寻求高僧的祝福，喇嘛们将护身符赠送给他们。

今年应该有好兆头，因为达赖喇嘛将完成他最后一项考试。新年一过，接着就是祈祷法会。去年的这一天成了抗议中国人的节日，但是学院的纪律长老告诉僧侣们今年要留意自己的行为，庆祝活动一过，就必须回到寺院。西藏各地的僧侣都赶来参加祈祷法会，他们要观看佛学博士颁奖，这是一个僧侣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历代达赖喇嘛之中，只有第十三世和第十四世两位得到了这项荣誉。

祈祷法会在二月底，也就是藏历新年的第三天举行。我夹在群众中间，坐在那儿默祷，旁边是僧侣也有寻常百姓，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中国人跟大家保持一定的距离。谈话都围绕着达赖喇嘛考试成绩优异这个话题，然而大难即将降临。

3 月 10 日那天，我被派到拉萨去处理寺院里的一些事务。我们一共十个人清晨出发。当接近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林卡的时候，只见一个人骑着一辆自行车飞快地向我们冲来。他喘着气，口里冒出白烟，在几尺以外跳下车来，从他的衣着上可以认出他

是一个年轻的政府官员。他说是被派遣来召集僧侣们到罗布林卡去的，拉萨的民众都围在罗布林卡外面，要保护达赖喇嘛，因为中国人邀请达赖喇嘛到一个军营里去，而他“接受”了邀请。这个年轻人以发抖的声音说，中国人会把达赖喇嘛送到中国去。

我们匆忙地赶到罗布林卡，已经有一大群人围在大门口。事后回想起来，这就是所谓的西藏抗暴的开始。群众失控了，每个人都在大声叫喊，一辆吉普车冲进示威的人群之中。一位名叫桑波的西藏内阁成员在侍卫的陪同之下，开着车进入宫殿。有的人从后面扔了一块石头，石头落在吉普车顶上，接着又有人扔了一块石头，它击中了桑波的头部，他随即被送到医院里去了。群众把他们的愤怒转移到一名叫昌都克琼[7]的西藏官员身上。大家推他、捶他，喊叫他的名字。一个年长的僧侣试着阻挠群众伤害昌都，可是大家都不理会他，继续狠狠地捶打这名官员。

群众开始骚动，昌都克琼不见了，好像他被人群吞蚀了。我们离开群众，朝拉萨走去。看到示威人群中间有一个瞎子觉得非常奇怪，怎么一个盲眼的人也会卷入这样的事件中，大概他也听到关于达赖喇嘛的处境，而要奉献他的力量，来保护藏人的精神领袖不受中国人的侵犯。

拉萨的示威游行更为浩荡，群众聚在一起，高声地喊“中国人滚出西藏，中国人滚出西藏。”骚动的群众现在离开罗布林卡而朝市中心进行，他们拖着昌多根琼的尸体。

[7] 克琼（ Khenchung）是宁玛派红教的佛学学位， 介于凡世的硕、博士之间。

我们默默地步行回到哲蚌寺，简直不敢相信亲眼目睹的事情。回到寺内，发觉那里已经人去庙空，庭院和法场上没有一个人影，只有从雷神庙里传过来缓慢的击鼓声。我的僧舍内还有几个人在那儿，我们都睡不着，就爬上屋顶，远眺拉萨。

第二天早上，值日的住持说他需要几个义工，我马上就自愿加入。寺庙里把僧侣组成百人一组，大家轮流值岗。我的那一组负责守卫寺院的后门，有些僧侣手上拿着英式的来福枪。中国人派遣士兵包围了哲蚌寺，他们在寺庙外面没有坡度的平地上搭起了军营。

一天早上洛色林学院的上师派我和其他几个僧侣到罗布林卡走一趟，我们得到的唯一指示是，到北边的大门去。在靠近宫殿的地方，每三到五米就有一个藏军守卫站岗。宫殿里面的僧侣已经把袈裟换成平民的装束，身上还带了来福枪。

在宫内等了几个小时，然后我们五个人被叫进雪尔印刷厂，这是西藏最古老的一个印经室。在楼梯间，有一个约五十岁肥胖的男人对我们说，保卫佛教不让它受到无法无天的共产党的侵犯，是我们的责任。这个胖子拿出一大捆壁报来，又交给我们几桶浆糊，我们抱着这些东西走到拉萨城中心，然后开始张贴。当壁报贴到墙上时，我才首次读到它的内容，上面写着“中国人撤离西藏、西藏独立”的口号。

整个城市陷入混乱之中，人们开始洗劫商店。当我们赶回哲蚌寺时，听到更多的呼喊声：“中国人滚出西藏！”“达赖喇嘛万岁！”后来我才知道，那天西藏的妇女也单独进行了抗议活

动，这是由可敬的贡噶林·贡桑女士所带领的。后来我在监狱里亲眼目睹了她被枪杀。

哲蚌寺现在有很多新来的人：穿着寻常百姓衣服的僧侣，只能从光头上被认出身份。有的人在腰上别了一把剑。夜里听得到枪声和迫击炮爆炸的声音，我们爬到屋顶上，俯瞰整个拉萨，枪炮开火，把天空照亮，象放烟火一般。

黄昏时分，可以在微风中嗅出火药的味道，枪声和炸弹声无情地持续着。我们退回寺院，保持安静，避免任何会惊动驻扎在寺庙外面那些中国军人的行为。我们无法知道拉萨那边的局势，不知道人民是否占领了城市，还是中国人已经把动乱镇压下去了。

一天下午，有一个人沿着小路走到我们的寺院里来。他带来了消息说，拉萨的藏人已经接管了中国的军营，僧侣们目下都应该留在寺院内。我们不久就发现传递消息的人是中国人派来的奸细。后来我在监狱里，才知道很多其他的寺院当时也曾经得到同样的假消息。

中国人会来攻打寺庙，这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离哲蚌寺一里外的地方，一队队的卡车开过来，中国军营增强了兵力。有些僧侣开始遗弃寺庙，往山上逃走。我不知道应该做什么，夜里不断持续的枪声让我无法入睡。次日早晨整个寺院陷入恐怖的宁静之中，宁静偶尔被拉萨传过来的枪声所打破。我走到各处察看，发觉很多僧侣已经或者正在准备逃亡。大部分人是在夜间逃走的，只有两个从嘎东来的僧侣还在寺院里。

我们三个人匆忙赶到仁曾丹巴大师的僧舍。我依然把他视为师长，从嘎东来的僧人对他拥有特别高的崇敬之情。平常冬季他都在嘎东过冬，但是今年他被邀请到拉萨来，参加达赖喇嘛的毕业仪式。他已经七十二岁，身体非常孱弱。

“你们还在这儿？”大师脸上还带着笑容问。我们告诉他，大部分僧人已经逃离寺院了。他点点头说：“坏日子就要来了。”我们请他跟我们一道到嘎东去，他说他太老了，只会增加我们的负担，但是我们劝他至少应该躲到哲蚌寺后面的山上去。我带上一些我屋子里的糌粑，大师让我打理一些书籍。身上仅带着这些东西，我们离开寺院走向通往山上的小路，耳边还响着拉萨的枪声。一路上都是僧侣和乡民，大家都慌忙逃难。

中国士兵在通往寺庙的通道上站哨，哲蚌寺跟拉萨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了，山下的村民赶着牲畜住进寺院。通往山上的小路上，满是推推搡搡逃难的僧侣、农民、小孩子和牲畜。上师的呼吸非常困难，心跳也很不稳定，每走几分钟就需要停下来休息。到达通道的尽头时，太阳已经下山了，那一夜我们就在一个山洞里过夜。

第二天我们被巨大的爆炸声吵醒了，中国人开始炮轰寺院。我们站在高处，望着炮弹落在寺庙的顶上炸开，我回头看上师，他正在哭泣。每当一颗炸弹落在学院的庭院和庙宇顶上时，就有一股股的烟和尘土涌出。此处不能停留，上师已经没有办法行走了，我们三个人轮流背着他继续往前走。

几天之后到达庆恰寺，这是一个照拂逃离哲蚌寺的僧侣的接待中心。寺里的住持是仁曾丹巴的学生，他很亲切地招待我们。听说中国人已经攻入哲蚌寺，逮捕了剩余下来的僧侣，他们双手被缚在身后，全部集中在大殿里。我知道现在必须加速投奔嘎东，通过山路上的路标我们可以辨认出方向。

三月的西藏还是一个很冷的季节，行程艰苦劳顿。高原上落满了新下的雪，黎明时分气温非常低。中午，太阳当头罩来，身躯很快就精疲力竭了。走了二十天才到达帕南，那些山峰的形状对我来说象个熟悉的老朋友一样。上师的精神稍微放松一些，其它人也比先前多话了，但是还不知道摆在前头的将是怎样的命运。中国人是不是已经到这里来了呢？我们在村外稍为停留了一段时间，看来好像没有什么不寻常的景象。这时已是近黄昏的时分，大部分的村民都在屋子里面。

我们缓慢走向通往寺庙的小道，穿过大门，看见一个僧侣站在庭院中，正在打一只狗。他对我们的出现一脸茫然，接着很多僧侣从四面八方跑过来欢迎我们。发现这位身体虚弱的逃难老人竟是仁曾丹巴大师时，大家都非常高兴。以前每次大师到来，都有号角声和夹道迎接并接受他祝福的僧侣，现在只有这临时的、非正式的欢迎形式。但是院内上师还是非常注重仪式的庄严，他从石阶上走下来，全身匍匐在地向大师礼拜，然后向他呈献一条白丝巾的哈达。

嘎东寺对于拉萨所发生的事情知之甚少。这里的僧侣们一向尽量杜绝从外面传进来的有关城里的谣言。曾有一邻村的村民跑

来向大家宣布拉萨失陷，达赖喇嘛已经逃亡的消息，结果他被大家赶出院子，藏人相信这是非常坏的预兆。但是我们把亲眼目睹的一切告诉寺院的僧侣，大家都为达赖喇嘛的安全祈祷。上师向我和同伴们表示嘉慰，寺院的住持在我们疲乏的脖子上挂上了白色的哈达。

第 四 章

逮 捕

在嘎东我感到很安全，帕南的乡民还是过着照常的生活，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他们以为不管拉萨那边发生了什么样的暴乱，只要自己低头继续耕种土地，这里的生活就会象几个世纪以来一样，继续下去。

从寺庙的顶端，可以俯瞰河谷和整个村庄，老年人坐在阳光底下，妇女们在田里除杂草，年轻男人在地里灌溉。从我第一天进入嘎东寺以来，眼前就一迳是这样的景观，从日常的景象中，完全看不出以后将要发生的事情。

大师的身体恢复得很快，他又开始传授讲课。邻近的几个寺庙都来邀请他去教授本寺的僧侣。那一年的五月，我跟随他到因贡去，这是嘎东以北一个偏远的地方。那里的僧侣们对于拉萨平暴事件似乎完全无动于衷。大师在因贡讲授一个月的课。我回到嘎东，到家中去看望了一下后，就退隐到寺庙去，相信不久之后，我将会跟仁曾丹巴大师一道回拉萨。

1959 年 6 月，三个中国军官在一个翻译人员的陪同之下，来到村里。他们宣布，大家得把手里的藏币换成中国的纸币。他们设立了一个临时的办事处，那儿放着两只巨大的金属箱子，装满了中国的新货币。村民排着队，把藏币交出来，换取新货币。

听说中国人已经接手江孜的寺院，并且逮捕了所有僧侣。但我在嘎东仍然感到安全，这个寺院没有参加动乱，而我在拉萨的参与是微不足道的。中国人能用怎样的罪名来加罪于我呢？7 月间，我到因贡去接仁曾丹巴大师，返回嘎东，他再次受到非常隆重的欢迎。想想真奇怪，几个月之前我们逃回寺院时，简直就象乞丐。

一天早上，我正在房内诵经，听到雷神殿那边传来一阵缓慢的击鼓声。我停止诵经，接着有人敲门。一位比丘非常激动走上来告诉我，全寺的僧侣都得集中到庭院中去。僧侣们站在庭院中望着列队站在寺院外墙的中国士兵，他们的步枪都上好了刺刀。几名僧侣把一张桌子抬到院子中间，年长的住持吩咐在桌上摆上花，一个小比丘被遣去拿花瓶。中国军官一言不发，只是冷眼旁观。我们按惯例向他们奉茶，可是遭到回绝。

所有的僧侣都坐在庭院中的泥地上，我坐在仁曾大师的旁边。中国军官坐在藏式的桌子后面，跟我们遥遥相望。这些人我们都不认识，他们不是原来那些对我们寺庙的情况了如指掌、驻扎在帕南村里的中国士兵。他们站在屋顶上，和外墙的中国士兵们自上往下监视着我们。阳光把他们投影在白墙上面，枪上的刺刀影子拉得长长地，更多的士兵把守在大门口。

一个中国军官站起来宣布：反动匪徒破坏了祖国的统一，并绑架了达赖喇嘛。他说得很快，双手在空中乱舞。他说嘎东寺应该表明它的忠诚是向着谁。接着一个名叫桑木林的藏人从军官身边站起来说，嘎东寺跟反动分子有勾结。他大声说这个寺庙也

"背叛了祖国的统一。"桑木林说话带着拉萨口音，他说僧人应该洁静自己的心灵，并且辨认谁是人民真正的敌人。他对我们大声辱骂，好像教师责备一个犯了错的孩子。他一边指责我们，一边来来回回地迈着步子。

开始我还不明白桑木林所说的话，他常常停顿，好像在等待反应。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小册子，拿给中国军官看，并且开始点寺院里有职位的僧侣的名字：司库丹巴曲培、副司库曲扎、仪礼长老程列和纪律住持。当桑木林喊出这些名字时，点中的人就站出队，士兵们逼近来，举着枪瞄准每一个僧人的面孔，另外一个士兵就把他们的双手掰到身后，戴上金属的手铐。

事情的发展直转急下。藏文里有种说法："心跳到嘴巴里"，这是我当时的感觉，恐惧征服了我们。我望着仁曾大师，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被铐上手铐的长老们却没有显出畏惧的态度，只是脸上带着问号："你们为什么这么样对待我们？"这是无辜的人脸上常有的表情。

中国军官往前跨了一步，桑木林替他翻译。他指着僧侣的鼻子，控诉他们跟叛匪有关连。僧侣们默默地垂头而立，军官在他们面前迈着方步，厉声咒骂："你们中间有一些人必须认罪，必须服从群众的意志。"他说我们是一群批着羊皮的狼，他很快会把罪犯全部揭发出来，这只是个时间问题。在刺刀下，僧侣被带走，锁在寺院的一个房间里。

我们都必须参加"学习班"。 更多的中国军官在年轻士兵的簇拥下抵达了。他们都穿着蓝色的毛装，右边胸前的口袋里插

着一支笔，看上去像胸章一样。有些人的胸前口袋插着好几支笔，这似乎标职位的高下，职位愈高笔插得愈多。共产党要每个人都穿同样的制服，以示平等，但是却用其他的方式来显示职位的尊卑。职位高的军官，衣服上的口袋就比别人多。中国人比那些被他们赶走的藏族官员似乎更注重区分职位的高下。

“学习班”由一个叫朱西的军官主持，他是地方委员会的主席，黝黑的皮肤显示出他已经在西藏居住过很长时间，这种干裂而粗糙的皮肤是喜马拉雅山上的风所留下来的痕迹。朱西讲课，要大家认清“三大剥削阶级”。

“西藏人民生活在三座大山之下，今天我们推翻了这三座大山，揭开了西藏历史的新编章。被剥削的群众推翻了几世纪以来就在吸食民脂民膏的奴隶主，现在我们改天换地了！”

我感到很迷惑，我们是单纯的乡村僧侣，这个人的官腔对我们毫无意义。被剥削的群众？三座大山？他到底在说什么？他开始解释：“你们仔细听着，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是：西藏的封建政府、贵族和寺庙的僧侣，这三个阶级剥削压迫了西藏人民长达几世纪。”

我们还是不明白什么叫做“剥削”。

“你们承认自己是剥削者吗？”他问。

我们摇摇头。这名长官停下来，寻思一个比喻。他接着说：“剥削群众，就象一个木匠，用刨子来刨一块木头，群众就是木头，剥削者就是木匠。”

大家脸上一片茫然，这位军官无法保持镇静了，他认为我们的不理解是一种顽强的抗拒。结束时，他丢下一句话，叫大家“放弃旧思想”。中国人还创造了另外一个新的名词，说我们有“绿色的脑子”，以后这个词就变成骂人的话。

接连几天僧侣都被召集在一起，表演一再重复地进行。学习本来是一个很高尚的词汇，但在中国人口里，它代表不同的意义。所谓“学习班”，其实是把一组人隔离起来，然后进行各式各样的控诉和威胁，士兵们围在四周监视。我们在寺院整整被关了一个月，每天强迫参加“学习班”。从我的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村民们被赶到地里，强迫学习，他们象牛群一样拥挤地蹲在一起。

7 月底八月初，是农忙的季节，村民本来应该准备进行收割了，但是现在谁都不许去田间工作，中国人宣布，有比收成更重要的事情。我很担心家中的情况，因为即使是老弱病残，甚至小孩都必须参加学习班。

在下一次的学习中，他们向我们解释压迫和剥削的区别，桑木林替中国军官充当翻译，讲述“三座大山”，他拿出一些笔记高声念给大家听。他抬高声音：“受压迫的群众就象套上牛轭的牛一样，被轭控制着，不能随便逃走。西藏人民是在封建制度牛轭的压迫下生活的。现在在共产党的协助之下，他们摆脱了这个压迫。”

让我们明白压迫和剥削之间的区别似乎非常重要。僧侣们是剥削者还是被剥削者？中国人对于我们给的答案似乎很不满意，

这些人都受过训练，非常善于辩论，他们学习过中国各地乡村的变革，所以手段上驾轻就熟。

中午，僧侣被分成十人小组，讨论早晨学习的课程。我牵着仁曾大师的手，把他带到一个小组来。我们不知道怎么开讨论会，就都干坐在那儿，彼此互相望着。后来一个中国军官带着年轻的翻译，加入了小组。我们坐在地上，中国人坐在小木头椅凳上。这位军官先说旧的封建制度有多么残酷，然后他解释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意义。

他说，一共有四种不同的阶级：地主、富农、中农和贫农。他问每个人属于哪一个阶级，我回答说我是一个僧侣，他不满意这种回答。他说即便在一个修道院里也有阶级的区别，指出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对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区分概念还没有弄清楚。后来我们被分成富裕僧侣、中等僧侣和贫穷僧侣。由于家庭背景，我被定为富僧，就是说在新的无产阶级社会中我是没有前途的。每个人的身份证上都盖上阶级成分的印，从此以后，阶级成分决定一切，包括受教育的资格和工作的分配。

这种小组会逐渐变成危险的集会，没有人能躲开中国军官的审问，我们必须自己说是被压迫了还是被剥削了，更要紧的是，要交待，自己是压迫者还是剥削者。几天下来，大家一直试图避免回答这些问题，最后只得承认实在弄不懂这些讨论的要点。

一天，有个年轻的军官加入我们的讨论会。“僧侣不是受压迫者”他说，“你们怎么可能是被压迫者？当清晨号角吹响的时候，你们只需拿着空碗到大厅里去，等着别人来侍候。”他特别

强调“空”这个词。他又问道：“你们的茶是从哪里来的？”他停了一会儿，假装是在等待回答，可是大家都已经学乖了，知道保持沉默是最好的方法。最后军官自己回答了自己的问题：“寺院里每一件东西都是从西藏人民身上剥削来的”。

会议和学习班天天都有。我们的沉默让中国人十分窘迫，认为大家是在负隅顽抗。他们要求僧侣彼此检举，以便加速理解阶级斗争的意义。他们使出新招，让出身贫苦家庭的僧侣统一到另外一个会上，他们被告知，由于出身贫苦阶级，所以跟受到压迫的西藏人民属于同一阶级。但是僧侣们说，我们的寺院对所有普通老百姓都很仁慈。一个中国军官宣布，村民指责寺院是人民群众的主要剥削者、压迫者，我们无法对证这种说法是否真实，因为僧侣不允许跟在村里的家人接触。后来我们才知道，中国人同时也告诉村民说，僧侣已经坦白交待，承认欺骗了当地的人民。

由于没办法引诱僧侣检举他人和坦白交待，中国人就开始惩罚单独的个人。第一名受害者是个跟我一样，来自于富裕家庭的年长僧侣。中国人把他所有的衣物都收来，堆在庭院里，在他东西的旁边，堆着另一摊一个出身贫寒僧侣的杂物。这两个人沉默地站在两堆自己日用生活品旁边，中国军官手指那两堆衣物大声申斥，他从年长僧侣的那堆衣物里挑起一件厚厚的毛料袈裟，通过翻译厉声问：“这是从哪里来的”，“羊毛”僧侣回答。

简单的答复把对方楞住了，他以为翻译漏翻了什么，就盯着他看。翻译重复了问话。“这是从哪里来的？”“绵羊”，接着他哭了起来。

我们都认为他回答得很好，既正确又聪明，可是回答显然不正确，他没有算计农奴所付出的劳工代价。按照唯物辩证法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他应该回答，袈裟的来源是被剥削的农奴的劳动成果。

很长一段时间，僧侣们每天都面对类似的问答。有次问题是：“谁养育了你们？”我们的回答当然是：“母亲”，这自然又错了，应该说是无产阶级的劳动成果哺育了我们。对我们的迟钝，中国人解释为：我们具有“绿色的脑子”，可是大家真没办法在短短的时间内，把这些每天在学习班里炮轰到头上的新名词消化掉。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我才学会怎么样用唯物辩证法和阶级斗争的语言来掩饰真正的答案。

僧侣跟村民被隔离开有好几个月的时间，终于中国人认为二者当面对质的时候到了。八月的一个早晨，我听到有人在喊“消灭三类剥削者”、“打倒反动分子”。从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村民四人一组，正朝寺院走来，他们手里拿着巨大的横幅，上面有藏文和中文写的标语。两个村里的小孩走在队伍的前面，手里撑着大幅的红旗。当这支队伍走在通向寺院的羊肠小道时，整齐的队伍开始骚动混乱，村民们使劲在泥土路上跺脚，引得尘土飞扬。他们大声吼叫，拳头在空中挥动。平时民众接近寺院时总是非常谦卑，低着头跨进门来。我看得出来，有些村民由于他们如今这样吼叫喧哗地来到寺院，感到非常尴尬。

中国人把寺庙改成一个展览馆。村民穿过嘎东的河谷，来看司库长老丹巴曲培个人用品的展出。他僧舍中所有东西都被陈列

出来：细羊毛的坐垫、嵌了珠宝的银制台灯、中国式的织锦缎挂联、讲究的法器、一套镶着银边的木制碗。跟司库长老的展出物形成对比的是旁边一个贫穷僧侣的日用品：一个破茶壶、几支旧而粗糙的木制碗、打满补丁的毛毯、一双很旧的靴子。

“你们看看这些展览品！”一个年轻藏人用很激动的声音对展出物进行评论：“剥削者的生活多么奢华，他们身穿丝缎，用银杯喝水，这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他又指着穷僧侣的衣物说：“你们看，这就是穷和尚的日子，他只靠一张薄薄的毯子渡过漫长冬夜。”

现在村民们对阶级斗争的理论已经很熟悉了，看到这些展出品，他们显出非常惊讶的神情，听讲解时，总在恰当的时候摇摇头，或表示吃惊。僧侣们也排着队去观看院子里的展出，评论员用很严厉的声音来批判寺院里的不平等情况。

司库长老本人不在场，不能为自己进行辩护。他和其他的僧侣已经成为中国人的阶下囚。中国人在寺院下方临时设置了一些劳改营，他们都在那里劳动。司库长老的竹扁担的左右两端，挂了两个铝作的铃铛，这种挑东西的方式对于西藏人来说，非常新奇。每天下午司库长老用他的竹扁担和两只桶，往来于河和营地之间，他为营地中国士兵负责挑水的任务。

我们把这一段期叫作“中国人暴露真面目的时期。”大家心理都响往着有一天达赖喇嘛会回来，一切的事情都会回复到原来的样子。我们跟自己说，有一天太阳又会从乌云后面露脸。

1959 年的夏天，会议铺天盖地而来，检举大会、坦白交待会、批斗反动分子大会、反对帝国主义会、还有一个“忆苦思甜”会，会上大家坐在那里听一个“农奴”叙述他在地主压迫下过的悲惨生活，会上大家都应该痛哭流涕。

中国人开始在帕南重新分配土地，我父亲的家产全部被没收了。我家被定为富农阶级，这表示我们失去了一切机会。作为一个富农的儿子，我自然而然被定性为剥削阶级的一份子。

当贫农们突然爆发一种革命热忱的时候，也会把人吓一跳。我记得有一个名叫贡却的穷人家青年，住在非常破烂的屋子里，每天从一个村子走到另外一个村子去打零工，他常常替农民把穀类背到磨坊去。当中国人分配土地给贡却时，他并不快乐，因为他一点都不喜欢农事。我还记得他编了一首歌，歌词好像是这样：

共产党真慷慨，可是我并不把土地爱！

请让我走来走去，还我个自由自在！

1959 年 11 月的时候，这些会议算是收尾了。我想对于中国军官来说天气已经太冷了。有一天大家排着队，领取一张纸，纸上面是中文字，没有一个人能读懂。中国人叫我们随身携带这张纸，随时拿给检查的长官看。几个月之后，有一个从江孜来的西藏青年把这张纸上的中文翻译给我听：“姓名：班旦加措，年龄：27，阶级成分:富农子弟，政治背景:尚未调查。”

最后一栏显示每个人的政治划分。有些藏人被称为藏玛，表示“干净”的意思，如果属于干净类，那可能出身于贫农家庭，

并且未参与过任何反华行动。另外一类被称为“藏玛麦巴”，是“不清白”的意思。我还没有被归类，当局尚未对我的政治参与进行调查。

到帕南和嘎东来指导学习班的中国军官们，开始打点行李，要前往江孜，他们把村子交给村民自己管理。他们来去都是匿名，我们只称呼他们为“中国人”，他们也从来没有介绍过自己，彼此之间互相称呼的时候总是用“主席、副主席或书记”。

希望生活恢复正常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中国高层认为这儿的反动分子和党以及祖国的敌人还没有清除干净。所以 1960 年年初，中国人又发动了一场“新的清查运动”，更多的大会和更多的学习班被组织起来了。象我这样政治背景还属于“尚未调查的人”，很快就成为新一轮运动的靶子。

记得有次一位中国军官大摇大摆走进寺院的庭院，指责僧侣们还继续顽固地依附在旧的封建制度上。他说，僧侣必须对自己进行改造，因为封建的农奴制度和旧西藏已经被击溃，无论是美帝国主义还是我们过去的神明都不能挽回颓势。他的宣布仅仅拉开了序幕。中国军官们问我们是否参加了拉萨的暴动，没有一个人开口，这显然让他们很生气，就宣布整个寺院都参与了支持“反动匪军”，都有罪。一场搜查武器的行动展开了，从一个僧舍搜查到另一个僧舍，他们一无所获。

我接收了伯伯的僧舍。仁曾丹巴大师住进最好的一间房间，上师让我料理他的生活。我每天给他做早饭，尽可能地服侍他，使他觉得安适。大师是一位非常谦和的客人，他的口味十分简

单，我们日常生活在一起很是亲近。他是印度籍的公民，可以要求中国方面遣返回国。很多从拉达克和司比提来的僧侣都住在札什伦布和拉萨，他们已经返回印度了，但是仁曾大师选择了继续留在嘎东。

从拉萨来了新的调查小组。有谣传说，前一个调查小组的官员们已经被撤职了，他们自己被送进“学习班”。新来的一批人更为威风，衣着也更为光鲜。当搜查我们僧舍的时候，大师和我就站在庭院中等待。大师的东西使中国人骚动起来，一名年轻的士兵把一张照片交到长官手里，他们走到屋子里面去，二十分钟以后出来，向我们走来。那个军官一身讲究的蓝色毛装和倨傲的态度，明白显示他们认为有人拒不认罪，并且隐瞒自己的反党和反人民行为。非常清楚，我和大师是他们要的人。

大师告诉翻译，他是印度公民，年轻时就到拉萨学习。他还说是我帮助他从拉萨来到嘎东的，随后他很礼貌地要求被送返印度。在翻译还没有把他的话翻完之前，这位军官举着一张黑白的团体照，要求大师作出解释。

照片上是一些西藏人跟印度独立领袖们的合影。1946 年 3 月，西藏政府派遣一个高级代表团到印度和中国，祝贺联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仁曾丹巴大师被推举为代表团的成员，他们到了印度之后，受到瓦威尔爵士[8]的接待。当时印度正要独

[8] Lord Wavell 是当时英国驻印度的总督，也是 1945 年希姆拉（Simla)会议的召集人。

立，西藏代表团因此会见了印度国大党的领袖。中国人没收的这张照片上，就有尼赫鲁和甘地。

他们允许我陪着大师走进屋子,我替他整理了一些书籍和日用品放在一个小的背包里。看着他走出寺庙，被带上一辆吉普车，我跑出去跟他道别，他只说了一句："我会留在锡金一段时间。"两个中国士兵用枪指着他喊："走！走！"他上了吉普车，这是一次永别，我永远没有再见到仁曾丹巴大师。

一名士兵把我带到一个小屋子里去，这原是另外一位僧侣的住处，现在改成审讯室。里面有三张木凳和一个当桌子用的大木头箱子。木箱子的一边脚下垫了纸，使得它不至于因地面不平而摇晃。门口站着两个警卫，一位军官姓廖，他的脸和嘴唇都干燥脱皮，这又是喜马拉雅山上的风所留下的痕迹。他牙齿之间的缝很大，一支接一支不停地抽着烟。藏语翻译加增坐在一个小凳子上，听候指示。

廖的态度严厉暴燥，凶狠狠地说："你有很多机会坦白自己的罪状，却长期隐瞒身份，党的工作人员很宽大，你偏选择了隐瞒自己这条路，这是非常严重的。我知道你反对祖国，参加了拉萨的示威游行。"

他停下来猛吸了一口烟，"只要你承认错误，共产党会对你宽大，党会原谅你的错误判断。"

廖又掏出另外一根香烟，指着桌上那张照片："这件事我们不能忽视"，他说。

他要知道关于大师的每一件事，我跟大师之间关系的每个细节。我告诉他一切所知道的大师的背景，这是哲蚌寺每个人都知道的事情，廖完全无动于衷。

“我们知道你的老师是印度政府的间谍”，他生气地说。

我抗议，说大师对政治毫无兴趣，但是中国人自己已经作了决定——仁曾丹巴大师是一名间谍。

“你必须承认你老师是一个间谍，”廖坚持道。

我也坚持着，拒绝在要求我作伪证的事情上合作。几个小时过去了，廖似乎对我的顽固大惑不解，然后他说了一句以后我在监狱里经常听到的话，他的声音突然变得非常温和，翻译也用同样秘密耳语的声调重复了他所说的话。

“你知道我们党的政策吗？”他问。

“不知道”，我回答。

廖强调党的政策是宽大的：坦白从宽，但是如果我还继续顽抗，党将对我进行“反击”。我再一次重复说仁曾丹巴大师不是一个间谍。廖的声音尖锐起来，坚持仁曾丹巴大师是个间谍。

我说：“你要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廖的巴掌已经扇了我一耳光，把我打倒在地上，门口站着的两个警卫走上来，抓住我的双臂，翻译加增往后退，看起来十分惊恐。守卫们开始踢我。

“你坦不坦白”，廖厉声道，“你说。”

“随你们怎么对付我！”我叫道，愤怒得失去理智。两个士兵把我的手用绳子捆在身后，然后再把绳子绑在一个木桩上。他

们收紧绳索把我的双臂从背后往上吊起来，越收越紧，两只手臂被拉得几乎脱臼。我痛得尖叫，小便失禁了，除了自己的尖叫以外，我什么也听不见了，守卫的拳头雷雨般落在我的身体上。

过了一会儿，守卫把绳子解开，我还没有回过神来，廖又开始审问。他问我现在坦不坦白，我说没有什么话可说。廖向守卫打手势。他们给我双手戴上手铐，脚也戴上脚镣。“仔细考虑吧”，廖直瞪着我的眼睛，丢下一句话：“坦白”。

我被带到另外一个房间，单独关在里面。那天下午，一个藏人给我送来食物。“你为什么不坦白”，他悄悄说，“不坦白，他们会杀了你。”

审讯又持续了几天。我一再重复解释自己跟仁曾丹巴大师的师生关系。中国人对于我参与拉萨起义的事件并不十分感兴趣，他们要的是从我嘴里套出对仁曾大师的指控，说他是间谍。我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呢？在西藏的佛教里，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真诚和信任上。我把大师当成良师，出卖他我良心怎么能安？如果中国人还没有把他遣返印度，只把他放在某一个地区的监狱里，而我又指控他是间谍，那会有怎样的后果？我决不能作伪证。

有一天清晨我醒得很早，守卫把我拖进另外一间房间。一个高个子的中国人走进来，他身上穿着一件长的棉军大衣，显示他的身份较高。这人后来成为恶名昭著的西藏扎奇第一监狱的主管，大家都叫他殷主席，他的大鼻子总让我能立刻认出他来。一个年轻女孩陪着殷走进屋子，从这个女孩的两颗金牙和她的比较

柔软的拉萨口音来判断，她似乎是拉萨富有商人家的女儿。她没有穿传统的藏服，而是穿着一身中国干部的制服。后来我才知道这年轻姑娘曾在拉萨监狱工作，名叫多卡。

中国军官腰间别着一支手枪。多卡向我提问题，从名字开始，她拿出一个笔记本，把我说的话都记下来，并跟我核对，记录是正确时，我就点头。

“你的事我都知道”，她说。多卡注视着我，观察我脸上的瘀血和青紫，她问我怎么回事，我没有回答。多卡轻声用中文跟殷说话，命令守卫把我的手铐和脚镣解开。

多卡似乎比其它藏语翻译有自信得多，看来她似乎对殷有某种影响力。大部分时间是她在讲话，她让我从八岁以来的经历讲起，我背后坐着一名军官不停地在作记录。只有当她替殷及其他的军官作翻译的时候，多卡才打断我的叙述，全部的记录都是用中文写的。多卡一直审问我了好几天，有些细节必须不断地重复。坐在屋子里的那位军官，把我说的每一句话，跟纪录核对，看看有无矛盾的地方。每当有任何细微的、合不上的地方，我都必须作出解释，军官把每处修改的地方交给我，让我在上面签字。

当局把我的交待材料跟其他僧侣和村民作的交待拿来对照比证，中国人一向如此处理事情。他们把你的证词和你兄弟姐妹和其他任何跟你有一点关系的人的证词来作对照，每个人都有一个非常详尽的资料袋。他们要让你明白，他们对你知道得多么事无钜细。“可是你哥哥是这样说的”，审问者会说，“你怎么不记

得啦？”因此，你就会开始思考：他们真的什么都知道吗？我哥哥真的告诉了他们那件事吗？我还应该坦白到什么程度？

这十天之内，多卡和殷从来没有发过脾气。多卡特别礼貌，她说起话来就象一个非常有教养的拉萨姑娘一样。有一天他们又让我在记事本上签字，多卡随便挑了一段念给我听，以便确证这些记录是正确的。我在上面签了字，并且用拇指在最后一页画了押，他们把本子拿走。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 殷主席说，“那就是你跟印度间谍仁曾之间的关连。”

房间里的气氛起了变化，多卡开始称呼我“反革命”，殷指责我在拉萨起义中扮演的角色。

“我已经跟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你们了！”我说。

殷重击我的脸，两个守卫上前按住我，让我跪在地上，并把我的头往下按。殷把他的脸凑到我眼前，反复地要我“坦白”。他把手枪拔出来，顶住我的太阳穴。

“这是你唯一的一条路”， 殷说。

这时，我感觉宁愿死，也不愿再受这种折磨了。我喊道：“杀了我吧！杀了我吧！”

殷退后一步，多卡开始踢我，守卫咒骂我，并且用绳子把我的手绑起来。他们把绳子绕过梁，然后把我吊起来，我当即昏过去了。再度有知觉的时候，发觉自己躺在地上，手和脚已经上了镣铐，殷站在房子中央。

“你的案子非常严重”，他说。“我们跟你还没有完”。

“你是个顽固的反动份子”，多卡接着说，“我会毫不犹豫地枪毙你”。

到了 1960 年的夏天，审讯终于结束了。殷和多卡不再继续问我仁曾丹巴大师，我被带回到寺院的天井中去。首先让我十分地吃惊的是，所有的僧侣们看起来都憔悴衰竭，好像心中的火焰已经熄灭了，大家一脸茫然，默默无语。我几乎认不出那些老朋友们了，他们能够认出我吗？现在大家都穿上平民的藏服了。

我们一共七个人被领出寺院，走在寺后面的小道上。手被绑在身后，七个人绑在一起，一条长的绳子把我们像登山者那样，串连在一块儿。我们往帕南走去，我听到很多人的喊叫声，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我的继母、父亲、兄弟和姐妹，我低着头往前走。

我们被带到一个叫罗布昆泽的小寺庙去，这个寺庙离帕南只有几小时的路程。我在新社会的牢狱生涯开始了。

第　五　章

逃　亡

以前我只从远距离看过罗布昆泽，关于它的历史唯一知道的是，此处是一个被遗弃的破庙。中国人在寺庙的顶层建了两座木制的瞭望台。我们在步枪瞄准之下，被推进大门，很多年纪只有十几岁的士兵们好奇地盯着我们。里面有更多的士兵在等候，我们被交付给一个年长的军官，两个守卫开始搜查我们随身带来的物品。

我带来了卧具和家里给的一些衣服，另外还有一个珍贵的礼物 — 一只金的劳莱斯手表，这是 1956 年我进入哲蚌寺时，哥哥送给我的。“拉萨离这里很远”，他对我说，“你如果碰到任何的困难，可以把这只手表卖掉。”僧侣们是不可以戴手表或珠宝的，我从来没有戴过这只劳莱斯手表，可是记得哥哥的忠告，所以始终把表带在身上。现在罗布昆泽的中国人把表收走，交给我一张纸条，说是表的收据。看守人把我们随身的东西都没收了，也拿走皮带及藏人用来系藏袍的长腰带，他们给了些长的细绳子，用来系裤子。

我被带到一间很大的长方形屋子里，布满尘土的地上，放着七张垫子。看得出这间屋子以前是很华丽的，墙壁上还有已经褪色但是隐约可见的壁画。守卫们把我的棉被往地上一丢，扬起一

阵灰尘。其他的犯人立刻围过来，好像是在自己家里欢迎客人那样，他们伸出手来帮我把背上的袋子取下来。一个老人挪出一块空间，把我的棉被放了上去。

这里的犯人都穿着平民衣服，但是从他们的光头可以看出其中三个人曾是僧侣。他们急切地要知道，我从哪儿来以及为什么被逮捕。他们大都因为卷入了西藏的抗暴而下狱，虽然大家在那次行动中都只扮演边缘角色。中国人坚持说我们犯了反抗共产党和祖国的罪，这是一项严重的罪状。在嘎东时，他们就说过，共产党会无情打击一切它的敌人。

罗布昆泽有二百名犯人，大部分是邻近的村民。我在这里待了几个月的时间，手和脚从来都没有离过手镣和脚铐。由于双手被铐在身后，没有别人的帮助无法吃东西。

第二天早晨我被一阵脚步声吵醒了，一名守卫打开了沉重的木门，提进来一壶茶。我们就靠着茶和各人家里送来的食物为生。我大哥也关在罗布昆泽，虽然不能交谈，但是在院子相遇的时候，我们总是交换眼神。我很担心家里怎么能负担我们两兄弟的食物和煮食的燃料。家人提供给我们簪粑和牛油，外加一些油炸的小饼。接见家人是不允许的，他们只是每天把食物送到守卫那里。

这套系统着实聪明，监狱的费用摊到普通西藏人民的肩上。囚犯家属被告知，他们是否跟当局合作会直接影响到犯人待遇的好坏。普通家庭都以为他们如果能够按时供应食物，牢里的家人就会受到比较好的待遇。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文化大革命时，上

面认为犯人家庭越跟政治犯保持联系，就越表示他们的思想反动。

第二天早晨十点钟，我又被叫去审问。一个中国军人上身穿着普通士兵的土色制服，裤子却是官阶比较高的干部所穿的蓝色长裤。他的头发剪得很短，长圆的脸。一个叫邓珠的翻译作了自我介绍，象很多其他替中国人做事的藏人一样，邓珠看起来紧张而缺乏自信，他也穿一身中国干部的蓝色中山装。

审问开始很温和，同样的开场白：你知道党的政策吗？接下来又是那句口头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翻译用诗歌所特有的轻柔和韵律，把这两句话说了出来。

“你懂不懂什么叫做宽大？”中国军官问我。

我没有回答。

“宽大”，他紧接着说，“不表示党对一切反革命行为闭上眼睛，如果一个人应该被判死刑而政府却判了他无期徒刑，这也算是宽大。”

我点点头，但是这并非表示我同意。

次日，我被带进另外一间很暗的房间。从一张狭窄的窗户射进来的一束光，使我可以看清楚靠墙的桌上摆着刑具，一根大棒子和一些粗麻绳。屋子的角落有一堆手铐、铁链和脚镣之类的东西。

中国军官提了一大串我八岁以来的生活的问题，我的回答被记录下来，并且跟我以前说的话做了对照。审问者静静地听，偶

尔打断我，让我解释一些更细节的事。刑具在桌上，墙角是那堆手镣脚铐。

第四天谈到 1959 年的事情。这名军官现在提高警觉，对我说的每个细节都仔细分析，他特别想知道，拉萨起义是不是有组织的行动，如果是的话，是谁在幕后组织？他一再重复地问：谁指使你的？你有哪些朋友？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我提到的任何名字都会被当作嫌疑犯。

我坚持说没有任何人指引我在 3 月 10 日那天，到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林卡去参加示威活动。军官突然用手猛拍桌子，举起一双手铐在我的面前摇晃。我警惕地观察他手的动作。

这名军人开始问仁曾丹巴大师的事情，他指控大师是一个印度间谍。非常奇怪，一提起大师的名字，我的精神如获甘露。军官说已掌握了证据，证明仁曾大师是间谍，我知道他在设圈套。我说，他应该直接去问大师，并拒绝再说话。军官拍着一个本子说："所有的证据都在这里面。"我依然拒绝合作。

军官拿起一支笔，把它放在桌子的边上，指着笔对我说，我的命运已经到了边缘，他发出最后警告：坦白是唯一的出路。两名士兵把步枪底座顶住我的背后，我从椅子上跌下来，跪在地上，全身颤抖。

这个军官怒吼道：坦白！坦白！邓珠也跟中国人一起打我，同时还把军官的命令翻译成藏语给我听。

中国人要我检举我的精神导师，我怎么能够做任何会伤害仁曾丹巴的事呢？我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不知道他是被关起来

还是已经被遣返印度了。我自己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跟政治有太大关系的事情，没有什么可以坦白的。不管他们对我怎样拳打脚踢，也不能引诱我对无辜的仁曾丹巴大师套上这种荒谬的罪状。

很久以后，我才真正明白，中国共产党多重视坦白交待，每一次开会的时候，他们都强调坦白是一种美德，而抗拒人民解放军是多么的不自量力，有一个中国军人拿西藏人跟解放军的对抗比作鸡蛋碰石头。每个犯人都必须坦白自己的罪状，只要还有一个犯人没有坦白交待，当局就认为工作尚未完成。

一个西藏人被逮捕之后，中国人总能够罗织一些罪名，把他投入监狱，然后用尽一切诡计从他口里套出所谓的坦白交待来。他们找此人的家属、朋友、和任何跟他哪怕只有分毫关系的人谈话，如果这一切都没有用的话，他们会对他周遭的人用尽威迫利诱的手段，最后找出一个人来检举他是反革命分子。

在罗布昆泽有一个从帕南来的藏人名叫松西旺加。他非常固执，拒绝承认犯过任何罪行。中国军官从来没有告诉过他，为何逮捕他，所以松西不知道到底应该坦白什么。“我没做错什么事”，他一再重复。最后，他们告诉他，他的妻子已经坦白交待，检举他是个反革命匪徒。

中国人发现松石跟帕南的一个妇女有过暧昧关系，就把这件事告诉他的妻子，这个女人在盛怒之下检举丈夫“曾经窝藏康巴的游击队员”。松西可能连康巴人是难民还是战士都搞不清楚，不过他妻子的“坦白”刚好是中国人要的。

开始我弄不明白，为什么当局坚持要人们承认自己犯了罪。不久才发觉这是共产党政策里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果一个人承认自己有罪，就表示“党是正确的，而个人是错误的。”对党来说，坦白是真是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党可以证明一名暗藏在人民里面的敌人被消灭掉了。

我承认西藏起义时自己在场，这一点我以为并不重要，如果中国人要把所有抗暴时在场的人抓起来的话，那就得把拉萨全部的居民都算逮捕。然而不管怎样的毒打，他们都没有办法逼我对仁曾丹巴作伪证，最后只能以我参加三月间拉萨抗暴的罪名起诉我。

一天早上，大家在院子里排着队，几个新的中国军官到达了。一个年纪大的军人站在台阶上宣布，调查结束了，我们被军事法庭判定有罪。拉萨暴动之后，整个藏区都实施军事管制，并设有军事法庭。

点到我的名字，我往前跨出一步，接下发给我的一张纸。信笺是红色的，正文是黑粗体的中文，“江孜军事裁判庭”是唯一的藏语，我不明白这文件是什么。大会结束后，大家都拿着手中的纸，围着那个年轻的藏语翻译。这年轻人拿着一张张纸看，并且读出上面所写的判刑年数。他看我那张纸，说：“七年”。

在宣布判刑之前，我并不感觉害怕，因为这段时期我一直有种奇怪的感觉，认为这些磨难终究会过去，我会被释放。并不是我一个人这么天真，所有被关进监狱的人都相信，只要达赖喇嘛

从印度返回拉萨，大家都会获得自由。我作梦都没有想到，以后的三十年我将会在监狱中渡过。

中国军事法庭发给我们正式的判决书，没有法院听审，仅仅这样一张空泛的文件就是全部的法律程序。他们关起门来作了所有的决定，我们没有任何申诉的权利。我被判决七年，并划为反动阶级，刑满之后三年，还得继续戴这顶帽子，并剥夺一切政治权利。

党获得胜利，正式的调查结束了，暂时不再遭受毒打。但是审问还是持续不断，他们每天都要问我们在想什么，是否还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说，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进监狱不只是一种惩罚，也是一个通过劳动，改造自己的机会。第一项任务是改造思想，把旧西藏的一切都从记忆里磨灭掉，学着拥抱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劳动是为建设新的社会贡献力量。

我们被强迫劳动。每天早上犯人排队点名，然后列队走到田里，这里本来是藏人放马的地方。村民们很早就发觉这块不毛之地很难耕作和开垦，所以聪明地决定，把这里当作放牧地区。现在中国人认定这块地应该耕种开发。1961 年严寒的春天，我们六个人背着一个巨大的犁到田里去垦荒，必须想法来拖这把犁，试着把绳子套在车轴上，一边三个人往前拖犁。一个年轻的解放军士兵站在犁上以增加重量，这样犁的刀刃可以伸入土地里去。

这名士兵很得意，站在犁上好像驾着一辆战车，如果他感觉到我们没有用足力气拖犁的话，就用一根粗线编成的鞭子抽我们的背。午饭时是唯一的休息时间，可是这段时间里还要进行社会

主义教育。一个长官给大家唸《人民日报》，介绍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领袖的事。我们应该学习的兄弟友邦有：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苏联也在名单上，那时苏联还是中国的朋友。我们也应该记住一些社会主义敌国的名称，打头的当然是美国帝国主义和英国。

我们还学了社会主义伟大领袖们的名字：马克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这些人的巨幅肖像挂在监狱里最显著的地位。斯大林的地位特别崇高，后来在文革期间，毛的肖像占了墙上最重要的位置。我们花了差不多五个月的时间耕作那一块地，每天拖着犁在充满石块的地里劳动。我痛恨听到犁的铁片刮在石头上的刺耳声音。唯一的安慰是当家人来送食物的时候。

1961 年 7 月，我们被转移到拉萨去。一天早上，我突然被从田里叫回监狱。其他的犯人都已经在院里等着了，士兵们叫我赶快打铺盖卷。

我背着一捆毯子走出来，四五十个士兵围着院子里站立的囚犯们，五辆军用卡车停在寺庙前面，行李背包集中放在一个大卡车上。士兵把我们的双手用粗绳绑在身后，看到犯人双手绑在身后，试图爬上卡车的滑稽无助样子，我简直哭笑不得。大家推搡着，有的人甚至笑了出来。士兵们非常不耐烦，他们两人抓住一个犯人的肩膀，把他直直往卡车上一甩，我被同样的方法甩进卡车。一共三十个人塞上了这辆卡车，囚犯挪动身体，调整到比较舒适的位置。

四个看起来很紧张的年轻士兵端着枪坐在后面，更多的军人坐在卡车的顶棚上，另外一些人坐在我们坐位之间的木板上。汽车两边插着两面巨大的红旗，车顶上也是一片红旗飘飘。一上路之后，汽车就加速，士兵们开始敲锣打鼓，命令我们唱歌，只准唱一首“赞歌”，歌名叫着“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人民真正好！

铲除反动派！

帝国主义夹着尾巴跑！

中国人民大团结，卷起社会主义大浪涛！

我们必须情绪激昂地大声唱，如果不这样，他们就指责我们暗藏了反社会主义的情绪。犯人只好声嘶力竭高声唱“社会主义好”。后来这支歌由于其它的原因，变得非常有名。有一名犯人无法通知家人，自己已遭到逮捕，就想出一个办法来。他看到同村一个叫达加的人也在田里，就编了另一个版本的“社会主义好”：

达加兄弟！

达加兄弟！

捎个信给罗布扎克。

告诉家人我有东西吃，

也有衣服穿，

他们要心安。

只把孩子照顾好，

就说我上拉萨了。

中国守卫只知道这支歌的韵律，因而不知道它的内容已经被偷梁换柱了。

卡车往前开着，红旗飘扬，汽车引擎声淹没在喧天的锣鼓声中。在田里耕作的农民向我们挥手，大概以为这是一个歌舞团，万万想不到几辆卡车里装的都是犯人。

两天之后，我们到达了拉萨外围的堆龙扎村，这里已经改成一个军营了。每人发了一套制服，是卡叽布的旧军服，拉掉了口袋，全部染成深蓝色。

从这儿再继续开往扎奇 ，此处以前是拉萨城外的一个西藏营地。那天晚上我们挤在一个大房间里，打地铺过夜。整天没有吃任何东西，卡车上一天的颠簸，弄得人筋疲力尽。

第二天早上，一个高大的人打开门，把两个人犯人叫出去，为大家准备茶水。我随身带有家里给我准备的簪粑，就著茶吃了。屋子里的气氛稍为松驰下来，大家开始交头接耳。大门是开着的，开始我们还有一点犹豫，但是逐渐地大家一个个走到门外去，好奇地打量着这所新监狱。

在狭小的空间里，犯人们肩擦肩挤成一堆。这里关的是藏军部队的残余，和一些光头上长出短发来的数百个僧侣，他们现在都成为中国人的阶下囚。我猜想扎奇西藏第一监狱大约有六千左右的犯人。

有几天时间没有审问，也没有大会和劳动任务，大家稍为放松了一口气。我发现一些以前哲蚌寺的僧侣，就坐在阳光下交换彼此的经历和最新消息。一天晚上，回到临时监宿，同伴说我错过了今天的一个集会，有个中国军官把大家的名字和有关细节都登记下来了。第二早晨，这些人又被点了名，将被转运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我的名字不在名单上。

犯人们被分派到西藏和中国各地不同的监狱里去。我在罗布昆泽的同伴们被分配到偏辟的藏南茂密森林地区的山南监狱。

山南后来变成了死囚监狱，很多同伴在那儿饿死和病死。我能逃脱山南的命运，是因为那一天没有参加点名。我被分在一个劳动组里，沿着拉萨的河谷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替中国军队修建房屋。

我们在露天搭帐篷过夜，随身只带了很少的个人日用品和卧具。早期，中国人不发棉被给犯人，所以必须随身带着自己的被子。帐篷四周围着非常密的铁丝网，连一只手都伸不出去。一大团活动的铁丝网用来充当大门，两个士兵日夜守在那儿，另外有几个守卫背着步枪，在营地的周围走来走去。每天早上我们从营地步行到工地去，中国人加紧在西藏地区筑路、建造房屋。

我不太清楚，缺乏食物和生活必须品也属于惩罚的项目，还是仅仅因为中国人没有准备好，不知道怎么应付巨大数量的犯人。总之我们必须自己设法张罗用具，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部分的人都是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受到突然的逮捕，根本没有时间打点行李，带上搪瓷杯子和碗等日用品。而没有碗就

领不到食物，有一些犯人带了自己的木制碗，可是这些碗很快就裂开不能用了。平时藏人的奶茶给木碗上了一层油，所以很耐用，但是牢里分配到的热汤把这层保护油层冲刷干净，木制碗很快就裂开了。

在堆龙扎食物很快变成严重的问题。我家因为不知道我在哪里，所以没有办法供给我食物。我的脑子整天都在想着吃食，所有的人都想方设法寻找食物。伙食一成不变每天早晨有一杯红茶，晚上有一碗面上漂着几片菜叶的稀汤。每晚狱方分配给每个人 4 盎司簪粑，这是第二天的食物。可是很多犯人太饿了，他们等不到第二天，当天晚上就把它狼吞虎咽地吃下去，这表示他们第二天中午没有任何东西可吃。

每天晚上返回营地的时候，可以得到一碗汤。如果谁幸运地有一只大碗，那他就可以得到一整碗汤。如果只有一只小碗，那就只能得小碗汤。一切只凭碗的大小来决定，没有其它的办法。

在整个监狱体制里，食具成最珍贵的东西。有些犯人弄到中国士兵定粮的锡罐子，我们常常在垃圾堆里面寻找这些非常珍贵的空罐子。这些罐子易锈，用了一个月左右就锈穿底了，没法再用。有时候犯人把生锈的罐子再重新打造成稍为小一点的形状。最抢手的罐子是里面镀了一层黄色涂料的，这种表示它们不会生锈。

我们学乖了不常洗刷这些罐子，否则黄色的涂料就会驳落，罐子也会很快穿底。有涂料的罐子原来是装了猪肉的，有时候在找到的罐子里面还残留着一点碎肉。

这种罐子被视为稀有珍品。

我在军营附近找到这样一只罐子，我把它珍藏着，甚至还专门为它做了一个木头的盒子来存放，这样便于随身携带。在监狱里你甚至会用珊瑚绿宝石或金戒指去换一个有涂料的罐子，因为在牢里生存下来是头等要事，珠宝都已经失去了价值。

食物的匮乏越来越严重，分配的少量簪粑根本不够延续我们的生命。我已经没力量承受自己的体重了。饥荒开始了，有天早上我醒过来，发觉两个囚犯已经在夜里死去。我们晚上睡觉，不知道第二天能否活着醒来。

以前的僧侣生涯使我训练有素，我把簪粑配粮分成很多小团，每隔一段时间，就放一小团在嘴里。大家把皮靴放在一起煮成一锅很稠的汤，人们吃一切能够找到的东西。有的人吃草，这使得他们胀气，病就更加重了。

我们忍受了一年多的饥饿。后来中国人解释说，社会主义友邦苏联取消了对中国的援助，并且逼迫中国偿还以前的借贷。有个中国军官说苏联要求中国用五谷来偿还贷款，这就是当时中国全国面临严重饥荒的原因。中国人从来没有承认，粮食的短缺是错误的农业政策造成的。

1962 年年底，我们又被调回扎奇监狱。大家都必须参加大会，总结经验。整个藏区的囚犯都来到拉萨，我们发现，过去两年之间，很多 1960 年被逮捕的人都饿死了。上面还是根据旧的名单点名。当一个名字被点到，没有人回答时，其他的犯人就大声喊：“他已经饿死了。”

年纪大的中国军官明白这些问题，可是又不能承认。他们警告大家不要提饿死的事情，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怎么可能有人饿死？后来点名又开始了，对中国人来说十分尴尬，一个死人的名字被念出来，没有人回应，大家都保持沉默。点名的军官等了几秒钟，在群众里望望，没人反应。最后有些人用藏文说："他断气了。"中国干部对于这样的回答相当满意，因为这就不至于让社会主义新社会背黑锅了。从此以后，每次点名，点到死人，我们就回答："他断气了。"

后来我们被编成较小的组。有一天，中国干部在藏人翻译的陪同下，过来跟犯人谈话。他似乎被我们的故事感动了，表示可以把我们送回原住地附近的监狱去。对我而言，就可以被送回罗布昆泽监狱。中国人做任何事都有目的，我们很快发觉，把藏族囚犯分成很小的组，是怕发生暴动。当时印度和中国正频临战争爆发的边缘，数十万藏族囚犯对中国内部安全构成相当严重的威胁。表面上的仁慈，只是一种策略，为了稳定人心而已。

在我返回罗布昆泽之前的几个月，监狱里的学习会集中讨论新的题目：指控印度为"扩张主义者"，还骂印度元首尼赫鲁为"帝国主义的走狗"。上面攻击印度越厉害，我们就越抱希望，西藏能够很快被解放。我们并不知道监狱大墙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中国对于印度的强烈抨击，使我们相信达赖喇嘛可能在国际上得到了支援。大家都祈祷能够及早得到自由，监狱里人们悄声地传说"快了，快了"。

11 月的一天，一组人被推上一辆卡车，将被转运到罗布昆泽去。我觉察到中国干部提高警觉，对于印度感到极度愤怒，说印度想“蚕食”中国。大家都暗笑，有一些胆子大的囚犯说：“你们也是这样对待西藏的。”令人惊讶的是，中国人听了之后居然没有发作。每当监狱外面的情势紧张，监狱里面的控制就会放松。犯人现在也能够得到一点家里的消息，我获知家中受到极大的打击，所有的土地都被没收了。

上面甚至开始释放犯人，每天都有五个到十个人回家。能重获自由的一线希望给人们注入了无限的力量。大家都聚集到院子里去，跟那些幸运返家的人道别，他们也会安慰地说，不久就会轮到我们了。1962 年的 10 月和 12 月之间我们的士气非常高昂，好像转机就会来到，只是时间的问题。

我相信自己也会被释放，我决定返回嘎东寺去。我听说那里还剩下一些僧侣。每天我都幻想着是轮到我向其他犯人道别了，我可以走出大门，爬上送我们回家的卡车上去。12 月一个寒冷的早上，我们囚房内的二十名囚犯中的五名被命令卷铺盖，我是其中之一。我把东西捆成一卷，笑声夹着窃窃私语声，每个人都在微笑。我走出门口，看见其他人都已在外面等着了。原来以为只需要办一个很简单的手续就可以回家，可是等了又等，一点动静也没有。

两辆军用吉普车开进院子来，上面坐了一些穿蓝色毛料服装的高级军官，监狱干部急忙跑出来迎接。他们彼此笑着握手。我们还在等待，又等了几个小时，还是没有动静。

到了下午，一个藏人翻译叫我们先返回囚房，说到晚上才会被释放。在房间里的等待越来越令人坐立不安，也不知道是否应该把铺盖卷打开。后来一个守卫来把大门锁上了，他告诉我们今天回不了家。第二天发了一份报纸，上面有很大的标题：“中国胜利了！”这个标题说明了一切问题，被释放的希望幻灭了，我又要重新面临饥饿、少得可怜的口粮、沉重的劳动和不断的殴打。我得把愤怒按捺下去，我们没有任何的反抗力量。

大家被集合到院子里去开会，我发觉中国人都兴高采烈，他们走路时带着一种新的傲慢态度。一名军官发表了一场胜利演说，宣称中国非常强大，人民解放军宽宏大量，暂时停火，接着他开始辱骂达赖喇嘛。

中国人对藏人的精神和政治领袖的态度有了突然的转变，以前共产党总是比较谨慎，不直接对达赖喇嘛进行人身攻击，但是现在却直接辱骂他是一个反动分子，说印度迟早会把他遣返西藏。一个军官说：“你们想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的梦想是永远地粉碎了。”

我知道释放是无望了，所以开始考虑逃亡。在没有惊动牢里其他二十名同犯的情况之下，我悄悄打听到另外有六名犯人也准备逃亡。其中包括一个六十八岁名叫杰波的老人和他的儿子旺杰。杰波说他宁可死在逃亡之中，也不愿意留在监狱里。还有另外一个嘎东的和尚名叫洛丹格桑。我不太熟悉洛丹，由于他来自于同一个寺院，所以我信任他。另外一个年青名叫达杰，他对山

里和高原地区的地势很熟悉，这是非常有用的。他家的人已经逃到印度了，达杰想去跟他们会合。

大家推举我来布置逃亡的计划。当然不能够在白天工作的时间逃走，唯一的可能性是在夜里。对于罗布昆泽监狱的结构我相当清楚，认为有一个方法可以逃脱。这间牢房以前曾经是厨房，一边的墙后原来有一个专门运送木材和牛粪的小门。我第一次到罗布昆泽的时候，管理人令我把这个小门封闭，所以我知道，把几块土制的砖挖开是很容易的。

有一天早上，守卫来把大家带去劳动，我假装病了。很幸运，他没有继续追问，就把门反锁把我一个人关在房间里。我走到墙角开始用一根小棍子去挖墙上那一块比较软的土砖。泥土很松，我很快就感觉到砖头开始松动了。只是现在不应该把它们推倒，否则声音会惊动守卫。我把缝挖大，伸入手指，把土砖一块一块卸下来。为了不让别人发现我做的挖掘工作，我们必须当天夜里就逃走。那天晚上，犯人从地里返回来之后，我告诉那个老人今夜的行动计划，并且让他转告其他人。

午夜时分我爬到墙角，把泥砖一块块卸取下来，已经看到天上的一颗星星了，接着我的肩膀也能够穿过洞。老人跟在我后面，接着是他儿子和其他几个犯人。我叫他们贴进墙壁，守卫在我们头上走来走去，可是这座墙很高，他们在黑暗中看不见我们。当最后一个人也从洞里爬出来后，我们开始往山下爬行。接近村庄的时候，狗儿吠叫起来，我很怕会惊动守卫，想像着他们拿着火炬从山后追赶上来。月亮晶莹，整个晚上我们都朝着山里

疾行。天亮时，到达山际的顶端，往下看去，整个村庄都浸在晨曦桔色的微光之中。我们在一个小山洞休息，大家倒头就睡。

达杰把我推醒，到山洞门口指给我看，山下有一队中国士兵骑着马朝山上走来。士兵们把村庄四面包围起来，进行搜捕。我们决定继续入山，往不丹边境逃亡，这有四至五天的行程。

那是隆冬时节，山路被雪覆盖，我们走过的地方，都留下脚印，给搜捕的中国士兵提供了线索。必须日宿夜行，太阳一下山，温度就降到零度以下，我们褴褛的衣衫不足以御寒，疾行却使身体保持温暖，月光也在夜里照亮了小路。白天很暖和，太阳照在雪上非常刺眼。我们随身带着簪粑，加一点水，这就是干粮。

翻山越山岭，走了五天四夜，追赶的人似乎越来越逼近了。达杰是向导，他对于山里的情况了如指掌。第五天我们从一个高山上往一个叫甘巴羌塘的河谷走去。达杰说我们只需要穿过一条小路就可以到达边界，一切就安全了。正在我们眺望不丹边境的时候，一队骑士兵骑着深色的马从东边的雪地里朝我们赶来，同时开枪。大家都开始奔跑，我跳在一块大岩石的后面，这里是放牧者搭建起来的牲畜棚。一颗子弹打在我身旁的石头上，声音震耳欲聋。我把身体紧紧贴在石壁上，几乎停止呼吸。我听到枪声和士兵们踩在雪地上的脚步声，他们正向我走来，接着步枪的枪托打击我的头部和背部。脑袋深处有一长串的眗声，我失去了听觉，还没有站稳，两个年轻的士兵已把我的双手绑在身后，并且

把我杠在肩膀上。其他的同伴们也都被逮捕了，我看见三个士兵在打那个老人，其他的士兵在打他的儿子。

我们被带到一个名叫旺丹巴左的村子里。村民站在狭窄的泥路两边，手在空中挥动，口中喊道：“打倒反动分子！”我们被拉在村民面前游街，有人大声喊叫：“反动分子应该接受处罚！”村人惧怕中国人，如果不辱骂我们，就会被指控是协助反动分子逃亡。我试着不去想下一步的命运。

那一夜我们被关在牛栏里。午夜听到轻微的脚步声走来，停了一瞬，又消逝了。天亮的时候，我们发觉有人在门口放了食物，大家象畜牲一样狼吞虎咽地吞食。

第　六　章

蓝天之下无处可逃

到达罗布昆泽，已经是太阳下山的时分，晚霞下的监狱看起来非常祥和。守卫把监狱的大门打开，嘎吱的眴声向难友宣布亡命者回来了。大家全被召集到院子里，警卫把我们交接了。一片死寂，只有狱警来回度方步的声音。一名卫兵命令我们把头低下来，接着所有的犯人开始喊道："打倒反动分子！"这种口号以前都听惯了的，但是下面一句却是第一次听到："枪毙反革命分子"。

群众的吼声慢慢平息下来，一个名叫严培的犯人走上来，他平常是一个受犯人尊敬的好人，现在他显然受到命令，来主持这场斗争大会。他按照例行公式指责我们的反革命行为背叛了"党的仁慈"，他说话的时候结结巴巴。接着少数几个留胡子的犯人中的一名往前跨了一步，他同样高声斥责反动分子，举着拳头凑近我们说"你们今生今世完了"。听了他的话我很震动，怕中国人会借机说囚犯们要求把我们处死。

那天晚上我们被关在露天里，气温非常低，没有棉被和毯子。全身疼痛，冰凉的金属手铐和脚镣嵌进手腕和足踝的肉里。我试着把衣服的袖子和裤腿塞在刑具和皮肤之间，可是一下就滑落出来。大家都筋疲力尽，没有力量再去抵抗饥饿和寒冷，一会儿就睡着了。第二天温暖的阳光照在脸上，把我弄醒。

我们被转移到江孜监狱，这是藏区主要的监狱之一。一行七个人由守卫押著推上一辆牛车，一路上不许说话，经过了一整天的行程，夜里到达江孜。那里没有电灯，几个狱警拿着火把出来，把我们推进一个房间。我跟伙伴们说，我们要承认逃跑的事，这是无法否认的，但是不应该彼此指控对方，也不要检举别人。

我曾经在江孜第一次亲眼目睹中国人入侵西藏，现在我成为入侵者的囚犯，又返回这里。对这个城市我记忆犹新，因为我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了达赖喇嘛。这个监狱原来是西藏政府所在地，传统的泥砖砌成的房子，中国人只做了很小的修改，把它变成了一座监狱。江孜大约有二千名犯人，大部分都是以前的藏军。

一到江孜，我跟其他六个人就分开了，偶尔我们会在院子里举行的大会上见面。我被关进一号牢房，跟其他十一人一间，他们象是在家里接待客人那样对我表示欢迎。这个牢房很新也很干净，我猜想是犯人们自己修建的，这就是共产党所谓的“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贡献”。

牢房是一个很简单的长方形房间，由土砖修砌成的，两边都有较高的平台，上面铺了薄薄的草席，算是床，我嗅到新鲜泥土的味道。门上贴着两张以藏文和中文写的监规。第一条，任何时间都服从守卫的指挥；第二条，犯人不可以散布谣言或攻击社会主义；第三条，犯人不可以跟亲戚或朋友联系；第四条，不可以把棍子、石头、绳子带进牢房等等。

墙上高处有两个狭窄的开口，算是窗户。每个人在平台上的那一见方地就是他的活动空间。犯人之间有不成文的规定，不可以侵犯别人空间，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每过一段时间当局就把我们搬到另外一个牢房去，这种固定的转移就把原有的私有的空间打乱了。牢房的角落里放了两只巨大的便桶，一到夏天，泥土的新鲜味就被人的粪便味道掩盖下去。每天早上两个人轮流去倒粪桶。白天出工，夜里，牢房的门从外面反锁。

我又重新被提审，这一次持续了整整一个月。到达江孜的第二天审讯就开始，我被带进一个房间，里面有几个中国干部等在那儿，他们都穿着法制人员的深色制服。长官名叫方远，是高个子，牙齿被烟熏得黄黄的。通过一个翻译他足足审问我六天，这段时间里他的嘴没有一刻不叼着香烟。方远通过翻译用一种奇特而精确的方式提问，头三天问题集中在我以往的经历，又得从八岁那一年开始讲述，这些故事我已经重复讲了很多次。

第四天，方突然把目标转到这次审问的关键上，“你为什么要逃跑”，他突然问。

从被逮捕的那一刻，我就已经算准了他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等了两年才有的吐露心声的时机。我告诉方，逃跑的理由是明摆着的，1960 年我被审问的时候，遭到毒打；关在堆龙扎期间，很多犯人都饿死了；存活下来的犯人总是在饥饿边缘挣扎，唯一等待他们的是死亡。

中国干部听着我的故事，在第一个小时内，没有人打断我的话。我提到食物短缺时，方远从他的椅子上站起来，缓慢而作做

地说："缺乏粮食是苏联所造成的。"他说中国欠了苏联大量的债务，对方要求中国以粮食偿还。方远坐下来让我继续说。我说1962 年 12 月释放犯人那一次，我不在释放的名单里，感到非常失望。

后来的几个星期，我常常会出奇不意地被带出牢房。方远态度温和，很少发脾气。但是审问后半段的问题越来越难对付，他们要知道我逃跑到哪里去，如果不在不丹边境被逮捕的话，我要去跟什么人碰面。这些问题都是假设性的，所以我一再重复地说我唯一的意图是要到达赖喇嘛居住的地方去，这时他们会立刻终止审问，最后整个审问过程也告结束了。

他们没有让我劳动，因为我带着手铐和脚镣，根本没办法作任何事。狱方使用几种不同的刑具。有一种是用很重的生铁打造的，两只铐之间只用很短的链子连结起来。另外一种比较轻，两者之间的链子也比较长，但是手铐上有锯齿状的边缘。在审讯期间，守卫会用力捏犯人的手铐，尖锐的金属锯齿就会陷入手腕的肌肉里去。

脚镣也有两种，一种是两只镣中间有一金属环子，戴上脚镣就几乎无法行走。戴这种脚镣的犯人总是痛苦地在屋子里摇摇晃晃地移动，生铁会刺到肉里，直到骨头。夏天，脚镣下的肉开始化脓腐烂，严寒冬天的温度会使皮肤在铁链下破裂。我戴的脚镣之间只有很短的链子，仅两个圆环那么长，因此只能蹒跚地移动。

整整六个月的时间，我一切都依赖同监房的人，没有他们的帮助，我连饭都不能吃。大家轮流照顾我，喂我，帮我清洗身子，帮助我坐便桶。我现在还常常想念他们，多么希望能够回报这些难友。他们中间有些人还在西藏，一小部分的人已经逃到印度了。我记得有一个犯人把簪粑做成一个个小团子放在我的床边，这样我躺在床上的时候可以自己吃。仁慈的难友们舒解我的一切不便和痛苦。

中国干部考虑得非常周到，让哪一个犯人用哪一种刑具，他们做的任何事情都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关。被关押、受惩罚以及偶尔施以小惠，在在都显示了共产党的无上权力。每个演讲和每次问话都是以共产党的伟大作为开场白，对共产党人而言，肉体的惩罚是要达到控制犯人思想的目的。每次大会他们都要讲一段关于改造犯人的思想和信仰之必要，叫我们学习用真心诚意来赞美共产党。手镣脚铐并不能控制我的思想，宗教信仰能带给我心灵的平静，肉体的折磨只是牢狱之灾加在身上的印记，我依然有能力让自己的思想自由翱翔。

有一天牢房的管理人叶西旺杰来找我。大家都叫他江孜大爷，即父亲的意思，因为他虽然还不到五十岁，却已经象个上了年纪的老人。他非常负责，总是提醒我们不要跟当局发生冲突。谈话时他留意不让别人听到，叶西告诉我，他刚刚参加了一个牢房管理员的会议，会上宣布每个参加逃亡的人都要作为斗争大会的批斗对象。

自从中国人入侵以来，我已经经历过几次“斗争大会”，我的家人由于阶级出身不好，也在斗争大会上被斗过。党宣称斗争大会能够宣泄平民对地主和其他剥削阶级的仇恨。斗争会开始的时候，仅仅是口头上的辱骂和谴责，然后逐渐发展成拳打脚踢，中国官员一般都在远距离旁观，好像那只是街上行人发生口角。他们几乎从不介入这种暴力行为，因为暴力行为只显示了“农奴们的愤怒”，这就能为党和它的官员们开脱一切责任。如果有人受伤，这是因为群众的愤怒，跟党无关。

村民、犯人和劳动单位全在中国干部的监视下，如果有任何人在批斗大会上没有表现出应当有的热情的话，当天晚上或者第二天，党干部就会找上门来。他们会带着一脸的关切说，你没有表现出很大的积极性呢。这是警告你，他们已经盯上你了。到下一次大会的时候，你就必须抓住一个无辜者的头发，对他咒骂踢打，以此来表示对党的热爱和对人民的支持。西藏所有的喇嘛高僧和官员几乎都挨受过这种形式的暴力。没有其他的方式更比这种批斗大会更能展现党的权力了。

江孜每个月都有一次所谓“奖惩大会”，在会上改造好的犯人得到奖赏，而那些没有改造好的就会受到惩罚，惩罚常常以批斗大会的形式举行。江孜大爷的警告使我对将来到的惩罚稍为有一点心理准备，然而还是十分担忧，在这种大会上你永远不知道什么事情会真正发生。

星期一早上轮到我了。中国军官们坐在院子里的一张大桌子前面。整个监狱都被士兵围住，他们的枪上都上了刺刀，狱警们

也列队站在那儿。我们几人被带到天井，排着队站在那儿，等候宣判。我的心砰然跳动，这次的集会似乎比平常的批斗大会更为隆重。从逃跑到现在已经六个月过去，一直都还没有判刑。我想我们可能被判死刑，一般判死刑的犯人都会戴上脚镣，防止他们自杀。

一个生面孔的高个儿军官站起来，宣布这是一次奖惩大会。一个藏人狱卒大声宣布："逃离罗布昆泽的犯人踏步向前！"我和同伴们戴着脚镣走出群众，灰尘在脚跟后扬起。我们站在高个子官员面前，其他的犯人被命令坐下，我们转身跟群众面对面。

一个年轻的藏人翻译员站起来开始谴责我们，说我们是出卖祖国、背弃人民的反动分子。这名青年大概是从江孜来的，他说的方言里夹杂了很多新的社会主义术语。他鼓动其他犯人也来揭发我们的罪状，要求大家对我们背叛人民政府的罪行进行惩罚。所有的犯人就象合唱团一般开始高声叫喊"铲除反动分子！铲除反动分子！"两千名西藏犯人的声音震天价响。当声音沉寂下来的时候，一个魁梧的犯人走近我们，卷起袖子，非常凶狠地辱骂我们，我以为他会打我。

"你为什么要逃走？"他问，他说社会主义的监狱是个改造教育人最好的地方，我们出卖了党和国家。他再一次地对我们一个一个地发问："你为什么要逃跑？"

我现在要决定是发言还是保持沉默。我知道，虽然大家震耳欲聋地合声责骂，但是内心是支持我们的。我识为自己不应该保持沉默，这是一个羞辱中国人，显示独立人格的机会。

“理由非常清楚”，我说。然后就开始把我的受难经过，包括很多犯人饿死的情况说出来。中国军官们显得坐立不安，而犯人们听到我的话都暗暗高兴，大家心里明白我们越狱的原因。那名魁梧的犯人被自己的问话引出这种乱子吓呆了，狱警命令他返回原地。

狱警点了另外一个叫塘泽沃帕的犯人，拉萨起义时，塘泽在江孜地区担任政府的低级职员，由于阶级出身而被投进监狱。他总是以巴结中国人来改善自己的境遇，在监狱里以殴打其他犯人而出名。当他走向我的时候，我想他会对我下毒手。塘泽先赞扬党和社会主义，然后又问“你为什么要逃走？”

“为了怕饿死，所以我逃走！”我回答。

塘泽狠狠掴我的左脸颊，我倒在地上。他用手抓住我的后颈，把我掼在泥地上。他说：“土地是党，蓝天是人民，在天地之间，你无处可逃。”他走到每个逃亡者面前，抓住头发，往他们脸上吐口水，象疯子一样暴跳如雷。一个士兵告诉他不要动手打人，这当然是装模作样，表示党的宽大为怀。其实在这种大会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不是在党的幕后指挥下进行的。如果有人挨打，他必然是在共产党的授权之下被打的。

批斗大会结束了，一个高级军官站起来宣判刑期。我们被形容为“重刑犯”，我的刑期第一个被读出来：帕南县的班旦加措八年，连续服刑，加上三年剥夺政治权利。我忧喜参半，不被处死我感到高兴，但是现在我的刑期变成十五年了。

其他的人受到类似的判决，杰波因为已经判了二十年的刑期，所以这一次就没有再加刑。他的双足戴着沉重的镣，中间只有两个圈圈长短的链子，军官宣布他要继续戴这种脚镣四年。

虽然这次被逮捕，但是我要逃跑的决心并没有减弱。中印战争胜利以后，中国人的态度更为粗暴和傲慢，他们一再重复那句最得意的话“蓝天之下，你逃不出党的掌心。”犯人们都非常沮丧，很快能被解救的希望再一次消逝了。

判刑之后，方远来找我谈话，他说关押我的目的是要改造我，变成新社会的一部分，我没答话。他要我参加监狱里组织的教育学习班，这样就能够了解到共产党是关怀人民幸福的。我知道中国人所谓的“改造”是什么意思，是要藏人全盘接受中国的一切，全方位否定西藏的生活方式。我拒绝了，决心拒绝配合中国人的要求，跟他们进行合作。

过了几天监狱官来找我，这是一个神情紧张的中年汉人。犯人一般跟中国官员没有接触，我们都是跟受雇于中国人的藏语翻译打交道。这是我首次跟一个官阶较高阶的监狱官接触。他通过翻译问我，是不是还打算逃跑，我说不是。他又问：“你还有没有别的话可说？”

我问可不可以把我的手铐解开，立刻遭到拒绝。他接着开始长篇大论讲述对人民的犯罪，最后问我愿不愿意学习一种新的技术。他说，“你还很年轻，应该对社会主义建设有所贡献。”我没答话，监狱长阴沉着脸对翻译说：“叫他说话啊！说话啊！”

“我连饭都没法自己吃”，我回答“手脚都被铐住了，怎么能够学习其它的事情呢？”翻译把我的话转给他，监狱官非常生气，叫守卫把我带走。

后来我告诉难友这件事情，他们说我不接受监狱官的建议，真是大笨蛋，大家都摇头。监房的头儿叶什也问我，为什么要给自己找麻烦。

次日两个警卫带着翻译走进来告诉我，他们选中我去学习西藏传统的羊毛地毯的纺织技术。一个守卫替我把手铐打开了，我感觉一部分肉也被揭走了，我的手仍然保持在背后的姿势，我试着把双手移到前面来，可是没有办法。我一再尝试，但是双臂完全是僵直的，手无法从背后移到前面来。我在肩膀上着力，要把臂膀往前搬，但是一切都没有用，我还是不能移动。一种刺骨的疼痛通过肩膀沿着手臂往下延伸。

我突然想到也许双手已经作废了，这使得我的心狂跳起来。过去七个月是我进监狱以来最痛苦的一段时间，我没有能力作最简单的事情，一切生活起居都得靠难友们的帮助。我常常做梦，梦见自己可以做最普通的一些事情：把一个杯子举到嘴边；自己解开裤带；用指头梳理头发，从进监狱以来我的头发已经长得很长了，里面长满了虱子，我很想用手去抓一抓。想到双手可能作废了，使得我几乎发狂。

狱卒让难友们替我摩擦双臂，这反而更增加了巨痛。他们把我带到医务室去，一个中国医生给我打了一针，并且按摩我的双

臂。大约两个星期之后，我才慢慢开始能使用双手，几个月之后才逐渐恢复了原来的灵敏和速度。

一个名叫瑞布沙卓拉[9]的老人教我纺织。瑞布沙是江孜地区卓有声誉的纺织师傅。他看到我脚上戴着脚镣，就对守卫人说“戴着脚镣不能工作。”他要求把我的脚镣打开，但是守卫说我是一名重犯，拒绝了他的要求。

脚镣使得我的纺织工作进行困难。藏式的纺织机是一种木结构，需要靠在一面墙上。纺织者应该盘腿坐在纺织机的面前，现在无法盘腿。瑞布沙和我设计了另外一种方法，我们在纺织机前面挖了一道两尺宽三尺长的沟，这样我就有地方放我的腿。

纺织需要手脚灵巧敏捷，我的进步非常慢。手指十分无力，打结的时候引起剧烈的疼痛，几乎没有力气举起梭子来把松散的羊毛线压紧成一排排整齐的线。瑞布沙很安静而且有耐性，他从来不会因为我的笨拙而发脾气，仅仅说：“我们再从头开始。”他一再地重复示范给我看。

1963 年年底，监狱的日常生活慢慢上了轨道，中国人的组织工作更有效率。中印战争之后，监狱管理重新获得自信，在举行大会的时候，中国人表现得更为傲慢，总是眩耀中国的丰功伟业。他们一再告诉我们，逃到印度的西藏难民都流落街头，成为乞丐，而且达赖喇嘛迟早总会返回中国。

[9] 卓拉（Jhola）是大哥之意。

我的生活是劳动、开会、睡觉，一成不变。每天太阳露脸后，就被狱卒叫醒，不管天气多冷，大家马上冲出牢房。跑到外面新鲜的空气里，给人一种自由的感觉。清新的空气也会流进那间被粪桶弄得臭气熏天的牢房。每天犯人们轮流地去倒粪桶，他们把一根扁担穿过粪桶的把手，挑在肩膀上，也许戴脚镣的唯一的好处是不需要担负这种任务。所有的粪便都被挑到离监狱远处角落的大池里，春天的时候，这些粪又被拿来当作肥料浇到田里。起床以后到开始劳动，这中间有两小时的时间，劳动犯人就会给大家送来两大壶很淡的红茶。

每个犯人每月的定量是二十五磅簪粑。每日的定粮都在头一天晚上分发下来，管次日一天用。采石矿的犯人可以得到额外的配额，因为他们的工作特别消耗体力。中印战争之后，食物供应略为有所改善。附近有亲属的犯人，被允许每月接受家里寄来的食物包裹，虽然有时候，狱警们会把包裹扣留下来，自己享用。

午饭铃响了，我们就返回牢房。值日犯又送来红茶，茶的唯一好处是热的，上面浮了一些茶叶，增加了水的颜色，实际上茶水没有一点茶的味道。接下来有很珍贵的两小时自由时间，监狱管理人这时都去休息或者午睡。我学会了利用这两小时的时间来集中思考或者休息，并坐在床垫上默默背诵经文。有些犯人睡觉，其它人坐在一起交谈自己身世和谈论的家人。

监狱里犯人之间很难建立友谊，因为当局非常留意不让人们之间互相熟络。每过三个月所有犯人都要换一次牢房，这是防止犯人有机会搞同谋活动。新的友谊很快就被切断，你每天总是会

见到不同的面孔，永远也不知道是否还有机会见到老朋友。有一些刑事犯人被指派为“线民”，他们对任何关于社会主义的谈话都非常警觉。监视无所不在，如果一个犯人对监狱里的食物表示意见的话，马上会当作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言论而报告上去。

我们本来是劳作六天，星期天休息，但是这种规矩永远没有实现过。虽然星期天有时候没有事，但是这一天总是拿来开大会或者学习，而这些会都是陷阱。管理人员对每个人的发言都有记录，并且把它放入个人的档案里。学习班其实就是不断的洗脑过程。我们大家都宁愿进行劳动，而不愿意参加这种会。

1963 年监狱没有电灯，每天的劳动和作息都完全依靠阳光。太阳下山之前的一道桔黄色余辉照亮监狱，监狱管理人来察看是否每号人都返回牢房了。爬上床，躺在那儿听到远远其它牢房的门被上了闸的声音，然后脚步声慢慢靠近了，守门人把我们的门也关上，同时上了门栓。最后一线阳光也退缩了，整个牢房陷入黑暗之中。除了睡觉没有任何事情可做，我们等待清晨的来临和木栅门再度被打开的声音。

我很喜欢我的活儿，纺织似乎比其它的工作悠闲一点。大部分的犯人都被派去从事建筑工。冬天的时候纺织机从外面移到室内，这样机器不至于遭受冰雪和风霜的打击。但是到冬天我脚上的铁链子就象冰块一样贴在皮肤上。我设法织一些羊毛在铁环上来作为衬垫。

1964 年年终，有谣传说江孜监狱将被关闭，犯人将合并到西藏其它的监狱去。有一天早上，上面让我们把纺织机撤下来，

因为所有的纺织工都要被转移到日喀则去。第二天我被命令卷起棉被，一个小时之后我就被放在一辆军用卡车上。

在行路当中，我看到了嘎东。过去三年每天看到的只是监狱的泥墙。现在我看到以前的寺院和形状奇异向天边沿伸的山峰。嘎东就象几个世纪以来那样座落在那儿，远远望过去，看不出这个山谷充满了忧伤和苦难。唯一能显示人们在遭难的是，寺院屋顶上没有新的祈祷旗在风中飘动。在江孜的监狱，我偶尔可以得到一点家里的消息，才知道家人曾经是被毒打的对象，一切土地和产业都被没收了。父亲和继母从原来的房子里被扫地出门，分配到一间原来是仓库的小房间。由于他们的地主出身，境况比犯人更为恶劣，以前的村民和佃户对他们象麻疯病人一样避之唯恐不及。在新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地主成为人下人，任何人都可以打骂他们，特别是那些贴上“农奴”标签的人。

到达日喀则，天已经黑了。几个拿着火把的守卫把我们带到一个大院里，说今天晚上就在露天过夜。第二天早上，我们被带进一间没有窗户的屋子里，仅有一扇很低的门。地面非常粗糙而且高低不平，没有垫子，我所拥有的破旧衣衫现在既要当被子盖，也要当垫子用。

我在这所新监狱的任务是建立一座地毯工厂。到达日喀则不久，就发觉对我们而言，时局真是糟得不能再糟了。1964 年 10 月，中国第一次进行核子试爆。一天早晨，犯人被召集去开会，中国人宣布了这个消息，军官们都兴高采烈，趾高气扬。一个穿蓝色羊毛装和肥肥长裤的军官站起来，宣布中国是个强大的国

家，以后永远不用再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了。他谩骂美帝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说到目前为止，这两个国家因为拥有核武器而任意称霸世界。

一个星期之后的一天，我坐在牢房里读着每个犯人必须阅读的《西藏日报》，学习课的时间，犯人必须坐在一起，讨论当天的社论。我当时被头条新闻中那句“班禅一伙”的字眼吓住了，“一伙”这个字眼一般是用来指责那些意图推翻共产党的有组织的小团体。这篇文章谩骂班禅喇嘛，指控他建立了一个“黑组织”，反抗无产阶级专政并且要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

这一篇文章特别使我感到震惊，因为我家以前就住在班禅仁波切[10]居所的下面，目前所在的监狱又是塔什伦布寺院以前贮藏粮食的地方。我很困惑，以往中国人总说班禅活佛是一个“爱国喇嘛”，他的寺院被称为“爱国寺院”，现在却如此严厉地谴责他。1960 年西藏所有的寺庙都被中国收归国有，唯一只有扎什伦布寺没有遭到毒手。

一天早上，整个监狱都被士兵包围了，说是犯人今天不用出工，这只有一种可能：要召开大会。大家在院子里集合，等待中国军官的到来。他们立刻开始谴责班禅喇嘛，宣布班禅犯了叛国罪并且背叛了党。一位干部愤怒地指责班禅一伙脱离了人民群众，跟达赖一伙的反动匪徒们靠拢了。说到中途，这位干部把音

[10] Rinpoche 是活佛的意思。

调降得低沉而柔和，假装他被班禅喇嘛的行为深深伤害了，不过我们还是没有明白，班禅喇嘛到底做了什么。

我首先想到的是，他可能跑到印度跟达赖喇嘛会合了。中国人把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称为“印度扩张主义扶持的两个奴隶主。”很久以后，中国的报刊才提到了班禅活佛向中国领导上了一份七万字请愿书，中国人责备他污蔑了党和人民政府。打击班禅的运动更加深化，很多扎什伦布寺的工作人员被逮捕，关进了日喀则监狱，可是我从来没看见过这些人。

这件事使我非常担心，达赖喇嘛已经被赶出国门，我们现在唯一只能寄望班禅喇嘛成为西藏的领袖。在帕南地区，我们对班禅总是有特别深的情感，虽然过去有一些藏人不满他“亲中国”。现在他突然倒下来，令我非常悲伤，我很知道中国人怎么对待其他藏人领袖。监狱领导告诉我们，必须对班禅喇嘛重新评价，每个人要表态，这表示我们将很快地被强迫对班禅喇嘛进行控诉。

在日喀则没有待多久，一天夜里我被一个照在脸上的火炬弄醒了。“谁是班旦加措？”火光后的一个人问道。

“我就是。”我迷迷糊糊地回答。

他将火把直直凑到我眼前，命令我卷起铺盖走出监房。我已经略有所闻，知道将会再度被调到另外的工作组或是另外一间牢房。火把照着睡眠中犯人们的身躯，这人又喊了我朋友洛登格桑的名字。洛登醒了，朝我的方向望过来，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也受到同样指令。我在卷铺盖的时候，脚镣发出了金属撞

击的声音。我把所有东西和被子捆成很整齐的小卷，在监狱里我学会了珍惜每一件细小的物品，我的手在黑暗中摸索地面，看看有没有遗忘其它的东西。火把后面的人看不清，可是从声音我听出来他是一个藏人翻译员。他在露天举着火把指点我们坐下，又给了一些热水喝。这时他说，我们将被转移到拉萨去。

把我们转移到西藏第一监狱的原因是那里也新建立了一所织地毯的单位，需要我们去指导那边的犯人。这是第一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会转移以及将会到什么地方去。这个翻译接着说，我们必须在天亮的时候搭乘公共汽车到拉萨去。

接着而来的是一个大好的消息，一名中国军官在四名警卫的陪伴下到达了，翻译员的态度突然改变，中国军官对翻译说了一些话，他安静地听着，点点头，接受指令。令我非常吃惊，他给我了开锁，把我脚上的脚镣取了下来。

我的心飞腾起来。过去两年，这一对脚镣已经变成我身体的一部分，习惯它限制我的行动，耳熟它敲在院子石头上所发出的沉重声音，也习惯了早晨不能象其他犯人那么快跑到厕所去。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我养成了一种特殊的走路方式，看上去比较自然，也较为舒服。

他们命令洛登和我背起行李，步行到汽车站去，前后各有两名士兵把我们夹在中间。那名军官和藏人翻译紧紧跟在士兵的后面。走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我必须全神贯注地进行这个最简单的走路动作，因为不戴脚镣我已经忘了如何走路了。坐过牢的人一看我现在走路的这副怪样子，就知道我戴脚镣戴了很长的时期。

已经有一大群藏人和汉人聚集在汽车站了，有些人立刻辨认出我们是“重罪犯”。我们在离开其他旅客几米以外的地方站住了，放下背包，士兵们把我们围在中间。那个军官离开了一会儿，回来的时候，手上拿着几张纸，我以为是我们的旅行许可证。他让翻译告诉我们规矩一些，又打开一个袋子出示两付手铐，说上面命令给我们铐上手铐，他不要我们觉得过于尴尬，决定免了。

爬上公共汽车，车上已经有十几个其他的乘客。从日喀则到拉萨的旅程开始了。道路崎岖不平，沙尘满天。尘土穿过窗户落到我们的衣服上和脸上，妇女们用头巾包住了头。当道路比较平坦的时候，一个旅客拿出一盒饼干传递给大家。当这盒子传到我和洛登面前时，一个年轻藏人妇女用中文征求中国士兵的许可，他摆摆手表示同意，我就拿了一小块饼干，洛登也拿了。那个女孩说：“多拿一些。”我极力克制自己，把篮子推开了。这个女孩用手抓了一把饼干放在我腿上，也抓了一把给洛登。她的细心让我非常感动，这是四年来我第一次尝到这种美味。在监狱里我学会了节省，所以我把这些饼干留起来没有吃。

那一天太阳落山后，我们到达了日喀则和拉萨中间的一站— 羊八井。记得以前第二次到拉萨时，经过这个城市。很多大卡车排列在路边，城里有很多新修建的中国式房屋，整个区域看起来象个大军营。

我们被带到一个大厅里，这是卡车司机夜宿的地方。卫兵给我们端来了一碗碗热腾腾的面，我狼吞虎咽吃下去，太美味了，

洛登跟我一样地吞食。其他的藏人旅客看见我们那副馋的样子，好像从来没有吃过这种东西。那一天夜里有人又给我们送了一份，我也设法把这些得到的食物保存起来。

我们就在羊八井过夜，第二天早晨继续上路前往拉萨。警卫允许其他旅客跟我们谈话，大家问了我们许多问题，我也问旅客关于西藏发生的事情。在监狱里，我们唯一的消息来源是中国人，而那些消息经常是不准确的。

我们风尘仆仆到了拉萨，下车时，有旅客把一些中国钱币塞到我的手里，我试着退还，但是他们很快下车，消逝在人群之中。

汽车站挤满了来自拉萨各地的旅客。我在监狱的几年期间，拉萨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看起来跟以前不一样了，他们都改穿中国式的服装，年轻人不再穿传统的藏袍，取而代之的是蓝色的无产阶级制服，男女的衣着都一样。开始我以为他们都是属于部队的，后来才发觉是当局鼓励这种时尚。

一辆吉普车来接我们，车子快速穿过城市的街道，到达了扎奇。这里的建筑物也改观了，看起来象一座现代化的监狱，而不再象一座军营。洛登看起来忧心忡忡，我叫他不要担忧，我们一定会见到一些哲蚌寺的老朋友，而且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是指导纺织。

1964 年，扎奇已是一座现代化的监狱，也叫西藏第一监狱。犯人都穿着光鲜的制服，监狱有电灯，天花板中间吊着一支电灯泡，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一间有电灯的房间里。我站在那

儿，睁大眼睛，欣赏着这支电灯泡。其他的犯人都笑我，叫我乡巴佬。这支灯整夜都开着。

许多西藏最有名的犯人和异议分子都关在扎奇。监狱分成五个大队。原来西藏的政府官员和高僧都关在第五队，包括洛桑塔什 — 西藏最后一任总理，还有拉勒，原藏东地区的藏军司令。一大队关的都是无期徒刑犯，二大队关的是老年犯，第三大队是女犯，我被分在第四大队。

每个大队下面又有好几个组，每一组里有十二至十六名犯人。组其实就是我们睡觉休息的牢房，每组有一个组长，组长是监狱系统里最重要的人物。

第二天，我被带到一个堆满了羊毛的大仓库去，有的人在梳理羊毛，有的人在纺线，这里看起来根本不象监狱，更象一个工厂。洛登和我被作为师父介绍给大家，当我们穿过厂房的时候，其他的犯人都对我们很尊敬。

几星期之后，扎奇当局宣布不要在这里建设地毯工厂，因此新近从外地转来的犯人又要被调到其他地方去。点名开始了，从各个地方调到扎奇学习纺织的人，又得重新卷起铺盖，除了洛登和我。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好在监狱里的气氛还算轻松，也没有定期的大会。这表示干部们太忙或者还不知道党的政策如何。监狱里似乎有很多行政上的变化，但是我们无从知道变化对每个人的命运将有怎样的冲击。

第 七 章

纺织师傅

1965 年的春天，打击班禅喇嘛的运动进一步深化，关于他命运的各种谣传，在监狱里流传着。我们大队被带领去看一个展览，据说是展出班禅喇嘛和同谋的犯罪证据，要我们看班禅自己组织的一支私人军队，和他拥有的大量私人财产。我记得看到一张黑白的照片，下面的解说是："印度派遣帝国主义间谍跟班禅一伙建立秘密联系"。我在照片上认出那个"间谍"，那是泽旺南加，一个消瘦的青年人，他 1959 年跟母亲逃亡到印度，后来在江孜跟我关在同一个监狱里。泽旺在他母亲去世后的次年返回日喀则，因为她以前常在扎什伦布寺祈祷，她最后的愿望是儿子能够到扎什伦布去为她供奉一次。这是泽旺返回西藏的理由，但是他被捕了，并被控以间谍罪。这张照片使我认识到中国人对班禅的一切指控都纯属子虚乌有。

现在我们的另一位宗教领袖也被中国人当作敌人了。我逐渐明白了中国人如何操纵、利用他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班禅喇嘛显示了他的才华，因此中国人要毁灭他。在监狱里情形也一样：犯人只要拍当局的马屁，就会得到嘉奖和报酬。在批斗大会和学习班上，中国人强迫犯人彼此检举，出了任何事情，责任反正都落到犯人自己头上。

监狱里的生活越来越规范化和上轨道，食物稍为有所改善，每天都可以吃到一些蔬菜。这段时间比较宽松，检举和批判大会也少一些，也许我们已经慢慢习惯了，也许我们已经接受了命运。

我最初是被当作纺织师傅派到第一监狱里来的。当局堆集了一大堆羊毛，让我跟木匠一道设计纺织机，同时从西藏地区调来很多人，准备开设一座工厂。后来党改变主意，不要建工厂了。我问管理人员到底怎么回事，他们仅仅说，“这是党的政策”。在监狱里待久了就会习惯，人们不在乎去从事毫无意义的工作。

我个人的情况倒是有了相当大的改善。我不再戴手镣脚铐，并且有较大的活动空间，跟别人一样可以随便走来走去。自从不戴脚镣以后，我在夜间也能够安然入睡。以前戴着脚镣时我不能习惯夜间睡眠，总是辗转反侧，寻求一个比较舒服的位置，身体任何不留意的迁动都会导致极大的痛苦。现在终于摆脱枷锁了，但是由于当局打消了设立地毯工厂的计划，我的纺织技术无用武之地，担心会被派到建筑工地当采石工。

有一天我跟一位来自哲蚌寺的年老僧侣说我还没有分派工作，他建议我跟他一道作木匠工。监狱方面无暇顾到这类琐碎的事情，我当木匠没有多久之后，他们又派我去做裁缝。这是好消息，不需要从事强度劳动，我感到松了一口气。自从被逮捕以来，目前的情况算是最好的。

当然我并不因此感到愉快，中国人现在已经把我的国家钳在铁掌之中，一时还没有任何改观的迹象。我察觉到，中国人对于

统治西藏越来越感到自信，他们不断吹嘘自己的进步，说西藏人的生活水平已迅速提高，然而新来的犯人往往把各地老百姓受苦的情况告诉我们。

有一天我去上工时，一个年轻女人朝我走来，我立刻认出她是多卡，那个在罗布昆泽审问我的拉萨女孩。她穿着一套蓝色服装，头发梳成两条短辫子。她只轻蔑地打量我，没认出我来。我记得她当时说过的那句话："我会毫不犹豫地枪毙你"。

多卡是妇女分队的主管，第一监狱里每个人都认得她。普通犯人都说她多么漂亮。多卡是模范干部，中国人的宠儿，她的声望和权力达到了巅峰，每个人都惧怕她。她新近跟一个绰号"霹雳啪啦"的中国军官结婚了，因为此人讲话快速，象机关枪扫射一样，他是负责建筑分队的。

1965 年年初，当局要犯人给党提意见，开始大家都不愿意发言，知道党会利用我们的发言，作为把柄来返击。大部分的人还是象往常一样，只说赞美党的话。

只有一个康巴人站了起来要提意见，他说有一次检查牢房，一个警卫偷了他的猫眼石，这是一种藏人极为珍贵，认为具有神奇力量的宝石。他说这块玉石是几代祖传，最后由母亲交给他的，他说多卡是贼。整个院子陷入沉寂，大家都望着"霹雳啪啦"，他的脸扭曲得像个拳头。

这个康巴人的勇气令我非常惊讶，从来没有听过有犯人敢对个别的管理人提出抱怨。这一次中国人宽宏大量是有原因的。为了纪念西藏成为自治区，表明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官

方发动了一场盛大的庆祝会。北京的高官们到达拉萨，也派了一个代表团到监狱来。

监狱当局要安抚犯人，确保在庆祝期间不出事故，因此很重视康巴青年的批评，他的勇气鼓励了更多的人发言。 所有的抱怨都指向多卡，妇女分队抱怨她扣克口粮，另一个组指出她向监狱农场要求提供额外的新鲜牛奶。当局很快作出反应，多卡被革职，派去照管监狱的牛群，这是管理人员最低级的工作。

几天之后，她的态度整个转变了，失去了原有的飞扬跋扈，走路时也形色匆匆，避免跟犯人的目光接触，不象以前那样充满信心在监狱场地走来走去。虽然我有一点可怜她，但是却很高兴她被拉下马，可惜她的霉运没有持续多久。

大家都非常思念达赖喇嘛，相信只要他在外面为西藏的自由努力，我们总有一天能够取得独立。有一天，《西藏日报》上很愤怒地报道，达赖喇嘛在美国设立了办事处，这个消息给大家很大的鼓舞。

美国！这条新闻透露了美国支持西藏人民的讯息，大家非常兴奋，窃窃私语，互相传递好消息。我听到一个名叫登达那波的犯人问另外一个名叫尼玛丹增的犯人，是否听到这个好消息。尼玛说："我们只要再坚持一段时间，现在全世界最强的国家美国将要帮助达赖喇嘛，不需要多久大家都会重获自由！"

这类谈话是很危险的。在监狱里第一件要学会的事就是不要泄漏自己的想法，犯人学会了隐瞒自己喜怒哀乐的技巧，感情的

自然流露是不可能的，一个人只能在党的指令下表现高兴和愤怒，连对最亲近的同伴都不能表露真实的想法。

总有少数人为了讨好当局而打小报告。登达和尼玛的谈话被人打了报告，消息传到多卡那儿。 她一直在等待这种机会。多卡把关于登达和尼玛的对话向当局报告，上面让她进行调查。第二天早晨，多卡冲进我们的牢房，命令大家到院外集合。她在一个高级的中国干部和三个警卫的陪同下来的，显然她是牵头人。

其他单位的犯人也都被召集到院子里，列队站在那儿，好像等候点名。多卡愤怒地发言："这里有人在散布反革命的宣传，让犯人产生 "空洞的幻想"。"空洞的幻想"是共产党新创造出来的词语，我们在会上经常用这个词，意思是西藏独立和达赖喇嘛返国都是空洞的幻想。

多卡在大家面前来回度步，厉声申斥，"这些罪犯们假装已经接受了改造"，她说："其实他们继续阴谋反党和反人民"。她下令："罪犯站出来坦白自己的罪状"，眼睛瞪着最前面一排犯人。

大家都保持沉默，不知道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什么，也不知道她称为"罪犯"的是指什么人，这种突发性的大会最让人摸不着头脑，有的时候它会转变成一个枪决大会。没有人站出来，一片死寂。看着犯人们恐惧得发抖，似乎给予长官们无比的快乐。

多卡进一步说得更清楚："昨天有一些人到医务室去，他们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反党的阴谋。"气氛松驰了一点，因为大部分人昨天没有去医务室。尼玛丹增跨出一小步说："我昨天去了医

务室”，两名守卫立刻抓住他，把他扭转跟我们面对面。“你坦不坦白？”多卡大声叫嚣。尼玛是个有胆识的人，不象别的犯人在小小的威胁下就崩溃了。他知道，除非多卡透露出她已经知道了多少，否则他不需要坦白。多卡很得意能成功地把“罪恶的反动匪徒揭发出来”。尼玛开始发抖，快要掉下眼泪了。

审问和批判大会是审问者和犯人之间的神经较量。审问者的目的是不亮出底牌，让被审者自己交待。“坦白”是这种大会的关键词，犯人问：“我犯了什么罪？”审讯者回答：“我们掌握了一大堆你犯罪的资料，你赶快坦白交待。”

这时候犯人就会绞尽脑汁，思索自己有没有不留心地污辱了或反对了党的言行。由于任何行为都可以被定罪，有经验的犯人就会先察言观色，然后作出对方所要听的坦白。但是在高压之下，犯人往往被弄糊涂了，承认一些自己没有犯过的罪，或者为了避免挨打，而对别人进行假检举。尼玛尝试保持镇定，想从多卡口中探出来她知道多少，然后再决定下一步。可是他的沉默使得多卡更为愤怒，她高声叫道“坦白交待！”拳头在空中乱舞。

一名监狱的中国主管目睹了整个审讯过程。我们后来知道在登达那波的建筑分队，也进行了类似的审讯大会，由“霹雳啪啦”主持。登达拒绝承认任何事情，但是尼玛后来让步了，他承认曾经跟登达谈过话。

多卡胜利了，“恶劣的反动分子登达和尼玛结盟散布反革命宣传”。她宣布：“他们赞美我们祖国的敌人”。尼玛被拖到登达面前，因为后者依然拒绝坦白。

调查进行了数天，犯人被召集起来开另一个大会，声讨登达和尼玛。晚上牢房下锁的时候，起了一阵巨大的骚动，一个名叫格登索南的僧侣失踪了，警卫开始寻找他，我听到吉普车开出监狱大门的声音，哨岗上士兵们进入紧急状态。一个警卫高声喊索南的名字，说上锁的时间到了，好像索南只是忘记了返回牢房的时间。

我很奇怪索南胆敢逃跑，他是哲蚌寺的和尚，年纪比我大很多，现在在我们分队的厨房担任炊事员，他性格活泼友善，学问渊博。

卫兵们在厨房里找到了他，他用一把切肉的刀割断了自己的喉咙。格登索南的自杀使得尼玛和登达的案情有所扭转。当局宣称这两件事情有关连，登达和尼玛要负索南死亡的责任，他们俩人被判无期徒刑。一个星期之后，尼玛也自杀了。他的同监跟我说，尼玛找到一块尖利的金属块，他安静地上床，用毛毯蒙住头，第二天他没有起床，监房的头头拉开他的被子，里面全是血。尼玛刺断了自己的脖子，一点声晌都没有发出，没有惊动睡在旁边的人。

很多犯人都自杀了，有人觉得这是懦弱，也有人认为是勇敢的举动，我不敢下任何判断。没有人能够理解，极度的失望会驱使一个人结束自己的生命。作为一个佛教的僧侣，我认为生命是世界上最宝贵的，有一种力量支撑我，使我有种愿望要向折磨我的人显示，他们并没有真正打败我，我依然有勇气活下去。

登达和尼玛唯一的罪行是他们对自由有一种憧憬，共产党最惧怕人们有这样的梦想。渴望自由使得我们这些犯人还有力量支撑下去，达赖喇嘛的自由塑造了我们的这种希望。

每当开会的时候，中国人总爱教训我们："放弃你们空幻的梦想。"他们常常说我们要"等到白头。"也就是当我们的头发都白了的时候，西藏还不会独立。表达任何这种希望，都是一种严重的罪行。

尼玛和格登索南自杀之后，多卡的名誉恢复了，她被上级嘉奖为社会主义的坚决拥护者，又被调回来管理妇女大队，可以常常看到她在监狱的场地得意地走来走去，好像那是她的私人领地。我感觉到她正在寻找下一个代罪羔羊，所以大家都尽量避开她。

然而不闯祸几乎是不可能的。往往我们认为非常单纯的行为，却被当局看成是犯人故意触犯了不成文的法规。1965 年 10 月有一个庆祝共产党在全中国取得政权的纪念庆典。我被派去帮助分队作准备工作。我以前在哲蚌寺时就认识这名炊事员，我发现他的神情愉快，脸上布满了笑容。他对我说："今天可以吃到肉饺子，你不觉得兴奋吗？"

我引用了西藏最伟大的浪漫诗人之一的第六世达赖喇嘛的一句诗作为回答："不能永远拥有自己的最爱，那么单独的一天又有什么意义？"

我说完之后也就忘了这件事。几个星期之后，在一个例行的集会上，每间牢房都必须"揭发罪犯"，这名炊事员受到很大的

压力。大家沉默地坐着，心砰砰地跳着。人人都怕自己被选中成为打击对象。

我知道自己没有犯什么罪，但是犯人都学会了，要不时地进行坦白交待来取悦党。我惯常用一种技巧来矇混过关：即先“坦白”一些不重要的小罪状，然后把它用夸大的意识形态用语包装起来。比如，我会说自己经常为了避免劳动而频繁地上厕所，这种行为是要颠覆社会主义，降低生产。然后信誓旦旦地宣称，我要贡献自己的力量来增加生产。每一次上面叫犯人控诉和批判别人的时候，总是引起我巨大的焦虑。

在这一场会议上，这名炊事员被命令批判一个人，他选中了我。他把我那天在厨房随口说的话，解释成为污蔑社会主义和赞美旧封建社会，我当时引用的那一句诗是复辟旧封建秩序的一种企图。

我被命令站起来，一个警卫带着夸张的惊奇表情盯着我：“你这个死不悔改的反动分子”，他说“你胆敢把封建时代跟我们新社会作比较？”然后他向在场的囚犯发问，他们是不是也认为以前西藏的情况比中国人来了之后好。他宣称，在旧社会犯人都没饭吃，都悲惨地饿死了，而在新社会里，连拿着枪指向党的罪犯们都还能够得到改造的机会。

我保持沉默，不愿意尝试替自己分辩，一个人一旦被控诉了，就没有辩解的机会。他们要我检讨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我们要观察你”，这名警卫人员说：“你应该跟封建意识画清界

线，拥抱新社会。” 接下来的十八天，我每天都被审问，为什么旧社会比新社会好。

我已经被关了五年，还是没有习惯监狱里的统治，失去自由令我痛苦万分。在第一监狱的劳动，体力上并不沉重，但是怕受到控诉的恐惧，对我是一种持续性的精神折磨。更糟的是我跟家里完全断绝了联系，在牢里不准写信，跟外界联系的任何方式的都立刻会引起猜疑。

同样地，家庭也被迫跟我们画清界线，跟任何政治犯的联系和交往都被视作犯罪行为。党的干部会去拜访犯人的家庭，命令他们接受所谓的“再教育。”他会问他们，要站在社会主义和劳动人民一边呢，还是站在“反对党和分离祖国的反动分子”那一边。对于这种问题当然只有一个答案。

对犯人来说，忘记家人是比较安全的。在狱中我们都学会了象个孤儿一样地过日子，外面没有父母，没有兄弟姐妹，甚至没有朋友。对一个出家人来说，做到这点比寻常人容易一些，我已经习惯孤独了，没有强烈的系带，没有妻子和儿女迁引我的心。有无数妇女为了证明跟反动的丈夫撇清关系而再嫁的例子，党欣赏这种公开决裂的作法。

1966 年的 2 月我再次被转移到另外一个监狱。接到命令要打铺盖卷，我们很怕会被派送到东南面靠近缅甸边境的山南地区。那所监狱在茂密的热带雨林中，远离拉萨，那种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干部们可以任意抠打和体罚犯人。

犯人从来不知道被转移的原因，转移犯人并不是出于行政理由，而是为了阻止他们形成牢固的小集团，党认为阴谋叛变无处不在。

每隔几个月所有的犯人都要大搬家，没有人能够在一个地方待上较长的时间。如果当局怀疑两个犯人成为朋友，立即就会被分开。任何有人性的仁慈行为都不被容忍，友谊被称为“糖衣炮弹”，特别是当友谊存在于一个劳动阶级和地主出身的人之间时。记得一名以前的藏人贵族因为给同监狱的犯人递了一支香烟，立刻被抓出来被批斗，这种行为被诠释为要收卖劳动阶级。

当局警告我们，阶级敌人会发动“糖衣炮弹”来阻挠社会主义革命。犯人之间尽量避免相互之间不必要的接触。他们要求刑事犯和出身贫困的政治犯支持社会主义革命，来揭发阶级敌人，有些人会认真地执行这种命令。

我经常被从一个牢房调到另外一个牢房，有时候甚至被换到一个不同的分队去。在一个寒冷的 2 月早晨，我被转移到生叶波监狱，它是按照一个离拉萨西北十五里以外的狭窄河谷里的村子而命名的。

四周陡峭的山壁掩护生叶波免于受到风暴的袭击，这里发展成一大片监狱场地，有三座单独 的监狱和人民武装警察的培训所以及西藏全部犯人的行政管理中心。1966 年我到达那儿的时候，只有两座监狱是开放的，第一号监狱和第五号监狱。我被分到第五号监狱第五分队。在露天扎营，哪儿需要劳动力，我们就很机动地被派到那儿去。

所有的犯人都住在围有密封的铁丝网的帐逢里，卫兵们日夜地巡逻。每个帐篷是一个单位，里面住着十五名犯人。我的单位在建筑工地从事一些很杂乱的工作如油漆粉刷，敲石块或焙砖。

夜里的温度降到零下，为了暖和大家都挤在一起，我常常因为帐篷外懔烈的寒风而不能入睡。每天早上醒来，就会发觉帐篷的油布上结了很厚的霜。

中国人在努力赶工，要快速在生叶波造好监狱的建筑。当局显然准备接收更多的犯人。我开始担任的工作是用一个很大的铁锤，把大块岩石敲成小碎块，后来从事比较轻松的劳动，油漆窗户。

每个星期在帐篷里也要举行批判会，这成为很伤脑筋的事。在监狱里已经关了六年，很难再想出新的坦白材料。每次开会的头一天，我总是绞尽脑汁地思考，看能够挑出自己什么样的毛病来作检讨。通常我会重复地交待说自己偷懒，逃避工作，阻碍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如果幸运的话，监狱长会接受我的自我批评，只对我进行一番申斥。有时候他们会反复地说我犯了罪，指责我反对共产党，通常没有进一步更严重的罪名。

1966 年春天，我注意到党的政策有一些调整。每天午饭的时候，有一组人给大家阅读《西藏日报》上的社论，并且领导大家讨论。一般我们都讨论社论里面所批判的对象：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或者印度扩张主义等等，反正只是按照官方正式的言论和报纸上的文章，依样画葫芦。

可是那一年的春天，社论变得有点朦胧不清，常常批判阶级敌人和修正主义者。中国干部似乎也被社论弄糊涂了，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一篇篇社论到底矛头指向谁。后来当我了解了共产党是如何运作时，才知道《西藏日报》的社论变得语气模糊，表示党内高层开始一个难分胜负的权力斗争。这种混乱，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五月的一天，犯人接到命令停止劳动，拆除帐篷。东西都捆在一起，放在卡车上，又被转移到生叶波监狱。虽然五个分队里，只有三个长期驻扎在那儿，但是那天下午却挤满了人。一名藏族管理人命令我们在露天扎营，每个单位都急忙找一块空地下寨，不久场地的泥地全部被新扎上的帆布营所掩蔽。

在五月开这样的大会是很不寻常的。通常中国人会在冬天把犯人召集到一起，召开“奖惩大会”，会期一个月。经验告诉我，戏剧性的变化往往是一个凶险时期将要来临的征兆

夜里很难入睡，一方面是害怕将要发生什么异样的事，一方面是因帐篷都挤在一堆。第二天起床以后，也没有往常那样的拥挤和匆忙。没有警卫人员来把我们驱赶出帐篷，相反地没有人管我们，大家在场地上交谈着，连营地的大门都是敞开的。

一些中国干部走进场地来，每一个分队开始集合点名。一个主管干部主持会议，他说毛主席亲自下令，要全中国的男女和小孩都参加文化大革命，要清除党内的修正主义者。

每个人都发了一本毛主席的“十六条指示”。中国干部很严厉地警告我们必须背诵这“十六条”，要我们站稳立场，并且

警惕党内敌人的进攻。我很惊讶，当局能快速生产这么多的藏文小册子。这种速度显示了他们对于新的运动是非常看重的。

他还宣布，犯人有疑问的时候可以发言，也可以提出批评。毛主席显然认为人们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不受到惩罚。这个干部用很真诚温和的语调向我们宣布这条消息，可是我并不相信他。每次被审问时，“坦白从宽”这句话听得耳朵都起茧了。

然而大家心里憋着一肚子的话，当党用宽大的政策作为诱饵，让犯人们吐苦水的时候，大家就把他们藏在心里多年的话匣子打开了。我们缺乏自由，厌烦每个星期的学习大会，狱卒的残暴等等，大家不再保持沉默，渴望有机会自由发表意见，而不必害怕自己的话被扭曲地解释为污蔑社会主义或共产党。后来证明这些宽大的承诺，只是一个陷阱，这是中国人称为“引蛇出洞”的一种策略，他们用这种承诺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持续十年的文革把西藏推进了最黑暗的地狱。

第　八　章

文化大革命

那年夏天的一个早晨，我被派到扎奇去油漆一座新房子。我刚开始工作没有多久，就看到一大群人打着红旗朝我的方向走来，在碧蓝的天空下，红旗在风中飘扬。敲锣打鼓声震天价响，群众的呼声超越了锣鼓声：“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看到这些打着旗帜的队伍，我觉得好像是一群孩子在节日里游行，队伍里的人没有一个看起来年纪超过十五岁，这些孩子后来被称为“红卫兵”。有些年纪更小的孩子也跟在后面走，双手热情地鼓掌。游行的人臂上都戴着红卫兵的袖章，对我们这些路旁围观的犯人，都视若无睹。

那天晚上，有类似的一帮年轻人到监狱来，他们发表一项声明，要求所有干部都参加文化大革命，铲除党内的反动派。红卫兵们在未来的年代里制造了大量的骚乱，打着毛泽东“造反有理”的口号，狂热地冲到街上，把一切他们认为阻碍革命前进的东西砸烂。我唯一对监狱有一点感激的是，它保护了我们免于遭受红卫兵的残害。

有一次在四组，我看到红卫兵把整栋行政大楼的工作人员都驱赶出楼，把纸卷成园桶做成帽子，让主管干部们戴着，把他们的衣服都剥光，然后命令他们站在一栋白色建筑的前院里。看见

这些人站在那儿，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心中很纳闷。他们害怕得全身发抖，手足失措。一个红卫兵命令他们低头弯腰。

开始我觉得这些干部们是罪有应得，自食其果。这种报复心理虽然违背我的宗教信仰，却是人性里面很强的一种冲动。监狱管理员和警卫只不过是整个行政系统最下层的人，但是他们的残暴导致了犯人的痛苦，我们的愤怒很自然地发泄在他们的身上。红卫兵们在他们脸上吐口水，辱骂他们妨妨碍革命的发展，拒绝暴露党内的敌人。

第二天这些干部官员弯腰驼背地在监狱场地走着，看起来很可怜，而且不知所措。红卫兵们命令他们也要开检讨大会，坦白交待自己缺乏支持革命的热情，终于轮到这些人进学习班了。

1966 年 5 月中，我们的分队也被命令要进行学习，这种学习持续了一整个月。主要学习毛泽东思想，并且阅读报道文化大革命进步的《西藏日报》社论，还放了一个电影，是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检阅了成千上万的红卫兵。

文化大革命被宣称是在毛主席和林彪的直接指导之下发动的。我以前没有听过林彪的名字，他被形容成“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接下来的两年之间，没有一次会议漏掉过这两个人的名字。

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为了要铲除一切妨碍社会主义进步的力量，并且消灭试图颠覆革命的党内敌人。他们让我们真诚拥抱革命，改造思想和行为，也警告我们，如果任何人离开进步的道路，他将会象一颗毒草一样被铲除。

我不明白这一切跟西藏有什么关系。

那年夏天的一个早上，上面让我们停工一天，我的心开始往下沉，大部份人宁可劳动，也不愿参加无休无止的会议，劳动可以让我们躲开赞美党和毛主席的义务。各组都列队站在院子里，面对坐在高台上的监狱官和外地来的长官。瘦瘦的、还不到五十岁的监狱长发言了："旧的封建制度社会已经灭亡，社会主义是唯一的道路。你们应该改造自己，要学习热爱党和群众。"他接着说，我们首先应该放弃"四旧"：旧文化、风俗、习惯、思想。他挥舞着拳头喊道："在无产阶级的铁拳下你们无处可逃！"

在接下来的几个类似的演讲之后，会议结束了。我们返回监房去讨论刚才会议的重点。牢房的头儿已经在那儿，他又重复早上大会宣布的要点。他正在说话的时候，外面传来巨大的声响和骚动。大家都冲到门口去看，庭院里已经堆了一大堆的毛毯、书籍、鞋子和衣服，还不断有囚犯把东西往上丢。

他们都在破除四旧。那堆东西被点燃了，一会儿就大火雄雄。我们受到怂恿，把自己的东西都丢到火焰里去。我有一整套的袈裟，平时用来当毯子盖，现在我把它丢到火里去了。其他犯人也把他们最珍贵的物品，包括宗教书籍和法器都丢入大火之中。浓厚的黑烟从火焰中升入天空。一个年轻的警卫冲进牢房来，指着一双皮鞋说这应该烧掉。"可是这是全新的"，鞋子的主人说，"这是印度扩张主义者制造的"，警卫反驳。他接下来望着我的小皮囊问道："你为什么还贪恋这种旧东西？"一般藏

族畜牧人都用这种皮囊来装簪粑，朝圣的人也在他们皮带下系一个小皮囊，它也可以权充一只碗的作用。

“这是劳动阶级喜欢的东西”，我回答他。

“这是封建主义的残余，我们不需要这种东西”，他怒气冲冲说，“感谢党的仁慈，连你们这种犯人都可以用‘现代’食具，在以前只有剥削阶级才用得起。”

我走出去把我的封建小皮囊丢入火焰之中，注视着它在大火中慢慢卷缩，感到哭笑不得。这样一只简单的小皮囊也成为我们新的统治阶级的打击对象。

从此以后，所有的东西都被区分成“封建社会残余”或“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有些犯人被迫把他们传统的藏式木碗丢进火里。警卫们来检查我们的物品，不让我们隐藏这类东西。任何桔色和黄色的物件都被摧毁了，因为这两种颜色代表了宗教。要不就得把它们染成红色或深绿色，因为这是人民解放军制服的颜色，我把我的东西都染色了。大部分的人为了表示对革命的热情，都把个人的东西丢到火里去。整个监狱陷入混乱之中。

几天之后，色拉寺的方向有袅袅黑烟上升，色拉寺是西藏第三大寺庙，离我们监狱以东只有几里的路程。我注意到几乎整个星期烟都从四面八方升上天空，表示到处都在烧东西，书籍、衣物、袈裟、鞋子和其他我们所心爱的东西都被摧毁了。直到后来我被放出监狱，才真正地了解到，文革对于西藏文化遗产所造成的全方位的摧毁。

记得当时我从大厅走出来，穿过庭院，一页纸像一片秋天的落叶飘到地上。我把它检起来，发觉这是我以前当小和尚时所学习的经文。烧焦的纸页在我的手中破碎了，我忍不住哭起来，但是又很快用袖子把眼泪擦干。走回牢房，发觉房子的进门处挂着一幅巨大的毛泽东像。

“破四旧”运动使一切进入瘫痪状态。说话作事时，很害怕别人会说我还有旧思想、旧习惯或旧文化的习气。不久上面宣布我们已经唾弃了“四旧”，从现在起应该接受社会主义的习俗了。我们学习在说话和书写方面，都要用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术语，因为这更适合于新的无产阶级文化。为了要活下去，我们不得不装出一种顺从的样子。

每天的会议都让人心惊胆跳。下完工返回监舍，吃了晚饭就是学习的时间，要读毛泽东的“小红书”或者是《西藏日报》的社论，每个星期还举行一次坦白交待和批判大会。我以前那种批判自己和其他犯人的懒惰的策略，现在已经不能满足当局了。监狱长亲自抓“人人批判人人”的工作，我常坐在床上，等候被点名，心里很慌乱，不知道如何进行坦白和批判。监狱的头头对我的犹豫不决非常生气，他大声地讽刺我“班旦已经完全改造好了，他认为自己应该被释放，对不对？”

他在挑衅，我最好保持沉默，但是他毫不放松，令我无处可逃。他下决心要逼我说出一些可以称为“反党”的话报告上去，最后他写报告，说我拒绝坦白交待，态度傲慢，自以为已经是一个改造好了的人。

第二天晚上，有两个监狱的领导到我的监房。年纪大的坐在门边，嘴上叼着一支香烟，年轻的在屋子里踱着步子，最后站在房间尽头。他们是冲着我而来的，因为牢房的头头已经向上面打了报告。其他犯人都沉默地坐着，年纪大的干部抱着手走向我，“有些犯人自以为已经变成新社会的公民”，他说，“但是有罪的反动犯人不能一夜之间就革面洗心。他们就象包在布里的石头，外软内硬。班旦，你以为我们会放过你？”我无语。他阴阴地笑着说：“谁拒不坦白，就是抗拒社会主义。”

突然他提高声音，命令我站到房子中间，像申斥小孩一样喊道：“对你只剩一条路了！”他向监狱管理点点头，后者举起拳头吼道：“消灭反动分子！”其他的犯人也跟他一起合声叫喊。警卫和监狱头头开始打我，我拿手挡在脸前，他们不停地对我拳打脚踢，大概持续了二十分钟之久。他们离开之后，我不顾全身的疼痛爬回床上倒头就睡。醒来之后，把上衣脱下察看肩膀肋骨上的瘀血和青紫。当我一跛一跛走向厕所时，其他犯人都假装忙着做自己的事，避免跟我的目光接触。

文化大革命延续了十年，一直到毛泽东去世。在那段时间里我大概挨过三四十次毒打，没有一个犯人免于被批斗。由于批斗大会有很多犯人参加，所以党总是可以开脱责任。我们都变成傀儡，无法保护自己。如果上面跟我们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也没有人会去争辩。

西藏分裂成两种针锋相对的派别：“造反”及“结盟”。每个办事处、工作单位甚至家庭，都按着这两种不同的路线站队，

往往同一家庭的成员发觉家人分成两派，监狱管理人员和警卫也不能避免这种派系斗争。年轻的管理人常常控诉他们的上级是“掌权派”，妨碍革命的进步。原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指控为资本主义渗透进共产党的总代表，《西藏日报》鼓动群众铲除刘少奇的代理人。

内部斗争使我们不得安宁，会议和惩罚跟以前一样日以继夜。监狱又进来一大批新犯人，大部分是年轻的藏人和中国干部，很多是以前政府和党的工作人员，后来被指控为刘邓在西藏的代理人。1967 年夏天，“造反派”和“结盟派”的斗争使整个国家都瘫痪了，唯一还能运作的似乎只有军队了，所以监狱的日常行政工作就被军人接管，我们被告知，这些军人是“保卫祖国者”。

有天我走进公共厨房，发觉这儿的情势也陷入混乱。一群中国犯人正坐在那儿，享受着温暖的阳光。他们身上穿的衣服比较整齐，看得出是刚到的一批。有个人看起来有点面熟，他正在一边抽烟一边跟别人谈话，当我走过他身边时，他盯着我看。

“欢迎你，蔡组长！”我说。他跳起来跟我握手，一边热情地笑着。

1960 年我关在罗布昆泽的监狱时，他是那儿的监狱长，虽然他没有审讯过我，可是我对他很熟悉。他的脸圆圆胖胖，并不是一个坏人，只是脾气暴躁，常常会突然发怒，但是又会很快冷静下来，把犯人打发走，不再继续刁难。看到他也被关进来，我感到非常惊讶。同样令我惊讶的是，我还看到一个从江孜来的名

叫旺杰的年轻西藏人，他曾经是蔡的翻译。旺杰是中国人统治西藏的受益者，出身于贫苦的家庭，后来被共产党送到中国去受教育。现在他看起来茫然而失意，他也认出我来，但是没有任何的表示，也许他觉得不好意思，也许他怕人家说他跟一个反动犯人有关连。蔡一直被关到 1976 年。他和旺杰的罪名是盗用公款，这是一个当时经常被加给一些干部的假罪名。

那段时间大家都觉得度日如年，只有在劳动的时候才能免除被控诉和惩罚的恐惧。批判别人和坦白交待的压力非常无情，这造成一种犯人们彼此监督的气氛。总是有几百双眼睛盯着你，恐惧使人变得更加卑曲和温顺，我内心深处对于中国当局的残忍和无情，感到深恶痛绝。

犯人之间逐渐形成一种彼此心照不宣的理解和同情，大家都明白，在高压之下每人干的事都一样。虽然批判别人会给自己带来敌人，但是我们很快学会了宽恕，不管对方怎样批判自己，我们都能谅解而不心怀怨恨。

没有选择的余地，不参加批斗大会就会被当成反社会主义者，同时也被视为一个反叛者。批斗大会上，在场的军委会工作人员会把你说过的每一句话都记录下来，如果他们发觉你不是全心全意参加，就会指责你缺乏革命热情。你应当把监狱的难友当成最仇恨的敌人，无情地打击他。

由于出身反动剥削阶级，我是一个显著的目标，很容易成为被打击的对象，在监狱内外，唯一得到文化大革命好处的是那些“贫农”阶级，出身贫穷的人犯罪，会受到宽大的待遇，这类获

得了新地位的人，如今变得趾高气昂，西藏人称呼他们为“粗脖子”。“贫下中农”被认为有比较干净的政治背景，因为他们不愿意复辟封建社会旧制度。这些犯人象宠儿一样在监狱里大摇大摆，虽然有时候也难免被批评，但是大家都非常小心，因为他们轻易就能把别人的批评说成是反动分子对劳动阶级的欺压。

阶级出身掌控监狱大墙的内外。一个出身贫困的犯人如果努力工作，经常检举别人，同时对阶级斗争表现了很高的积极性，他就可以很快受到宽恕而被释放。

1967 年年底，这些会议都成了鸡蛋里挑骨头，鸡毛蒜皮的小事都会上岗上线，惩罚还是跟以前一样残酷而充满暴力。连我们坐的姿势都受到批评。如果大家用习以为常的模仿佛祖打坐的盘腿方式坐的话，就会被批评为对佛祖有封建主义的信仰。我们被迫模仿解放军士兵那种蹲法，我觉得蹲着很不舒服，想来所有藏人都觉得这个方法非常愚蠢，大家不习惯这种姿势，犯人的腿本来就已经很弱，现在更是蹲下就发抖。蹲几分钟我就必须站起来，假装是需要拿东西去。

1968 年的春天我被派到监狱附近的一个制砖厂去劳动。有好几个月的时间都没有斗争大会，也没有挨打。晚上是学习的时间，大家清一色地都阅读毛泽东的“小红书”。有一天晚上我正在阅读，有两个士兵和我们分队长，名叫琼先生的藏人走进牢房。琼先生脸色黝黑，脾气暴躁。

年纪大的长官开始发话：“共产党仁慈又有耐心”，他故意用一种非常庄严的口气说，“党给所有的反动分子改造自己的机

会，可是他们仍然继续反党反人民，这些罪犯就象屠夫一样，挂羊头，卖狗肉。”这个军官很有表演天才，他突然发难，只有一个可能性：我们中间有一个倒霉鬼将面临严厉的惩罚。连牢房的头头都非常害怕，他要是不把任何最细微的小事向上面报告的话，就会被认为是同谋。长官看了另外那个士兵一眼，他立刻大声喊：“班旦加措”，我不寒而栗。

同房的难友一听到是我的名字，都松了一口气，我丈二金刚，摸不著头脑，站起来走到房间中间，长官命令我坦白交待，他指控我“打闷枪”。

“坦白！坦白！”他大声地吼道。很多犯人在这种情况之下，吓得会把内心的秘密兜底倒出来。我明白现在必须镇定，保持沉默，先等待这位长官透露一点倪端。那名士兵对于我的沉默感到异常愤怒，长官命令牢房的头头和其他人抓住我的手。

他们把我的头使劲往下按，并且把我的手臂拧到背后。“低下头去！”那个长官叫道“你这个猖狂的反动分子！”周围的犯人合声喊道：“交待！坦白交待！”我仍然保持沉默。这个时候从外面走进两个人来，一名犯人和一名警卫。牢房的头头拉我的头发使我抬头，他指着刚刚走进来的犯人问我：“认识他吗？”

我认识，他名叫仁曾，是从拉萨来的。我们在同一个分队，在监狱场地我常常看到他，他也跟我一样被派到制砖厂去，不过我不明白我跟仁曾之间有什么关连。“我认识他”，我对审讯者说。

牢房的头头把我的头往地下按，仁曾开始控诉我。“班旦这样恶劣的反动分子从来不肯承认封建主义被消灭了，他们还常常做梦，希望封建主义能借尸还魂。”仁曾指控我犯了罪，他说那天下午我做了一种“水祭”，这是一种西藏人常常举行的仪式：把手指进入水中，然后在空中用指头一弹，就算祭奉神祇了。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就没有做过这种仪式了，因为我知道如果被任何人抓住，后果会有多严重。

“你认不认罪？”长官问。

“我根本没有做这个仪式”，我很生气地回答。

这个长官又转向仁曾，让他把我犯罪的详细经过重述一篇。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仁曾形容我如何把手浸到河中，然后弹向空中。可是事情并不是象他那样说的那样，下工以后，我们沿着一条狭窄清澈的河返回监狱，我把手套掉在河里了，所以弯下身去拣。我用双手掬起水来喝，水非常清凉，所以我往脸上拍了一些水，之后我把手甩了一下，想把水甩干。

仁曾把这件简单的事扭曲成为一种宗教仪式。长官立刻命令其他犯人对我开批斗大会。同监的难友们拥过来，从后面和两侧推我，有些人甚至踢我。牢头拿了一条旧的粗绳子把我全身捆住，双手捆在后面，使我无法动弹。我的胸口、手臂、肩膀以及肋骨上遭到了雨点般拳头的捶打。犯人们知道如果不重击我，那么自己也会被控诉成为不支持社会主义。我没法举手保护头部。

我看过有人在批斗大会上死去。一位名叫薛康·永登的温文长者，曾经是第十三世喇嘛的文书，因拒绝批判达赖喇嘛，而挨打。他失去知觉，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了。

我其实希望快一点死，我告诉警卫最好把我杀了，他们被“我的挑衅”激怒了，回答我的是，重击我头部的侧面和踢打我的肋骨。

这一阵拳打脚踢结束之后，警卫都气喘如牛，汗流雨下。我倒在地下，牢头把我松绑，绳子一解开，我的呼吸又恢复正常了。警卫撤离房间，那个长官还回头看我说：“别以为你的案子结了，我们要一直审问到你招供为止。”

我爬回床上，巨烈的疼痛慢慢平息，我进入了睡乡。第二天轮到我到公共厨房提茶水。我的脸肿得厉害，胸部和手臂都是青紫瘀血。大家看得出来，我疼痛得厉害，如果不是怕被指控为“跟反动分子拉帮结派”或“同情反社会主义的罪犯”，谁都会愿意代替我去担任这项工作的。现在大家只能对我行注目礼，看我挣扎著提起壶，走到院子去。

后来我还是去砖厂工作。我犯罪的证据对大家而言，是显而易见的可笑，但是犯人们都装作没事的样子，把眼光调开去了。我尽可能努力工作，知道一旦停止工作，情况将变得更糟。那天下午我越来越焦虑，精神沮丧地回到牢房，还没进门，就看见牢头已经含着一支香烟在等着我了。我爬上床，可是他瞪着我说：“你想干什么？”

我说想躺下来，他大声辱骂我：“落后分子”。接着分队队长琼先生带着昨天那两名守卫进来了，他重复昨天的控诉，说既然我知道这种行为是禁止的，为什么还继续这种“水祭”，我重复地否认了。牢头又命令大家开批判会，我低下了头，其他的犯人开始推我，并且一个接一个地骂我，有些人只是来拉我的衣服，摇我，他们实在不忍心再来打我这样一个完全无助的人。

这种情况持续了十三天，我无法进食。劳动是我唯一能够得到的松弛的机会。可是一到傍晚，哨音响起，大家站队返回监狱的时候，我的胃就抽筋，心里充满恐惧和忧虑。记得就在这段灾难时期，有另外一个犯人自杀了，大家叫他大黑斑，因为他脸上有很大一块胎记，以前是布达拉宫南加寺的僧侣，由于参加 1959 年拉萨起义而被逮捕，他在批斗会上被作为打击对象，因而自杀。

他跟我在同一个制砖厂工作，工厂和监狱之间是一条土道，每天我们沿着这条路往返于监狱和工厂之间，经过的卡车扬起滚滚尘土。一天晚上当我们往监狱走去的时候，黑斑走在我前三行，突然间，他走出队伍，扑向一辆刚从大门开出来的卡车。卡车停下来，已经太晚了，我看见他的脚猛烈地抽搐了几下就躺在尘土道上不动了，我调开头去。大家被命令快速地走回监狱。

没有人谈论黑斑的死亡，这件事情就象每天例行的生活一样，过去就过去了。大家都恐惧得不敢有任何感情的流露，眼泪也都成为秘密。

每天的日子都笼罩在巨大的痛苦之中，大家对于毒打和折磨都变得麻木了。我的神经崩得越来越紧，逐日增加的焦虑快要把我的精神压跨了。我也在考虑是否要步大黑斑的后尘。每当返回监狱的时候，批斗会就紧接而来，我肉体上遭受的毒打比以前减轻了，连琼先生都有一点意兴阑珊。

两个星期以来，我拒绝坦白交待，坚持自己的说词。监狱管理人最后放弃了，他说我的案子将交给年度的批宙大会来处理。我想我的固执最终赢得了难友的尊敬。

每年的批审大会在冬天举行，分队队长会在大家面前宣读他收集的报告。那些打了别人小报告的“积极分子”会得到一张毛泽东的像或者一本“小红书“作为奖赏。“改造失败”的犯人会被加刑，每一年总有几名犯人会因为无法改造而被判处死刑。

1970 年 10 月的一天清晨，我听到大铁门刮在地面上的声音，门打开了，队长对警卫大声喊叫，让他把犯人叫醒。监房的门开了，警卫冲进来喝令我们立刻起床。大家在外面集合，天还是漆黑的，天空中布满了成千上万的繁星，冷风刮着脸。有大卡车开进监狱，牢头说卡车要把我们送到扎奇，参加年度的奖惩大会，这表示将要执行死刑了。

到达扎奇的时候天还没有亮，我们跳下车，警卫命令我们坐在泥地上。更多的卡车运来了几百个其他的犯人。拉萨附近监狱的犯人都被召来参加这个大会。天亮的时候，我们排队走进监狱的场地。地上有粉笔写的每个监狱每个分队的号码。

一个干部向我们宣布开会的三条注意事项：不许说话、不允睡觉、不许上厕所。清晨的太阳带来了一点暖意。司法部的干部走进来，坐在我们对面的一张长桌前面。其中一个人打手势，警卫带进将要被枪毙的犯人。我虽然庆幸不在中选之列，但是对即将发生的事情心里极为厌恶。

持枪的警卫把那些双手用麻绳捆得紧紧的犯人一个接一个地带进来。每个人的脖子上挂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我不认识的中国字，猜想是犯人的名字和被加诸的罪行内容。越来越多挂着木牌的人被拖进场地，不久大约有五十来人站在我们面前。一个警卫打了手势，牢头和积极分子们就大声喊道："消灭反革命分子！"几千个人的声音跟着响起来，叫着同样的口号。

在这些将要被处死的人里面，有两个我们大队的人。两天之前梅周贡卡的提贡·班达和拉布秋两人被点了名，谣传说他们将会被释放，当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们将要面对死刑。现在这两人站在那儿，眼见认识的人即将死去是很难忍受的。

台上的一个军官喊出了我的名字，我被叫到前面跟那些跪在地上，一动不动马上要处死的犯人面对面。有一名犯人被揪住头发，拉到我脸前。她是一个满脸皱纹、没有牙齿的老妇人，肿胀的脸满布了瘀血，差不多已经奄奄一息了。直到今天，我想起她，全身都要发抖。

两个警卫抓住我，把我的头往下按。有人高声读出这个妇人的名字和她的"罪状"：反叛祖国、参加反革命行动、谋图推翻

无产阶级专政。我并没有留心去听她的罪状，因为单单她的名字就已经使我的心砰砰跳动。

她是贡噶林·贡桑女士，我以前多次听过她的名字。贡噶林出身于西藏一个很有声望的贵族家庭，大家都很敬佩她对抗中国人的英勇行为。她组织并领导了 1959 年 3 月 12 号拉萨妇女的抗议活动。我听说她在批斗大会上坚持宣称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她是西藏 1959 年起义的一位英雄。

我们彼此相望，她的眼睛雾朦朦布满血丝，脸上有一种表情，似乎要求我替她祈祷。虽然是冬天，但是太阳照进院子，使我觉得头晕目眩。我想象在万里无云的天空中，有一只鹰在我们头上盘旋，我有一种感觉，这只大鸟会俯冲下来，叼起我，把我带离这个地方，远离这场即将来临的死亡。

我旁边突然出现了一个士兵，我吃了一惊，他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大队长走到我面前。

“班旦加措”他叫我。

我的喉咙发干，他并不期待我的回应，“你知道吗？”他继续说：“你站在悬崖边走钢丝”，他用大拇指和食指比了一下，“就差了这么一点儿”，他指指那些等待死刑的犯人。我心里又是恐惧又是厌恶，他的威胁我几乎没听入耳。

大会一直持续下去，宣读犯人的案件一直持续到下午，最后他们宣布党决定剥夺罪犯们的生存权。几千个嗓门拉开喉咙喊道：“坚决消灭反动分子！坚决消灭人民的敌人。”这些人被拉上一辆敞开的卡车，卡车缓缓驶过在场的每个大队，最后停在监

狱门外，这里有一条犯人们自己挖的大约五尺深的沟。几名军人爬上监狱的围墙，以便看得更清楚，有些人卷起双手眺望。

囚犯被命令跪在沟前，然后一排机枪扫射了。子弹的力量把他们弹到沟渠里，士兵们再度瞄准，从近距离给那些在第一轮没有打死的人补上枪。开枪之后的一分钟是完全的死寂。那一天共有十五个人被枪决了。

死者的家属会收到一张帐单，上面列具发射子弹的数目和捆绑他们的绳子价格，从而得知他们的亲人是被枪决的。

死亡对我们如影随行，这是党权力至高无上的表现。面对死亡时，每个犯人的表现都不同。记得在 1971 年的秋天，又有一批人被一个个召唤到一个小办公室去。办公室的门是大开着的，房间有一张很大的窗子，从外面可以把里面的情形看得一清而楚。有一个名叫强巴曲培的老年僧侣在我前面被叫进去。

强巴是祥拜陀寺庙的住持，是噶甘地区一位声誉很高、学识渊博的僧侣。他的腰围很宽，脸园园的，无数的毒打和刑求，都没有能使强巴放弃他的宗教信仰。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想像，当他听到被宣判死刑的时候所作出的反应。强巴哀声请求宽恕，他在中国军官面前匍伏在地，就象一个僧侣在老师或者高僧面前表示敬意那样，他失去控制不停地哭泣，旁边的士兵冲上去，把他拖到桌子前面。将他的手印按在一份文件上。然后把他象一个袋子一样捆绑起来丢在屋子的角落。

下一个被叫进去的人名叫白玛董丁。白玛曾经是达扎地区的总管，达赖喇嘛尚未成年时，他是西藏的摄政。他在监狱里很受

人爱戴，白玛也不知道将被判死刑，他站在桌子前面，一个军官宣布党要剥夺他的生存权。白玛说："谢谢你"，他听起来十分愉快。不但我，连中国军官们都感到意外，他接下来说的话让大家更是大吃一惊。白玛引用了西藏的谚语："长而快乐的生命固然好，不快乐却短暂的生命则更佳。"说完之后，他非常镇定地把手指沾在印墨里，然后在文件上画押。

回想起来，我感到震憾，白玛是一个世俗人，没有受过冥想和佛教哲理的训练，当他面对死亡的时候却充满了勇气，然而另一个僧侣平时总是在思索死亡，他的信仰让他明白肉身不过是一个短暂的现象，但是在面对死亡时却如此错乱而请求宽恕。白玛的态度把汉人的权力抵消化解，他面对死亡的镇定使得他们的残忍变得毫无意义。

另外一个犯人由于偶尔污损了毛的像而被判处死刑。在一个周会上，他的罪行被揭露了，牢头象往常一样主持这个会议。一个犯人指控另外一名犯人对伟大舵手怀有刻骨的仇恨，证据是有人看到他那张毛的像上有一道很深的指甲印。会上还公开了这一道印子的确切尺寸，当局要这个被指控的人解释，这条印子是怎么弄到毛主席像上去的，他无法解释，就被判处死刑。

这段时期，中国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在西藏这场运动则是针对达赖喇嘛和班禅活佛的。我们知道汉人要我们批判达赖喇嘛，指控他是党和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头号敌人，我们想方设法绕过达赖喇嘛，只指控西藏的贵族阶级。干部们反复地问："谁是西藏所有苦难的源头？"

一天，有名叫图丹贡却的犯人在开会的时候站起来，他因为参加了 1959 年的骚动而被判刑二十年。他镇定地把其他人犯人刻意避免的话说出来了：“达赖喇嘛是西藏苦难的原因”，大家都能不相信他会说出这样的话来。“达赖喇嘛”图丹继续说：“是出卖祖国的奴隶主，我们应该揭发达赖喇嘛的罪恶。”他被减刑至七年，后来被任命为牢头。1970 年年底，各种派系的斗争慢慢结束了，军队掌控一切。绝大部分的寺庙都被关闭或摧毁了，所有的西藏人都住在公社里，这被形容为“发展的最高阶段”。

第 九 章

劳动改造

到 1970 年的年底，我在监狱里已经度过了十载春秋，我逐渐开始相信我不能活着走出监狱，重享自由。我非常孱弱，精神和体格都极度衰弱，经常上气不接下气。我向大队长申请许可，想到医院的医疗室去看病，但是被拒绝了。我们一共二百多人被派到拉萨以南的堆龙，修建一所水力发电站。他们说水力发电站是西藏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社会的标志。我们挖掘一条沟渠，把河水引过来，由于大家拼了命干，所以一个星期的工作在三天之内就完成了。水电站的领导祝贺我们，并发给每个人一块肥皂一条毛巾。对于我们而言，拼命工作能让人逃避一下沉重的精神负担。

我回到生叶波时，健康情况越加恶化了。到诊所看病的申请再度被拒绝。监管人说我是装病想偷懒，我被派到一个采石矿去，这是体力劳动最重的一种工作。有一天我晕倒了。

我被送到当地的医疗站去，这个小屋子里空空荡荡充满了消毒剂的药味。医生告诉我这是一座医院，他问我："你为什么不早来看病？"我告诉他大队长不允许，这位医生非常生气，他说我病得很厉害，应该转到更大的医院去，我被送到扎奇。

在这儿我一辈子头一回作了一次全身检查。一个姓王的年轻汉人大夫给我检查，他不断用简单的藏语说："不好！不好！"我默不作声。检查完以后，医生让一个藏人护士来给我解说医学名词。他说我有心脏病，可是他的诊断结果一通过翻译，就都丢失了。

对我来说，躺在一张自己的床上，远离监狱的嘈杂声是非常奇怪的。白色洁净的棉布床单非常奢华，他们给我干净的新衣服，我甚至一天能吃三餐，有时中间还有点心。早上供应病人一杯地道的西藏奶茶，有时候还有米饭和蔬菜。

王大夫其实非常关心病人的状况，但是党的工作也已经渗透到医务人员之中。王大夫看了我的档案，知道我的案子的来龙去脉，他常常问我为什么坚持反动的信仰，他劝我拥抱社会主义，他说社会主义能够推动全世界的进步。

很多犯人被医生和护士的温和态度软化了，开始泄漏多年隐藏于内心的秘密。我决心不要落入陷阱，然而一天我仍然被一名警卫抓住了把柄，说我"污蔑"了社会主义。当局总是在每个牢房、工作单位和医院里安插一些秘探，他们会事无巨细地把犯人中间的事报告上去。密探常常是由有"干净"背景的刑事犯来担任，他们成为当局的耳目，受到干部的鼓动，往往会对他人直接进行批判。

我被送进医院的第二天，就注意到这里有这样的人。有一个从藏北地区那曲来的青年搬到我旁边的病床，他看起来没有什么病。他自我介绍，并轻描淡写地说他杀了妻子，又补充一句，他

的出身是“贫牧”，这表示在中国的占领之下他是受益者。由于学习好，大家都叫他“红仔”。

我对红仔很警惕，他的出身背景使我对他敬而远之，决心不要给他机会来刺探我，而他总是在我旁边伺机而动。有一天，他要求我把塞在枕头底下的新睡衣给他，我再也按捺不住了。

“作为贫牧，你从党那儿得到了一切”，我大声说，“作为剥削阶级，他们拿走了我所有的东西。”红仔一听非常高兴，我立刻警觉到这些冲口而出的话会被扭曲变形，当作是我对社会主义怀有巨大仇恨的表现。果然，分队队长很快来到我的床前，并宣布我是一个“不肯服气封建主义已经被击败了的反动分子。”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我又成为批斗大会的对象，必须坦白自己的罪状。在这里他们不对我拳打脚踢，只是用言语来攻击我。其他的病犯尽可能装出愤怒是发自内心的模样，按照既定方式不断地辱骂我。我坦白了自己的错误，红仔看起来十分兴奋，因为他成功地暴露了一个反动分子。

我的身体在逐渐恢复，开始在医院里做一些轻微的劳动，打扫卫生、整理绷带或搓棉球，但是我依然有气喘，并且胸部有剧烈的疼痛。1971 年年初，我出院了，被送回生叶波监狱，分到第一号监房，这是以恶劣著称的号子。

让我休息三天之后，我又重新被派遣到采石矿去，跟其它几百个犯人在这里把巨大的岩石，敲碎成小的四方型的石块。开始他们让我做敲石的活儿，可是很快他们就派我作搬运工作，把石块背在背上，从矿上运到九十米以外的工地上。

开始工作的第二天，就看见一个年轻人一动不动躺在地上，有一块巨大的石头压在他胸膛上。警卫和管理人员的残酷是无与伦比的，一个月之后，一天牢头旺杰用铁棍把一个犯人的脑袋打开了花。

我的皮肤变得越来越粗糙，手指和手掌结满了老茧。有些犯人用旧鞋底来做护掌，我也尽可能地收集旧鞋底，我一共收集到六只旧鞋底，把它们用铁线缝在一起。这些垫子成为我最珍贵的所有物，保护我的手不被石头的尖锐边缘磨伤。

九月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两个士兵把林彪的像片从墙上取下来，林彪是党在人大上指定的毛泽东的接班人。将近五年以来，我们每天早晚都必须高声呼喊“林彪万岁”。现在他的肖像被取下来，这个表示有很严重的事情发生了。

几天以后又开大会。监狱长宣布林彪企图谋害毛，他的阴谋没有成功，林彪和他的同盟坐飞机逃走，飞机失事，机上全部的人都丧生。中国干部们对这件事情似乎也一头雾水。不久新的批林运动展开了，我们每天学习《西藏日报》，并且展开相应的批判。进行这类控诉，对我们来说已经得心应手了。一切跟林彪有关的党刊都被删改了，壁画或像也被涂改或消毁。书上凡是有他名字的地方，都不动声色被撕下来。

不久，一个名叫丹巴的藏人干部在一次会议上宣布，亨利·基辛格将访问中国，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名字，登巴向我们解释基辛格这个人物，并且说中美之间的关系更为加强了。几个月之后，我们听说美国总统尼克松将访问中国。

尼克松访华被看成是中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巨大胜利，令我们感到非常失望。从 1960 年开始，藏人一直希望美国能来解放我们的国家。1961 年我在扎奇听到一件消息，说美国在印度训练了一支藏军。有一个犯人说，他曾经被送到美国接受训练，然后又被空降送回西藏。

有一段时间，由于中国严厉地谴责美国，使我们的期盼增强了信心。美国被形容成是一个幻想统治全世界的反动国家，被中国当成头号敌人。我们在无数的大会上对美帝国主义进行谴责，现在听到美国将向中国低头这种消息非常令人沮丧。中国爱说“东风压倒西风”。

每天必须听冗长的胜利演说，中国人说藏人希望从美帝国主义那儿得到支持的希望落空了，美帝就象藏人的神一样，不能帮助我们。上面让我们看尼克松到达北京，受到欢迎和接待的电视新闻。几个星期以来，监狱里的广播器不断播报中美友好关系，还说美国总统象一只狗一样夹着尾巴到了北京。次年中国变成联合国的成员国。西藏得到解放的一切希望都似乎化成幻影了。

唯一的安慰是达赖喇嘛在印度还能享受到自由。

看来我得到释放是无望了，事实上获得释放也不再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我听到了一个名叫扎姆师傅的人死亡的消息，他是专门制作庆典上所使用的铜器的工艺师傅。扎姆于 1960 年被捕，在监狱里待了十年，于 1970 年释放，返回自己的村子，欢迎他的只是另外一场批斗大会。所有的村民包括他自己的家人都

聚集在一起，出来作证批判他，谴责他是阶级敌人和反动分子。获得“自由”数天之后，扎姆师傅自杀了。

当局拿这个故事来警告我们，说如果我们不彻头彻尾进行改造自己，是无法逃避群众的愤怒的。他们说西藏人民现在燃烧着革命的热情，期待毛主席来成为照亮他们前途的火炬，还说监狱里跟外面的世界是没有什么两样的。

1975 年我十五年的刑期结束了。12 月 24 号的早晨，他们告诉我不需要去劳动，应该到行政大楼去报到。我知道这并不意味着释放，只不过是换一种方式的转移。大楼外面已经有其他几个犯人在等候了，他们同样也知道这并不表示获得释放，快乐地跟家人和朋友团聚。正式的刑期结束之后，犯人通常被遣送到另外一个劳动改造营去，那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监狱。

一个藏人走出办公室喊我的名字。监狱长和大队长都在屋子里面。他们假意营造一种兴奋的气氛，使我相信现在是获得释放了。大队长接着告诉我，我将被分配到宁塘砖瓦厂。

“砖瓦厂！”我喊道，几乎失声笑出来。那是一个声名狼籍卖苦力的地方。平常警卫们总是用送我们到砖瓦厂来威胁我们，这个劳改营在离拉萨十五里的地方，靠著雅鲁藏布江边，几乎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大工厂，专门生产大量的磁砖和砖块。这种分配跟我心里想象的去处是不谋而合的。

我回到牢房去打点行李，找到一张 1960 年进监狱时没收东西的收据。我拿着这张收据到办公室去，大约二十分钟过后，一

个警卫拿了一包东西出来。我查看了那包东西，发觉我的表不在里面。我告诉中国干部，并且给他看收据。

他叫我在外面等。过了几分钟，大队长出来了，他说我的表已经被销毁了。

“可是我还活着呢！”我说。

只有当一名犯人死了以后，他的遗物才会被销毁。干部又返回办公室，我听到他们在里面进行讨论。一个藏人干部走出来要看我的收条。

“那是一个金的劳莱斯表”我说，“这是全世界最好的一种表”，听说即使把它表丢到火里或雪里，它都可以照常走。

“如果我们不知道详情，怎么能找到那只表？”这个干部说。

“在我的档案里应该有这张收条的原本”，我回答。

我们又走回办公室，干部拿给监狱长看。

“我们会赔偿你的表”，他安安静静地说。

我不满意，告诉他这只表非常昂贵。

“反正有黄金的正式兑换率，”他说。

我开始觉得有意思了。“当初我哥哥买表的时候，并没有按照你们的兑换率，我还是要我的表，不愿意要钱。”

我假装非常生气，指责他们盗窃，破坏了监狱的规定。多少年批斗的经验告诉我，要攻击一个干部的最佳方法是，质疑他对党的忠诚和他的意识形态。

“毛主席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导解放军，禁止他们拿走人民一针一线。”我说：“只有反动士兵才会偷窃犯人的东西。”

最后监狱长说他们会调查这件事情，并且会把找到的表给我送到宁塘砖瓦厂。他说拖拉车已经在外面等着了，我拿起背包就跑出去。跟这些干部交锋之后，心里有一种胜利的愉快感。车子把我们拉出生叶波，朝着拉萨的方向开去。

车行大约三小时之后，砖瓦厂到了。跟我一道搭车的还有一个中国人，他以前是会计，另外还有一个前日喀则的僧侣。车子开过布达拉官，这是 1964 年之后我第一次重新看到这座壮观的寺庙。

工厂的办公室在一个有铝皮屋顶的新建筑内。一个藏人和一个汉人干部坐在一张桌子后面。藏人干部名叫成列，正在仔细看我的档案，汉人干部只是望着我们猛抽他的烟。成列一人发话，他先问我的名字和一些细节问题，同时跟我档案里面的记录核对。

“你不再是犯人了”，他说。

我没有任何的反应，显示出我不同意他的话，成列也满不在乎，交给我一双手套和一个象外科大夫戴的白棉沙口罩，跟我说了一下工厂里的工作，并告诉我作为一个“二劳改”的权利和义务。

“二劳改”不可以离开区域，也不允许到拉萨去。在得到大队长的许可和另外一个“二劳改”的陪伴下，等于互相“担保”之下，我们可以到合作社的商店去买东西。

我们居住的宿舍跟监狱没有什么区别，房子有泥墙和凹凸不平的地面。墙角可以看到结了冰的水洼。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像挂在墙上。有一个木头的钩子可以挂衣服，另外有一长条高出来的地方是给大家打卧铺的，那上面放着五套棉被，显示出我将跟其他五人共居一室。

已经是近黄昏了，大家都还在工地里，我倒头睡了几个小时。纷杂的脚步声和人声把我吵醒了，进来的人很惊讶发现有一张新的面孔。他们对我笑笑打招呼，彼此互相交谈起来。有两个人以前是哲蚌寺的僧侣，所以我们有好些共同认识的朋友，跟他们在一起我感到很自在。

这里的气氛比在监狱轻松多了。虽然也有学习班和批斗会，但是大家都比较坦诚，说话也比较自由。另外两个僧侣对我很照顾，他们告诉我作为“二劳改”的生活决窍。

每天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大家必须起床，背上一个大的箩筐出门，任务是去捡满一篮子的牛粪和人粪拿回来当肥料，这是一项竞争非常激烈的工作。每天清晨二百个“二劳改”满山遍野到处寻找粪便，要完成自己的指标。

一个名叫次丹旺秋的“二劳改”拒绝去捡粪，在箩筐过磅的时候，次丹把空箩交出去，说他找不到任何的粪便，他立刻被拖出批斗。

次丹以前当过贵族家庭的管家，因而被贴上“剥削阶级代理人”的标签。他很能言善道，有问必答。他以前东主的地产在离宁塘半英哩的地方，每次他到那边去拣粪便，都会被当地的农民讥笑。有天次丹跟他们争锋相对说：“我们现在过的日子多美啊，每天要捡粪，好像这是什么宝贝糕点一样。”这句话传到上面去，他又因为污蔑社会主义变成批斗的对象。

次丹第二天不肯起床，同房的人一再劝说，他也不理。大队长带了几个警卫进来大声申斥他，次丹说他在附近的山上走遍了都找不着粪便。队长说他应该更勤奋地到马路边上去找。

“我不知道大卡车也会拉尿”，次丹回答“社会主义的卡车的确比资本主义的卡车更为优越。”

那一天劳动取消了，所有的“二劳改”和附近的居民都被召集起来开会，次丹以前地主家的农民都被叫过来批判他。我们这些“二劳改”也都应当对他进行批判。他开始被众人咒骂，后来遭到毒打，最后他们把他枪毙了。

拾粪的定额完成之后，我就步行到工厂去，他们命我和泥，要和得均匀光滑到可以制磁砖的程度。我得将砖胚放进窑去烧，窑里灰尘很厚，几乎不能呼吸。劳动能够获得微薄的报酬，我用这些钱来买每月的定粮。每年也可以买定额的十三码布和十一磅糖。报酬是按每个人的政治成分来决定的，所以我的报酬是最低的一级。

吃饭的时候，我们在大厅的窗口前排队等候分配食物。每个人报上他想要的窝窝头数，服务员就在名字后面打上叉叉。一个

窝窝头一个叉，名字旁边还写着每个人食物定粮的数额。如果一个人已经到达了每个月的定量，就不能够再取食。每个月管理人把我们消耗的窝窝头数加起来从定额里面扣除。当局也从我们的报酬中扣除电费、水费、盐费、茶叶、蔬菜和燃料的费用。

劳改营是采取自己给自足的制度，一切行政费用都从犯人的工资里面扣除。维持这样庞大的劳改营系统，国家不需要任何的开销。

政府的口号是“多生产，少消费”。原来冬夏有两套制服，现在只发给一套棉制服，整年都穿这一身。我的鞋子都破烂不堪，制服也很快都缀满了补丁。

整个西藏都实行公社制度，私有财产和土地都被没收，进行重新分配。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人们只能分到很少的配额。整个国家都变成了一座监狱，没有人可以随便旅行，没有许可证不能购买任何东西。

劳改营有两个目的：第一，孤立阶级敌人；第二，提供廉价劳动。上面对我们说，我们唯一的出路是积极劳动和努力改造。就象在监狱里一样，每星都要开会，每个人自我批评并且检举朋友。跟其他人一样，我经常受到批判，也批判过别人。

我始终不能克服被迫检举朋友时，内心感受的痛苦，但是大家必须学会去忘记这种无休无止的强迫性出卖。犯人之间同舟共济的感情是真诚的，大家都避免作可能导致别人加刑或死刑的指控。然而总有少数犯人为了要向党表忠心，不顾后果对他人进行无情的指控。我们称这种人“积极分子”。

在我到达宁塘没有多久，一个大家都很喜欢的名叫巴桑的犯人，经过了三个星期的严酷批斗而自杀了。另一个叫索南班旦的犯人总是尽量找机会表现自己如何热情拥抱新社会。索南发现巴桑藏了嵌着达赖喇嘛小照的像章，在一次周会上，他站出来揭发了巴桑的秘密。巴桑死后，当局宣布他是因为不能够适应新的社会主义社会而轻生。

第 十 章

舵手之死

劳动营是介于监狱和社会主义新社会之间的一个中途站。从理论上说，劳改营是再教育的中心，但实际上它给共产党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劳动营也象免疫中心一样，把西藏要求自由和独立这类危险的思想跟社会绝缘。犯人们一旦被送进劳改营，就知道他们最终将死在那里。

宁塘砖瓦厂的管理跟一般的监狱没有什么区别。厂长是一个凶恶暴躁的中国人，他把工厂当成私人王国那样统治着，连警卫都怕他。他有一个藏人助手，名叫旺堆，这人五短身材，对我们很有同情心。

没有警卫在整个宿舍地区日夜地来回巡逻，所以我们的住宿区跟其他厂房附近的宿舍看起来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我们是“二劳改”，不是自由人，没有哨岗并不表示我们不在监控之下，党发明了另外一种更有效的方法来进行监视。

我们被分成两类，一种是戴帽的，另一种不是戴帽的。戴帽的都是政治犯，也就是被打上反动分子标签的人，不戴帽的是普通刑事犯。这是一种互相监视的机制，不戴帽的人有义务监视戴帽的人。当局继续利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制造矛盾和形成犯人之中的猜忌。不戴帽的人被称为社会主义和革命的维护者。

这些人在工厂和在宿舍之间大摇大摆，享受他们所拥有的权力，政治犯有任何些微不适当的行为，立刻会被反应到上级去。作为报偿，检举人能得到会很快被纳入新社会的承诺。到达工厂不久，有一天中午休息的时间，我坐在礼堂的大门口，一群小孩子围过来，他们互相怂恿走上前来，其中一个走到我面前，向我乞讨食物，令我非常惊讶。这孩子说他们一家人已经好几天都没有吃过东西。

党告诉我们饥饿和食物短缺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但是这些孩子面有饥色，比大饥荒年代我在堆龙监狱看见过的情况更糟。他们都浮肿得厉害，皮肤苍白，显出一种病态的青色，眼睛几乎睁不开，没有穿鞋，衣服也是褴褛 不堪，连旧封建社会时代的乞丐都比他们强，至少那时候行走的乞丐肚子里是填满了的。

我怀疑他们可能是以前地主的孩子，所以现在特别受到歧视，因为以前的“反动阶级”成分的家庭都遭难了，受到比畜牲还不如的待遇。阶级出身现在是最关键的，无论粮票证、身份证、以及医疗卡上都写著阶级成份。我问这些孩子他们是什么阶级。

孩子们说他们是贫农阶级，我大吃一惊，因为党告诉我们贫农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受益者。小孩子们跟我说附近的公社都缺粮，有些人的家里已经不得不开始吃青草，他们把草熬成一种很稠的粥，然后吃下去。我把一些窝窝头给了他们，不久这些孩子就成了我们营地的常客。

整个西藏现在进入党所谓的“共产主义发展高级阶段”。宁塘地区被分成十二个大公社和大队。所有的房产和牲口都收归公社所有，人们按照一种复杂的工分制取酬。

越来越多人到我们营地来乞食。我暗中把他们公社的名字记下来，不久就发觉整个宁塘地区都面对了同样粮食短缺的情况。当大人来乞讨的时候，我要他们述说饥荒的原因，他们说这不是自然灾害所造成的。

缺粮的现象是因为人们必须把收成的一大部分粮食，“自愿”上缴给政府。本来大家已经付了相当重的税，而公社行政部门在高压之下又谎报高于实际的生产指标，因此必须向政府缴纳更多的粮食。

为了尽量提高征收，党在农民之间制造一种狂热的竞争。他们告诉农民向国家贡献得越多，越能表现他们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党及毛主席的忠诚。在这种指令之下，没有人愿意表现怠惰，公社之间也有类似的竞争，大家都争着表现，要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比别人更大的贡献，这就使得人们谎报生产数字，从而人为地把税收往上提升，最后弄得贫农们都在饥饿边缘。

“新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甚至于要吃糠，这东西是“旧封建社会”拿来喂牲口的，大家都觉得这种情况骇人听闻，但是没有干部敢对党和领导质疑，因为谁反对党他最后的下场就是进劳改营。

这些面目憔悴的年幼孩子，一出生就见证了社会的灾难。作为犯人我们被虐待是在意料之中的，但是普通老百姓该怎么说

呢？他们应当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受惠者。这整个镇压机器本来应该把贫苦农民和牧民从封建的奴隶社会里解放出来，但是过去的二十年他们所尝到只是苦果。

地方官员发觉到劳改犯人用食物来救济农民，就向监狱当局反应。我被指责是带头鼓励资本主义乞讨行为的人，厂长把我叫到办公室去，要我交待整个事情。令我很惊讶，事情后来就不了了之了，原因是我们厂和外面这个公社之间有宿怨，管理员认为我们作的事让公社十分丢人现眼。

1976 年春天，我终于听到来自帕南我家的消息。一天，有个访客来看我，这是我成了囚犯之后的破天荒第一遭。我感到迷惑不解，很想知道倒底是谁来了，走出去就看到一个胖胖的年轻妇女，戴着一块蓝色的头巾，身上是打了补丁的裤子，上面一件绿色的棉袄。她脸色憔悴，两只眼睛湿漉漉的，手上拿着一个热水瓶和一个小篮子。

我向她道歉说我认不出来她是谁。

“我是南玛明盖”她说， 我没听过这个名字。

“也许你把我跟别人混淆了”，我说，“我是班旦加措，是哲蚌寺的僧侣”。

她解释说，她是我父亲的厨师的女儿。我离开帕南已经十五年了，所以不认识她。我问她怎么知道来这里找我，她说看见我在工厂里劳动。

明盖刚刚搬到宁塘地带，她和丈夫都参加修建一条靠近我们劳改营的公路。她告诉我，父亲于 1965 年去世了，由于是地主

出身，父亲经常是批判大会的对象，受到村民们控诉。我最敬佩的那一个哥哥，也于 1968 年死于一次批斗大会。我们家成为红卫兵最喜欢打击的目标，家人有时单独的，有时一块儿，经常地被拉到公共场合去毒打。我的继母在一场特别残暴的毒打中，左半边瘫痪了。

那一天夜里我不能入睡，满脑子都是家人的面孔和他们所遭罪的痛苦。虽然以前就知道红卫兵特别爱挑选封建地主作为攻击对象，但是知道归知道，这并不能消减我的悲伤。

明盖很善于利用她的背景出身，由于她以前是仆人，所以成分很“干净”，可以畅通无阻地进进出出。她经常来看我，并且带一些食物跟我分享。有一天她丈夫还给我送来一条崭新的棉被，这一定所费不赀。

他们的来访和仁慈就象香油一般，在那个黯淡的冬天温暖了我的心。我那时候心情沮丧而孤独，明盖使我回忆起以前的快乐时光。她是工人，所以也被允许回到帕南的家去探亲，通过明盖，帕南的家人知道我还活着。

1976 年春天，中国的总理周恩来和人民解放军创始人朱德去世了。报刊上广为报道他们的逝世，劳改营里举办了哀悼仪式。积极分子制造哀悼气氛，好像是失去了自己的亲人一般。当局利用这个机会来侦察每个人对党的态度，因此大家必须表现得万分悲痛。

朱德死后一个月，我在《西藏日报》上读到一则新闻，中国遭到超强的地震。中国人平常怀疑我还拥有封建思想是没有错

的，因为我马上把地震和上面两件死亡事件看成是不详的预兆。八月有一天，我在夜空中看见一颗慧星殒落时，我的迷信又加深了。

西藏人把慧星看成一种征兆，我立刻走回宿舍，想问问看有没有别人也见到那颗慧星，但立刻警觉到，这样的问题会引起别人指责我在鼓励迷信和散布谣言。

在报上读到中国某地区下了一阵“石头雨”，我相信那是一些陨石。第二天我忍不住问了一个名叫扎西拉丁的僧侣，是否也看见了彗星，他点点头但是不敢大声地把这秘密说出来。

关于彗星的消息很快在劳改营里散布开来。每个人都记得 1950 年 10 月当中国人入侵西藏之前，西藏曾遭到地震，那时候大家也看到过慧星。经过二十年中共的洗脑和打压，一颗慧星的出现又立刻把我们传统的信仰唤醒了。

我个人认为所有的这些迹象都预兆着毛已经接近死亡。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已经年老体衰，但是不敢对此公开发表意见。1976 年 9 月 9 日我的预感成真，毛在北京去世。我回忆起来，听到他死亡的消息，就好像昨天才发生的。多少年来中国人都告诉我们毛泽东是超人，是不朽的，然而现在他象一个凡人一样也离开了世界。

下了工之后，我手上拿着杯子，跟一大群人排队站在那儿等候。广播器里高分贝发出一长串声响。大家一般都不留心广播器里的那些废话，只是排着队，彼此交谈着。因为广播开始总是用

中文播送，大部分的人都不会说汉语，所以从来不去听广播的第一部分。

现在换了一个藏语广播员。“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他的声音颤抖着，呜咽地堵在喉间，停顿一下重新开始。我旁边的人说“到底怎么啦？”播音员似乎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开始念出一大串惯常加在伟大舵手毛主席前面的形容词，最后他说：“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人民热爱的毛主席已经离开我们了。”

这个消息把人弄得天旋地转，毛泽东真的死了？这当然应该是真的，谁敢开这么大的玩笑？回到宿舍以后，这个消息沉淀下来，我内心充满了狂喜，简直可以跳起来大声唱开来！毛泽东是我的灾星和克星，二十年来，我每日每夜都要念他的名字，甚至当我病痛得连张嘴喝水的力气都没有时，都必须要喊出“毛主席万岁。”我随身携带他的小红书，甚至特地制作了一个小红袋子来装这本小红书，因为有些犯人为了把书弄脏而被判处死刑。

我的一切苦难和成千上万死去的犯人的生命中都刻有毛泽东的名字。他的名字把我们串在一起，我认为他的死终于把这条灾难的链锁给拉断了。

我相信其他人也有同感，当然我们只能把这种感情隐藏起来。我摆出一副沉思的样子，假装在思考问题。不知道下一步的发展会怎么样，但是有一件事情是非常明确的，事态将要起变化了。我想象着达赖喇嘛也许会返回西藏，但接着又想，会有另外一个比毛还坏的人掌权吗？我既快乐又恐惧，暴君已死，但是谁将继承他的宝座呢？

第二天大家被召集起来开会，所有的监狱管理人都带着黑臂章，有些人还在胸前口袋上别了一朵纸花。一个干部宣布："我们敬爱的领袖、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和我们的导师、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了。"广播器传出来哀乐，有些犯人眼里充满了眼泪，放声痛哭起来。我听到有一个人哀嚎："毛主席比我爹娘都亲。"其他犯人都肃穆地站在那儿，大家都很警觉，知道在这种哀悼的场合，必须保持一种"正确的态度"。我已经变成相当出色的演员了，脸上挂着悲伤的表情，保持着沉默。不久有些犯人开始哭泣，甚至于假装晕倒，这是中国人所谓的"正确态度"。在台上，干部们失去控制地哭泣著。

两个警卫出现，拿来满满一袋子黑色袖章，除了政治犯人之外，其他犯人都要别上黑袖章，普通刑事犯才有哀悼的特权，我们这些"反动分子"是不配哀悼毛的死亡的。我们单位的一名犯人很骄傲地戴上了黑袖章，向我摆摆手，象一个小孩炫耀他的糖果。次日所有没戴帽的犯人都到拉萨去参加伟大舵手逝世的哀悼会。

毛的去世使得劳改营里的政策宽松起来，无休无止的会议停止了。1978 年上面要我们把小红书都烧掉，把这样一本已成为我们以往二十年生命中一部分的书烧掉，让人有一种奇特的感觉。我们也被允许不必再每天早晨进行向毛主席请示汇报的仪式。

生活的变化非常快速，上面让我开始纺织并且生产地毯。劳改营有一大群绵羊，以往这些羊毛，或是卖给合作社，或是被任

意地丢到一个角落去。屯积的一大堆羊毛等待著被处理，我很高兴有机会摆脱砖瓦厂的工作。

问题是我是整个监狱唯一会纺织的人，每个程序都需要自己动手，包括把羊毛纺织成线，然后染色，这是非常繁复的工作，但是我可以不在其他的人监视之下单独一个人工作。

报纸上有整版关于“四人帮”、特别是毛泽东遗孀江青的报导，“四人帮”被指控要于毛去世之后在党内夺权，同时应对文化大革命的暴乱负主要责任。党承诺要改正过去十年来的错误，我们在劳改营中很快感觉到了好处。犯人的工资提升了，比较繁重的工作甚至能够拿到叫做“阳光与风”的额外报酬。

1977 年的冬天，所有的戴帽犯人都召集来开会，我们又再度被审问在 1959 年抗暴中所扮演的角色，我重复了自己的故事。滑稽的是，有些犯人说动乱的时候，他们根本就不在场。我们不明白，过了这么多年之后，为什么重新翻出这件事情来审问我们。

几天之后，早点名时，我和另外三个犯人被点到，让我们到拉萨去。车把我们带到城市边缘的一个很大的军营去，我们跟从其他劳改营来的几百个犯人，一起聚集在很宽敞的大厅里。大厅布置得象有宴会一样，一边墙前放着长条的桌子，上面放满了食物，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食物。和善的士兵给我们倒茶，好像我们是贵宾一般。我看到一些来自扎奇、和四组五组的熟悉面孔，大家彼此亲热地打招呼，以为不久就能够获得自由。

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名叫旺秋的藏人党员干部走进大厅，开始发表演说。“同志们！朋友们！”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旺秋赞美党的伟大，然后说西藏最近二十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是脱序现象，大家不该因此而反对党。他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四人帮”身上，然后以一种很温和清晰的声调宣布，所以的政治标签和帽子将被摘除。

旺秋接着说，在华国锋主席的领导之下，我们将面对一个新纪元，大家都应该贡献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的西藏，这是我们听熟了的老套。

我旁边坐了一位名叫曲培塔庆来自哲蚌寺的年老僧侣，这位可敬的有着长长灰白胡子的老人，让我想起寺院墙上画著的那种寿星。

我问他：“你打算做什么？”

“我想回到寺院去”， 曲培回答。这提醒了我，其实我也想回到哲蚌寺去。

当局让大家第二天把自己的要求提出书面申请。干部们说可以允许我们回家，但是旺秋很快接口说，我们大部分人都识字，受过很好的教育，最好还是考虑为建设新的社会主义而贡献力量。

会议持续了三天，大家都睡在大厅里，每天早上有士兵给我们送茶。我听有些人说，在被屠宰之前要先喂肥了。第三天的早上，上面告诉我，我的申请被批准了，可以得到居住许可，返回寺院去，我挥舞着文件感到欣喜若狂。我发觉整个大厅里大约两

百名的僧侣只有三个人被批准返回寺院。其他的人猜想，提出的申请反正不会被批准，所以都要求去当老师，他们以为这样返家的机会更大一些。当他们发现我们的申请被批准之后，大家都改变了主意，纷纷向那一位负责送呈申请表的主管要求改变，但是他不能再做任何的改动。共产党还在其位，一个高级官员一旦做了决定之后，没有人敢对他的决定置疑或拒不执行。

想到就要被释放了，我带着兴奋的心情返回宁塘。有些犯人跑过来向我道贺，有些人让我替他们递信给家人。我以为会被立刻释放，但是一时却没有动静。过了几天，有一辆军用吉普车开进劳改营，他们把我和另外两个僧侣曲培塔庆和图丹董珠叫去。几分钟之后，塔庆喜笑颜开地出来，手舞足蹈，他获得自由了。

轮到我走进办公室去，大队长坐在桌子后面，他的眼睛扫着一叠厚厚的档案，我的咳嗽让他注意到我进来了。我尽可能礼貌地说："我是被允许返回寺庙的。"

劳改营反对我的要求，原因是我是一名重要的工人，依照党的最新经济政策，劳改营应该扩大地毯的生产，由于我是唯独一个在纺织技术方面带徒弟的人，所以必须留下。我的抗议毫无用处，唯一的补偿是，在周末的时候，我可以随意到拉萨去。

就在那个时候，洛桑旺秋来到我们的劳改营。我 1964 年年初在扎奇监狱第一次遇见他，此刻我把他当成一个督导人和朋友。在监狱里大家称他为先生、老师。我还记得以前在扎奇监狱，洛桑先生有次在开会时站起来宣布，他写了一篇祈祷文，祈

请保护神能让西藏免于遭受自然灾害，这是极为勇敢的作法，因为中国人把这种事情看成是“散布反革命谣言”。

按照西藏的标准，先生个子很高，脸庞消瘦细致，上唇有一道细细的胡须，态度很坦然，显示出他有内在的力量和丰富的学识。1960 年他因为头一年的拉萨起义而被逮捕。从 1970 年开始，他也变成所谓的“二劳改”，在劳改营当工人。

我向队长提出要求，要一个助手帮助我来纺织羊毛，他让我在附近的工厂里随意挑选一个人，我就选择了洛桑旺秋先生。我认为纺织的工作对于一个象他这样年老的人比较合适，因为那时候他已经六十四岁了，身体非常瘦弱。

我们 1978 年 8 月开始一起工作，两个人在一间屋子里，我在一个角落纺织而先生在旁边纺线。那时候大部分的犯人对于局势的变化感到非常兴奋，我也问先生的看法。

“这只不过是穿着新鞋走老路。”他说。

过了一段时间我才逐渐明白他的话的意义。事实上共产党有两项基本的原则是不会改变。第一，关于西藏的独立问题，第二，关于宗教自由问题。我们周围的人好像已经很快把以前发生的事情忘记了。其实事情没有真正的改变。我们依旧是犯人，监狱管理和守卫的任何猜测和幻想都直接会影响到我们。现在党只不过宣布新的纪元开始，这并不能成为一个值得欢呼的理由。

先生一边拉出羊毛线供我纺织，一边跟我谈话，我开始从另外一种视角来给自己定位。我个人被关押，只是整个西藏被奴役的一个小小的缩影，成千上万无辜的藏人被投入监狱，受尽折磨

或饿死，我们的国家被占领，人民打入黑牢。我们怎能说已经自由了呢？我现在比以前更痛恨共产党了，这个党一方面说它拯救了贫苦大众，另外一方面又把成千上万的人推向死亡，这是一个草菅人命的党。

1979 年一个寒冷的二月早晨，所有的“二劳改”又被召集起来开会。这一次他们又叫我们别害怕，尽量提出批评。每当党的最高层发生权力斗争时，就要举行这种会议。来自于犯人和普通贫民的批评意见，就被当作证据，拿来打击当权派。

这次会上又是一大堆献媚拍马的人在做冗长的报告，赞美新纪元和共产党。这使我非常愤怒，觉得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把所受的苦难说出来，让中国领导知道。我回来之后，看见先生已经坐在地板上，身边围了成堆要待抽线的羊毛。他看着我说，“才过了几天，他们就已经把过去二十年所承受的罪都忘记了”。

先生建议，应该把我们的想法写成请愿书，借口会上没有机会发言，所以采取这种方式。我立刻同意了，接下来的两天，先生就开始写一篇很长的请愿书，他写写停停，有时也念给我听。对于他学识的丰富和文字的优美我非常敬佩。

他把请愿书写在一个皱皱的小本子上，一开头就引用了达赖喇嘛的“为宇宙真理祈祷”，每一段的起头他都从这篇祝愿文引了四行诗。请愿书的第一部分详细地陈列了西藏人民近年来所遭受到的灾难，第二部分是叙述西藏两千七百年的历史，来证明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藏历新年快来了，所有的管理人员和警卫都忙着要过年了。这是多年来第一次中国人允许大家过藏历新年。我跟先生商量，这是一个交出请愿书的大好时机。他同意了，于是立刻把请愿书送到办公室去。警卫没有时间听他说话，只是叫他把请愿书放在桌子上。先生离开办公室的时候，问警卫说："普通人可不可以读这份东西？"

"可以"，那名守卫头也没有抬地回答道。

他们允许先生在 1979 年的新年到拉萨去看亲戚。天一亮他就起床，带上那十九页的请愿书，动身往拉萨去了，请愿书上的落款是劳改犯人班旦加措和洛桑旺秋。先生把这十九页的请愿书贴在拉萨西藏医学院的墙上，这是从毛泽东死后第一次有人在这里贴大字报。

先生回到宁塘以后跟我说，他刚把大字报贴出来，立刻就有一大堆人围观阅读。其他犯人告诉我，这份请愿书在拉萨引起一阵骚动。过了十天之后，警察才开始来调查我们。开始他们把先生找去了，一个小时之后，一个名叫帕桑的藏人守卫来把我带走。

我们受到调查，但是没有被起诉。先生和我都坚持说我们得到值班长官的许可，我们甚至交了一份请愿书到办公室去。当局要让我们相信，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因此尽可能表示宽松的态度，我们两个人没有受到处罚，他们只是把先生转移到一个新的工作单位，让其他的犯人监视我们两个。从那次以后我们只能秘密见面。

1979 年 9 月有一些党的高级官员来我们工厂视察，并且宣布往后的两个星期，任何人都不准到拉萨去。我们很快得到消息，达赖喇嘛派遣了一个西藏流亡组织的代表团将到拉萨访问。显然当局要防止我们去会见代表团，后来我听说代表团的成员要求见洛桑旺秋先生。

我们不愿意中国人欺骗代表团，让他们以为西藏人民在新政权下很快乐，决定再张贴一些新的大字报，鼓励人民起来为自己的自由而进行斗争。我写了几张大字报，呼吁西藏独立，并要把中国人从雪山之国驱逐出境。我拿给先生看，他很欣赏，说他也要写一些。

先生那天单独在房间里制作大字报，但是他被监狱里一名恶名昭彰的马屁精兼密探容巴看见了。容巴立刻向看守室的长官报告，并且说看见我那天早上跟先生在一起。

一个名叫巴桑的守卫把我从纺织室里抓出来。

“今天早上你为什么去看洛桑旺秋？”他问。

“我去还书”，我回答。

巴桑一边骂我一边把我很粗鲁地推向先生的住处。先生正站在屋子中间，他的双手举过头。

有一些还没有写完的大字报散在地上，旁边是揉成一团的纸，上面是他写标语的草稿。有几个士兵正在搜查他的物件。

“你跟这事有没有关系？”其中一个人问我。

“我正在工作，跟这些事无关。”我回答，一边思考是否已经把写完的大字报藏好了。先生要保护我，他说：“班旦跟这件事没有关系。”

“你们今天早上为什么碰面？”巴桑问道。

“他来还书”，先生说，我的心砰然跳动。

十月一日那天，另外一个叫桑丁的犯人把我写的大字报偷偷带出营地，并且把它们张贴在拉萨，他自己后来成功地逃到泥泊尔了。第二天两个警察和吉普车到达我们的营地，我和先生都被召到办公室主楼去。

“你们两个人中间谁去了拉萨？”有一个年轻的藏人问道。

“大队长可以证明我们没有离开过”，先生用他温和的声音回答。他们没办法把我们跟拉萨出现的大字报联系在一起。

虽然先生被抓了个正着，不过当局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先生被从宁塘转移到西藏医学院去，他们让他在那儿搜集整理在文革中遭受大规模破坏的传统藏医的资料。我提出要转移到哲蚌寺的要求，依然以同样的原因被拒绝了：我在这儿是一个重要的手艺工人。

后来我发觉当局把我们两人放在不同的地方，为了便于监视，他们怀疑我们是一个庞大的名叫达楚幼虎队的地下组织成员。当局希望尽可能多捕获该组织的成员，他们派三名犯人监视我的一举一动。中国人抓紧时间搜集证据，希望来一次大搜捕。

我跟先生有差不多六个月的时间没有任何的接触，我只是专心在宁塘工作。过了这段时间之后，监视我的犯人放松了警惕。

1981 年当局才下手，他们在拉萨逮捕先生并且再度加刑，把他移到嘎扎监狱。这是个坏消息，因为先生是我的少数几个残留下来的精神泉源。他写信给我，鼓励我继续工作，要我永远不要放弃为自由和独立的奋斗。几星期之后我到拉萨去，想设法张贴大字报，把先生被捕入狱的消息公诸于世，并且呼吁当局释放他。

我认为不少藏人有一种安全的误觉，很多从 1960 年就失踪的朋友和亲戚现在返家了，看起来好像没有新的逮捕行动。我想告诉人们逮捕还在继续着，虽然现在公安局聪明多了，他们误导人们，似乎一切都很光明了。我写了几张大字报，在其中一张上面，我记录了劳改营的内部情况，最后一句话是“监狱依然存在”。中国官方拒绝承认劳改营就是监狱，正式文件上，不记录犯人被关押在劳改营的情况。比如说洛桑旺秋先生于 1970 年正式“释放”了，但是后来的十年他还是关在劳改营里面。

其他犯人警告我，说我的行为可能会让他们重新再过苦日子。他们要我放弃，说现在的情况好得多，约束也放松了许多。他们似乎生活在一种自我放逐之中，没有一个人愿意再回想以前那些恐怖的日子。“让过去的过去吧”，接受党的这句格言比较容易。

党要我们忘记饥饿是怎么回事，要我们忘记烂菜汤的味道，忘记手镣脚铐和遭受毒打的滋味，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不会再重演了。1980 年中国共产党的新总书记胡耀邦到拉萨来，公开向拉萨人道歉。警卫们把《西藏日报》发给我们，让我们读胡耀邦答应了要给予西藏更多的自由，特别是要重新恢复宗教自由。

可是我每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仍然在监狱里，宁塘劳改营里还关着二百多个犯人，虽然大家都老早就服完自己的刑期了。我们依然得每天早上拿着篮子出去捡粪便，依然要参加学习班，要无休无止地学习党要开展新纪元的承诺。

1982 年 2 月，我决定要在拉萨再张贴一些大字报，这是一个非常寒冷的早上，我把自己裹在厚厚的藏袍中。我们现在至少被允许重新穿着传统藏人的服装了。我疾步而行，要在太阳升起之前到达城市。我先走到围绕着大昭寺的八角街，在这个西藏最神圣的寺庙中，我非常惊讶地看到那儿有很多人在做他们的晨间祈祷。现在整个藏区的人都被允许到拉萨来朝拜。

城中心有大量的朝圣者，嘴里都喃喃地念着经。如果现在张贴大字报会被太多人看见，我不知道他们会有如何的反应。我走到政府行政大楼，那儿还相当安静，没有人在军委办公室前站岗，我决定把大字报贴在这儿的墙上。

我的大字报鼓励西藏人民觉醒，反抗压迫者。我们生存在虎口之中，被吞下去是迟早的事情。我告诉人们，现在的改革和所谓的宽松政策不过是一种装饰和点缀。只要毛的接班人邓小平的政权在全国稳固了，他也会用手中的权力再度压迫西藏人民。

回到宁塘的时候，厨师刚好分发早点。没有人注意到我已经出去过一趟。我看见大堂那边升起了烟，直接走去拿茶水。两年之后中国人才发觉张贴大字报的是我。

1982 年胡耀邦再度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胡以宽松政策而著名，我记得在《西藏日报》读到一个消息，达赖喇嘛就

他的连任，发去了贺电，这是一个很有鼓舞性的信号。胡答应把驻扎在西藏的中国军队撤除大部份，劳改营里也立刻感受到这个政策的效果。汉人厂长被调回中国去了，他的藏人助手旺秋成为劳改营的领导。

冬天的一个早上，当我正走向大厅去拿茶水的时候，看到很多犯人都挤在一大张通告前面。我也好奇地走去，原来这是中共中央的通告，所有的劳改营都被取消，劳改当局没有权力还继续把我们囚禁在这儿，大家都要求立即释放。大部分的“二劳改”都被释放了，到了年底，营里只留下了十个人。他们还是以同样的原因不放我们：有技能的工人必须在厂里完成重要的任务，一直到 1983 年的春天我才被允许离开劳改营。

我不知道应该回到帕南寺或哲蚌寺，我知道回帕南比较容易取得居住权，但是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心思回到那儿去。去年哥哥的儿子来看我，没想到他那付样子，赤脚、衣衫褴褛。他告诉我，姐姐们跟继母不说话了。文革期间，姐姐们检举了父亲，看着他被中国士兵活活打死，继母不能够原谅她们。

我也知道杀死哥哥的凶手还是一个自由的人，有些人现在甚至变成地方上的高干。嘎东的寺庙已经完全摧毁，我难道真有内心力量去面对这摊废墟。

第十一章

在废墟中

公共汽车把我带到山脚下，我朝着山坡上的哲蚌寺走去。三十年以前，我从帕南长途跋涉到达这里，第一次看到哲蚌寺，它当年的金碧辉煌现在已不复存在。还记得当时从山下仰望着它，白色的高墙，以及闪闪发亮的金色屋顶，所有这些都消失了。我简直不能相信眼前这个哲蚌寺曾经是一个拥有六千名僧侣、充满朝气和生机的一个城市。现在它的墙灰暗而斑剥，光秃秃布满了裂痕，就象一个肢体不全的人体。

我在一块岩石上坐下来，闭上眼睛。当我再度睁开眼睛的时候，发觉自己似乎穿过了时光隧道。有一群康巴人朝着我缓慢地走来，男人们都穿着藏袍，头发编成辫子用红色的丝线绑扎。妇女们戴着很精致的珠宝和大的琥珀项链，蓝色帆布的拖鞋，后面有橡皮的鞋跟，唯独这个马脚泄露出现在是中国人统治的时代了。

这些快乐的朝圣者熙熙攘攘走过我身旁，我也跟随他们走向那个已成为废墟的寺庙。站在门外面，朝里面的院子望去，它被破烂斑剥的墙所围住。朝拜的人不能相信地摇摇头，然后就扑伏到地。

我把双手举过头，然后三次全身匍匐在地，这是十五年来第一次能够不必提心吊胆怕有人监视我。四周这一切败落的景象使

我的双眼充满泪水，我缓缓地在这一片废墟之中漫步，想把这伟大寺庙以前的轮廓再唤回记忆。我去寻找以前住过的僧舍，那儿已经夷为平地了。

我碰见另外一群以前的僧侣，他们也跟我一样在废墟里面寻寻觅觅，想把寺院的全貌在脑子里重新拼凑起来。一个年老的僧侣盯着我问："你原来属于那一个科系？""洛色林"，我很高兴地回答他。他在空中比划了一阵，指出洛色林以前曾经是在这一块地上，我们现在站在它的露天场地上，从前这里是上辩论课的庭院。我们站在那里，谈论彼此相识的朋友和熟人以及曾被监禁的地方。他们问我是不是要回来，我说如果寺院愿意接受我的话，当局允许我回来。

他们把我带到哲蚌寺的民主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去。这个办公室是宗教事务局设立的，西藏所有还残留的寺庙都在这里登记在案。管理人员理应由僧侣选举出来，但是我很快发觉候选人的名单是由党提出来的，人们只能从他们中间作挑选。

寺院后面还有一些建筑物，它们的颜色也变成灰暗，墙壁也已经斑剥了，上面还依稀可以看出中国字写的红色标语。我穿过大门，走上一条铺着厚石的回廊，有一些妇女们在一个角落里洗衣服。

一个戴红头巾的女人指给我看一个红色的门，那是民主管理委员会的办公室。里面一个名叫晋巴林措的还俗僧侣跟我打招呼，他看起来很瘦弱，脸色黝黑，面带病容。事实上晋巴是一个充满精力的人，而且非常干练，他并不是人们说的那样是中国人

的傀儡。相反地，在红卫兵捣毁寺院的行动之中，他极力保护文物。晋巴现在是民主管理委员会的主任，负责哲蚌现在所剩无几的文物，我跟他说我想返回寺院。

“你以前在哪个监狱，”他问道，虽然我没有说我曾经坐过牢，他明白以前所有的僧侣都被中国人监禁了。

我简单把自己在不同监狱的经历跟他说了，并且告诉他我是一个纺织师傅会做地毯。晋巴一听我会织地毯，表情就改变了，他非常欣赏我能纺织。

“你可以教妇女们纺织”他说。

我感到很迷惑，哲蚌寺难道不是一座寺庙了吗？很快我就明白，它现在已经更象一个小村子。所有的僧侣都结婚了，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都强迫娶妻，来表示革命热情和证明自己不是落后的。晋巴自己也结了婚，有两个小孩。

委员会同意我返回，1983 年 5 月我就搬入了哲蚌寺，他们让我任意挑选一个住处，我就选择了一个有两个房间的僧舍，这里景致很美，可以看到整个拉萨的山谷。我的东西很少，只是铺盖卷和两件旧的藏袍。多年来在监狱里我只穿制服，也没有烹饪用具，但是在宁塘的时候买了两只中国式的热水瓶。

由于整个藏区的劳改营都被解散了，所以突然之间有一大批年老的僧侣返回寺院。寺院当局很愿意接收他们，因为院里太需要他们的技能。我被派去修复寺院还残余剩下的几座庙宇里面的壁画。

新的寺院生活有点象一场闹剧，我们都不穿传统袈裟。以前人们都叫哲蚌寺为“戏剧学校”，因为院里的和尚经常更换袈裟，但是我们现在只穿工人的蓝制服，一个月三次被允许进行祈祷。寺院就象一个公社，每个人都攒集工分，同时按照工分进行分配。然而不管这些改变有多么奇怪，能够返回寺院依然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

有一天我正在教授一群年轻僧侣背诵长的经文，有人来告诉我，有一些警察和宗教事务所的干部到了哲蚌寺。几天之前，我听说甘丹寺出了些麻烦，猜想当局只是要提高警觉，因此没有格外留心。

接下来的几天，这些穿着新的蓝白二色制服的干部和警察在寺院里巡逻。我有一点担心，他们要求占据寺院里很大的部分，看上去是要用来当长久性的办公室，警察的吉普车整天都进进出出。

有一天晚上有人敲我的门。我正坐在床上念经，一个年轻的僧侣把头伸进门帘来。

“你睡了吗？”他问。

“进来吧”，我说。

“班旦师傅”这名僧人悄悄说“警察们在探问你，你要当心。”然后他就离开了。

第二天晚上，我正在房间里，听到有更多吉普车开进我们的寺院。寺院内有几百只流浪的野狗，拉萨市政府为了把城市弄得更清洁，以便接待外国旅客，所以把这些狗都赶出来。它们聚集

在寺庙中，这天夜里全都狂吠起来。我正在想狗儿为什么这样兴奋？接着就听到有脚步声朝我的房间走来，我不动声色静静地听。几分钟过去，有人敲我的门。

“门没有上锁”，我说。屋子一片漆黑，“灯在那里？”有人问。我告诉他们灯开关的位置，僧舍前边的屋子的灯亮了，门帘后面出现了一支步枪的枪眼。我坐在床上，不太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接着门帘被拉开，两个年轻的中国警察冲进我的卧房，用枪指着我。

他们身后跟着另外十五个警察都进来了，僧舍的外间站满了人。他们的头儿是一个脸庞大而浮肿的中年军官。他静静地站了一会儿，打量四周。寺院的主管晋巴林措站在他的旁边。通过藏语翻译他粗鲁地问：“你是谁？叫什么名字？”

“班旦加措”，我安静地回答，我想最好坐在床上别动。

这个中国军官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用中文高声地念。他的藏语翻译替他转译：“按照拉萨最高法院法官图丹总珠的命令，我们逮捕你。”没有说是什么罪名。警察叫我站起来的时候，房内所有的人都往后退，让我能够从床上下来。一名警察给我双手上了手铐，这是一种新式用很轻的钢做的手铐，在屋内的灯光下闪闪发亮，我再度尝到冰冷的金属接触皮肤的滋味。

警察开始搜查我的房间，为了不让天花板的泥土掉下来，我买了一块白布钉在天花板上。一个警察把这块布拉下来，上面累积的灰尘立刻象烟雾一样在房间里扩散。警察找到一堆宗教经文，把它们丢到屋子中间去。当我看见有一张纸从书里跌落出来

时，心开始往下沉。我曾用这张纸来为我的大字报打草稿，上面的字迹还很清晰。警察们非常高兴，这是他们拿到的第一个证据。

两个警察开始检察我的热水瓶。我在其中一只热水瓶的玻璃和金属空间中藏了一张西藏国旗和达赖喇嘛写的文章，警察把水倒出来，开始摇热水瓶。一个人扳住热水瓶的底，另外一个人把玻璃那一部分抽出来，旗帜和几张纸掉在地板上，警察们高兴极了。中国军官拍拍我的肩膀用流利的藏语问："班旦加措你承不承认自己的罪状？"他指着地上的证物说。"这些就是你犯的罪，这不是人赃俱获吗？""这是党的天下"，我 1960 年第一次被逮捕的时候，也听到过同样的话，还记得那时候在罗布昆泽寺庙挨打的情形。

我看到晋巴林措全身发抖，他知道当局一定会指责他为什么包庇我，让我住在寺院里。米玛是民主管理委员会的副主任，他也非常紧张，斥责我是"披着羊皮的狼"。

"你用不着打落水狗"，我对他说。

中国人打手势把我带走，在枪口之下我被推下楼梯，走出院子，上了一辆吉普车，我的左右两旁是两个守卫。整个院子里都站满了警察，车子先往拉萨的方向开去，过了一会儿转向直奔旧的色珠[11]地区，这里以前是专门关西藏高级政府人员的监狱，像西藏最后一任总理洛桑塔扎西。

[11] 色珠（Seitru）为音译，是地区和监狱名。

色珠现在改为一个看守所，犯人们无限期地被关在这儿，在此等待法庭的正式判决。有几名警卫在那儿等待我们，我认出其中一个名叫达杰的高个子藏人队长。四个年轻的汉人警卫站在旁边，手中拿着三尺长的电棍。达杰把吉普车门打开，抓住我的肩膀，把我从车子里拖出来。已是将近午夜时分。

穿过几道门，经过一个狭窄的冷飕飕的房间，走到一个四周都是牢房的天井。我被关进第六分队，守卫打开我的手铐，把我推进牢房，又把从我僧舍带过来的棉被丢进来，门在我的身后关闭。

这时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被捕了，站在牢房中间我有一个感觉，这一次我将被关押很长的时间。从党的角度看，我没有被改造，我背离了社会主义的道路。这间牢房很空荡，水泥地上只有一个稻草的垫子，天花板漆成绿色，由于漆得很光亮，甚至可以从里面看到自己的影子。我在外面度过了三个月十八天的自由生活，现在再度入狱。

新的牢房比我以前待过的所有其它牢房都更进步。里面有新鲜油漆的味道，门的对面有一个小小的窗子，窗口上了很粗的铁栅和铁网。新的铁门上面，有个小小的窥孔，门的下方有一个开口，从外面反锁著。

我把被褥打开放在草垫上，试着入睡。不久我又听到吉普车的发动机声响和铁链拖在地上的声音，那天晚上一共有四人被捕。

早上我被安装在门外的电铃声叫醒，没有人来开门。过了一会儿，下面的小洞打开了，有人推进一杯热茶来。又过了几小时，门从外面打开。达杰组长进来，把我带到另外一个房间，有个人给我从正面一张和侧面两张拍了照片。我想起历年来看过成百上千的犯人照片，上面打上了黑叉叉，这是死囚犯临刑前的照片。

次日，我被带到审讯室，一间冷而不舒服的房间，里面同样也充满了油漆的味道。地上的水泥地和墙壁都跟传统的西藏建筑不同，藏式房子里面的黄色泥砖使屋子里充满泥土的气息。

达杰组长靠近我，说了一句“仔细考虑，彻底交待。”

两个中国干部和一个翻译坐在桌子后面。年长的那个做了一个特别的表情，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大概不会打我。要评估一个中国军官的人性比较困难，他们代表权威和压制，而且我们跟他们的接触总是隔了一层，因为有翻译夹在中间。翻译的存在似乎把犯人和审问者之间的情感接触隔开了，犯人只跟翻译而不是跟审问者有直接的关系。

我坐在一张木头椅子上，一个干部通过翻译要我坦白。我不说话，一段长长的沉默。

“你知道为什么被逮捕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被逮捕。”

二十年来的不断审讯经验使我对他们的技俩摸着了窍门，在没有弄清楚对我的控诉原因之前，不主动透露任何信息。他们让我叙述从八岁以来的身世。

“从 1975 年以来我就是宁塘砖瓦厂的劳改犯，这之前我在生叶波。”我开口了，停了一会儿又接着说：“其实用不着重复我的身世，这些故事我从 1960 年起已经重复了很多遍，你们真感兴趣的话就读我的档案吧。”

审讯者没有反应，我以为他们要动手。但是他们让我走，只是警告我应该“仔细考虑”。我不多说是有原因的，我必须知道他们已摸了多少底。比如说，知不知道我在宁塘写过暴露西藏人生活状况的大字报，那是桑丁帮我偷带出营地，然后转给达赖喇嘛的，我们当时都在大字报上签了字。我必须知道这次逮捕跟这一篇报告有没有关系。

审讯持续了好多天，我始终拒绝坦白。中国军官一直没有发脾气，也没有打我。有一天早上，我以为又要接受审讯，结果说是有亲戚来探访。

“你跟洛桑和多玛有关系吗？”达杰问，我点头。

达杰把我带到另外一个房间，哥哥的儿子洛桑和他妹妹多玛正在等着。洛桑于 1981 年曾到宁塘来看过我。现在他穿着很好的衣服，脸上油光光的。他们面前的桌子上有一只热水瓶，一个篮子里面放了饼干和一块藏式奶酪。多玛倒了一杯茶递给我。

洛桑说他们现在住在拉萨，他当裁缝，生活很好。我的继母也跟他们住在一起，不过她现在病得很厉害。洛桑告诉我警察也去查过他们。

“长官说如果你老实交待的话，他们会释放你。”他说，我没有出声。

“班旦，请你坦白吧，为了我们的缘故，”洛桑说。接着他和多玛开始哭起来，我叫他们别担心，请他们好好照顾继母。达杰来把我带回牢房。

我又被带到审讯室去，洛桑和多玛眼中的泪水在我脑中挥之不去，我告诉审讯员，现在愿意交待了。年轻的中国军官给我从热水瓶里倒了一杯茶并且请我吃饼干。我开始叙述我从八岁以来的身世，他们没有打断我。

当我讲完故事之后，年纪大的审讯员凑过脸来问“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被抓进监狱里来？”

“你们在我哲蚌寺的房间发现了证据，所以逮捕我，不是吗？”我问。在没有弄清楚他们知道多少内情之前，我不愿意吐出更多的话来。

“那你承认自己的罪行啦？”年长的干部说。

我松了一口气，他知道大字报的事，但是显然不知道桑丁帮我偷偷带出去给达赖喇嘛的那一篇报告。我承认张贴了大字报，但是接着就引来其它的问题：谁给了我笔、纸和浆糊等等。他们要知道我是单独行动还是有同谋，我一再重复这是我一个人做的事情。

当局不满意我的回答。第二天他们要求我把一年来接触的所有人的名字都写在纸上。我怎么能避免牵连朋友呢？我决定不向他们提供名单，只向他们交待出我的“同谋”。我说藏在热水瓶里面的国旗和那几张纸是一个名叫洛桑格列的老僧侣给我的，我知道他在我被逮捕的那一天夜里去世了。

“谁是洛桑格列？”审讯者问。

“他在宁塘”，我回答。他们把他的名字和一些细节记下来，似乎对我的招供感到满意。我已经连续被审讯了十一天了。

我的计谋成功了。几天之后一个中国干部告诉我，他们已经抓了洛桑格列，他作了彻底的交待。我听了以后只是暗笑，知道中国人不愿意丢面子。不过依然觉得很困惑，为什么这一次没有遭到毒打？难道这些审讯者发了善心？事后我才知道，那天晚上我跟其他几个在哲蚌寺被逮捕的人被判了死刑，我的亲戚们已经在拉萨的大昭寺替我点了油灯。听说新德里的藏人在中国使馆门口进行示威游行，要求将我释放，这是把我从死亡之神手中救出来的原因。

到了 1984 年年初审讯告一段落，四个穿着深蓝制服的高级司法官员宣读了我一系列罪状的控诉状，并且问我内容是否正确，我点头，接着把指印盖在文件上。以前犯人们仅仅得到一张纸，上面写着判刑结果。文革时藏人经常连审讯的记录都没有，就被投进监狱。现在是“新纪元”时代，当局建立起所谓的司法制度。

一天早晨，我被一辆吉普车载到拉萨的法庭。已经坐了二十多年的牢，这却是生平第一次经历法庭审判，不知道等待我的将是什么。法官是一个胖胖的名叫多杰的藏人，他简略介绍庭上的其他几个官员。一个名叫普布的老人被带上来，这是我的辩护人。法官问我有没有什么话要说，我看看普布，想他也许会做一些什么建议，可是他只是一动不动地面对法官坐在那儿。

“有要说的话吗？”多杰重复问道。

“我不认识我的辩护人，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任何人拿出证据来证明我有罪，”我回答。法官不理会我，下令审判立刻开始。一个年轻的西藏人站起来读诉状，提到在我房间找到的物证，并且说我承认了张贴过大字报。法官又给我一次机会发言，我开始陈述：中国人一直宣称西藏十分进步，这都是假的，藏人并没有象中国人宣布的那样从农奴制度中被解放出来。我接着叙述宁塘村民的生活情况和那边严重缺粮的现象。

法官让我把话说完，然后带着不同意的笑容说：“瞎子只能看见黑暗，反动分子也只能看见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阴暗面。”

1984 年 4 月 29 日我被再度判刑八年。我已经五十一岁了，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中国人在我的国家里所设的监狱中度过。

新家在俄日尺度监狱[12]。发了一套夏天和冬天的制服，要管三年穿。我被分派到主要是老年人组成的大队，指定从事比较轻微的劳动，象照管菜园或在厨房里帮忙。会议已经不象以前那样严历，也不需要假装吹捧党和它的领导人。但是犯人仍然需要定时学习，每次都要讨论《西藏日报》上的文章。

那一年九月，我经历了一次很奇怪的会见。我被叫到主楼的一个房间去，坐在一张铺了很讲究的桌布的桌子前面，上面有一只热水瓶，两只很昂贵的杯子、一盘饼干。墙上挂历的照片是中

[12] 俄日尺度（Orithridu)为音译。

国现代化的建筑。稍后，一个年轻的中国人进来，他打着领带，携带了一个很讲究的皮包。他的翻译替我们倒茶，招待我们用点心。

“他们怎么样对待你？”他说他是从北京来的，需要知道监狱的管理人对我好不好，我需不需要进行医疗检查，他的态度看起来十分真诚。

当时我对这种待遇感到非常惊奇，但是后来才知道我当时被意大利的一个国际大赦组织指认为良心犯，所以这次的访客跟那个组织向中国政府和拉萨当局写信，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不久之后，警卫们又恢复了惯常的残暴。有一天，我对厨子达瓦抱怨，供应的茶常常都是凉的。过了一会儿，达瓦带着一个名叫强巴的守卫走到我房间。犯人都叫强巴“爷爷”，因为他的白胡子。强巴问，谁抱怨了，我说是我。他说要测试茶是否真是凉的，说完之后，就把整整一热水瓶里的水倒在我赤裸的右手臂上。

其他犯人看到强巴挥舞着电棍走向我，都急忙躲开了。开水把我烫得疼痛难当，接着他接着用电棒不断刺我的肩膀和胸部。厨子站在一旁观看，非常欣赏这场权力的示范表演。强巴瞪着其他犯人，好像在说“下一个轮到谁？”

我痛苦得大声喊叫，其他的监狱干部跑来看发生了什么事，我大声喊道：“党在杀害一个犯人。”一个上级干部把大家赶走，然后责备强巴和厨子。我被送到医疗室去，一个年轻的护士替我处理烫伤。

共产党现在改变了策略，以前举行坦白和批判大会是为了要把我们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如今党注意到这些政治犯不会因为党让他们改造，他们就能被改造。我们这些人被打上“改造不了”的标签，同时得到相应的对待。唯一能让政治犯让步的方法是把我们孤立起来，同时让我们尽可能多受痛苦。

在俄日尺度打人是家常便饭。警卫们都象要赴战场一样全副武装，他们随身带有手枪和两把别 在腰带上的刀，还常有两种不同的电棍：一尺长的短电棍上面有闪亮的塑料把手；另外一种是长电棍，伸长了象一把剑一样。警卫也穿盔甲，有时候他们这样全副武装连走路都有困难。警卫们经常毫不犹豫地用手中的新式武器来对付我们这些改造不了的犯人。

第十二章

新生代的分离主义者

1987 年 9 月 28 日《西藏日报》报道了一场拉萨的示威游行。哲蚌寺的二十一名僧侣要求西藏的独立和自由。我非常惊讶，第一次看到官方报纸对这种事情进行报道。平常这份报纸总是局限于报导能荣耀党的消息，现在却把这条新闻放在第四版，通常这是报导国际新闻的版面。记者把这场示威游行斥责为“一小撮分裂分子”的行为。“分裂主义份子”是一个新的名词，用来称呼西藏的爱国主义者，中国人把西藏人争取自由的想法统统视为要分裂祖国。

多么令人激动的消息！自 1959 年以来，这是首次出现的一场严肃而公开的示威抗议。

报纸上把二十一名僧侣的姓名和年龄都登了出来，令人惊讶的是他们都这么年轻，我第一次被捕的时候，这些人都还没有出生呢。他们是共产党人所谓“吃党的奶水长大”的一代，然而他们现在呼喊口号，要求西藏独立。

对于一个政治犯来说，没有任何事情比当你知道外面还有人跟你有同样的信仰和理念更能受到鼓励了。我知道奋斗将通过这些年轻抗议者的声音承传下去。

监狱当局立刻召集大会，要求犯人谴责示威行动，命我们读《西藏日报》上的冗长文章，文章批判了误入歧途的抗议青年们。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们听说当局开始在拉萨进行大肆逮捕。外面来打听消息，说有些人已经失踪，要知道这些人是不是已关进监狱了。我们有一个联络网，让外面的人知道谁在监狱里，同时在狱里的人也能得知外面所发生的事情。

1987 年 9 月的示威游行启发了拉萨其它的一些街头运动，甘丹寺是西藏第二大寺院，曾经拥有五千名僧侣，现在这个寺庙的僧侣们开始发动示威游行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甘丹寺遭受特别猛烈的攻击。我从宁塘被释放之后，经过这里，看到寺庙被夷为平地，没有一个建筑物保存下来。

越来越多的和尚和尼姑参加抗议，拉萨的青年人也组织起来，参加了抗议行动。这种情形导致监狱里的政治犯（我们监狱只有五个政治犯，其余都是刑事犯）受到更为严密的监视。狱方经常问我们外面的事情，只要西藏有任何的骚动，我们就会被召集起来开特别会议，命我们对外面的事情表态。我只简单回答，“我只是一个犯人，跟外面的示威游行没有任何关联”。

那一年冬天，我获悉七十五岁的洛桑旺秋先生死了，他成年以后大半生都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度过。有关方面说他是老迈而死，可是我确信他是被谋杀的。当局对他特别残忍，即便七十五岁的年纪，他依然带着手镣和脚铐从事繁重的劳动。有一天下工之后，他以懒惰怠工的借口，被铁链铐在一根铁柱上，一个名叫

巴角的警卫把他打得昏迷过去，我也曾经在这个人手中吃过大苦头。洛桑一定是受到严重的内伤，后来被送医院去，已经太迟了。他们故意把他释放回家，说让亲戚来照顾他，但是第二天他就死了，当局把他死亡的责任推脱得干干净净。洛桑是我认识的人中间最高贵的一个。

接下来的两年，示威行动越来越多，每次成功的抗议活动又酝酿了下一次更大的起义。我记得那是 1989 年 3 月的一天，我正在监狱的苹果园里工作。年纪比较大的犯人通常都派在果园里劳动，果园的收成已经成为监狱相当大的一笔收入来源。塑料包着的温室内温度很高，而且十分潮湿，这里面苹果树生长得很快。我正忙著照料这些树，突然之间听到从大门的方向传来响亮的歌唱声。我走出去，看到一长排的犯人正返回监狱，觉得非常奇怪，现在还是中午，为什么提前返回监狱呢？他们看起来十分快乐，唱歌的神态也毫无忧愁的痕迹。我返回温室，突然两个警卫走进来命我们返回住处。途中我注意到有武装警卫站在屋顶和哨岗上，我问同屋的人发生了什么事。

“拉萨出事了”，一个人回答。

我知道这意味着将有另外一场抗议活动。大家都躺在床上等待进一步的消息。

第二天早上有很不寻常的大批警卫来到我们院子，在一边靠墙的地方机关枪架起来了，旁边还有一排排的子弹带。我意识到拉萨发生的事必然十分严重。

早点名过后，那天不需要出工。警卫给我们拿来一些扑克牌和象棋等游戏，大家三三两两在院子里找空地坐下来，几乎有一种节庆的气氛。当局显然非常害怕这里也会爆发出抗议的行动。

那天下午，我看到一个在医务室工作的年轻护士，她平常对我十分友善。当她穿过场地时我叫住她，请她查看一下我的肩膀。我脱下外套，露出肩膀请她检查，一边悄声问“拉萨发生了什么事？”她假装检查我的肩膀回答道，“八角街那边有骚动，警察没办法控制局势”，她说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了三天了。

黑烟从拉萨的方向升起，狱方突然宣布包括我所在的四个分队，要转移到其它的监狱去，我们得立刻打点行李准备调动，一个小时之内就动身。好在我对这种突然袭击式的转移早已习惯了，监狱生活的规律之一就是任何事情都可能在毫无警告之下发生。

警卫把我们匆匆赶出监房，大家背着行李包，爬上一排刚刚驶进院子的有帆布顶篷的卡车，引擎已经在低吼了。大家爬上卡车，一片拥挤纷乱，不知道会被送到什么地方去。

突然，就象刚才离开那样匆忙，卡车在大门口停下来，我们被赶下车，又被命返回牢房，不折不扣是一场大混乱。整天这样被赶来赶去，我四肢酸痛，急忙爬上床，把自己裹在旧的毛毯里，脑子里盘桓着今天所发生的一切，迫切想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第二天，为了要把我们跟外界隔绝，连步行去劳动也取消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狱方不要我们闲著，因此提供娱乐节

目，撑起一个很大的银幕，放映香港的流行影片给犯人看。大部分人都聚集在那儿看电影，我却从来就不喜欢这类东西。

那天晚上有卡车车队到达院子的声音，我透过窗户往外看，探照灯照明了场地，几辆大卡车停在第一和第二分队的房子前面。从卡车的车身下面我看到很多新来犯人的脚，正慢慢地走进建筑物。不难想象，这是那批在拉萨抗议的人。

新来的犯人大声抗议。卡车也把一些人运到妇女分队去，女人们也大声喊著抗议口号。我们都挤在窗户前，心中十分佩服。接着这些抗议声变成恐怖的哀嚎，大约是警卫冲进住房开始抠打犯人了，整个监狱充满了哀嚎和玻璃破碎的声音。第二天早上我去厕所的时候，看见院子里到处都是玻璃碎片和打烂的窗户，新来的犯人大概跟警卫展开了搏斗。

第二天我们被囚禁在监房内不准外出。从窗户望出去，看到警卫们在院子里摆上桌子，审讯干部拿着笔和本子走过来，坐在桌前。一些按西藏人的说法，小得还鼻涕未干的年幼男孩，从屋里走出来，排队站在桌子前面。年轻的姑娘们从另外一边妇女牢房出来，她们的头发用彩色丝带绑在脑后，看起来象洋娃娃一样。有一个小女孩两只手插在口袋里，好像她要到糖果店买糖果。他们都无所惧畏，没有一点焦虑的表情。

看到西藏人有一种新的抵抗精神，使我感到极度的欣慰。这些年轻的抗议者是活生生的证明，虽然经过文革的摧残和三十年的洗脑，西藏的青年们都没有被蒙蔽而跟随共产党。相反地，一种民族精神比以前更为蓬勃地兴起了。

后来我问这些年轻犯人在学校里有没有学习中文，一个男孩子带着不屑的表情看着我，讽刺地说，谁愿意去学压迫者的语言。很多年轻的和尚尼姑说，他们宁可进寺院，而不愿意上普通的学校，因为他们不愿意学任何中国人要教育他们的东西。

共产党把青年人的抗议看成是拒绝党的行为，他们相信年轻藏人之所以抗议，仅仅是因为不知道西藏以前被封建地主统治下的苦日子，所以党组织了一些学习班，来教导这些年轻叛逆者学习西藏的历史。然而一切都不能按照他们的计划进行，当党干部对年青人说他们应该心存感激能生活在现在的“黄金年代”，青年人就说，他们的父母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死、饿死。当局无法反驳，只好说这都是四人帮的错。

看到这些年轻的男女孩子，心中感慨万千。回想起自己早年进监狱的情况，现在新来的犯人跟我们当年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他们没有杯子、盘子、汤匙，也没有棉被。老犯人就把多余的杯子和毛毯拿给他们。

年轻的抗议者在人们心中唤醒了某些东西，监狱里现在产生一种互相友爱和同仇敌忾的气氛，连普通刑事犯都被年轻人的勇气所打动，开始帮助他们，教他们如何应付审问。这些青年都还不满二十岁，当中国人第一次入侵西藏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出生，是所谓在红旗下长大的一代，但是他们否定了共产主义，要求西藏的自由。

大家尽可能地帮助这些政治意识觉醒的青少年男女，他们对监狱里其他刑事少年犯发挥了良性的影响。有一个名叫边巴的少

年犯见到他们的勇气，很受感动，就来找我，说他愿意为西藏的独立贡献力量。边巴才十六岁，脸孔消瘦苍白。开始我有一点担心，怕当局利用他来刺探我，这是经常所使用的手段，让普通犯人监视政治犯，所以跟刑事犯在一起时大家十分警惕。但是边巴很可爱，每天下工以后，他都坐在我的监房外面等候。他是个文盲，我告诉他第一件应该做的事就是学习读和写。我开始教他识字，不过我非常小心，不谈论任何政治问题，预防以后被抓辫子，在监狱里你总是得万分小心。

有一天警卫在厕所的墙上发现有人涂了“西藏独立”几个大字。他们把这些字照了相，并宣布这是一桩非常严重的反革命罪行。上面对这批新犯人的胆量十分警觉，认为这次事件是危机的前兆，决心找出抗议源头，核对每个人的笔迹，要找出写标语的人。犯人一个个被盘问，在标语出现的当天，看见有谁去过厕所 。

有人报告，看到边巴从厕所走出来，他手上带有黑炭的印迹。边巴立刻被逮捕了，铐上手镣脚铐，被单独关禁闭。“关禁闭”是把人放在极为狭小的空间里，把手伸向两侧就可以碰到空间的尽头，里面极为寒冷，既没有棉被也没有毯子，当然也没有窗户，完全的黑暗。当我看到这个少年被带走的时候，非常害怕他会被判处死刑。

整个西藏现在进入戒严时期，任何出格的行为都会受到最为严厉的惩罚。中国当局对示威游行如此如临大敌，表示国际上对

西藏的声援越来越强烈，这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最近一次全藏、特别是拉萨的汹涌抗议活动，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局势对于边巴这样的嫌疑犯是非常不利的，他是一个普通少年犯，以前对政治从来没有兴趣，当局立刻得出结论，他是被人收买或受到其他政治犯的影响。他们知道他曾经多次来我的监舍，我也借给他一些书籍，我立刻被怀疑上了。后来我知道边巴被毒打，并且刑求了很多天，但他始终拒绝指控我，坚持是个人的行为，我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他。

自边巴被抓出来之后，监狱的形势更为紧张。俄日尺度监狱的主管有天把我召去，这一点都不令我感到惊讶。对于拉萨最近的示威活动，我从来没有隐满过我的兴奋，而且公开对新到的政治犯表示祝贺，当局认为我发挥着极坏的影响，这是毫不足怪的。我被带领到大院一边的办公主楼去。

“你得离开”，一个干部说。

“去哪儿？”我问。

“到上边去”，干部说。

当西藏人不愿指出确切的地方时，他们就说到上面或下面去。

“今天早上没通知你吗？”干部的上级问道。

“没有”。

“你将被转到扎奇”。

重新返回扎奇西藏第一监狱，1964 到 1975 年之间那儿曾是我的家。于是我又卷起铺盖卷，行李打成一个包袱，然后爬上一

辆等待中的吉普车。司机是一个藏族妇女，她曾经要求我教她女儿认字。

“发生什么事了？”她看左右没人就悄悄问我，但是很快有一个士兵和高级的藏族官员上了车，那个官员手臂下夹着一本厚厚的档案，那是我的个人档案，包括 1960 年以来的一切资料。吉普车开离监狱，扬起了一阵尘土。

一路无话，到达扎奇。他们仔细检察我随身带来的行李，然后把我送进第七号监狱，房间里面我十分熟悉：空白的墙壁，每个犯人的东西整齐地放在床上，没有单独的床，只在高出地面的一个平台上，每个人有一块自己的空间。我进去的时候，同屋还在出工，只有一个年老的犯人坐在床上。

他站起来自我介绍是益西。他从暖水瓶里为我倒了一杯茶，我们交谈起来。益西是拉萨南部山南地区的一个僧侣，有肺病。他说这间宿舍一共七个人住。

门打开了，一个藏人守卫把我叫出去，带到审讯室，我一眼就认出一个名叫巴角的审讯员。我认为对于我的朋友兼老师洛桑旺秋的死亡，他要负主要责任。以前我们都叫巴角“快手”，因为他动不动就举手殴打犯人。他个子高大，不停地抽烟，手指被熏得黄黄的，眼睛总是泪汪汪。他坐在桌子后面，两个刚才搜查我行李的警卫站在门边。

巴角正在翻阅我的档案，我一进门，他就放下手中的档案，站起来走向我吼道：“无赖！”接着吐出一长串咒骂。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这间审讯室让我想起一个愤怒之神的神

坛。墙上挂着一排电棍，钩子上的各种手铐闪闪发光。巴角从墙上取下一只长的电棒绕著我转圈子，棒子在空中舞著。

“你已经在监狱里三进三出，但是依然拒绝改造”，他说。他又开始盘问我过去的犯罪历史，虽然我以前的事他在档案里都读过。

“你多大？”他问道。

“六十”。

“不对！你五十九岁！”巴角显然在向我挑衅。

“我是猴年出生的，所以是六十岁。”

巴角又走到那排电棍前，这次他挑选了一只一米长的电棍，将它放在一个电源底座上充电，电棍冒出火花，发出一阵声响。

“你为什么又进来了？”巴角继续问。

“因为我在拉萨贴出大字报，呼吁西藏独立。”

“你还要独立吗？”他挑衅地问。

没等我回答，他把电棍从底座拿起来，用这新的玩具刺向我。我整个身体在电流之下痉挛，他一边骂着脏话，一边把电棒刺进我的嘴里，拿出来再一次插进去。他再度走向墙，选了一支更长的电棍，我感到整个身体被撕裂了。我还迷糊地记得，一名警卫把他的手指伸进我的嘴里，把我的舌头拉出来，避免我窒息，我也依稀记得一名警卫怕得逃离了房间。

这些事情好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一样，记得当时全身颤抖，电流掌控我全身，令我剧烈地颤抖。我失去知觉，醒过来时，发觉自己躺在呕吐物和小便之中。记不得躺在那儿有多久，我的嘴肿

胀起来，下巴不能移动，嘴里有巨痛，吐出一些东西来，那是我的三颗牙齿。那次之后的几个星期，我都不能够吃硬的食物，我全部的牙齿在这次受刑中都脱落了。我被带回宿舍，益西等在那儿。“谁干的？”他问。“巴角”我喃喃地说，益西扶我躺下来。

过去几年，我的生活相对来说改善了很多，会不再开了，批判大会也取消了，整个说来监狱的管理宽松得多。巴角的残忍行动是一种恐吓，让人又回忆起文化大革命年代的梦魇。我怀疑他对我用刑是得到上级的授意，要好好教训我一次，藏人反抗中国人统治的高涨情绪令我兴奋不已，这使他们十分愤怒。

一阵铁链在地上拖拽的晌声加上人的话声，犯人现在下工返回宿舍了。有一个二十多岁，身体强壮，名叫洛桑丹增的人，直直走到我面前问，“师傅，他们对你用了重刑吗？”我无法回答，仅仅拿手遮住了面孔。

洛桑参加了 1988 年 3 月 5 日在拉萨发动的示威游行，那次事件中有一个年轻的警察从窗口摔下死去，中国当局控诉洛桑谋杀了这名警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跟这宗死亡案件有任何关联，抗议的人冲进拉萨市中心大昭寺旁边的一座建筑物，警察追赶众人，在混乱之中，有一个警察不幸从窗口摔下来，洛桑被逮捕了，被判死刑，缓刑二年执行。当我 1990 年 10 月到达扎奇的时候，这两年快到期了，但是他一点都没有惧怕的样子，相反地，他十分生龙活虎。

扎奇有一个专门关政治犯的分队，我被关在跟我有共同信念的人同一间牢房。同房间的七个人不是参加了示威游行，就是写过主张独立的大字报。虽然巴角对我的用刑使我痛苦万分，但是在这间牢房里我感到十分安慰。我几乎无法张嘴，分队的厨子以前是一个僧侣，他送来一些溶化了的牦牛油给我喝，西藏人认为这种牛油有神奇的效果。牛油使我全身温暖，让我的肠胃舒畅。

他们不允许我看大夫，第二天早上就把我派到厨房去工作。这是比较轻松的活儿。我们坐在一大堆蔬菜前面，把烂掉的叶子和菜根摘除，然后丢进大锅去。其他的犯人问我，谁对我下了毒手，我说是巴角，听到这个名字大家都摇摇头。

扎奇的政治犯都在第五分队，同时被安插在八个组，也就是八个宿舍中。我在第七组，跟同监房的人相处融洽。年纪最大的是一个名叫霍·拉康（意老喇嘛）的七十五岁僧侣，另外还有个叫索南多杰，大约十八岁的男孩子。索南很有天赋，爱替犯人画肖像。另外一个年轻的犯人名叫达瓦，他在村子里贴了大字报，指责中国在西藏的统治是殖民主义。洛桑格桑是哲蚌寺的年轻僧侣，是 1987 年 9 月 27 日第一次的示威游行中的一名领袖。另外还有玉洛·达瓦次仁、洛桑丹增和我一共是七个人。跟这样一些勇敢而善良的人在一起，我感到非常欣慰。在分队里有一种进取和积极的气氛，这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以前犯人们生活在不断的恐惧之中，害怕被同伴检举，可是新一代的政治犯不轻易被暴力的威胁吓住，人们准备抵挡反弹回去。

我们这间牢房是整个分队的主轴。有个犯人偷偷弄进来一只小收音机，每天晚上洛桑多杰会听 BBC 的中文广播，另外一个叫阿旺洛桑的犯人懂一些英文，他把耳朵靠上收音机去收听世界新闻。这样我们经常能够听到达赖喇嘛在国外旅行的消息。

我们把监狱的情况写成报告，同时收集犯人的名字，找一个方法把这些消息透露出去。由于外界往往不知道谁被逮捕了，所以必须让拉萨人知道，以便通知犯人的家属。后来这些名单被带到西藏之外，交递给人权组织。到西藏来的外国旅客常常感到很惊讶，有时陌生人会把一团纸塞进他们的手中，上面写着，请把这张纸条传递给联合国或外国的政府。

我在扎奇认识了温和谨慎的玉洛·达瓦次仁，他也是一个极好的听众。玉洛是甘丹寺一个很有名的转世喇嘛，1960 年至 1979 年他被关在监狱里，1987 年又重新被捕入狱。我在中国的电视节目中听过玉洛的案子，他现在亲口告诉我，他一生那些令人惊讶的故事。他说有次到朋友家去吃饭，在那儿见到一个多年以前就认识的僧侣，此人于 1959 年西藏起义之后逃跑，后来定居意大利。这人带着一个意大利朋友返回西藏，玉洛那天晚上跟他们一起共进晚餐。进餐时玉洛说，西藏的问题只有当西藏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时，才能解决。

他们的谈话不知怎么传到中国安全局的耳朵里，玉洛和东道主图丹次仁立刻被逮捕，被控以“散布反革命宣传”的罪名。一场寻常的谈话升级为“国际阴谋”！按照国安局的说法，他们的聚会是为了赢得“外国援助”。

玉洛被逮捕之后，甘丹寺的僧侣在拉萨举行示威要求释放他。这次的抗议导致了拉萨有史以来最大一次示威游行，中国人宣布西藏实行戒严。

七分队每个犯人都有受尽磨难和痛苦的故事，但是我们斗志高昂。中国人继续大批逮捕，扎奇不久就有几百个政治犯，大部分都是年轻的僧侣。中国人称呼这些犯人为“达赖喇嘛的走狗”，似乎是贬义标签，但是这种称呼让我们感到骄傲，对我们而言，达赖喇嘛始终是自由的象征。

我们没有被毒打吓退，继续在监狱里组织抗议活动。我们告诉年轻犯人，不要在警卫面前流露出恐惧，因为恐惧能赋予警卫更多权力。三十年的牢狱生涯使我认识到，永远不能请求他们发慈悲心，因为你永远不会得到。

1990 年冬天，当局和政治犯之间的对峙发展成为正面冲突。记得那个冬天特别寒冷，非常幸运，我没派上露天劳动的活儿，而是派在潮湿而狭窄的温室里工作，给树苗和各种植物喷洒农药，封闭的园顶空间布满了一种呛人的气味。

12 月 15 日发生在一名青年政治犯拉巴次仁身上的事激怒了犯人，我们于是组织了扎奇监狱的首次抗议活动。拉巴是拉萨第一中学的学生，由于在学校成立了一个叫“雪狮”的主张独立的组织，就被判刑三年。这孩子在监狱里很受大家喜爱，洛桑把他当成自己的弟弟看待。

拉巴被逮捕后，关进嘎扎看守所，在那儿受到残酷的刑求。到了扎奇之后，又被一名叫白玛仁曾的警卫毒打，白玛的名字就

是残暴的代号。大家看出这类毒打所造成的严重内伤，拉巴几乎不能行走，他的整个身体象老人那样弯曲着。他一再说胃部非常疼痛，我们给他一些藏药，洛桑建议他去医疗室看病。

每次去看病，拉巴都被医生赶回来，说他装病。有一天夜里隔壁宿舍传来呻吟声，大家都开始喊叫，“拉巴！拉巴！”喊声越来越大，但是警卫那边毫无动静。其他宿舍的犯人也开始参加呼救，不久整个宿舍都淹没在一片“有人要死了！”的喊声中。

有人大声喊：“来人了！”呼喊声立即终止，我听出是队长的声音，他大声责骂我们。

“病人在哪里？”他问。

“第八号宿舍”，犯人们大声喊道。

那天夜里拉巴被送到医疗室去，队长威胁我们，第二天要处理这件事情。果然第二天狱方让第五分队参加一个大会。才走到院子里，武装警卫就把我们包围在中间，另外一组警卫手里拿着长的电棍逼近，队长要我们交待昨天发生事情的原由。

我们没有理会他，因为在监狱场地的另一个角落，一辆三轮救护车开进大门，拉巴被送到医院去。那天晚上我们得知他被送到拉萨警察医院，但是当天晚上又被送回监狱，医生说查不出严重的内伤。晚上他的情况恶化，再一次被三轮救护车拉走，拉巴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死去。

第二天早餐之后，我才听到这个消息，一个在医务室工作的犯人走进我们的宿舍，把消息告诉了洛桑丹增。洛桑僵立在那

儿，眼泪从他的面颊流下来。我们大家面面相觑，不知该作什么。

拉巴死亡的消息在政治犯中间很快传开。真是不可思议，我们没有张扬什么计划，但是在中国和西藏之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在扎奇发生了。回想起来，简直不知道我们怎么敢去做那样的事情。

洛桑丹增把他床垫上铺着的一张白床单撕成两半，在一边他用很美的西藏文字写着“我们哀悼拉巴次仁的逝世”，在另外一边他写下“我们要求改善政治犯的生活条件。”然后我们象举旗帜一样将这两条床单举在身前，慢慢从屋内走到院子中去。

第七组犯人发动一场示威游行的消息象野火一样传遍整个监狱。我们当时一共有十个人在监房，大家一心一意去做这件事，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挡我们。洛桑丹增和白玛拿着第一面旗帜走在前面，格桑次仁和嘎丹加塔拿着第二面旗帜跟在他们后面。当我们走出院子的时候，激动地发觉分队其他小组的犯人也排成四行站在我们后面。我的监狱生涯中，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抗议活动，大家都沉醉于自己的大胆和勇气之中。

分队大约有一百五十名犯人，全部加入了抗议的队伍，唯一的例外是一名几个星期内即将被释放的犯人。我们象士兵一样列队整齐，旁人一定会以为这是事先演练过的。队伍向行政大楼走去，其实这离宿舍不到一百米，短短的距离走起来好像有几里路那么远，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

通常在早餐之后和出工之前，中间有九十分钟时间留给大家做个人的事，所以我们作的准备工作没有引起注意，队伍穿过院子时也没有警卫看到。直到我们走到行政大楼前面，才有一个站在楼前的中国青年士兵发现，他立时满脸通红，显然非常害怕。队伍在他面前几步之遥处停下来。

“拉巴次仁真的死了吗？”洛桑丹增用中文问他。

我不懂他们之间的中文对话，但我相信那个守卫的回答是肯定的。他匆忙奔进办公大楼，门砰的一声在他身后关上，一时还没有其他士兵出现。我们站在寒冷的空气中，十二月中旬的气温很低，但是我一点都感觉不到寒意，内心的激动使得周身暖和。突然有一个小门被推开了，警卫们冲出来迅速把我们围在中间，有人拿着武器，有人手持长电棍。在远处的一堵墙上，机关枪已经架起了。

靠近我的一名犯人叫巴卓，是个被判刑三年的年轻僧侣，他因为 1988 年三月那次抗议活动中死去的警察而被判刑。在审讯中他们对巴卓残酷用刑，所以他的神经非常脆弱，还没有恢复过来。突然之间，他往前冲，并且大声叫喊，同时对守卫以很粗暴的手势比划着。这是非常危险的，对方会认为这是挑衅。有一些年纪大的犯人把他夹在队伍中间使他平静下来。

这时，穿着蓝色毛大衣的扎奇监狱长缓缓走向我们，他旁边是医务所的那位中国医生，另外还有监狱主任，一个地位很高的藏人科长。他们在警卫和其他干部的簇拥下，面对我们。

“你们干什么？”监狱长大声叫道。

洛桑丹增用中文向他说了一些话。

“昨天夜里有一个犯人死了”，科长说，“他叫什么名字”

大家同时开始大声喊着：“拉巴！拉巴！”

“谁是你们的领导？”科长问。大家喊道，“我们没有领导”。

藏人科长镇定地走向前排的抗议者，叫我们把心理的委屈都说出来。洛桑丹增把拉巴的详细情况都讲出来，特别是他曾经被一名叫白玛仁曾的凶恶守卫毒打的情况。洛桑要求当局调查拉巴的案子，要求惩罚所有对他的死亡有牵连的守卫和医务人员。另外一个抗议者要求开一个追悼会，允许犯人的代表参加。站在前排的犯人开始发言，说出他们心中的冤屈。很多人指出自己也曾经被白玛仁增殴打过，这个名字一再重复地被提出来。

很快轮到我了，我说话的时候，有一个守卫悄悄跟给科长耳语。我们这些年纪大的犯人总被视为带头惹事的人，而被分别对待。我说拉巴的事，不该虚伪地说这孩子是自然死亡，他的死是因为受到殴打受伤和医生们的失职。科长有一点疑惑的表情，那个医生也尴尬不安。我说我也曾经被巴角虐待过，他的名字又被其他犯人提出来。

科长是精明的人，知道要舒解目前紧张的情况，最好的办法是让每个人都发言。犯人们慢慢地平静下来，原来内心的愤怒逐渐舒缓，因为第一次能够自由地被允许发言。科长答应会彻底调查拉巴的案子，所有失职的人都将受到惩罚，也宣布会调查犯人

被殴打和虐待的情况。能够达到目的，我们感到非常高兴，几个藏族警卫朝我们年老的犯人走来，叫我们赶快回宿舍。

太阳已经照在头顶了，这是很暖和的一天，我们慢慢撤回宿舍。由于这次的示威行动主要是我们组牵的头，因此静待警卫对我们进行报复，刚才那样奋亢的反抗精神慢慢在消退。

洛桑丹增把他别在制服上的达赖喇嘛像章取下来，他二年的死缓很快就到期了，今天的事他很可能被立刻处以死刑。

“我并不需要活得长”，他说，同时把他曾很骄傲地佩带过的达赖喇嘛像章交给我。

我们都垂下眼睑，只有洛桑脚链拖在地上发出的声音。

后来几天当局没有任何反应，好像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我们非常生气，因为并没有举行哀悼会，也没有惩罚白玛仁曾和其他有关的人，只不过守卫和医务人员的态度有明显的改变，似乎比以前客气一些。

抗议的那一天刚好是犯人接见家属的日子。来访的人说，我们的抗议活动早就传布到监狱大墙之外，拉萨人民的反应非常之好。当亲戚们下一周来拜访时，带来了大量的食物，都是社会上捐赠给政治犯的，这使我们不必只依赖监狱中少得可怜的定量食物了。监狱当局发现了这个情况之后，立刻严格规定政治犯接受访客送食物的限额。

四、五天之后所有犯人都被叫到院子里去开会。一个干部宣读名单，把犯人分成十到十五人的小组。我跟洛桑丹增和玉洛分到第一组，上面命我们换房间，转移到第一号牢房去。这种转换

没有带来太大的区别，我依然跟朋友们在一起。玉洛被指定为组长，也就是牢房的头，平时他们总是挑选一个比较有“干净”背景的人当组长，但是现在当局更愿意让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来担当这个职位。

到新的监舍不久，我们就被叫到审讯室去。上面知道大家很团结，所以决定进行单独审问。一天下午我正在打瞌睡，一个守卫来把我带出去。我的审问者是一个名叫强巴格桑的藏人，不出意料之外，他问我们为什么抗议？这是谁的主意？

我重复拉巴死亡的情况，并且描述自己受刑的经验，我张开嘴让他看我肿胀的口腔和变色的上腭和舌头。

“你这老家伙嘴巴还真厉害”，格桑说，“我知道你这种人！”

我知道他的意思，他的结论是：我是不能改造好的人，对付这类改不了的家伙最好的方法就是暴力。

我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来控诉巴角。所有的犯人、警卫和干部都知道他，我的公开抱怨显然让这个邪恶的人感到十分尴尬。一天下午，我正悄悄地进行着宗教仪式，全身匍匐在地，突然听到门晌的声音，一转身看到巴角消失了，他把门拉上，原来他一直在监视我。

当局违背了一切承诺。我们抗议之后一个月，他们宣布拉巴是死于阑尾炎，没有人对他的死负有责任。白玛仁曾和巴角都没有因为对待犯人的粗暴而受到惩罚。据我所知，他们两个现在还在扎奇工作。

我知道为什么很多警卫不怕自己的出轨行为会受到惩罚，因为他们跟监狱系统的高官有关系。巴角的妻子是党书记巴桑的女儿，巴桑是扎奇监狱的政委，也是监狱里职位最高的共产党官员。巴角的小舅子是一个名叫朋措的高干，他在监狱的司法部门任职。象巴角这种警卫是有恃无恐的。

当局宣布我们的刑期分别都要增至五至六年，这引起了巨大的愤怒，监狱的气氛又开始紧张起来，有些犯人公开表示要再次进行抗议。当局意识到这又要引发骚动，因此很快撤消了加刑的决定。

1991 年春天，我们得到消息，有一个外国代表团将要到扎奇监狱视察。监狱里的情况突然得到改善，这是代表团很快就要来的明显信号。四月，厨房里突然供应很丰富的水果和蔬菜，大块的肉和肥油在我们的食物中出现。整整一个星期刑事犯被派来把监狱布置得更美观，所有的建筑物都粉刷一新，人人都发了一套新制服。

我们这间监舍又变成活动中心。洛桑丹增说，必须跟外国来访者接触，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决定起草一份请愿书，把监狱里的真实情况和使用刑具的细节陈述出来，也要把拉巴死亡的事情写出来。洛桑同意由他起草这份请愿书。

最大的困难是要对同牢房里名叫霍·拉康的人保密，他倒并不是个奸细，只是他特别容易激动。霍·拉康是守不住秘密的，由于他是文盲，所以我们之间只用文字来沟通，每个人把希望洛桑写进请愿书的要点都记下来，不久他就把初稿写好了。我们没

有把对食物定额的短缺和生活情况的恶劣写进请愿书，真正重要的是拉巴的案子和政治犯的处境。

我们把所有受过酷刑的犯人名字开了一个清单，也描写了嘎扎一批尼姑的遭遇。她们被用一种特殊的方法强奸了：警卫把电棒放进她们的下体。请愿书最后附了一封递交给美国总统的信。但是怎能把这份请愿书交到外国代表团的手里呢？我们猜测代表团只会去参观刑事犯的监房，或许也会参观医疗室。洛桑丹增说他可以想办法交出这封请愿书，说他反正已经被判处死刑了，当局没有办法再对他加刑。洛桑是个足智多谋的人，大家同意了他的建议，由他去递交这份请愿书。

有一天我们下工，返回来吃午饭，一个刑事犯告诉我们访问者已经到达了。我后来才知道这个访客是李洁民（JAMES LILLEY），后来的美国驻华大使。那天在分队值班的是一个好脾气的退休的藏人干部，洛桑请求允许他去医疗室，说还有另外两个汉人犯人也需要看医生，守卫同意了。当他们要走的时候，另外一个名叫丹巴旺扎的犯人也提出要看医生。他们被允许走出监房大门，走到院子里去。

洛桑、丹巴和其他两人一起穿过院子往医务室走去，那时，代表团刚好走出办公大楼。洛桑他们几个人马上被推到靠边的一间厨房去。在一些中国记者的陪伴下，访问者转了一会儿，快走到靠近厨房的一个门前，李洁民要求见玉洛·达瓦次仁，他的案子已经在国际媒体上被广为报导，他也被大赦组织认领为良心犯。玉洛被带出来见李洁民，他们通过一个翻译简短地交谈。

偶然的会见对于洛桑是一个极好的交出请愿书的机会，他只需要走出厨房靠近代表团。他刚要走的时候，丹巴旺扎说他要递交这份请愿书，洛桑拒绝了。

“你不信任我吗？”丹巴问道。

洛桑让步了，他不愿意让丹巴感觉到他不被信任。丹巴是一个笨拙而粗率的人，他从厨房走出去，冲到李洁民面前，把这份请愿书塞到大使的手里。可是李洁民愣住了，在他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的时候，一个中国女孩子把这封请愿书从他的手里抢下来。

那个时刻我正在温室里工作，但是满脑子都在想着这封请愿书的事。我很有信心洛桑能够找到一个方法把这封信交出去，可是当我回到宿舍时，发觉他坐在床边上，一脸沮丧。

“ 我们没办法递交出去”，他说。

我一下子泄了气，但是当洛桑仔细描写当时发生的情况之后，我又释怀了。一个重要的外国客人亲自经历了全部事情的过程，一定会要求一个解释的，我确信我们的努力不会落空。其他的犯人现在都很担心请愿书会落在中国人的手里。洛桑丹增说当局一定会辨认出他的笔迹来，他会坚持这是个人的单独行为。

丹巴旺扎懊恼极了。我们都劝慰他，但是没有用处。当霍·拉康发现我们瞒著他策划了这次行动时，监房里的气氛就更糟糕了。唯一的安慰是玉洛·达瓦次仁会见了李洁民，他说他把大家的委屈和冤情都向大使说了。

中国当局非常愤怒，我们的大胆举动使得他们在重要的外国代表团面前丢失了面子，我们相信上面会用最严厉的惩罚来对付我们。几天都平静地过去了，没有人提这件事。我猜想他们在等待高层的批示，或许因为李洁民还在拉萨。洛桑相信他会被立刻处死，但是在面对死亡的时刻他却非常镇定，一点都不后悔。其他人想到即将失去他，却都没有办法保持他那样的平静。

事后我才知道李洁民当时要求中国政府不要把洛桑丹增处死。但是，当时大家真是焦虑万分，度日如年。

丹巴旺扎跟我一道修理温室外一条狭窄的小沟渠，我问他是否对即将来临的审讯作好了准备，他说没事。他的信心令我感到惊讶，因为我太知道，当局绝对不会轻易放过这件事情的。就在我们谈话过后不久，有一个警卫来把他带走了。

中午时份休工，走回宿舍去吃午饭。我在院子里的水龙头下洗了脸和手，然后回到监房。有一些犯人沉默地站在门口，洛桑丹增和丹巴旺扎的棉被不见了，他们睡过的地方露出一块赤裸的水泥地。别的犯人来告诉我们，禁闭室的门从外面反锁，有犯人被关进去了。

我们感到非常无助，怎样能减轻他们的痛苦呢？我们贿赂了一个警卫，让他给洛桑和丹巴一点额外的食物，也让玉洛和另外一个名叫阿旺普琼的犯人去向政府求情释放他们，请求自然无效。监狱里的士气又变得非常低落，我们所作的一切努力，要求当局作一些改变，都没有得到实现。很多人希望年纪大的犯人能

够出来带头，新一代的政治犯似乎期待我们告诉他们下一步该怎么走。有些年轻人公开谈论我们应该绝食抗议。

“我们难道就让自己的人关禁闭吗？”他们问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回到宿舍，我看见三个年长的犯人，包括受人尊敬的转世喇嘛玉洛正在午睡，我告诉他们，年轻犯人正等待着他们的指示。我提到年轻人想进行绝食抗议，如果几位年长的同意，他们就会行动起来。

“我不能担当这种责任”玉洛说。

显然他认为这种行为的后果会制造更大的痛苦。洛桑丹增和丹巴旺扎被关了将近三个星期的禁闭。丹巴开始宣称要进行绝食，但是他后来极为虚弱，结果还是同意进食。我相信洛桑能够度过难关。他不但年轻，精神也非常坚强，死刑的威胁就在眼前，他反而什么都不惧怕了。

1991 年四月底，一个犯人悄声说他看见禁闭室的门打开了，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他们现在自由了。下工之后我就急忙赶回分队，希望能看到他们，但是依然没有这两个朋友的影子，大家都感到奇怪，他们的卧具都不见了。第二天早晨我发觉另外两个犯人也被带走了，他们的棉被卷也失去踪影。

我跟一些年轻犯人站在分队办公室门口，犯人愤怒而激昂，大声向警卫问道：“我们的人哪儿去了？”守卫人只是稳稳地站在那儿，不理会，犯人不让步。

“不关你们的事”，守卫回答道。

“我们的人在哪儿？”犯人们又问。

双方僵持了几分钟。越来越多犯人加入，要求警卫回答。警卫们看见形势越来越紧张，转身走进办公室去寻找援助。

所有的政治犯现在都聚集在大楼的前面，大家静静等待反应。突然面对我们的正门被推开了，一群带枪的中国士兵走出来，摆出阵势。扎奇的两个共产党的代表，一个名叫巴桑的藏族女人和一个高个子中国干部在士兵们的保护下走向我们。

“有什么事？”巴桑问。

“我们的人在哪里？”大家高声喊道。

没有回答。两个警官掏出手枪，其中一个人对天放了一枪，同时命令大家在院子的泥地上坐下来。高个子的中国干部大声对我们吼叫，同时用他的手枪威胁我们，他举着枪指着我们，一个又一个。我听不懂他说什么，但是前排的犯人一个接一个的站起来，我也跟着站起来。突然间没有任何警告，他向一个名叫阿旺仁曾的年青僧侣开枪，击中他脸部的侧面，枪从他的手上掉下来。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当中国干部威胁我们说，如果任何人敢站起来说话，他就要开枪，他话刚一说完，大家几乎同时站起来，人们起来的动作卷起了一阵尘土。

士兵们全部冲上来，有些人的枪已经上了刺刀，有些人拿着长的电棍，他们主要对年轻的犯人们下毒手。有个名叫普布的男孩站在最前面，他开始奔跑，一个士兵用刺刀刺向他的后脑，我

看见血从他的头喷出来，普布倒在地上。这种景象令我眩晕，这时候我感到有人用枪托打在我背上，我跌到了，喘不过气来。

周围的犯人被中国士兵追赶著，一个年纪大的藏人警卫尝试把我们跟士兵拉开。其中一个年老的守卫叫我们赶快跑回牢房去不要出来。“老天爷”，他拼命喊叫，“快走，不然你们都要被杀死。”很多犯人逃回宿舍，我看见许多青年犯人躺在地上，中国士兵们在殴打他们。

我们开始大声的呼喊“凶手！凶手！”但是士兵们无情地进攻，他们跑到牢房来，拖出所有的年轻犯人。我惊恐万分，以为那天我们全部会遭到屠杀。越来越多的军人开着吉普车进来，士兵们被命令撤退。

我逃回牢房，不仅感到背部的疼痛，腿部也有剧痛，因为士兵用枪托不断地殴打我。军人走进大门，把一堆手铐和脚镣从袋子里倒在我们监房的门口，警卫进来开始把人一个个拖出去。显然他们接到命令，专门要对付年轻的犯人。第一个拖出去的犯人名叫阿旺普琼，他因为主持 1987 年的示威游行而判刑十九年。阿旺看起来十分的疲惫和憔悴，他是我们这群人里最能言善道的，他不断向当局质问洛桑丹增和丹巴的下落。警卫给他手脚都上了镣铐，把他带到审讯室去。从监舍望去，可以看见两名女医生守在阿旺走进去的审讯室门口，她们拿着一个药箱和一个钢制的装注射器的盒子。我闭上眼睛开始六字真言的祷告“唵嘛呢叭咪吽”。

二十分钟之后阿旺被带出来，他看起来象一个破布娃娃，脸肿胀不堪，到处都是青紫，让人几乎认不出来了，他接着被关了禁闭。一个接一个的年轻犯人被戴上脚镣和手铐带到审讯室去，先是一顿毒打，然后被关禁闭。 由于禁闭室不够，有些人只是被链子栓在露天里。

当局决定用暴力作为对付一切反抗的唯一手段。警卫们开始用残酷的手段来惩罚一切轻微的反抗行为，但是犯人们并不让步。他们公开说宁可死，也不愿意臣服于中国人，这是一场意志力的较量。受压迫的一方拒绝承认压迫者的权力，这对使用暴力的压迫者是最大的污辱。人的身体能够承受巨大的痛苦，并且重新恢复。伤口可以愈合，但是一旦精神崩溃了，一切都完了。因此我们绝对不允许自己感到沮丧，我们从信念中汲取力量，坚信我们是为了正义和为了自己国家的自由而战。

第十三章

面对敌人

第二天早点名的时候，景象一片凄惨，有的犯人身上贴着纱布，有的人手臂吊在绷带里，大家互相扶持着走出来。很多年轻犯人手脚都上了镣铐。

抗议行动以后，安全防御加强了，更多的士兵在周围站岗，我们总是在监视之中，连在劳动的时候也有士兵站在一旁监视。可是犯人的抵抗在监狱里形成了一种非常高昂的气氛，连刑事犯都积极地支持政治犯，帮忙把外面的消息和药品带进监房。

当局宣布年终考绩评奖时，将要扣除大家的工分，这表示大部分人都会被加刑数年。干部们以为我们会要求减刑，但是大家态度非常坚决，对于这种进一步的惩罚，不表示任何异议。我们要显示不惧怕监狱，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敢作敢当，让当局知道，不能再用任何方法来恐吓压制我们。

对方也没有动静。不久中国人开始计划纪念“十七条协议”的庞大庆祝活动，“十七条协议”是 1950 年中国军队入侵后，西藏政府被迫签订的。上层宣布将有一些北京的高级人员到西藏来参加庆典，他们很注意，不愿意在这段敏感时期引发新的抗议行动。

我还是继续在温室里照料苹果树，并且种植蔬菜。这项工作相当轻松，温室里的产品和菜园里的收成已经变成监狱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当局甚至决定在扎奇扩张建筑另外五十五个温室，上面定下一个指标，每个温室每年必须按照指标生产定量的水果和蔬菜。

示威抗议几星期之后，就听说洛桑丹增、丹登和另外两个犯人被送到藏南的山南监狱去了。洛桑是我们监狱的精神支柱和勇气的源泉，分队的犯人现在都想念他。一个月之后，我们收到他的信息，说已安全到达山南，叫我们不要为他担心。

那个夏天，犯人允许看电视，主要是看中国的体育节目。我对于世界性的体育活动不熟悉，年轻犯人告诉我，中国队将参加秋天在北京举行的亚洲足球杯。年轻人都喜爱足球，他们熟悉每个球队，一谈起足球明星就滔滔不绝。

中国人乐意让我们看这种节目，认为这也是中国进步繁荣的标志。我们却把转变看成再次抗议的机会。我原先对这种比赛的平淡兴趣就很快转成一种很高的热情，因为犯人都坐在大厅，每当中国人输了的时候，大家就高兴地欢呼和拍手，当对方踢进一脚的时候，我们会发出如雷的掌声，连普通刑事犯都加入我们的欢呼阵营。

有一天晚上，当局似乎对我们的欢呼感到警惕，害怕又会发生骚动。一大排士兵围绕着大厅，更多的监狱警卫手上拿着电棒站在门口严阵以待。次晨一个愤怒的警卫大声斥责我们。

后来我们才知道，刑事犯由于加入我们讥笑中国球队的行列，而受到警卫的处罚。当局告诉他们别犯错误，应该爱国，支持祖国的球队。我们不愿意跟刑事犯之间产生任何摩擦和裂隙，因此以后在看足球赛的时候，就停止了讥笑和欢呼。

政治犯之间的团结空前牢固，虽然我们没有任何秘密组织，也没有暗中讨论计划抗议活动，但是大家还是能整齐划一地行动。为西藏的自由进行争抗是大目标，个人的顾虑和问题都变成次要的了，只有在牢狱之中，我才见过如此坚定的团结精神。

共产党运用各种手段要突破我们的团结，他们设计了一套增加点数和奖赏的制度。如果一个犯人工作努力并且表现好，就可以得到一定的点数。在每年一度的评审会上，把每个人的点数加起来，谁得到最高的点数就可获颁奖，最高的奖是获得减刑。

这当然是很大的诱惑，但是我们都看穿了它背后的阴谋：让我们彼此竞争，出卖对方讨好当局。我们轻视这种攒集点数的规定，把发下来的规则说明不拆封就丢掉，拒绝合作。不用说政治犯里没有一个人因增加了点数而得到减刑。

我们继续利用一切机会向当局抗议。1991 年十二月，一个瑞士代表团到扎奇来访问。就象上一次李洁民来访之前那样，一些装点监狱门面的工作立刻展开了，粮食定量也突然增加，这一切使我们知道访客很快就要到来。代表团来了，被带到各处去参观，而同时政治犯被锁在监房里。

有一个脸孔清瘦长长白胡子的六十六岁的政治犯，名叫达那·晋美桑波，想法混进了普通刑事犯的监舍去。当代表团走到

院子里的时候，达那用英文大叫“解放西藏！解放西藏！”他特别为了这次机会而学了这句英文，管理人员告诉瑞士代表团他是一个疯子。

为了这件事达那的刑期又增加了八年。他 1983 年因为“反革命宣传和批评国家领袖”的罪名被逮捕，判刑十五年。到了 1988 年由于他喊叫西藏独立的口号又被加刑五年，现在再加上八年，达那将到 2011 年九月三日他八十五岁时才能获得释放。这次瑞士代表团的事情，达那告诉我他一点都不后悔，他说如果有机会的话他还会再做。

扎奇监狱里有三十名女政治犯，其中二十七名是尼姑，她们大都参加了拉萨的示威游行，喊了“西藏独立”的口号。有一个世俗的女教师名叫达瓦卓玛，是因为教“反动歌曲”而判刑的，她教学生唱西藏国歌，为此被判刑三年。

在审讯的时候，很多年尼姑被迫脱光衣服，赤身裸体站在那儿，警卫们在她们面前走来走去，手上拿着电棍做出各种下流和挑衅的动作。想到这些尼姑所受到的污辱、恐吓和残酷的殴打，对于她们的坚定勇敢，我特别感到尊敬。

妇女们都被关在第三分队，跟普通女刑事犯关在一起。我有一种感觉，由于我们的分队组织过几次抗议活动，女犯们似乎感觉现在轮到她们采取行动了。1992 年的春天，机会来了。在西藏藏历新年来到的头一星期，当局警告犯人不要布置监舍，也不允许穿新衣服。新年第一天西藏人都喜欢穿新衣服，这是既有的习俗，现在不被允许，实在极其恶劣。

去年还被允许以传统的方式庆祝藏历新年，同时还放了三天假。今年照旧放假三天，但是以传统的方式来庆祝是不允许的，不明白是为了什么原因。

我们决定不管禁令，象往常一样庆祝新年。尼姑们也一样，把牢房用亲戚送来的礼物布置起来。新年元旦，她们把那些宽大的卡哄制服脱下，换上全新的藏服。

我们也都穿上新衣，三天之间都没有早点名，也不需要出工。犯人们都坐在院子里，有的在玩牌，有的在玩其它游戏。太阳照得暖暖的，大家跟着阳光的移动而移动。由于我并不喜欢玩牌，而且僧侣也是不允许赌博的，所以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坐在房舍里阅读和诵经。

放假的第二天，玉洛活佛从外面匆匆进来，脸上带着忧虑的表情。

“士兵走进第二分队去了”，他说，一边替我倒了一杯茶。

“他们大概又喝醉了”，我不经意地说。

第二分队是关刑事犯的，我们过了好几天才知道，其实在妇女监舍曾经发生了一次骚动。

妇女分队的管理人是一个五十几岁的藏人妇女，她是以粗暴和象老鹰一样的警觉而出名。新年第一天她走进妇女监狱，命令尼姑把所有的装饰取下来，同时要她们换上监狱制服，当妇女们拒绝的时候，分队长就把守卫叫进来，他们冲进宿舍开始残酷地殴打妇女犯人。两个年轻的尼姑和那名女教师被指认为抗议的领袖，因此被关了禁闭。

假日的第二天，尼姑们开始高声呼叫抗议，要求释放她们的朋友。警卫又再度冲进宿舍 ，用电棍把几个妇女殴打得昏迷过去。第二分队的普通刑事犯从窗户望出去看到发生的事情，于是开始呼叫“凶手！凶手！”我相信这种喊声救了那些尼姑的命。

当局很快把抗议事件推到老年的犯人头上。为了消除他们对年轻犯人的影响，狱方建了一座新的牢房，把年轻的犯人关进去。我被留在旧的牢房，我猜想中国当局认为是我们鼓动了抗议活动。

我们在监狱里完全被孤立了，一般日常作习都被取消，没有点名，也不出去劳动。大家很快就觉得非常得无聊，玉洛要求让我们去劳动，他的要求被拒绝了，当局似乎要通过散漫无聊的方式来折磨我们。劳动至少能给一个犯人正常的生活感觉，也是最容易打发时间的。那年的夏天也特别火热，每天到太阳从喜马拉雅山落下的时候，我们好像度过了一世纪。

我的刑期很快就要满了，但是我尽量不去想它。我们都知道当局总是会借任何细微的事情来继续拘留一个犯人。1992 年的夏天，我经常阅读和背诵年轻僧侣时代所学到的许多祈祷文。白天我都留在宿舍里，避免在外面受到警卫的监视。我开始每天做全身匍匐在地的仪式，每天从五十次加到二百次，藏人相信全身匍匐在地是一种对精神和身体的纪律要求。我希望释放之后能够全身心投入宗教的事务，相信做这种仪式是对未来在寺院生活的一种预习。

夏天结束时，狱方管理一再提审我，他们要知道我被释放以后要作什么。

“我是一个僧侣，当然会返回寺院去。”我说。

我知道这次绝对无法返回哲蚌寺，中国当局已经强迫该寺把所有曾经卷入政治抗议活动的僧侣赶出寺院。他们问我以后是不是还继续抗议，并且张贴大字报，我用毛泽东“小红书”的话回答：“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那些警卫一听气得掉头就走。

我简直不能理解，当局到现在依然要我相信中国人统治西藏，造福了西藏人。他们要我感谢党，给我机会改造自己，我则每次都重复藏人这些年来所受到的灾难。有一次谈话时，巴角也在场，我告诉长官，巴角曾经殴打我，我把嘴张开让他们看光秃秃的上下颚，那次巴角把我所有的牙全打掉，现在嘴里只剩下三颗。

“ 这只发生过一次”，警卫说。

朋友们给我带来消息说，外面的形势非常危险，哲蚌寺不会接受任何被释放的政治犯。朋友劝我离开西藏，他们说我留在这个国家，会继续被监视，任何人只要跟我接触，都会立刻遭到怀疑。

我开始作逃亡的计划，直到今天也不能把这件事情的内情透露出来，因为很多曾经帮助过我的人现在还在中国军队和警察的掌控之下。我现在虽然可以自由地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但是必须小心，不要把朋友暴露给公安。

被释放前的一个月，我跟监狱外的朋友接触，告诉他们，我希望逃到印度去，用获得的自由继续为西藏的独立而努力。我也希望有更多时间从事宗教的奉献，期待能够见到观世音转世的达赖喇嘛。

中国政府发表的“中国人权白皮书”在监狱里流传开来了，我要到印度去的计划显得更为紧迫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白皮书”里中国当局宣称西藏没有政治犯，也没有犯人受到虐待。文件把扎奇形容成“新式的社会主义监狱”，犯人都被当成人，而且受到人道的待遇。

这份“白皮书”启发我应该收集一些罪证来向世界显示西藏所发生的事情。朋友们说我最适合做这个工作，因为我在监狱里已经度过这么长的时间。中国当局只让外国代表团看某些指定的监狱，因此一个活生生的证人自由公开地发言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一个大胆的任务，怎么逃离西藏呢？我绝对不可能取得任何旅行许可，也会日夜受到监视。任何人只要跟我说了话，就会被警察审问，因此一切的安排必须在高度的保密中进行。

外面的联系人说他们会为我作好必要的安排，我请他们买一些中国警察用的电棍，上面必须有警察局的标记。听我的建议他们去找一个汉人老警卫，这人只要给他钱，什么都能办。我知道他有办法弄到电棍，果然如此。

释放前的几个星期，我又被叫去谈话。巴角和其他两个管理人在一个空荡的房间等我，屋里弥漫著他们吸烟散布出来的烟雾。巴角指着一张椅子让我坐下来。

“你马上就要离开了”，他开了头，“有什么话要说吗？”

“没有。”

“你向来顽固”，巴角说，“象一头牛，始终拒绝改造。”我没答话。

“你认识拉鲁？”一个坐在巴角旁边的藏人干部问。

拉鲁是以前西藏政府的官员，1959 年他领导西藏的抗暴，后来被释放了，现在在中国的行政机构担任要职。

“我审讯过拉鲁”，干部继续说，“象拉鲁这种人能够被改造，那么你也能被改造！”过了一会儿，他又重复老套，说中国政府是多么造福西藏，谁改造好了就能够受到很宽大的待遇。

“你的顽固是没有用的”，这个干部最后说，“你所希望的西藏独立只是一个梦而已。你看拉鲁，他现在替祖国服务，在中国人大里有很重要的地位。”这个官员暗示我也可以去攀登这样的辉煌事业。

我开始重新叙述我的故事，从第一天被逮捕，一直说到被巴角殴打。我还告诉他们我的劳莱斯表，提醒他们我手上还有这张收据。巴角直接问我要到哪里去，我说想回到寺院。

我必须让他们相信我非常想回到寺院去，我的晚年将在宗教生活中度过。我想如果我坚持要回哲蚌寺，当局也许觉得满意，不会想到我会企图离开西藏。

“我现在是一个老人，只希望把生命奉献给宗教”，我一再重复。“如果你们不让我回哲蚌寺”，我警告他们，“我要在大

昭寺前面抗议！”官员们听到我的威胁以后，露出非常严厉的表情，告诉我审讯结束了。

所有的政治犯都知道我即将被释放。在这之前的四、五天，大家在院子中举行了一个聚会，分队的人全部坐在一排。我不记得在会上大家都说了什么，结束时，难友们走上来拍拍我的背，拉住我的手，并且送给我一条长长的白色哈达。

“老师，请你保重”，大家说。我一方面感到高兴，一方面感到难过，因为即将离开难友们，他们之中有些人是我曾经遇到过的最高贵，最有勇气的人。警卫站在远处，观察我们的一举一动，然后走过来把我们分别赶回不同的牢房去。这次聚会我深深地被感动了。

监狱里有一个习惯，一个将被释放的犯人会招待整个分队的人喝茶，所以我拿了三十小袋奶粉，和我所能够收集到的牛油，请厨子帮我准备奶茶，把分队所有的人包括刑事犯都请到了，这真的是一次告别会。

1992 年八月二十五日的清晨，我很早就起来，慢慢开始把棉被整齐地打成卷。一个同屋从厨房取来茶水，把大家都叫醒。我丢开监狱的制服，穿上亲戚送来的传统世俗藏人所穿的一套崭新藏袍。这件袍子这么宽松，同屋得帮我用长长的丝带绑在腰间，然后把袍上的折拉平。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说了一会儿话。玉洛也起来了，把他的宽边帽子戴在我头上，他退后一步很满意地望着我。

“你现在看起来年轻十岁”，他说。

门突然打开了，两个官员在守卫的陪伴下走进监舍，一个是分队队长，另外一个是扎西格桑。我们有一次向扎西抱怨狱方使用电棍，他回答道：“政府花了很多钱在这些武器上，就是让我们用来打你们，我们不过照办而已。”

扎西现在礼貌多了，他有点嘲讽地说：“先生，我们现在来请你上路了！”

分队队长替我拿起棉被卷，扎西拿着我的热水瓶，难友都跑上来，在我的脖子上挂上一条条长长的哈达，然后没有其他的任何形式，我就走出监舍，走到主院去。在附近温室里工作的尼姑看到了，向我挥手，我也回应她们。

走到主楼办公室，我签署了释放的文件。

“我们不反对你返回哲蚌寺”，分队长说。“但是你要先得到宗教事务局和寺院当局的许可。”

“谢谢。”我说，知道既然监狱方面已经同意了，那么要取得寺院方面的同意是不难的。

脖子上围着哈达，在两个警卫的陪伴下，我慢慢从办公室走向大门，大门已经打开了，门外有些人在等着，是我的侄儿洛桑和一些朋友。

走出大门，走出监狱，仅仅几步之遥。我的脚一踏出大门，朋友们都冲上来给我挂上好几条哈达，有人递给我一杯奶茶，他们也请两个警卫喝茶，但是他们摇摇头就走回监狱，沉重的门在他们身后关闭。

跟洛桑一道来的有一个以前的犯人名叫达瓦，还有高个子的仁青先生，我在狱中他和妻子对我非常仁慈。仁青自己也在监狱待过很多年，释放之后，就献身于帮助犯人和他们的家属。朋友把一条花的地毯铺在地上，拿出一篮子的饼干、干肉和奶酪。他们让我坐下来，请我吃东西。

那天早上，坐在离监狱大墙只有几尺的地方，我大概喝了有十来杯茶。朋友们把我带到布达拉宫下面的一个小村子去，洛桑和他妻子还有我的继母就住在这儿。洛桑在这里工作，制作传统的藏帽，拿到拉萨市中心的市场去卖。

我到达的时候，很多邻居跑过来看。我笔直走近屋子去探看继母，她现在已经瘫痪卧床。屋子里很冷也很阴暗，继母看上去就如同一个影子。我的眼睛习惯了屋里的黑暗，看见她举起了头，我走向她，把前额跟她的前额碰触。

“遭了多少罪啊！”她喃喃地说，眼泪从她的面颊上滚落下来。

接下来的几天很多人都来看我，大部分都是以前的犯人。我得到消息，逃亡计划不久就可以准备好了。我接到指示，叫我按兵不动，不要引起任何怀疑，我只假装要返回哲蚌寺。

坐上公共汽车来到以前的故旧寺院，到达那里时还很早，空气里充满了香炉里燃烧香烛的青烟。大部分毁坏了的房舍都已经修复了，太阳在白色的墙上洒下金色的光芒。这里很多青年僧侣都曾经坐过牢，因此警察总是牢牢盯着这座寺庙。在通往哲蚌寺

的路上，他们设了一个哨岗，任何离开寺院的僧侣都必须出示旅行许可。

我问一个僧侣哪儿可以找到寺院的党书记，他让我到大殿去。僧侣们刚刚做完早课，有人把他们的副主任，一个矮胖的名叫贡曲扎西的人指给我看。记得很久以前我还没有被逮捕时，贡曲曾经是一个手艺很好的木匠。我现在穿著藏袍和玉洛给我的帽子，所以他没有认出我来。

当他看了我交给他的证件之后，笑了，他还记得我。他说我的证件都齐全，然后把我带去见主任，一个名叫益西塘多的僧侣。

“你要什么时候返回寺庙？”益西简略浏览了证件之后问我。

“越快越好。”我说。

益西叫我几天之后再来，我知道他们先要跟公安局通气。几天之后我分派到一间很大很清洁的房间，一张窗户可以俯览整个山谷。我跟寺院方面说我将在八月二十九日的雪顿节之后搬进来。这个节日又叫酸奶节是夏季结束的一个庆典，拉萨人会倾巢而出，在附近的公园搭起帐篷，然后会有丰富的野餐。成百的家庭将到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林卡去，因为那儿将演出三天的藏剧。

依照传统，哲蚌寺要举行庆典，把一张巨幅的唐卡揭开，展示该寺珍藏的一幅佛教格鲁巴教派创始人宗喀巴的画像。僧侣会排成一长列队，肩膀上肩着一条长约六十尺的旗帜。今年的雪顿

庆典又转变成另一次抗议活动的机会，寺里一间达赖喇嘛每次来访都住的房间上方，升起了一面西藏国旗，寺院周围的墙上都贴有大字报，上面写着“中国人撤离西藏”。

当我在节庆之后带着行李，来到哲蚌寺的时候，发觉整个寺院布满了警察，所有的僧侣都被一个个单独审问。

“雪顿庆典期间这里出了一些事”，益西塘多跟我解释。

“你过几天再来吧！”

对于即将逃亡，我感到越来越焦虑。这件事能成功吗？其实我只需要耐心等待，信任朋友们会把每件事情都安排妥贴。我安慰自己说，他们已经帮助过很多其他的政治犯逃到尼泊尔和印度了。当然我要把这些事都保密，绝不向家人透露，不能把他们拖下水，因为一旦外面发觉我失踪了，家人将是第一个被审问的。

一天夜里有人敲门，侄儿告诉我有人找我。月光下站着一个戴帽子、推着自行车的年轻人。

“ 你是班旦加措吗？”他悄声问。

“是的”。

“这是给你的”，他交给我一个袋子，里面是一些中国人使用过的刑具。

第二天早上，年轻人带来了我等候已久的消息。我告诉家人现在要到寺庙去了，继母看起来很是高兴，我拉住她的手，把前额轻轻地跟她的前额摩擦，我在内心向她道别。

这个青年把我带到拉萨的一所房子去，在这里我跟安排逃亡的朋友见面。他们说已经找到一个司机，他会把我送到尼泊尔的

边境，又说司机是个好人。终于要离开了，从这一刻开始，我才真正开始激动起来。

第二天早上，很早就醒来了，但是他们叫我不要开灯。一个男孩送来一套很整洁的服装，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穿西装。这套衣服对我来说太大了，必须在腰上系皮带的地方卷几道，一个朋友拿来一长条底端有个口子的绳子挂在我脖子上，原来这是一条领带！自从毛泽东死了以后，领带变得非常时髦，每个干部都要打领带，表示他们很摩登。

“你看起来象个十足的商人！”朋友说。

半小时之后，我坐在一辆自行车的后面，一个人把我载出拉萨。

我看到很多老年人围着大昭寺做祈祷。太阳刚刚从山后露出脸来，香炉里上升的袅袅青烟在八角街面飘荡。我们穿过了这个庄严城市的市中心。

在离城中心几里路远的巴玛日，我们停下来，朋友让我在这儿等候一辆卡车。我随身只有几件衣服和那个里面装了电棍、棍子、刀和手铐的袋子，这些奇怪的东西是我全部的行李。

朋友离我而去，我站在路边发抖，这套西装完全不能抵挡晨风的寒冷。几辆卡车开过去了，大约七点钟的时候，一辆上面罩着灰色帆布的绿色卡车，停在我旁边。“你是那个犯人吗？”司机问，我点头。

那是 1992 年九月七日。我得到指示，在进入尼泊尔边境之前最后一个叫樟木口的村庄，跟某个商人接触。卡车司机是个年

轻人，看起来好像刚刚睡醒，他告诉我要送一批货到尼泊尔商人那儿，卡车里装的是中国制造的鞋和空瓶子。

我家人以为我已经搬到哲蚌寺去了，寺院里的人以为我还在家里，可是现在我坐在卡车上，离开拉萨朝尼泊尔开去，到他们发觉我失踪，还要好几天的时间。过了几小时，车子开过帕南，可以远远望到山丘上嘎东寺的外形，我弟弟还在那儿出家，1962年我关在罗布昆泽的时候曾经看过他一眼，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了。

车行了两天，到达那南，这是到尼泊尔边境之前最后一个古老的西藏城市。司机大概注意到我非常紧张，在接近一个路障的时候，他把手搁在我的手臂上，试图使我镇定下来。卡车停下，他走下去就消失在一个办公室里。几分钟之后，他带着一个中国军官走出来，当我看见他们在笑的时候，我放心了。这个军官示意士兵把闸栏打开，我们就缓缓开向聂木兰。

停下来吃了早饭又休息了一会儿，司机把一些他从拉萨带来的信送走了。下午又继续出发，车子开在十分弯曲而陡峭的山路上，周围的山岭都布满了森林，比我所见过的西藏任何地方都更绿而苍翠，车停在一个拐角的空旷处，司机说最好等到天黑的时候再穿过边境。

远远可以看到樟木口的灯光，一直等到黄昏的时候我们才继续向村庄的方向开去。樟木口是个新的小镇，是进入尼泊尔之前最后一道海关和移民局的检查站。司机让我假装睡觉，他去联系。他去了没有多久，就带着一个壮实的男人走过来，这人的头

发梳成长长的辫子，左耳戴着绿宝石。在此地看见一个传统打扮的人，让我觉得是吉祥的征兆。他带我到一个屋子里去，并且请我喝茶和吃面食。

壮实的男人必须找一个向导，带我穿过尼泊尔边界。从樟木口到边境开车不到一个钟头，然后只要走过西藏和尼泊尔之间的那座友谊桥，就到达彼岸。他们说开车太冒险，必须在夜里步行到达边境。

我们不能马上离开。第二天我必须整天藏在一个仓库里面，一直到夜里才能出来。一共等待了十天，朋友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才找到愿意带我过境的向导。一天夜里他带来一个尼泊尔老人，叫我跟他走，我感到十分紧张，因为向导不会说藏语，而我不会说尼泊尔语。

我紧紧跟在他身后，很快地就走出樟木口，走进浓密的森林。爬上一条很狭窄而陡峭的羊肠小道。大约在午夜时分停下来，望下去樟木口的灯火就在脚下。开始下大雨，我的向导用一张塑料布挡雨，我很幸运，朋友给了我一套雨衣。

向导走得很快，但是他经常回头看我是不是跟上了。不一会儿我全身都湿透了，鞋里也灌满了水。我们没有交谈，天亮的时候，穿过一座绳索桥，向导简单地说“尼泊尔”。

我们继续行走，到达一个小村庄，中午时分，我很高兴地发现樟木口那位壮实的朋友已经拿着他偷偷运过边境的袋子在那儿等着我们。

当天就在那儿过夜，第二早上我坐在一个年轻尼泊尔人的摩托车后面，往加德满都出发。

车行了一整天，当天晚上到达了首都。这个年轻的夏尔巴人把摩托车停在西藏难民接待处的门口，这是达赖喇嘛几年前设立的。

整个经历就象一场梦一样。

我还没有停止担忧，有时候尼泊尔警察逮到西藏人也会把他们交给中国人，我如果被抓到，一定会被递解出境。当然处在这种情况之下的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接待中心挤满了从西藏各个地区穿越喜马拉雅山逃亡出来的难民，很多人受到严重的冻伤，有的时候严重到必须把肢体切除。我被带到联合国高级难民总署去，正式登记为难民。他们给了我一些钱，并且允许我前往印度。

必须尽快离开这里，没有担搁时间，我立刻坐上一辆开往新德里的公共汽车。几天以后，终于到达了达兰萨拉，这是以前英国人统治时所建立的一个小小的山区驻地，对于西藏犯人来说，这个名字是重要的精神泉源，因为达赖喇嘛把达兰萨拉选作他流亡的家园。

外面下着雨，乌云使我想起西藏的悲惨处境，我情不自禁把这个潮湿多雾的达兰萨拉跟达赖喇嘛曾经住过的亮丽庄严的布达拉宫和罗布林卡相比较。

我第一次于 1951 年在江孜见到达赖喇嘛，后来在旧藏再度看到他，当时他被节庆的缤纷华丽包围著，现在我只是直接走进

只有一个守卫看守的简单房屋里去晋见他，好像是去看一个很朴素的僧侣。经过这样漫长的时间再一次拜见达赖喇嘛，我内心激动不已，立刻向他全身匍匐在地，并且呈献一条哈达。

“仁曾丹巴上师的学生”，达赖喇嘛说，我过于紧张而无法抬头看他，“你受了很多的磨难”。

我安静地坐在地上，他开始问我监狱里的情况，他已经从其他犯人那里听到关于我的事。他提到很多难友们的名字，我感到他非常真诚地关注我们。这一次会见超过了两小时，我有机会告诉他，我们大家对他的忠诚。

离开房间时我哭泣起来，这样的会见是我一生最大的愿望，我得到一套新的袈裟，这是 1961 年以来第一次又重新穿上了袈裟。我穿着新衣、走到达赖喇嘛居所对面的寺庙去，祈祷所有其他人都能够从苦难中得到解脱。

我逃亡的消息在报刊发表之后，发觉自己早已被国际特赦组织认定为良心犯。意大利有一个小组从我 1983 年被逮捕以后，就不断地写信给中共当局。1995 年我被邀请到意大利去访问，认识了那些九年来不断为我的事向中国当局写信的人，虽然我们之间有语言、文化和地理上的障碍，但是我深深地被他们的善心和胸襟所打动。

同一年，我旅行到日内瓦，在联和国人权委员会上作证。我被带到一个巨大的大会厅里，坐在两位藏语翻译的青年人旁边。很多人走来走去，而且彼此交谈，我不知道大家怎么能够听见我说话。我深深吸一口气，然后开始读证词。

“我的名字是班旦加措，我十岁的时候就出家了。”

读完全部证词之后，抬起头来才发觉中国代表团的人坐在我面前聆听着，他们在听我说话！这给我一种无比自由和幸福的感觉，我希望所有的难友们都能够看到这些，因为我们作梦都希望有一天能跟折磨我们的人面对面，让他们聆听我们遭受的苦难。我是第一个有机会在联和国的机构前发言的西藏人，因此我知道这不仅代表自己，更代表所有还在监狱里以及曾经坐过牢的西藏人。代表团的人只听到我的声音，但是我的声音后面，是成千上万的犯人，他们都已经死去，不能象我一样亲自出面作证。

中国代表团对我的发言没有反应，但是不久以后在伦敦有人把中国驻英大使写给当地报纸的一封信念给我听。

马玉珍的信如下：

“班旦加措是一个罪犯，因为他参加反政府行为。他所犯的罪状包括颠覆政府、越狱逃亡和偷窃。班旦加措所说的在监狱受刑的故事是不真实的，中国监狱是禁止用刑的。”

压迫者总是否认他们自己是压迫者。我所能做的只是把我所看到、听到和一生所经历的奇特经验亲自作证并取证。苦难都已经刻在西藏的河谷和山脉上了，雪山之国的每一个村庄和寺院都有人们受苦的悲惨故事，这种苦难会继续，直到西藏获得自由那天。

译 后 记

这本书的中文版迈过了两道翻译的关口。夏加·次仁先生通过他跟班旦喇嘛的对谈，将之形诸藏语文字，之后他将藏语译为英语，现在这本中译本是根据英语版本翻译的。在英译中的过程中，有关藏语人名地名的问题，皆得到国际声援西藏运动（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华盛顿总部的仁青塔西先生的协助。

书中收录的照片由作者班旦加措、仁青塔西、吴弘达、东淘·丹增诸位先生提供。书稿的打字排版是 Penny Yu 及古原两位女士的功劳。译文中出现的翻译有欠妥贴和错误之处，则是译者的失误。本书中的注解为译者所加。

一年之前，劳改基金会的执行主任吴弘达先生首先提出翻译这本传记的想法，他要“让中国人知道中共政权给西藏人民制造了怎样难以想象的痛苦和屈辱”，得到作者班旦喇嘛的允诺之后，出版英译本的伦敦 Harville Press 又慷慨地让出中文版权，成全了整个翻译计划。

译者于最近十数年先后访问过拉萨、日喀则、前藏地区和达兰萨拉，得以豹窥藏人的日常及宗教生活和流亡地区藏人生聚教训的面貌。读完译完班旦喇嘛的传记之后，只有一个想法：像德国总理勃兰特七十年代在华沙犹太人的墓前下跪一样，有一天，

中国的元首也应当将达赖喇嘛请回布达拉宫，并向他及西藏人民下跪请求原谅。

附录一

拉 萨 市 人 民 检 察 院

起 诉 书

（83）拉检刑诉字第 17 号

被告人班旦加措，男。现年 50 岁。藏族。代理人出身。喇嘛成份。西藏白朗县人。藏文水平较高。一九六零年因参叛被江孜军管会白朗县军事法庭判处 7 年有期徒刑。一九六二年因脱逃罪被江孜军管会军事法庭加刑 8 年。一九七五年刑满就业。一九八三年初回哲蚌寺。同年八月二十六日因反革命煽动罪。经本院批准，由拉萨市公安局逮捕。现在押。

被告人班旦加措反革命煽动一案，经拉萨市公安局侦查终判。移送本院审查起诉，现查明犯罪事实如下：

被告人班旦加措于一九八二年三月九日在西藏军区西大门西侧埂墙茂王山、布达拉宫等处，张贴鼓吹“西藏独立”的反动传单。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六日在该犯住处搜出日记本中记录有给达赖喇嘛写的反动信。其内容至为反动。攻击我社会主义制度。对党和党的政策进行恶毒的诽谤，叫嚣要实现西藏独立。还抄有“西藏国旗”说明书。油印的反动传单一份和书写反动传单的工具等物。

上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已供认不讳。

本院认为：被告人班旦加措书写鼓吹“西藏独立”的反动传单等物，已构成反革命煽动罪。为了打击反革命犯罪活动，维护社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二款、第六十二条之规定。特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

此

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

代检察员：陈诚富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九日

附注：

1.被告人班旦加措现自治区公安厅看守所

2.被告人班旦加措的案卷一式三份。

附录二

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刑事裁定书

藏法（1984）刑裁字第 7 号

上诉人（即原审被告人）班旦加措，男，藏族，现年五十一岁。西藏白郎县人。捕前住哲蚌寺。一九六Ｏ年因参叛被白郎县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一九六二年因脱逃罪，经江孜县军事法庭加刑八年，一九七五年刑满就业。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六日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拉萨市公安局依法逮捕。于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九日经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上诉人不服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拉法（84）刑一字第 9 号刑事判决。以“不是反动宣传，是从一部经书中抄写的等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诉。

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此案进行了审理，并于一九八四年七月二日经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于一九八二年三月九日在西藏军区西大门等公共场所，书写、张贴反动传单，煽动“西藏独立”的犯罪实际清楚，证据确凿。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　　驳回上诉；

二、　　维持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拉法（84）刑一字第 9 号刑事判决。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审　判　员　　土　登

审　判　员　　罗　曲

代理审判员　　王传清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一九八四年七月五日

书　记　员　　洛桑新巴

附录三：采访纪实

班旦喇嘛的今生今世

今年 3 月间班旦加措到华盛顿参加“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十五周年纪念庆祝会，译者对他进行采访，仁青塔西担任翻译。

问：你出身于富裕家庭，父亲是地主，跟班禅喇嘛的父母亲又是邻居，按书中的描写，共产党来之前，西藏的乡村生活悠闲有趣，你童年时代接触过贫穷的农民和牧民吗？他们的生活如何？

答：我家在拉萨和日喀则之间的山谷中。小时候我跟邻居家的孩子们玩，他们家比较穷，看见他们的房子和厨房的灶都比我家简陋得多。西藏历来是个不平等的封建社会，有穷有富，我曾经去过藏南穷困的地区。不过在“旧社会”中，并没有听说过有病死、饿死的人。而共产党来了以后，五十年代进行土改，一般人的生活不但没有提高，反而在实行公社制之后饿死很多人（书中提到连在八十年代还有饥荒的情况）。

以前人们生活自由自在，牧区比农区富有，但是农民有办法赚外快。早期，每次的法会，总有农民去帮忙，完了男人可以得到十八块大洋，女人十二块大洋。也有人到印度做生意，来回跑。

问：以前有钱人家作兴至少送一个男孩子去当喇嘛，这是小孩子接受教育的唯一机会，你家如何？

答：我十一岁时出家，还有个弟弟也当了喇嘛。我们家七个兄弟姐妹都会读书写字，也学过梵文。有钱人家一般聘请喇嘛（或普通人）当家庭教师。有钱人送孩子进庙要送很多“见面礼”，穷人家孩子去当和尚不用交钱。

问：你的祖母认为你是个高僧转世的。你信转世轮回吗？相信自己下辈子会变成什么？

答：我信奉佛教，自然相信转世轮回，我相信下辈子又会转世成为一个喇嘛。

问：回顾你一生的苦难经历，这和佛家一般说的生老病死相去甚远，你个人和西藏人民所受到的痛苦是人为的和制度性的残忍所导致的。你怎么从宗教和哲学上来解释？

答：人生的痛苦有两种：一种是普遍性的，人生在世，人人都要面对的生老病死，属于这一类。 另一种是突发性的，这是人为导致的，非常规性的。像中共不断地发动各种运动，为人带来极大的痛苦。这种“痛苦中的痛苦”，是突发性痛苦所带来的结果。

问：藏人是大自然的子民，单纯而朴实，为什么遭受到这种灾难？

答：从佛教观点来说，不论民族、人类还是个人的命运都和因果轮回有关，因此要积善果。从历史的长河来看，一代人甚至

几代人都是短暂的。积的“因”有时候累集了几百年才见“果”，而不是一代代就因因相报了。我相信西藏人民有一天会过好日子的。现在我当喇嘛积善德，而我以前受的苦可能是因为积了恶德。

问:佛教中的四戒:不杀生、不偷、不谎、守独身。监狱中很多以前的僧侣都自杀了，你也曾经想过走这条路，这算不算违反教义？

答：佛教里说自杀是最大的罪过，因为生命是最珍贵的，不可杀生，轻生更不好。在中国人的监狱中，每个人必须出卖、检举别人，这是出家人不可作的。有些僧侣在狱中自杀，这固然违反教义，但是却也避免了出卖他人。有些人神经脆弱，受不了折磨，而走上此路。

问：你在狱中的三十三年，经历了饥饿、禁闭、半年手铐、两年脚镣、吊梁毒打、电棒捅进嘴里。什么是你最痛苦的经验？

答：出卖和揭发别人最折磨我。党要大家表忠诚，要求每个人检举他人，这就造成有些人对难友上线上纲的指控，和子虚乌有的诬陷。我最怕这种批斗和奖惩大会，说了假话害人，不说假话害己。但是一开始害人，害了一个，就会再去害一百个，精神就堕落了。挨打可怕，但是一个人的肉身的承受度是很大的，打伤了（如果不死）还能痊愈，精神一旦崩溃，就永远失落了。

问：你恨不恨中国人？

答：西藏发生的悲剧，是制度造成的。汉人也有好的，我也遇见一些有同情心的监狱管理人。大饥荒的年代，有一个专门给

军营送水的年轻汉人士兵，他有时给我一点吃食，让我免于饿死。他被调走时，我哭了。

最让人害怕的是监狱里的审问员， 但是连这种人里面也都有好人，所以不能一概而论。

问： 你始终对中共的统治抱有深度的怀疑，认为只有当西藏成为独立的国家时，人民才能从痛苦和压迫中解脱出来。达赖喇嘛并不要求西藏独立，你的看法不是和他的政治主张相左吗？

答：我的确主张西藏独立，但是这和达赖喇嘛的主张没有冲突。达赖喇嘛认为在一国的框架中，西藏应取得真正的自治，他把藏人能过幸福的生活这一点放在首位，如果这能够做到，独立也就不是必须追求的。但是中共政府往往是不能信任的，它的宗教和民族政策说变就变，至少以往的几十年是这样。我不了解汉民族的文化，只知道中共政府坏事作尽，瞄准西藏，就像一把拉满了的弓，西藏人一有动静，箭就应声而出。现在我们只能在无奈中寻求妥协，通过国际的监督和国际协议来解决西藏问题。

附录四：采访纪实

阿旺桑珍

——一个唱歌的尼姑

廖天琪

她在众人的拥簇下,走进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会客厅。陪伴她进来的是国务院负责西藏问题的敦巴斯基（Paula Dobriansky）女士和几位瑞士及法国的外交代表。她的身量纤细矮小,像一个孩子,但是脸上却有风霜。阿旺桑珍——西藏最年轻而刑期又最重的女犯人，三月间在国际多方的施压下，获中共释放来到美国。四月中在华盛顿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欢迎会上笔者第一次见到她。

布琼泽仁先生把众人的发言翻译给她听，内容都是赞扬并敬佩她的坚毅与勇气，她的脸色凝重，十分专注。轮到她发言时，稚嫩的声音立即泄漏了她的年纪，虽然内容是沉重的。她感谢国际社会对她的援救，希望这种人道的关爱能继续转移到她那些尚关在西藏监狱中的难友身上。

五月间吴弘达先生和笔者一道再度对阿旺桑珍进行访谈，Dolkar 女士协助翻译。

童年入狱，家破人亡

阿旺桑珍出自一个典型的西藏家庭，父母都是佛教徒。她在 7 个孩子中，排行第六。（她出生于 1978 年，按藏历算法一出生已经一岁了）。她 11 岁时就由父母送到噶日尼姑庵去当了尼姑。除了她，另外还有一兄（现在印度）一姐也在拉萨出家。

自从 1989 年以来，藏人的民族自决意识逐渐高涨，每次的群众示威游行几乎都是由寺院内的僧尼带头发动。1990 年阿旺桑珍 13 岁（实足年龄 12 岁）那年参加了这样一次游行示威，结果被公安拘捕，投入监狱，9 个月后才放出来。这期间她的父亲、叔叔和哥哥也因政治活动而被投入监狱。当时母亲在山上修行，家人瞒住她，不让她知道丈夫儿子被囚之事。然而公安是他们家的常客，有一次他们要来抓她的姐姐，家人请求公安人员不要将他们家三口人在狱中的事说出来，以免惊吓住母亲。但是公安却直接对其母说出实情，老母亲闻言惊倒，次日即不能言语，隔一日即去世。父亲过了一段日子从狱中放出来，不久也忧伤死去。

阿旺桑珍 15 岁时再度因参加了示威抗议活动而被捕。由于年幼，不能判刑，法庭宣称她已 17 岁，已非“少年犯”，将她判刑 3 年。在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服刑期间，桑珍偶尔有一次看到了穿着囚服的父亲在工地劳动，她几次要求跟父亲见面都被拒绝。在父亲整整的八年刑期中，他们父女终于有过一次五分钟的

会见时间，这是桑珍在狱中 11 年漫长生活中，唯一值得欣喜纪念的片刻，这也是她最后一次见到父亲。去年(2002)桑珍出狱后，才知道父亲已经去世了。她的叔叔被判刑 5 年，虽然都在同一个监狱里,她始终没有见过他。

永远失去的青春和成长

桑珍正在发育成长的时期就被投入监狱。年纪幼小的她第一次在监狱中开始来月经。由于遭受拳打脚踢，和精神折磨，加上监狱的食物恶劣，营养不良，她的健康全毁。往往她的历假三个月或六七个月都不来。直到今天 25 岁了，她身体的女性周期都无法恢复正常。若是在正常的环境中成长，她可能会是一个高大健壮的高原女子，有着黝黑肤色和红红的面夹。现在的桑珍看上去是个纤弱的女孩，但是她的神情坚定，柔中带刚。这株幼苗曾在黑暗的狱中，得不到阳光和雨露，所凭借的是坚强的精神毅力，如岩石下的嫩芽悄悄成长，她不可能成为一棵绿叶成荫的大树，但却是一株险峰下的奇芭。她头次被捕入狱时，才不过是十岁出头的孩子，两手被粗绳绑在背后，并被吊起来，挂在梁上。他们用电棍击她，骂她是“分裂分子”，问她幕后黑手是谁。这个小女孩不但曾被单独监禁四个月，而且也被关过禁闭。在阴冷潮湿的水泥地小黑牢中，既无被褥，又无厚衣来抵御寒气，她只得卷缩着身体蹲着，以免跟寒澈骨髓的地面接触。她在这种不堪的、非人的情况下度日如年熬过了禁闭。这个经验对于她的身

心，如同化脓的伤疤，随时都在疼着，随时都在打击她的健康。如今 25 岁的桑珍正处在生命中最丰茂的阶段，但是她的身体却一直被各种疾病所缠绕，无法摆脱。今后在自由世界生活，健康是否可以慢慢调补过来，都还是个未知数。

由于十岁就入了尼姑庵，一年之后入狱，桑珍自幼失学。在当尼姑的那一年中，她所学习到的佛经相当有限。但是老师给她讲的释迦牟尼故事却深印入脑海之中。佛教中的一些基本慈悲、宽恕的道理成为她在人生长夜中的一盏明灯。在狱中受到折磨和苦难时，她心中默默背诵那几段有限的经文，并且心中想着藏人心目中的神 – 达赖喇嘛和他的慈悲，因此心中并无怨恨，相反地，时间过得很快。

监狱里的生活

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里有 200 多名女犯人，年纪从十几岁到六十多岁的都有。分为三队，下再分组。桑珍被分到第三队。犯人多数都是藏人，刑事犯和政治犯各占一半。汉人占十分之一，多为刑事犯。平时藏人和汉人相处平和。监狱长是汉人，队长是藏人，而管理人员则多为汉人，发号施令时往往触礁，因为藏人都听不懂。

狱中的食物定量，早餐有馒头，中午是米饭和茶，晚上定额两个馒头。如果自己有钱，可以提出要求购买方便面。每天上厕所的次数也有定额：4 次。监狱里每两年发一套单衣，每三年发

一套棉衣棉裤给犯人。棉被则每五年更新一次。桑珍被关在一个12 人一间的监房内，都是上下铺的床，水泥地。这个 12 人的小组经常被调换，不让大家建立起私人的友谊和联系。两名正副组长是上面指定的。

在劳动方面，桑珍和其他的犯人们一样，大部分时间是在温室里种菜、施肥。夏天日照强烈，温室内的温度从午时到午后四点非常高，犯人在高温封闭的温室中依然必须用喷雾器喷洒化学杀虫剂，除虫除草。定额必须完成，否则要加班加点，因为这里所生产的江豆、黄瓜、番茄、冬瓜都是市场上的抢手货，犯人是监狱的摇钱树、廉价劳工、不吃草的好马儿。冬日，天寒地冻，温室里的气温也很低，大家依然得蹲在地上操作。一星期工作六天，周日休息，但也常常加班。

监狱方面在外面接了织毛衣的合同，因此犯人们也得纺棉线、织毛衣，除了外边的合同定量，还得侍候监狱管理人员家属的私人需要，为他们织花梢的毛衣。工作每天有定额，有时晚上也要劳动，不完成不准睡觉。监狱管理把她们搓成的羊毛线，细的一两一块五、粗的一两一块、土毛线三两一块，卖给工厂。织毛衣时，多半用很细的针，必须织得很紧，花式又复杂，在昏暗的灯光下，很多人的眼睛都伤了。桑珍多少年来都只能玩儿命赶工，去完成定额。去年是她 11 年中第一次“超额完成任务”，得到 15 元奖金。年终给劳动积极分子发的一等奖是 45 元，二等30，三等 25 元。每个犯人们给监狱制造的财富何止万千，而得

到的却是这样微薄的“奖金”。然而对犯人这依然是一笔额外的“财产”，桑珍提到这 15 元钱奖金时，脸上挂着稚气的微笑。

犯人终年的劳动是没有报酬的，每人每月可以得到 6 元人民币零用钱。由于监房里的电灯泡和打扫用的扫把，都得犯人自己掏腰包购买，这点钱几乎都用不到自己身上，反而要家里接济，送食物和日用品。

以前那种学习班的形式取消了，但冬天有所谓的冬训，大家念报纸学习。如果哪天报纸上有剪掉的大洞，她们就特别高兴，因为这表示报上有政府不愿大家读的新闻，这往往是国际上有关西藏或达赖喇嘛的消息。

早期监狱中那种互相检举，思想汇报的做法已经逐渐淡化。但是每年一次人人都得写思想总结，把自己“思想改造”的情况坦白交待一番，同时还要赞美共产党的“恩德”，这样就可以换取比较好的待遇。政治犯们都拒绝写这种报告。桑珍从来没有写过。2001 年她的身体健康恶化，管理人员劝她写检讨，如果写得好，可以减刑，提前保外就医。桑珍答应写，但是不肯写上他们要她写的那些话：“西藏独立是藏人的妄想，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没有得到减刑，但是国际社会的压力使得北京低头，于 2002 年十月十七日将她释放出狱。

曾经有一段时间，狱中安排了学习藏语的机会，由犯人自己担任教师，一周一次，但是后来又取消了。另外也设了汉语学习班，大家自由参加，不强迫。每个月的 20 号有一次家人来探监的机会，时间只有 15 分钟。这是在犯人劳动和政治学习两方面

表现都让上面满意的情况下，才能享有的恩赐。桑珍的会见家人的权利经常被剥夺。

女犯人得不到特殊照顾

监狱里的女犯人也一样劳动，得不到特殊照顾。连她们每逢例假时也不例外。女犯所需要的卫生绵也要自己花钱去买，而每月发的 6 元零用钱，连买这个用品也不够。1996 年严冬时节，有几个尼姑因为拒绝狱方要她们颂赞共产党的要求，而被惩罚站在雪地中，男警卫们坐在暖和的屋内，对着她们指手画脚取笑着。勇敢的尼姑们坚持着，甚至还喊“达赖喇嘛万岁”和“西藏独立”。结果她们得到关禁闭和加刑 8 年的处分。这件事当时也传遍了全世界。

女犯人中也有人被戴上手铐和脚镣的，并且也一样挨打。常常为了小事，就有可能被叫到队长办公室，受到摔巴掌和拳打脚踢的待遇。桑珍也听说过有女犯被强奸的事。近年来藏人的政治意识更加觉醒，很多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因为参加游行示威而被投入监狱。监狱内的“军训课”是由武警教官主持，他们打起人来特狠，常常罚女孩子们站在太阳下烤晒，高原的日照强烈，很多人晕倒。桑珍说，菩萨总是保佑她们。但也有人受不了监狱里的虐待和艰苦的生活条件，一名 17 岁的女孩子就自杀身亡了。

1998 年桑珍被再度加刑之后，接下来的几年受到格外的折磨。她和另外 11 名女犯关在一间房内，几个月的时间，每天只

有一桶水给 12 个女犯，这不仅是大家的饮水，其他洗脸、刷牙等都就这桶水。

三次加刑

1993 年桑珍第二次被捕后，判了三年刑。才 13 岁的她十分固执，在狱中不但没有写悔过书，坦白交待或对自己的罪行表示悔过，反而“屡教不改”， 因此被狱警用水管和腰带毒打。有一次她和其他女犯从一个男犯人那儿设法弄到一个录音机，她们从电视节目中摘录下一些歌曲，并且将狱中的生活编制成歌，录音下来，想法让人带出，以公诸于外界。事情被发觉后，当局加判她 6 年刑期。从这件事后，外界就知道查奇监狱中有那么一位“唱歌的尼姑”。1996 年冬天由于她和其他尼姑们在狱中喊“西藏独立”和“达赖喇嘛万岁”的口号，又被再度审判，在狱中开庭，宣告加刑 8 年。口头和文字的宣判书都是汉语，她反正听不懂也看不懂，但是依然必须在文件上签字。这些法院的判决书在桑珍出狱时全部被监狱当局没收。

1998 年 5 月 1 日劳动节，狱中有升旗仪式，桑珍是被剥夺了参加仪式的政治犯人。她当时在监房内听到外边有人喊“西藏独立”的口号。5 月 4 日她们女犯再次听到外边有人呼喊口号，她们立即内外呼应。她看到外边喊口号的男犯人被警卫打倒在地，留下地面上一滩滩的血迹。桑珍因为是“共犯”，这次又被加刑 6 年。若是按照这几次刑期的期限，桑珍要坐到 2016 年才

能获得释放。这次出事后，桑珍受到残酷的用刑，狱警用电棍把她打得头破血流，晕了过去。靠了同监房的难友用藏丸给她消炎治疗。以后几个月都不准她换衣服和洗澡，例假来了也没有纸。有些刑事犯看不过去，要帮助她也不行。

桑珍 11 年在狱中始终坚持默默背诵经文。由于没有念珠，她把一件旧毛衣拆了，用毛线打成一个个的结，长长一串就成了念珠，这是每天伴随她的精神食粮。她也曾经为隔邻牢房的和尚男犯编结念珠，让他们在狱中也能持续诵经的功课。

由于桑珍身体的健康日渐恶化，而国际上的营救呼声日高，2002 年 10 月当局要她写悔过书，写下“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部分”，然后考虑放她出来“保外就医”，桑珍自然拒绝不从。相反地她把狱中挨打受虐待的详细情形用藏文写了下来。当局强迫她改写。最后桑珍还是被释放出狱，被告知应当遵守 5 条规则，不可乱说乱动，不能离开指定的居住定点，每月应回监狱报到一次。桑珍出狱后住到姐姐家中，公安人员也跟着搬到她姐姐家对面的房子里，就近监视她。今年 2 月人权对话组织的 John Kamm 到了拉萨，在他的要求下，桑珍获准赴拉萨去会见他。此次的会见为她三月获准来美铺了路。

政府篡改桑珍的出生日期

阿旺桑珍兄弟姐妹一共十人，其中三个和父母亲都已经去世。桑珍出生于 1978 年 2 月 3 日，但是今年当中共当局让她出

国之前，发给她的护照上的出生年月是：1973 年 8 月 4 日，足足报大了 5 岁。原因无他，桑珍第一次于 1990 年被捕入狱的实际年龄是 12 岁，这大约是世界上最年幼的政治犯人， 当时她坐了 9 个月的牢。为了销毁证据，桑珍 1993 年再度被投进监狱后，公安人员到她家把一切户口的证件都抄查走了。中共政权先是要摧毁桑珍的精神，遭到了挫败，小女子坚定不屈。他们同时也折磨她的身体和健康，达到一定程度的效果，但桑珍身体虽然孱弱，仍然留得青山在，存活下来。最后他们要湮灭她的身份、分裂她的人格，蒸发掉她的一切出生文件和个人历史记忆，把她打造成另一个年满三十岁的“新”人，也不成功。阿旺桑珍就是阿旺桑珍，一个瘦弱坚定的小女孩，她自己也许并不知道那个专制政权和它强大的军警法人员都败在自己的脚下。桑珍的存在将一直是中共政权的梦靥，她是一面专制暴政的照妖镜。

桑珍现在最期待的事是见到达赖喇嘛。她要努力学习英语，希望把自己的故事告诉全世界。她的心每天都悬在西藏狱中的姐妹身上。如果可以，她依然要继续当尼姑，下一辈子也要。

雪山下的火焰

—— 一个西藏犯人的证词

黑色文库 第四集
作者/班旦加措
撰写/翻译（藏译英）/夏加·次仁
英译中/廖天琪
出版者/ 劳改基金会黑色文库编辑委员会
责任编辑/ 廖天琪　古原
封面设计/ 蓝飞　古原
华盛顿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本书由劳改基金会设计、编辑及出版。若获盈利，仅用作《黑色文库》的出版费用。

Fire Under The Snow

By Palden Gyatso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1997
by The Harville Press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Black Series, Volume4
The 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
www.laogai.org
Washington, DC, 2003
ISBN 1-931550-47-6
Printed in Washington D.C.
定价：U.S. $ 18.00